

國立交通大學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碩士論文

《島嶼邊緣》：一九八、九〇年代之交台灣左翼的新實踐論述

ISLE MARGIN : Discursive Practices of The New Left in Early 1990's Taiwan



指導教授： 陳光興 柯裕棻 教授

研究生： 陳筱茵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七月

《島嶼邊緣》：一九八、九〇年代之交台灣左翼的新實踐論述

ISLE MARGIN : Discursive Practices of The New Left in Early 1990's Taiwan

研究生： 陳筱茵

Student : Hsiao-Yin Chen

指導教授： 陳光興
柯裕棻

Advisor : Kuan-Hsing Chen
Yu-Fen Ko

國立交通大學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Graduate for Research and Cultural Studies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in

Arts

July 2006

Hsinchu,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七月

《島嶼邊緣》：一九八、九〇年代之交台灣左翼的新實踐論述

ISLE MARGIN : Discursive Practices of The New Left in Early 1990's Taiwan

學生：陳筱茵

指導教授：陳光興 柯裕棻

摘 要

本論文研究的主要對象是一九九〇年代初期泛左翼的、進步的、文化的評論刊物—《島嶼邊緣》。

《島嶼邊緣》於 1991 年創刊，至 1995 年共發行 14 期，1996 年宣佈停刊。其所關注的焦點並不在八、九〇年代之交台灣國民黨與民進黨的政治和選舉鬥爭中選邊站，亦非為特定政黨的政策護航，而是揭露台灣被政治鬥爭所遮掩的社會矛盾及提供被排斥的弱勢族群一個現身／聲的管道，並頑鬥地反諷當時台灣政治鬥爭、資本奪利的醜惡。「邊緣戰鬥」是《島嶼邊緣》在面對八〇年代至九〇年代解嚴後的社會政經情勢，對抗權力集團的論述及實踐策略。「邊緣戰鬥」在台灣反抗威權宰制的年代，代表《島嶼邊緣》知識份子所佔的位置，選擇一條非正面衝突的抗爭路徑，而是一條具有某種主動性的逃逸路線，並在文化批判評論上採取「後正文」的編輯書寫策略，建構一套「邊緣戰鬥」的論述軸線，高舉「台灣新反對運動」的旗幟，邁向實踐「人民民主抗爭」的公共領域。

《島嶼邊緣》在九〇年代的起落已是個歷史，是個突兀的癥狀，也是個神話。《島嶼邊緣》這個符號具對不同世代、不同族群的人代表著截然不同的符號意義。它的崛起讓霸權結構的當權者跳腳；而它的消逝讓曇花一現的邊緣弱勢感嘆。而對於曾經參與其中的邊緣知識份子，《島嶼邊緣》的停刊是邁向下一階段的動力來源；也可能是個絕口不再提的痛苦禁忌。

關鍵詞：島嶼邊緣 台灣左翼 邊緣戰鬥 後正文 台灣的新反對運動 解嚴

僅以此文卑微地獻給

曾經、現在、未來在台灣「邊緣戰鬥」的鬥士們！（...縱使可能成為 *Don Quixote*...）



感謝在論文現身／獻聲的「神祇們」：姚立群、萬胥亭、張育章、張釗維、王浩威、甯應斌、何春蕤、蔡其達、馮建三、傅大為、但唐謨、陳雪、王蘋、吳永毅（依訪談順序），供「學術靈媒」的我上身，雖然一直學不會「退駕」！並感謝陳光興&柯裕棻兩位指導教授和劉紀蕙&林文玲兩位口試委員合力替我「驅魔」！而訪談稿的安插經過敵人「純真的作手」，對於各方勢力的恩怨糾葛完全沒有經過權衡；如有挑撥之意，必為虛構。請以「後正文」觀點進入本文。

在此叩謝恭送！！

目 錄

【摘要】	i
【言謝—恭送神祇】	ii
【目錄】	iii
第一章 導論—論「島」	001
1.1 起點	1
1.2 提問與展開	4
1.3 訪談及敘事	6
第二章 島嶼邊緣進行曲	008
2.1 邊緣島嶼的《島嶼邊緣》—崛起	8
2.2 《島嶼邊緣》的刊物基本分析	41
第三章 《島嶼邊緣》的亂言亂語亂動作—「台灣的新反對運動」之酷兒操演.	055
3.1 《島嶼邊緣》與西方（左傾）理論思潮的接合	55
3.2 「人民民主」在地（左翼）的論述生產—「台灣的新反對運動」	64
3.3 《島嶼邊緣》的論述實踐—「邊緣戰鬥」與「後正文」之反常態的酷兒（Queer）操演	76
第四章 島嶼邊緣變奏曲—論述軸線的移轉及其消逝	106
4.1 變形戰鬥—論述軸線的移轉	106
4.2 《島嶼邊緣》的曲終人散	109
4.3 九〇年代的後續	131
第五章 結論	136
5.1 《島嶼邊緣》的生死紀事	136
5.2 泛左翼、邊緣另類的文化刊物	137
5.3 八、九〇年代之交泛左翼知識份子的「接合」	139
5.4 九〇年代初期左翼反抗的新實踐論述	140
【參考書目】	143
附錄 一 《島嶼邊緣》大事紀	152
附錄 二 《島嶼邊緣》14 輯（1991-1995）文稿一覽表	154
附錄 三 <島嶼邊緣停看聽> / 蔡其達	162
【後記—天使不敢走的路·傻子一路衝過去】	I-III

第一章 導論—論「島」

1.1 起點

1.1.1 2004：二元對立的台灣社會

2004 年的台灣是一個高度情緒動員的台灣。

3 月的總統大選充斥著遮掩、謊言、撕裂、謾罵、抹黑、操弄、權謀、暴力、激情，不論是草根百姓抑或是標榜理性的專業人士，均紛紛被迫二元表態藍綠¹，藍綠雙方均以政黨／統獨認同收編弱勢團體的階級認同、身分認同，化為選票上的圈印。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陳水扁以「台灣主體意識的勝利」切劃開了競爭對手－國民黨連戰和親民黨宋楚瑜搭檔－的「大中華意識」，以愛台灣的本土化論述加速「去中國化」，贏得二度執政權。歷史位置殊異形成的族群意識形態差異，成為台灣政治中不想弭平，反極欲灑鹽的歷史傷口；以省籍族群的差異，區隔選票的劃分；區隔塑造愈明顯，選民二元對立的態勢也愈深。2004 年總統大選後，由藍綠選民分佈的版塊便清楚可見台灣被族群議題狠狠地撕裂：以大安溪為界，台灣社會居民的價值觀呈現「南」轅「北」轍的差異，一島兩國－南國／北國。

統／獨、外省／本省、藍／綠、中國／台灣...這些二元對立的字眼逐漸成為台灣人民標誌自身位置及身分認同的語彙，甚至以此作為選後劃分群體和評定敵我的標準。以政黨及族群意識形態的分化，將台灣社會的政治矛盾及社會矛盾中的不同歧見，跨過對社會議題進行多元、公共討論的程序，化約為藍綠顏色的二元論述（不是支持就是反對）。而非政治性的社會議題（環保、住屋...）及弱勢族群（同性戀、外籍新娘、外籍勞工、性工作者...）也逐漸被邊緣化或隱而未見。也就是說，台灣現今二元對立的論述不僅加深差異的切劃及相互的壓迫、排斥，並壓抑了台灣其他弱勢、邊緣的聲音；又或者這些邊緣、弱勢的聲音在受公平檢驗之前，早已被政治及媒體貼上藍綠標籤，操作為強化政治二元論述的收編，而顯得力量薄弱甚至噤聲。

面對上述以族群、意識形態二元對立的台灣社會局勢，如何縫合、超脫二元收編？有沒有第三／n 種聲音出現的可能？並且可以代表邊緣現身／聲，而不被二元對立所收編吞噬？換句話說，「擺脫選邊站的第三／n 力量如何成為可能？」成了首要的問題意識。

1.1.2 重返歷史

從現今二元對立在台灣發展的態勢，為何政權的替換只是權力階級相互代換下管制

¹ 台灣媒體在 2000 年總統大選後，尤其是宋楚瑜籌組親民黨後，開始慣以政黨黨旗顏色指稱各政黨（藍－國民黨、綠－民進黨、黃－新黨、橘－親民黨）。並以政黨對議題的支持傾向區分政黨及支持選民為兩大陣營：泛藍（國民黨＋親民黨＋新黨）及泛綠（民進黨＋台聯黨），並以顏色深淺（深藍、深綠、淺藍、淺綠）代表對特定政黨的支持度及忠誠度高低。

力量的置換，並非意味著權力的削弱及管制的卸除？「左翼」的群眾革命、解放力量為何在台灣無以開展，使得右翼的威權統治和新右派以族群政治為名形塑的國家力量，輪替霸控台灣的政權？也就是我認為這不僅僅單因省籍情結所衍伸出在政治色彩上的藍綠對陣，更重要且一直未被言明的是在意識形態層次上與「左翼」（共產黨／社會主義）的切割劃分，是兩個不同層次敵我形構的相互糾葛。

面對當下的問題必須回到過去的歷史探究。所以除了要清理國民黨與民進黨兩黨政治鬥爭史外；並要進一步釐清反對力量實際上是隨著台灣社會的變遷，透過因地制宜的發聲管道、形構因時制宜的論述，以不同的形貌登場；台灣在二次戰後反威權的運動力量並非只是現今主流以「民進黨」為主體的歷史敘事。

1945 年，二戰終戰後隨之而來的並非戰爭的結束，而是「國共內戰」和「冷戰」二元體系的開始。蔣介石政權為鞏固在台統治及「中國」政權的正當性，除了在 1949 年 5 月 20 日，發布「戒嚴令」，進行極權統治；並將「反共抗俄意識型態」挪用為「肅清異己」的工具，施展假肅清匪諜之名逮捕異己、打壓左翼份子的情治行動—「白色恐怖」，全台陷入冤獄及誣陷的肅殺之寒。面對戒嚴時期的政治局勢，反對運動往往以辦報、辦雜誌作為反對力量宣洩的出口，並多次衝撞出批評時政的言論空間及影響政策的制定，故主要以刊物及其論述作為反映反對力量的分析取徑。

以時間的歷時性視之，第一波的反對運動基礎在五〇年代由《自由中國》（1949.11-1960.9.4）拉開序幕；而《文星》（1957.11.5-1965.12）則是繼五〇年代《自由中國》停刊後，影響六〇年代最重要的思想雜誌。此波反對論述對應著大陸遷台和冷戰體制的時空，以大陸來台的知識份子為主的集結，多為「反共」及「批判憲政體制」的政治評論。而第二波的反對運動基礎對應著七〇年代蔣經國接掌政權的轉型期，在政治、經濟、外交上均出現結構性的罅隙，提供了《大學雜誌》（1968.1-1973.1）論述發展的空間。此波反對力量逐漸凝聚以「黨外」成為反對運動的代名詞，並逐漸轉為本省籍政治菁英領導的集結，也由反共論述轉為批判時政為主，黨外人士也逐漸以「選舉」、「街頭運動」、「黨外雜誌」的途徑尋求政治體制的改革。（參見林惠萱，2000：8-23）

戒嚴時期的黨外運動及言論發表多遭到國民黨政府以「反共」為由打壓、抹黑、禁刊，甚至逮捕判刑。在七〇年代末期保釣事件後，反國民黨威權的「黨外」反對力量順著「左／右」兩條意識形態迥異的軸線，在時間的共時性上慢慢岔開。

第一條軸線主要是高舉「台灣獨立建國」的反對陣營。1975 年創辦的《台灣政論》雜誌（1975.8-1975.12），發行 5 期；是第一本以「本省籍」知識份子為主創辦的政論雜誌，也是第一本高舉「台灣（獨立）」大旗的反對刊物。此軸線主要是以本省籍的知識份子、民意代表及台灣經濟奇蹟後新興的中產階級菁英為首，發表時論，要求自由人權、解除戒嚴和開放黨禁，並聚焦在以「台灣獨立」、「台灣本土」為名的政治反對運動。日後也被視為民進黨政治反對運動的開頭，並帶動黨外雜誌的熱絡及轉型：從政治體制的批評轉為黨外候選人的宣傳工具；也從知識份子主導的政治改革，轉為政治菁英主導的政治運動。而這股反對力量在 1979 年創辦了《美麗島》雜誌，從靜態的雜誌出版轉

為動態的發表群眾性的政治演講，聚集黨外運動的支持者，擴大黨外運動的力量；而「美麗島事件」終止了一九七〇年代的黨外運動，卻也開啓了八〇年代「美麗島大審」對黨外運動的聲勢。延此軸線這股力量的集結在 1986 年突破戒嚴禁制，以「民主進步黨」為名組織政黨，並成為當今構築台灣反對運動史的主體。

另一條軸線則主要是以「左翼」為名的反對陣營。1976 年 2 月 28 日《夏潮》雜誌（1976.2.28-1979.2）創刊，發行 35 期。以陳映真、陳鼓應、王曉波、王拓、蘇慶黎為核心，集結民族主義、現實主義派的學者、作家、保釣的歸國學人...等知識份子。前三期為綜合性人文刊物，第四期由蘇慶黎接任總編輯改版《夏潮》，內容轉向反帝國主義、反資本主義及反黨國體制、支持工農階級的批判性左翼論述，從歷史、文學、藝術、民歌、政治、社會階級...等各方面展開政治批判的論述形式。藉由在雜誌的文章發表，發動「現代詩論戰」、「鄉土文學論戰」，以對國民黨制式歷史文化的文學批判，開展左翼思想的視野，並推動民歌運動及投入選舉活動。

在高壓的戒嚴體制下，「反國民黨」仍然是在野知識份子的聯合陣線，但又不願加入黨外陣營的情況下，就必須自舉大旗以鮮明的立場，平衡整個「反國民黨」陣營的文字論述，用新接觸到的左翼思考模式，重新挖掘以及認識台灣的整體面貌。《夏潮》在這樣的條件下破殼而出。（郭紀舟，1995：65）

「夏潮系統」有別於國民黨政府「反共」的統一中國論述，也非全面主張統一回歸中國共產社會主義體制，主要是以民族主義及左翼的人道關懷為起始點，思考「非中共的社會主義在台灣實踐的可能性」（郭紀舟，1995：31）。在「反共抗俄」的年代，開展出一條「左翼」的反對運動路線。但以左翼為主的力量集結，在反對運動史中，卻因日後國際共產體制的相繼垮台、轉型和台灣島內的兩黨政爭以對立性政治議題的操弄，逐漸遭到消音及壓制。

八、九〇年代之交的台灣，國民黨極權政體面對反壓迫的抵抗，政治、社會運動藉由島內人民對「民主的共識」（democratic consensus）衝撞出解嚴的空隙，擺脫五〇年代以來蔣氏威權及國民黨統治的壓制，開創一個邁向民主的轉機。而八〇年代崛起的反對黨—民主進步黨原本以爭取人權、民主、自由、平等為號召的「黨外」力量，在明立公投台獨的黨綱及確立以選舉取代街頭抗爭的運動軸線後，產生質變。解嚴後的體制固然開放，但經歷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和七〇年代末的「美麗島事件」，國家機器的政治迫害及構陷冤獄，加上「反共意識形態」的教育規訓和思想改造，均在心理的精神狀態和生理的身體感覺上造成難以清理的創傷，也促使民進黨為主的黨外反對力量因「懼左」及「撇清」而擱置階級問題，並在執政之後走上背離民主改革的方向。民進黨的反對力量除了重新激化台灣存在已久的統／獨論述，操以「省籍族群」的選舉策略；並以「國家＝國民黨」、「民間社會＝民進黨」的鏈結，深化國家與民間社會的對立態勢，二元極化藍綠的政治立場，統合了社會反對運動團體的發聲，並以此在 2000 年台灣總統大選取得政權。但在贏得執政權力後，與左翼、社會主義的切分線並沒有隨著國民黨政權的下台而被抹消，冷戰時期國府所深植的二元對立—「反共」意識形態未得平反仍被延續，

並以「統派＝中國共產黨」的鏈結，壓迫了左翼及其他社會運動在台灣的發展空間。

現今的左翼知識份子面對國際共產政權的相繼垮台及國內的冷戰反共意識的未獲清理，必須構築一套接合在地脈絡的新論述，藉以擺脫二元對立的政治局勢及二元對立的反對軸線。所以，「左翼的革命實踐如何在地轉化為第三／n 力量？」成了問題意識進一步的提問。

1.1.3 《島嶼邊緣》作為取徑

為探究解嚴時期的進步運動及論述遭遇現實政治操弄之後的轉折，及台灣的政治運動何以統獨矛盾優於社會矛盾的政治論述，動員了選民的情感投入也吸噬了左翼及社運的力量，故重新回溯並檢視解嚴時期前後的文化批判評論便顯得必要。

1991-1995 年發刊 14 期的《島嶼邊緣》除了是一份解嚴後集結文化批判評論的重要刊物，更是延續台灣左翼軸線轉化的論述集結。在傳統左翼勢力的逐漸式微及新左派論述的被挪用，激發不同背景的泛左翼知識分子聚集編輯雜誌—《島嶼邊緣》為同一出口發聲。藉由重新回歸左派在台灣消音的原因，並貼合當時的政治經濟社會實境以文化評論的形式作一連結，冀欲在噤聲後重新取得力量。並針對解嚴後力量逐漸受統獨意識的拉扯而弱化的社會反對運動建構實踐策略，提出「人民民主」、「邊緣戰鬥」、「後正文」、「台灣的新反對運動」...等另類論述，更可視為八、九〇年代之交政治統合社會反對運動下第三／n 種聲音的實踐。

而了解這些邊緣戰鬥者的變動過程也是我自己的慾望及動力。《島嶼邊緣》或許不再復刊，或許被評為不合現今的社會情境，但重溯《島嶼邊緣》並非藉以取暖自慰，《島嶼邊緣》背後所代表的聲音是現今台灣社會被藍綠所掩埋的、所遺忘的。而八、九〇年代之交生成的論述，其結構條件、脈絡勢必異於現今的台灣政經局勢（這是不能否認的時代背景變遷），但這些文化批判論述仍對當今的台灣情勢具有深度批判性的解構力，除了揭示現今台灣的政經情勢和九〇年代這些邊緣戰鬥寫手們所面對的壓迫仍舊存在，也冀望透過這些論述的回返及重新檢驗，可以提供現今轉／強化的壓迫一個分析的參照點，甚至提出切合現今的論述與實踐走向。

1.2 提問與展開

選擇在此重提《島嶼邊緣》即欲藉由《島嶼邊緣》的研究分析作為一個取徑：一個進入台灣八、九〇年代之交動盪歷史的取徑；一個進入解嚴前後文化論述的取徑；一個進入何謂「實踐第三／n 力量」的取徑，並作為當今台灣社會邊緣發聲的參照點。故主要針對《島嶼邊緣》何以是「第三／n 力量」？這個「第三／n 力量」的集結如何可能？又如何產製發聲？最後又如何轉化？作出提問。

《島嶼邊緣》如何崛起？如何運作生產？

面對怎樣的政經情勢及引發何種共同問題意識，這批不同背景的邊緣知識份子以《島嶼邊緣》的匯集如何成為可能？而《島嶼邊緣》這份刊物如何將眾多議題的歧異性

以暫時的同一性再現於解嚴後的台灣社會？

《島嶼邊緣》面對解嚴後的台灣社會提出了哪些論述？

《島嶼邊緣》在內部的成員集結及編輯模式和對外部政治經濟社會論述的回應，均是針對不同面向展開左傾的意識形態爭鬥。《島嶼邊緣》在思想、書寫、實踐上採取那些論述來鬆動二元對立的主流論述？並且因台灣社會的變遷，《島嶼邊緣》經歷了幾種論述位置的轉換？

《島嶼邊緣》為何停刊？其後轉化形式為何？

針對上述的提問展開論文的章節：

第一章 <導論—論「島」>：說明本文意欲藉由八、九〇年代之交台灣標榜邊緣泛左翼的論述刊物—《島嶼邊緣》，探究八〇至九〇年代的台灣知識份子面對當時解嚴後的政經社會情勢，自省出的問題意識如何接合上新左派的論述及實踐，對當代台灣社會現象中資本主義的轉型及民主轉型後國家建造的過程提出詮釋及引發的行動反應，並提供現今台灣反對運動面對新政權輪替後一個發聲可能性的參照點。

第二章 <《島嶼邊緣》進行曲>：主要透過訪談稿的整理，書寫解嚴後以王浩威為首集結的「讀書會」到以「戰爭機器」為名的專欄寫作、叢刊出版至《島嶼邊緣》雜誌的創刊敘事。除了耙梳《島嶼邊緣》成員的集結過程，敘說這群邊緣知識分子當下的心理狀態及身體感覺；並進一步掌握其所對應的解嚴前後政治經濟社會脈動，拉出和外部其他知識集團的座標位置。再者，透過 1991-1995 年 14 期《島嶼邊緣》雜誌的基本內容分析，勾勒出《島嶼邊緣》的生產運作方式及支撐出刊的物質條件基礎。

第三章 <《島嶼邊緣》的亂言亂語亂動作>：分析《島嶼邊緣》的知識分子除了自身在解嚴時代下的身體感覺、自覺意識，並接合了「泛左傾」的西方理論論述，在八、九〇年代之交的文化場域及社會反對運動中，提出以「人民民主」串誦、「邊緣戰鬥」發聲、「後正文」書寫的「台灣的新反對運動」，來對抗傾民進黨知識分子提出的「民間社會」論述。並在後期（第七期以後）由引介西方學術理論的刊物主調轉為以反對二元對立及反本質論的「Queer 酷兒攻略」，開創「假台灣人」、「女人國·家（假）認同」、「酷兒」、「色情國族」等 n 種身分認同，企圖鬆動主流二元對立的論述。

第四章 <《島嶼邊緣》變奏曲>：分析《島嶼邊緣》論述的移轉背後除了對應台灣社會大環境的變遷、「智慧財產權」政策制定的影響，還有內部成員參與狀況的改變。而外部對《島嶼邊緣》的標籤化及內部民主的歧異無以調和，加上台灣政治經濟社會變遷等的多重社會力量，促使《島嶼邊緣》在 1996 年正式宣佈停刊。

第五章 <結論>：《島嶼邊緣》為八、九〇年代之交，以另類／小眾媒體的同仁誌刊物作為發聲管道的泛左翼知識份子集結，進一步耙梳《島嶼邊緣》的文化批判文類在停刊後的轉化形式。總論《島嶼邊緣》作為斬斷二元對立的第三力量集結，對現今社會的參照性。

1.3 訪談及說故事

面對《島嶼邊緣》這個冒發於九〇年代台灣社會的癥狀，如何進行分析及解釋？主要以訪談為主。

訪談從 2005 年的 8 月開始展開，截至 2006 年 7 月共訪談到十二位相關《島嶼邊緣》的受訪者，多為《島嶼邊緣》雜誌的編輯委員、編輯顧問及相關人士。²

受訪日期	受訪者	與《島嶼邊緣》的關係
2005.08.29	執行編輯－姚立群	第三期至第十四期的執行編輯
2005.09.24	編輯委員－萬胥亭（路況）	第三期「拼貼德希達」專題主編
2005.09.30	編輯委員－張育章	第十一期－「民眾音樂研究初探」專題主編
	編輯委員－張釗維	
2005.10.03	發行人－王浩威（譚石）	第五期「宛如山脈的背脊－原住民專輯」專題主編
		第七期－「佛洛伊德的誘惑」專題主編
		第十二期－「保衛阿圖塞」專題主編
2005.10.12	編輯委員－甯應斌 （何方／卡維波）	第八期－「假台灣人專輯」專題主編之一 第十三期－「激進神學」專題主編 第十四期－「色情國族」的專題主編
	編輯顧問－何春蕤	在《島嶼邊緣》的編輯事務上亦有投入
2005.10.15	編輯委員－蔡其達（晏山農）	第一期－「葛蘭西一〇〇」專題主編
2005.10.28	編輯委員－馮建三	第四期－「廣告・閱聽人・商品」專題主編
2005.11.09	編輯委員－傅大為	第二期－「科學・意識型態與女性」專題主編
2006.06.06	但唐謨（蛋糖饅）	第十期－「Queer 酷兒」專題主編之一
	陳雪	第九期「妖言」的發表及「Queer 酷兒」座談與談人
2006.07.19 （口試後訪談）	編輯委員－吳永毅	第八期－「假台灣人專輯」專題主編之一
	編輯委員－「平非」之王蘋	第九期－「女人國・家（假）認同」專題主編之一

訪談的提問主要是有關受訪者與《島嶼邊緣》雜誌的關係。包括當時如何進入《島嶼邊緣》？在《島嶼邊緣》雜誌的參與？《島嶼邊緣》雜誌的崛起和消逝的原因？最後則是對《島嶼邊緣》雜誌的評價或定位。³

藉由上述受訪者的訪談稿併以 14 期的《島嶼邊緣》和唐山出版社的《戰爭機器叢刊》，及八、九〇年代當時的報紙、文化評論刊物...，探究《島嶼邊緣》的成員組成及現狀，了解其辦雜誌的定位、籌備時間、主題設定、印刷版面編排、經營資金和廣告來

² 基於時間及空間的限制，有許多想要訪談的對象未能受訪：有的找不到聯絡的門路、有的則是在國外、有的則是沒有回應、有的則是...沒有面目。尤其是《島嶼邊緣》中表述建構出的邊緣群體及《島嶼邊緣》的閱眾，在個人能力及外在限制下被迫在此文當中消音、隱身。

³ 而每次的訪談，我總是想著一個沒有答案也問不出口的問題：對於「曾經『投資』《島嶼邊緣》這個符碼的人」（陳光興，1996.09：197），我的訪談是否重新召出他們什麼？此刻重談《島嶼邊緣》，對他們到底具有什麼樣的意義？

源等面向，來勾勒這一批知識份子在面對九〇年代初期台灣解嚴後的政經情勢及社會環境，各種反對運動與權力集團的衝突及抗爭的空隙中，集結凝聚共辦《島嶼邊緣》的內在動力何在？及那個時代台灣知識份子的共同問題意識為何？及當時知識份子所接合的相關理論脈絡的整理，進行研究分析。

訪談稿在文章中的運用，將採取大量直接引用不同時間點的受訪者針對相同問題的回應文字。⁴這樣的書寫必須先釐清的前提是這些第一手資料是經由我主觀意識地詮釋、檢選而拼貼再現；而如此斷章取義的書寫則是希望試圖製造一種《島嶼邊緣》成員相互對話的張力。嘗試具體記錄邊緣知識分子如何在二元對立的政治情勢及政治運動統攝社會運動出口的時空中，以《島嶼邊緣》的發聲管道為集結，並構築一套邊緣串連方式及《島嶼邊緣》的邊緣認同。這樣的做法，除了因為現實上重聚這群編輯成員的不可能；另外虛擬對話中的相互呼應，某種程度固著並正當化我對《島嶼邊緣》歷史現實的描繪；但更重要的反而是對話中的歧異所顯現《島嶼邊緣》的歷史複雜性，並提供不同位置對《島嶼邊緣》的認知框架。

另外，我欲透過《島嶼邊緣》的刊物史來展開一個有別於現存的台灣社會史觀—邊緣多元盡現的歷史。冀望以「說故事」的方式取代理論架構，因為《島嶼邊緣》當中呈現最為豐富的不只是理論論述的提出，而是人在社會動盪中最直接的身體感覺產出的文化產物。所以藉由素樸地勾勒《島嶼邊緣》創刊到停刊時期的歷史，和整理當時台灣的社會、論述的轉進及運動方式的改變，描繪出在動盪時代下受到多重社會力衝撞、擠壓出的人們的面貌。透過書寫《島嶼邊緣》為主體的小敘事，放置在八、九〇年代的台灣政治、社會、媒體、社會主體的心理狀態...的激撞網絡中，去說「島邊」的故事：說一個解嚴後知識分子在台灣的故事，說一群堅持邊地發聲、寧鳴不默，但最後終致分岔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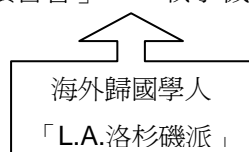
⁴ 訪談稿內容不另附件，文中訪談稿資料的引用段落均以「姓名：縮行變形字體。(年月日)」的格式標明「受訪者：訪談內容(受訪日期)」；而訪談稿引用姓名以《島嶼邊緣》雜誌上編輯成員名單為用，另註明(真實姓名/慣用筆名)。

第二章 島嶼邊緣進行曲

時代的洪流已經捲入鍋爐中，沸騰的情緒急欲找到宣洩的出路，高漲的氣焰衝出了抑制的蓋，壓抑重返的煙霧活蹦的竄昇。九〇年代的開頭在既是世界的邊緣島嶼也是大陸邊緣島嶼的台灣，群聚了一群不分統獨、不分省籍、不分知識土洋、不分學院內外、不分身分認同卻以「邊緣知識份子」身分自居的人，急欲劈荆斬棘找尋一個出口，一份建設新社會的藍圖，一條躲避威權宰制的逃逸路線。但卻又在九〇年代中期各自離散，但戰鬥的種籽已隨其血脈散落至各邊緣角落，並恪守其位生根發芽，靜候時局更迭中下個串連戰鬥的時機……。

2.1 邊緣島嶼的《島嶼邊緣》—崛起

「讀書會」→「戰爭機器」專欄、叢刊→「島嶼邊緣」的三段進程。



《島嶼邊緣》是台灣解嚴後以王浩威（筆名 譚石）為主要的節點，藉其號召的「讀書會」作為串連平台，由「讀書會」主要成員和「L.A.派」⁵的海外歸國學人為基幹：王蘋和丁乃非（共筆名 平非）、李尚仁（筆名 迷走）、吳正桓（筆名 吳其諺）、吳昌杰（筆名 楊棄）、吳永毅（筆名 施和悌）、林寶元（筆名 梁新華）、陳光興（筆名 南天門）、甯應斌（筆名 何方）、楊明敏（筆名 冥冥）、萬虛亭（筆名 路況）、蔡其達（筆名 晏山農）、蔡珠兒...等人，在《自立早報》副刊主編顧秀賢的邀稿下以「戰爭機器」為名開設專欄，撰寫文化評論，並由「唐山出版社」將評論文章集結為「戰爭機器叢刊」出版，最後凝聚一股泛左翼知識份子的集結力量創刊《島嶼邊緣》（1991-1995）14期。

2.1.1 讀書會

故事就從解嚴後的讀書會說起。

1. 人脈串連的匯合點—王浩威

蔡其達（筆名 晏山農）：我想最重要的一個關鍵，其他人應該都有跟你提到，其實最關鍵的人物是王浩威。因為要不是他，這群人不可能全部可以聚在一起。（20051015）

1984年，高雄醫學院的學生王浩威北上實習，面對到的是從戒嚴走向解嚴的台灣社會。而八〇年代初期的台灣仍在戒嚴令的禁制下，但社會上的矛盾意識受到七〇年代「保釣」、「中壢事件」、「美麗島」...等事件的影響逐漸擴大，黨外及社會運動要求改革開放的聲浪也愈趨升高。知識界開始透過讀書會及營隊的舉辦，進行人脈的串連及理論

⁵ 「L.A. 洛杉磯派」又稱「La 拉派」是挪用吳永毅（20060719）訪談時的定義詞彙，指稱解嚴前在海外留學的左翼知識份子團體之一。

思潮的傳遞。而隨著社會運動、地下活動的勃興，個人或團體之間的「人際網絡串連」⁶ 背後伴隨的社會推動力，成了八〇年代台灣知識分子及社會、運動主體面對台灣社會、政治、經濟結構轉化下所因應出的社會行爲。

王浩威（筆名 譚石）：我當時還是高雄醫學院醫學系的學生，1984 年北上台北實習時，才開始參加所謂有關的「地下活動」。實習的這段期間，我常到台北重慶南路的「桂林書局」找一些原文書來看，在桂林認識了一票「週末派」志同道合的朋友：有呂正惠、林寶元、陳璋津、陳伯璋、辜正豐...等一票人。⁷

又因為自身醫學院的背景，也認識同期的台大學生、黨外的「新青年」—民進黨「新潮流」派系的第二代：吳昌杰及活躍的學運份子李文忠。另外 1981 年在高雄助選黨外人士時，認識文化大學的鍾喬、楊渡，接觸到了陳映真等「夏潮」系統的「社會主義」者。另外在一個陽明山教會舉辦的暑假營隊中，認識了剛回國的王菲林，日後並加入王菲林家中舉辦的《資本論》讀書會⁸。

在王菲林的引薦下，我開始在《電影欣賞》撰寫影評。便認識了念完心理學博士回來的吳正桓（筆名 吳其諺）⁹。吳正桓並找了一票人：迷走（李尚仁）、現在裝置藝術的王俊傑、誠品的林文琪、市立療養院的游正名等年輕人，辦了一個「電影欣賞獎」¹⁰。

1985 年畢業後在台北準備當兵服役。《南方》雜誌正籌備創刊¹¹，總編輯呂昱在出刊前，曾南下校園與學生進行互動串連，透過我在高醫的學弟介紹到台北找上了我。所以在《南方》我也認識一群人：第一批核心的人就是林深靖、藍博洲、林芳玫、李尚仁。從 1985 年一直到 1987 年退伍，我就是過著白天上班；晚上就去編《南方》雜誌的生活。我因為當時當兵的關係，所以在《南方》雜誌的編輯群中其實是處於比較邊緣的位置，但那個地方就開始變成大本營，認識寫《軍旅札記》的楊照和路況（萬胥亭）。（20051003）

萬胥亭（筆名 路況）：我那時考上台大哲學研究所。我是透過陳克華和王浩威在文學的領域裡面認識的，之後還有一陣子，我們一起編過《現代詩刊》¹²。王浩威的角色就有一點像一個好好先生，從最早的時候到他家辦讀書會，到後來寫專欄、出書，等於是他都扮演一個媒介。他是從一個比較文學的領域跨到一個比較廣的文化批判、文化評論甚至政治的領域，所以各路人馬都認識他，所以他實際的角色像是一個各種人脈的接合點、匯合點。（20050924）

王浩威溫和敦厚的個性加上自身投入文學創作，並深具左派思潮的因子，當時在台

⁶ 並在此後，甯應斌在《台灣的新反對運動》一書中，提了「人民民主的串連」和「串連」的論述。「串連」似乎是這個年代知識分子口中的「行動口號」。

⁷ 「就是大家週末才有空。因為那時候還沒週休二日，就禮拜六中午過後，大家就會跑去那邊買書、看書。看完書之後傍晚就會一起吃飯、打屁、聊天，他們就自己叫『週末派』。」（王浩威，20051003）而桂林書局是當時少數專門引介英文原文書及西方思潮書刊的書店，所以也成為當時知識分子人脈串連的所在地。

⁸ 王菲林（1956.5.13-1992.5.20），已故的左翼電影文化工作者。《島嶼邊緣》並編有「王菲林的時代—台灣八十年代的結束」的紀念專題（《島嶼邊緣》，第 7 期：67-95）。

王菲林解嚴前投入工黨的建黨工作並在新店自家公寓組了一個《資本論》的讀書會，找了王浩威一起參加，裡面還有汪立峽、吳正桓、林寶元、杜繼平、韓家玲...等人。王浩威在訪談時表示，讀《資本論》在當時是不能言明的禁忌，而且這種讀書會大家都會讀出感情來。

⁹ 吳正桓，筆名「吳其諺」，已故的左翼電影文化工作者。自「讀書會」—「戰爭機器」—《島嶼邊緣》的重要推手，與王浩威合編《島嶼邊緣》第 7 期「佛洛伊德的誘惑」專題；並為第 13 期封面內頁指稱的「老吳」。

¹⁰ 《電影欣賞》第 32 期—第四屆的「電影欣賞獎」（1988.3）。

迷走（李尚仁）在〈獎的神話、獎的功能—第四屆電影欣賞獎〉一文中也詳細記載這段「幼齒派」的審獎經歷，當時這票年輕人擔任評審時，質疑並修改僵化的議事規則及守舊的給獎獎項，並提出一套（當年度適用的）新評選辦法。可以感受到當時解嚴世代下的年輕知識份子、文化工作者的年輕氣盛—亟欲求新、改變體制且「氣焰高張」、勢不可抵。（參見 迷走，1990：191-196）

¹¹ 《南方》雜誌（1986.10-1988.6），發行十七期，標榜「新左」的學運刊物。

¹² 《現代詩》季刊（1953.2-1961.8 復刊 1982.6-1997.12），文學刊物。

北及高雄都結交到知識、文化...等各界好友，涵括統獨兩派、電影及文學創作...等領域。這樣的人脈條件也奠定王浩威日後成為《島嶼邊緣》主要串連匯集的聚合點。

2. 讀書會－讀什麼書？怎麼會？

1987年，台灣解嚴。王浩威退伍後在台大擔任精神科醫生，自身在知識上的左傾取向，開始閱讀大陸簡體字的翻譯書刊；另一方面本身對於新左翼、精神分析及後現代等理論思潮感到興趣，開始透過英文原文書的閱讀汲取西方結構、解構...的新思潮。

王浩威（筆名 譚石）：當時我透過「夏潮」系統開始接觸到一些「社會主義」的思想，就開始有各種這類的資源，就可以看到一些大陸簡體字的書。那讀的書某個程度上發現有所不足，因為當時大陸簡體字翻譯的書籍，仍顯保守，多為傳統左派的理論。1984年的時候，桂林出版了廖仁義翻譯的《法蘭克福學派》，開始看了「法蘭克福學派」的東西，總是覺得還想要再讀一些東西，大部分這種書都是英文的，像結構、解構...等等，所以那時候就想要讀英文的，特別那時候就想要讀拉崗的東西，就開始聊。（20051003）

由於求知若渴及謀求串連實踐的力量，王浩威便在復興南路的自宅中組織一個「讀書會」，閱讀相關精神分析及法國當代的西方理論：拉崗（J. Lacan）、傅柯（M. Foucault）、布希亞（J. Baudrillard）、克莉絲特娃（J. Kristeva）...等的當代思想理論。

那時我們組了一個讀書會，最先是因為要設法一起讀懂拉康的作品，猶如天書一般的《Écrits》，也就聚了一群不同知識背景的朋友，每週固定的時間就陸續出現在我家裡我自己的臥房兼書房。這個讀書會竟然也維持了近三年，前後參加的十多位朋友也就這樣讀出了「革命情感」，才有了「戰爭機器」這樣的江湖名號。

對我來說，這許多的閱讀開始摧毀了我原先內心世界的理性邏輯，根深抵固的二分思考開始真正融化消失，思考開始出入於弔詭的自在。思想，也許還沒辦法變成德勒茲筆下的戰爭機器，讓自己如何逃脫出意第帕司的必然軌道卻開始成為夢想藍圖的一部份。（王浩威，1994：12-13）

（1）讀什麼書？－八〇年代末期多元紛雜的知識狀況

戒嚴時期，國民黨政府以「反共意識形態」為名，在思想方面嚴格控管知識的來源及知識的導向。在思想教育的體系，國民黨政府透過九年國民教育的施行，由國立編譯館統籌編印符合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教科本（俗稱國編本），進行單一化的思想控管。在言論箝制及書刊出版方面，則相繼修訂嚴格的法條規範報紙、書籍的出版及內容¹³，並在1951年頒布《管制匪報書刊入口辦法》直接限制大陸（淪陷）地區的出版品及左翼思潮刊物的傳散。（參見王天濱，2002）

¹³ 從1949年開始頒布《戒嚴法》、《懲治叛亂條例》、《台灣省戒嚴期間新聞雜誌管制辦法》、愈顯嚴苛的《出版法修正案》、《出版法施行細則》、《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台灣省戒嚴期間新聞紙雜誌圖書管制辦法》、《戰時出版品禁止或限制登載事項》的九條禁例.....等。並由「台灣警備總司令部」（今改名「台灣省保安司令部」）負責出版物審核業務，方能印刷、出版、進口。另外並針對報紙採取限張、限證、限印、限價、限紙的「報禁政策」。上述文化出版品的審查，一但查有為匪宣傳；詆毀國家、元首；淆亂視聽、危害社會治安...等違規內容，根據法條予以查禁，進行扣押、沒收、禁止散佈。

台灣經過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時期的肅殺，傳統的左翼勢力被連根拔起，中間雖然經過海外保釣運動的左傾和《夏潮》雜誌透過文學論戰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啟蒙，但是在充滿禁忌的政治環境中，「社會主義」就算是在知識份子的書齋中，也還是一個禁忌。（陳福裕，夏潮聯合會網頁）

所以政策的制定迫使左翼、社會主義的思潮、刊物在知識份子的書齋中「缺席」，並成為不能言明的禁忌。而由於對「社會主義」的禁制而進行的思想控管，經由時間的推移，使得台灣的知識份子對於教育體制內所製編的書籍感到不足並提出質疑，並在八〇年代興起一股「西潮熱」：

「美麗島事件」後，一時之間，不但知識分子大批湧進當時的黨外陣營，而且，各種跟社會實踐有關的思想學說也逐漸蔚為顯學，從而也使八〇年代成為一個社會哲學的年代。其中，最受重視的應該是韋伯及馬克思，以及各種從他們找到理論依據的新馬克思主義思想家，諸如盧卡奇、葛蘭西與哈伯瑪斯。姑且不論這些思想學說是否相映於台灣當時的社會情境，也不論他們是否能受到深入的研究，至少這個趨勢說明了政治的禁忌已經阻擋不了知識分子追求新知的決心，以及它們想要超越昔日被政治冷感症所矮化的思想格局的意圖。（廖仁義，楊澤 編，1999：55）

所以八〇年代大批的留學生及歸國學人逐漸將西方思潮引入，除了援引歐美的當代思潮：自由主義、存在主義、韋伯...，也逐漸「走私」馬克思、社會主義等的左翼思潮。而當時西方的批判理論也從傳統左派轉向新左、新馬克思主義，取代存在主義的結構主義也轉向後結構、解構主義的理論論述。但台灣當時的知識狀況並非跟隨西方思想脈絡的循序漸進，而較像是斷代地同時接收西方的各式思潮，或是斷代地只擷取當時的最新人文思潮。一時之間，各色理論：後現代、文化研究、女性主義、解構...及各思潮大家的名號：布希亞（Baudrillard）、阿多諾（Adorno）、德希達（Derrida）...開始滿天飛，充斥整個知識圈。

一直要到「南方出版社」大量翻印這類中文譯作，所謂「西馬」才普及化些；讀點左派著作雖已不是什麼危險禁忌的事，但多少仍有點刺激及「前進」的意味。而在接下來短短兩三年時間內，台灣很快地和歐美新思潮的流行搭上線，各種流派的思想與學說，從西馬、後現代、解構主義、文化研究.....一個個很快地被引進來（有時亦不免有膚淺消費及趕時髦的情況發生）；在電影評論亦不例外，意識形態批評、女性主義、符號學、精神分析.....等方法都被援用，一時間術語分陳倒也相當熱鬧。（迷走／李尚仁，1990：xiii）

萬胥亭（筆名 路況）：那時台灣思想的潮流，最早是「自由主義」的思潮，解嚴前夕有一段「韋伯熱」，後來便興起「新馬克思主義」的風潮。當時香港有個社團編了阿圖塞《意識型態國家機器》，小小本的，裡面只收錄兩三篇文章，在唐山書店賣，也幾乎人手一冊。（20050924）

新馬、西馬、法蘭克福學派、第三世界...的左傾知識，隱匿在多元紛雜的西方理論浪潮中，進入台灣的知識界。而這些西方思潮的論述話語一方面開始成為當時知識份子、反對運動的分析資源、框架視角及彼此之間的溝通用語；另一方面也成為《島嶼邊

緣》的成員在文化評論的主要援用資源。

(2) 「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八、九〇年代的求知管道

而對於左傾、西方理論的新思潮，在八〇年代台灣主要知識理論傳遞的管道，在於歸國學人的傳遞擴散、本土禁書的地下管道或西書的翻譯，另外還有人文思潮雜誌相繼發刊的引介。

A. 放洋

威權政體的壓制性與保守性格，使得多數的知識份子苦悶無處發洩，紛紛以出國（從商或留學）來逃避台灣政治社會苦悶與蒼白的氣氛，而最大多數的是逃向資本主義的天堂—美國。（郭紀舟，1995：18）

當時八〇年代的學院知識管道，除了在台灣繼續升學之外就是留學，而又以美國為主要的留學國家。「根據教育部公佈的統計數字，在 1990 年以前，80-90%以上的留學生是留美的，曾經構成在美國最大的外籍學生群體。所以，戰後的精英大部分有過美國讀書生活的經驗」（陳光興、錢永祥，2005b）。這些歸國學人的思維語言和思考架構，深受歐美的思想浪潮所影響，而除了當時身受美國式民主的自由主義洗禮外，無可避免也接觸到六〇年代文化大革命帶來席捲全世界青年運動的左翼思潮，這股左翼思潮也在七〇年代的保釣運動中的台灣留學生所運用實踐。而這一波美國留學潮的歸國學者也藉由組織讀書會或在報章雜誌（《夏潮》、《當代》、《南方》...）發表文章來傳遞西方的理論思潮。

B. 本土

萬胥亭（筆名 路況）：解嚴前，台大附近就很多「小卡車」停駐、竄流，車上裝載販售的盡是禁忌的「簡體字」書刊，包括馬克思的翻譯書，供內諳門道的知識分子和學生翻閱選取。（20050924）

而在台灣內部，西方新思潮的汲取在七〇年代政府整體出版政策的調整下，出版社的增加帶動大量圖書著作、出版品市面上的流通。¹⁴出版業的發展並助長了解嚴前知識的多元流通。「隨著解嚴的宣佈，在外文書刊的進口或翻譯方面，政策上也盡量採取折衷主義的立場，以平常心的寬容來取代一味的禁忌。如今資訊交流的管道暢通，知識圈對於國外盛行的『新左派理論』當然不可能視若無睹」（蔡源煌，1989：242）。而戒嚴時期，「大陸的文化出版品及學術專書...等尚未開放的圖書刊物主要是以地下出版品的模式出現，在新生南路、師大路兩個大學校園附近的流動書攤上」（蔡源煌，1989：239）。所以部分「左翼禁書」仍需經由地下知識管道，藉由人脈或組織取得這些「禁書」的近用權、或藉由「讀書會」來相互交流對知識的理解。

¹⁴ 1976-1986 年是出版業「開放管制獎助起飛期」：隨著管理出版的單位由內政部轉移到了新聞局，由過往的管理監督轉變為輔導獎勵。1973 年內政部出版事業管理處併入新聞局，更名「出版事業處」，在出版法修訂案中明定出版獎勵保障的條款。政府為積極輔導出版事業，對於出版品從管理的角色逐漸開放，轉為獎勵補助。（參見王乾任，2004）

C. 新人文思潮雜誌的發刊

同時期新人文思潮的興起，這代表威權時期意識形態的壟斷與操縱，出現危機。這包括 1985 年的《人間》與《當代》，1986 年 9 月復刊的《文星》，以及同時的《台灣新文化》，以及 1987 年 11 月出刊年輕而左的《南方》。它們的訴求與立場，各不相同，但是幾乎均共有一個「反省」的人文精神。它們對國家、對資本主義、對文化壟斷，各種型態的壓迫，或者提出思潮上的批判，或者提出實踐的呼籲。……這些刊物在 1986 年 9 月以後所發生的文化影響力，很難在此估量。但是我們仍可以公平的說，它們的出現，與時代的脈動有明顯的契合。它們也明白的在試圖改造台灣文化界以往的商品化、大眾化與順服化傾向。這些雜誌的出現，為台灣因為戒嚴而僵固的思想文化，注入新的挑戰。它們同時正好滿足一個「反抗時代」的思想上的基礎。如果我願意，我們甚至可以說，這是另一個較不引人注意，但是極為重要的思想層次的抗議運動。(張茂桂，1989a：37-38)

八〇年代初期黨外政論性雜誌在「美麗島事件」的影響號召下，結合黨外人士選舉的宣傳，刊數大幅增加；但因競爭激烈下的利益導向和內容的浮濫，導致閱讀量下滑而陸續停刊。(參見 林惠萱，2000：2、133-139；馮建三，1995.8：188-189) 繼有別於推動政治反對運動的黨外雜誌，在八〇年代末期興起一波《人間》、《當代》、《文星》、《台灣新文化》、《南方》...等新興人文雜誌的脈動。(參見許津橋，許津橋·蔡詩萍 編，1987) (參見羅葉，楊澤 編，1999：174) 這些新人文思潮雜誌的發刊，除了成為當時知識傳遞論述交流的管道外，也直接提供八〇年代反對運動實踐的論述基礎及發言的空間。

《人間》雜誌(1985.11-1989.9)，共 47 期。延續著高信疆在 1975 年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推出「現實的邊緣」專欄，並累積《夏潮》雜誌左翼思想及鄉土文學論戰的能量而來。陳映真在 1985 年創辦《人間》雜誌，雜誌創刊號的發刊詞即點明《人間》發刊的宗旨：「『人間』是以圖片和文字從事報導、發現、記錄、見證和評論的雜誌」。秉持左派的視角，以民眾史的報導，探討社會政治經濟的問題，並開啓五〇年代白色恐怖被掩沒的肅清歷史。在戒嚴結束之前的社會變動下，《人間》集結了一群年輕的報導寫手與攝影記者，走進生活的現場，走進事件的現場，從社會弱勢團體與個人的立場去看台灣的人、生活、勞動、生態環境、社會歷史。貼近生活、貼近人民，繼而以筆、照片反映社會底下人的真實樣貌。《人間》在 1989 年因財務虧損而宣布停刊，更確切的說是因為刊登「杜邦」的廣告引發爭議。《人間》雜誌停刊後，陳映真轉投注在人間出版社的刊物出版，並在 1998 年 12 月推出介於書籍與雜誌間的「人間與思想創作叢刊」。《人間》結合報導文學、紀實攝影的綜合性高度人文關懷，為日後報導文學的主流動線奠下根柢。並集結左翼知識分子的社會運動能量，以下鄉、蹲點的方式走入田野、貼近中下階層弱勢族群，並累積可觀的報導文學作品量。(參見 劉依潔，2000)

《當代》雜誌(1986.5-1996.3/118 期休刊，1997.7 復刊-迄今)在 1986 年創刊，金恆煒擔任總編輯，以彰顯「時代性」為宗旨，包括人文、哲學、文化、思想、文學、藝術等的綜合性刊物。「《當代》雜誌的創刊可以說是台灣思想史的一件大事。從創刊號以法國後結構主義思想家傅科作為專輯人物來看，它已經宣告了台灣的知識分子想要爬

過新馬克思主義的峰頂，往前探勘更壯觀的風景」(廖仁義，楊澤 編，1999：55)。《當代》介紹主要的世界哲學思想，從尼采到福柯，從葛蘭西到德希達，從後結構主義到新馬克思主義。並發行有「德希達」、「女性主義」、「科學哲學」、「情色」、「魯迅」、「新馬克思主義」、「法西斯」、「台灣史」、「比較文學」、「激進神學」、「後殖民論述」...思想專輯，提供有關西方社會文化現象、大師經典思想與現今社會發展關係的討論。內容並包括國外文學作品的翻譯、國內作家的散文、小說、評論等。是解嚴前後主要引介西方思潮的重要刊物，也是台灣維持最久的人文刊物。而《當代》雜誌也在《島嶼邊緣》發刊前的論述空間上，扮演重要的平台角色。「人民民主」與「民間社會」的論戰在《當代》雜誌開打。但也因為《當代》過於學術性的色彩，無法容納「島邊」知識份子非學術性的論述或創作，也成為推動《島嶼邊緣》發刊的因素之一。

《文星》停刊二十年後，在 1986 年 9 月重新復刊(1986.9-1988.6)，共 99-120 期。仍著重文化思想的傳遞，以綜合性文化評論刊物之姿走過戒嚴到解嚴。但在財務的負擔及社會現實的考量下：經過時代變遷的社會，缺乏文化思想的關懷，《文星》無法與知識青年及社會的走向接合。蕭孟能在 1988 年宣告《文星》停刊。

1986 年 9 月，由台灣菁英作家集結創辦《台灣新文化》月刊(1986.9-1991)，共 22 期。由宋澤萊任總編輯，倡導台語文化運動，內容以強調台灣本土意識及台灣文化的文學和評論為主。「《台灣新文化》是當時本土作家籌資創辦的刊物，致力於釐清台灣文化的特殊性，及其在將近一百年的『脫中國』歷程中跟中國文化之間的差異。」(廖仁義，楊澤 編，1999：56)一共發行 22 期，其中 16 期均遭到查禁，最後鼓吹「台灣民族論」，高舉「台獨」的文學大旗，而遭停刊。

《南方》雜誌(1986.10-1988.6)，共 16 期。以新馬克思主義之姿在 1986 年 10 月創刊，在呂昱的運作下，年輕及左的立場影響整個八〇年代的學生運動，從爭取校內民主自由，到以反國家霸權、資本主義霸權為核心，並鼓吹「民間社會」的興起。不僅見證解嚴前後民主化的過程，也提供校際學運的串連整合，並出版有《自由之愛：台大學生「自由之愛」運動紀實》...等人文思潮及學運刊物，積極帶入文化批判的知識領域。「《南方》是一群學運精英為自己與更廣大的知識精英進行思想論辯而創辦的刊物，雖然財力單薄，但是對當時校園的思想視野的開拓卻有重要貢獻」(廖仁義，楊澤 編，1999：56)。1988 年停刊之後，更深刻影響九〇年代的野百合學運。而自我標榜新左路線的《南方》雜誌，後期提出了「民間社會」的論述，供以反對運動實踐之用，而論述構築者日漸傾獨的偏向，併以民進黨挪用以詮釋台灣社會運動在八〇年代末期的勃興，其後並以自由主義學者為主的澄社所辦的《中國論壇》(1975.10 創刊-1992.10 停刊，共 385 期)持續延燒，「民間社會論」的論爭更是日後《島嶼邊緣》重要的攻擊目標及對話對象。(見本文 3.2.1)但另一方面《南方》貼合台灣現實脈絡的論述形式和深入校園的力量結合，也是日後《島嶼邊緣》發刊時投射的刊物想像之一。

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源起於北美留學圈，由傅大為積極串連運作，集結不同領域的成員組成編委會，在解嚴後一年(1988.2 創刊-迄今)創刊。並以台灣在地的經濟、

社會、政治、文化、傳播...為問題意識，強調社會改革實踐與理論詮釋應用並重的批判性研究為宗旨的台灣左派刊物。除了刊載社會批判的理論性學術論文，並出版學術論著，且不定時針對社會議題舉辦「台社論壇」，開放與外界的對話空間。《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簡稱《台社》），是獨立於學院或學科外的人文社會性研究刊物。其編輯委員的資格、文章的撰寫格式、稿件的刊登均須經過學術標準的嚴格審核制度。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在文章刊登過於學術色彩和嚴格的撰寫型式，也推擠《島嶼邊緣》選擇較為靈活性的發刊定位和編輯形式。

吳永毅：「新左評論」是一個在「島嶼邊緣」出來前，各個不同派系裡面排名最高的。所以對雜誌的想像是逐漸發展成為這個樣子。另外我覺得大家應該希望和《南方》當時的作用有點像，它可以連結理論，又可以跟台灣現實貼近，跟學生、校園、社運都有一些關係。當時《當代》、《台社》都還在辦了，我們不是要走理論、也不是要研究，希望更靈活更基進。我認為當時是有討論跟《當代》不一樣，和《台社》也不一樣，所以《南方》比較像是我們這幾個不同複雜的人、力量之間的共識。.....當時大家有一個共識就是說，有一點像是「左翼文摘」，是最可能辦成的雜誌。因為第一個對於當時可以產生多少跟台灣現實貼近的論述，是沒那麼大的把握，講真的。那大家不管怎樣就搞一些翻譯，這樣至少有足夠的量可以維持定期出版。也許這個份量是大家當時覺得最容易讓它延續下去的東西。所以我覺得其中有一個選項就是變成像這樣的東西，所以有點像《新左評論》。就是把當時西方在談什麼，我們就把它翻過來，所以這有點從雜誌的生產。我覺得模模糊糊不管王浩威這邊、或者是陳光興，或者我和王蘋...，大家都認為這是一個維持雜誌繼續再生產的方法。所以那個名稱和對雜誌當時的想像，是有點合在一起的。(20060719)

姚立群：《島邊》一開始有幾個模仿的對象，就是《島邊》要長得什麼樣子？就是《新左評論》幾個雜誌，有一兩期都會寫到那些東西吧！它有一些想要取法的雜誌，但《島邊》比起來又雜了一點，包括文章類型的選擇並不是非常整齊，《島邊》有的文章很長，有的分上下集出，也有小的、個人的抒情文，它整個內容比較混雜一點。另外還有一個，說競爭者也有點奇怪，就是會常常拿來跟《當代》做比較，那時候它是比較笨重一點的，現在反而有一些活力起來。而《台社》比較像是一個論文發表的園地，比較單純的編排，不考慮「賣相」。《島邊》是會考慮「賣相」的，只要連續幾期印刷廠做的不太好的，美編就會要求把它換掉。後來我們就找沈式，沈式是比較大的印刷廠，我們以為錢會比較高，結果也沒有，所以如果費用一樣，我們當然找好一點的印刷廠，換過兩次的印刷廠。(20050829)

可以顯見當時籌辦刊物時所投射想像的型體模樣，除了《新左評論》之外，《當代》、《南方》、《台社》均是「島嶼邊緣」日後籌辦刊物的「理想型 ideal-type」：希望以文摘形式一方面引介西方左傾的理論思潮，另一方面構築台灣現實脈落的論述；並隱含著企圖以刊物介入校園論述的意向。所以上述這些人文思想刊物所提供的發聲空間、論述內容除了傳遞理論思潮及推動左翼或台灣的文化運動，並提供刊載論述的空間供其知識分子發言，亦透過雜誌擴散新興社會運動的議題及實踐論述，並都和《島嶼邊緣》日後的發刊有著某種程度的推動和形式投射的關係。

(3) 怎麼「會」？— 哪些人？在哪裡會？

王浩威所組織的讀書會並沒有所謂的「固定成員」。台大牙醫的李尚仁（筆名 迷走）、心理學背景의 影評人吳正桓（筆名 吳其諺）、師大外文研究所的吳昌杰，哲學研究所的路況（萬胥亭）、社會學的林寶元、還有王浩威當時在高雄醫學院的同學楊明敏、蔡榮裕...，剛開始是這幾個人。再之後就是留美傳播背景的陳光興、比較文學的丁乃非歸國後加入，加上輔大歷史研究所畢業的蔡其達，是主要參與讀書會的成員。另外還有

王菲林、蔡珠兒、何春蕤、卡維波（甯應斌）...等都曾短暫來去過。

萬胥亭（筆名 路況）：王浩威當時本身在台大是精神科醫生，找了一批朋友，在家裡面組織一個讀書會，讀一些法國當代的理論，一開始念拉崗，後來念傅柯。這些人主要是以後《島邊》的創辦人：李尚仁（迷走）當時在台大牙醫系；吳正桓（吳其諺）是影評人前幾年已經去世了；還有王浩威當時在高雄醫學院的幾個同學，對精神分析都有興趣的：楊明敏、蔡榮裕；還有吳昌杰是外文系的，剛開始是這幾個人，再之後就是陳光興進來了，還有蔡其達。陳光興當時是稍晚一點參與讀書會的成員，他剛回國，那因為陳光興比較愛串連，他自己想要推「文化研究」，也就開始到處串連。後來卡維波（甯應斌）也有來，還有做工運的吳永毅就更晚一點。（20050924）

王浩威（筆名 譚石）：都是在復興南路我的房間讀，就小小的，奇怪？那時候怎麼擠得下？（笑）這個讀書會並非是小團體的秘密聚會，公開歡迎任何人的加入，參加者只需遵守一個原則：每個人一定要分配導讀，所以就變成讀起來很吃力的就會走掉了，所以人來人往的。（20051003）

而原本是爲了閱讀理論、相互切磋、交流新知的讀書會，反而成了一個人脈串連的介面，這是當初組織讀書會的時候所沒有想到的功能。之後並以此讀書會爲據點，並逐漸在解嚴後的知識界集結成一股新力量，甚至在日後搞出了《島嶼邊緣》...

3. 解嚴後的狂飆社會

「讀書會」當時其所對應的是解嚴後的台灣社會。解嚴後的社會變動與《島嶼邊緣》成員的心理狀態及日後的論述形構是相互拉扯的作用力。在此必須將視角框架放置在台灣戒—解嚴的歷史脈絡，藉由分析整體社會政經結構的轉變與民眾力量的相互作用，使社會運動得以狂飆及消退，也得以了解當時個人身處洞見觀瞻的生活樣態。

一九八〇年代是台灣掙脫舊枷鎖的時代，也是新生事物和新的社會內容開始被添加進舊結構及舊文化裡的時刻。一九八〇年代以 1980 年 2 月的「美麗島大審」開始，以 1989 年的股市狂飆，首度破萬點作結；在中間的則是 86 年 9 月民進黨成立和 87 年 7 月的解除戒嚴，以及 88 年 1 月的蔣經國強人的逝世。那段歲月的歷史佈景快速更動，我們正在告別一個舊的時代，但告別的儀式確未免太淒厲了一點。（南方朔，楊澤編，1999：21）

八〇年代的台灣，在政治力、經濟力、社會力的多重力量匯集下，撞開了重達 38 年戒嚴禁制的大門。雖然看清門後的假象：「許多所謂的威權，其實只不過是一張紙偽裝出來的假像，一被撕開，就再也無法維繫」（南方朔，楊澤編，1999：28），但就像承受不起門扉的再次闖起，或是害怕紙糊片門後的是銅牆鐵壁，抑或慾望的昂起已無法澆熄，非得將整片門壁都撕踹個碎爛，方才霸休。

解嚴此一極端政治性的現象，實亦蘊含著豐富的社會性意義，不只是迫使解嚴後一連串政治自由化的背後，有著回應民間社會要求的基礎；解嚴後一但政治獲得自由化的進一步進展，則亦有助於民間社會作更深一層的要求。...而解嚴一但明示有成為可能事實之後，民間社會的各群體便馬上在獲得此一訊息後，以更大的空間去展現上述「反支配」的具體行為。一時之間，在正式解嚴的前後，民間那種反支配的「氣」難免會因長期積壓的「怨」一但在獲得放膽發洩的機會後，便出現「亂」的現象，一九八七年的社會情勢，相當程度就是解嚴前後「亂」的寫照。（蕭新煌，1990.6.25《中國論壇》354 期：69）

在各種社會、歷史力量的匯集下，國民黨政府在 1987 年 7 月 15 日宣佈「解」除台灣長達 38 年的戒「嚴」令，是世界上最長的「戒嚴令」。而解嚴何以成爲「事實」，是八〇年代極其複雜的歷史力量匯集，並非可單因詮釋的：

有關解嚴（1987 年 7 月 15 日）之所以成爲「事實」的解釋，...不再天真的歸因於執政黨權力中心的主動改革意願；也不再樂觀的視此一政治變革為經濟成長的自然外溢結果。而至少會關照到另外四個極為重要的解釋脈絡，一是政治反對勢力的壯大以及對解嚴訴求的升高；二是來自國外，尤其是美國的壓力（其中還涉及海外台灣人政治團體之影響力）；三是執政黨內部若干菁英對儘早結束「戒嚴體制」逐漸形成某種試探性的嘗試；四是民間社會自八〇年代以來以儼然成形的求變心態。.....這幾個內、外在的壓力，說實在的，在八六年中期都已成形，並轉變成爲一股整體全面求變的「結束戒嚴」訴求。（蕭新煌，1990.6.25《中國論壇 354 期》：68）

解嚴後各種社會運動、弱勢團體（學生、黨外團體、婦女、勞工、農民...）紛紛進行大規模的群聚遊行與街頭抗爭；國民黨則在反對運動由黨外團體政治運動爲主的抗爭下，陸續開放大陸探親、報禁、停止動員戡亂時期、萬年國會的重新改選、廢除刑法一〇〇條、總統的全民直選...，勾勒的是一個台灣從冷戰時期的反共抗俄極權統治轉爲自由、進步的民主化發展過程。

在這些歷史與結構性因素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引起的社會結構變化以及以國民黨為主導的黨國體制對於社會生活的直接間接的介入與操控，又與社會運動的興起與沒落有密切的關係（徐正光、宋文里（編），1980：328）。

顯見八〇年代末解嚴的政治自由化，伴隨著「社會運動」的狂飆，透過「政治力」—外交危機及蔣經國接班後國民黨的轉型、「經濟力」—經濟結構改變後的消費社會興起、「社會力」—中產階級與反對運動的結合相互匯集的「反彈力量」。

（1）社會力與政治力的相互作用

國民黨政權在蔣經國的接掌後，面對國際外交的孤立及政治反對力量的衝撞，造成強控制的衰弱，而 1986 年黨外人士的組黨，也透露了威權體制喪失鎮壓的能力。反對黨的組成及中產階級的興起所形構的社會改革推動力迫使蔣經國宣佈解嚴。解嚴後，國民黨政府控制體的轉化，無力遏止社會運動的抗爭，也因為參與社會運動抗爭的風險降低，促使各種既有資源持續累積投入社會運動組織。

解嚴後的返鄉大陸探親熱，和聲勢日見浩大的反對（台獨）運動，卻也使得爲持續保有優勢威權的執政黨，一方面更強勢地透過媒體控管群眾，另一方面更加懷柔的釋出一些權力（社會運動的空間或法條的修改）以安撫群眾。但動盪環境下所產生出的社會力是不可預測的，解嚴後社會空間，要求改革的聲浪持續不斷，迫使政府釋出更多人民應有的權力。而 1988 年強人蔣經國的過逝，權力遞擅引起政權的內鬥，也出現了一段對社會控制的空窗期，使社會運動資源得以在此期間進行串連擴大。由於媒體的報導及社會反對力量資源動員的大餅加大，抗爭手段及議題的開放空間加大，促使社運組織的

異質化¹⁵及議題、陣線的多元化，以一波波的社會運動、社會議題持續衝撞威權體制，蔚成風潮。(參見張茂桂，1989a)(參見楊渡，1988)

(2) 社會力與經濟力的相互作用

在經濟結構轉化後，八〇年代末期另一方面社會力的展現則是消費力的提昇及資本積累的競逐。伴隨政治力、經濟力解放後資本消費的狂飆，也興起一股追逐金錢的熱潮：街頭巷尾求明牌的大家樂、股票萬點的號子菜籃族，成為八、九〇年代之交的台灣社會經濟力的展現。「八〇年代末期的衝破威權統治的多重力量中，民間龐大的消費力是極為關鍵的；而同時，這股主導性的民間消費力量多多少少也決定了台灣民主政治的走向與形式」(陳光興，文化研究月報第二期)。也就是說，經濟結構的轉變創造經濟奇蹟的財富，伴隨民間消費力的興起，也同時支撐著政治上的反對運動逐漸取得社會空間。台灣中產階級的興起，提供社會運動狂飆在領導、動員、擴散的資源及力量：一方面因權力、資源的不合理分配促使爭取權益的動員力量；另一方面在掌握權力資源後，針對「要求改善生活」的新社會議題：「環保、消費」，經過有效的組織運作，也轉化成為社會運動的新軸線。(參見蕭新煌，徐正光·宋文里 編，1990：21-46)(參見蕭新煌、張景旭，1994)

解嚴之後，詭異的浮躁氛圍渲擴至每顆竄動的心，頓時前仆後繼一湧而上街頭：衝撞拒馬的嘎嘎雜音及漫天抗議口號的叫囂、滿地宣傳標語影印紙的碎屑、游擊紛飛的小蜜蜂噴漆隊、方便攜帶的肥皂箱舞台、隨行隨演的行動劇……。各式各樣的抗議團體輪番上陣：消費者運動、勞工運動、婦女運動、校園民主運動、原住民人權運動、老兵返鄉運動、環保反核運動...，表情紛雜多樣的臉孔裝飾著台灣的街頭。

一九八〇年代正是一切沉寂都開始颯颯起來的時刻。人們颯過政治，接踵的還有颯車、颯金錢、颯股票、颯大家樂，颯是一種狂歡與耽溺，八〇年代的後半，我們沉醉其中。台灣的八〇年代巨變，不只是政治的鬆動重組，還是社會分化的加速和價值觀的丕變。這樣的社會已無法再用昔日的方式來繼續統治。歷史大門被重重撞開後，八〇年代的「颯」乃是九〇年代的「亂」的準備。今日的我們都活在「亂」之中。(南方朔，楊澤編，1999：29)

但在「亂」的當中，「解嚴」並非是一張文令宣告而已，它並非從宣佈的當下就此區隔禁制與解放的兩極。「解嚴」更不是一個靜態的時間節點，並非是一個可以完全讓時間斷裂的事件，而是一種持續抵抗「戒嚴」體制的過程：

戒嚴的即將解除，黨禁即將開放，其影響層面絕非僅止於政治上或戒嚴體制下法令上的一些限制，事實上，戒嚴體制的解除，代表台灣地區將步上一個開放的新社會，不論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等等，都會受到這個「開放趨勢」的影響，在各方面要求改革、要求減少不

¹⁵ 全部運動組織之異質化，都在 1986 年 9 月政治自由化之後發生。組織的異質化則可用三種情形來說明：(1) 原有組織分裂，曾有明顯的相互對立，或者，新的對抗組織的出現；(2) 原有運動團體的分化，形成聯盟但分工的關係；(3) 多元化：不相關也不聯合的運動組織的孤立出現。異質化的整體現象，可作為運動資源擴大聯合(或分隔)，並可以用來解釋外來資源與異質化的關係，也可以代表運動的「風潮化」現象。(張茂桂，1989a：93)

必要或不合理的約束、要求放寬管制；而且，一些意識觀念上的「戒嚴」，也必將在往後逐一解除。事實上，就「戒嚴」的實體執行內容觀之，除政治活動外，與人民日常生活有關的強制限制並不多，重要的卻在於長期戒嚴體制下所養成的一些相當難改變、調整的觀念和意識形態。(楊渡，1988：237、238)

所以八〇年代末期開始到現在一直是個「解嚴-進行式」的過程，一個從「戒嚴」時期權力場域中威權壓制的失衡，加以外力的推擠，和內部的竄動，到「解嚴」之後主體思想、身體感覺破除舊有禁制規範並尋找新價值觀的建立過程，這是一項緩慢、長時，且不知何時完結的改建工程。

2.1.2 「戰爭機器」專欄、叢刊

《島嶼邊緣》的出現是在《南方》等一些雜誌快要消失的時候，也是「新馬」、「新左」、「結構主義」進來的時候。對我們而言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同時也是知識上的斷層。也因此我們才想到應該要多讀書，因為有不一樣的知識背景才能解決問題。經由不同的知識工具激盪出對台灣社會不滿的策略，所以才會有像『戰爭機器』的專欄出現。(王浩威，《POTS》，1995.12.15)

1. 「戰爭機器」專欄

戒嚴時期的報紙、電視、廣播等媒體均在國民黨的嚴格控管或持股經營，媒體在政治禁忌或既得利益之下，頓時成為國民黨統治權的宣傳管道，製播或捏造不實新聞，成為國民黨意識形態統治的傳聲筒、抹黑反對人士的打手。而台灣第一份晚報《自立晚報》(1947.10.10-迄今)，卻以「無黨無派·獨立經營」、「政治上不傾向任何黨派，也不妥協於任何財團或勢力」為發報理念。1988年1月1日開放報禁後，《自立早報》創刊(1988.1.21-1999.1.21)一是台灣解除報禁以來的第一份新辦日刊綜合性報紙，並形成「自立報系」。除了在八〇年代中屢次黨外反對運動的衝突事件中予以平衡報導，甚至直指政府及主流媒體對反對運動的抹黑，確立了自立報系的公信地位。¹⁶(參見 賀照緹，1993)

張育章：報禁開放後，新興小報：《自立早報》、《民眾日報》，為求與兩大報做出不同的報導觀點及滿足不同的閱眾市場區隔，將原有文藝性質的「副刊」，轉變為具有政治性質的文化評論專欄，此舉也附合當時群起的反對運動批判時政的聲勢，閱眾反應相當熱烈，並刺激《中國時報》也將副刊改版為「文化觀察版」(蔡珠兒主編)。(20050930)

解嚴之後，1988年「報禁的開放，新聞自由的擴大化，促成台灣有關抗議運動資訊的更大流通，意識形態更難操縱壟斷，也提供運動人更多的可動員資源以及保護」(張茂桂，1989a：39)。在報禁解除後，報社為求生存，經營方針被迫改變，因應市場的利益導向和言論空間的加大，進行報紙的改版和一連串報業改革的浪潮。因為言論空間

¹⁶ 在1986年11月30日，列管黑名單的許信良傳言返台，在中正機場爆發一場「衝突」，而主流媒體一面倒的播寫「反對人士暴動」的報導，而《自立晚報》的新聞報導及「綠色小組」的錄影帶畫面卻揭發衝突背後的抹黑手段。社會開始警醒對主流媒體的播報內容採取質疑，並也因此確立「自立早報」的公信地位及「錄影紀錄片」在反對運動中的重要角色。(參見賀照緹，1993)

的加大，和因應增張後的版面填補及面對黨外雜誌和其他報刊的競爭，開始刊載政治運動、社會運動的報導，也有助於新興的社會運動訊息的擴散。另外報禁解除後副刊文類的編製轉向，亦提供讀書會成員在切磋新知外具體言論發表的空間。

在報業改革的推動下，《自立早報》的副刊編輯劉克襄及主編顧秀賢，將軟性的「副刊」轉向成爲「文化評論」的專欄型式。透過人脈的串連，廣泛向各方邀稿，也因爲自立報系本身的媒體公正性及容許異議的包容性，並適巧爲解嚴後言論自由的開放提供發言的空間，故大量反對政府的政治或文化評論多刊載在《自立早報》的副刊。

顧秀賢透過王浩威串連讀書會成員，以「戰爭機器」的名義在《自立早報》副刊設立專欄，輪流撰稿。在這一波報業副刊的改版浪潮下，「戰爭機器」除了藉由副刊專欄作爲串連平台，也介入並促使文化評論寫作形式風潮在八、九〇年代之交的興起。

萬胥亭（筆名 路況）：第一階段是開讀書會，那時候我們本身都有在外面寫文章。像李尚仁他有寫一些影評，我那時候是研究所的階段，也開始寫一些文化政治的評論、廣義的文化評論。那時候多在《自立早報》、《南方》、《當代》發表文章。

後來《自立早報》的顧秀賢就跟我們讀書會的成員邀一個專欄叫「戰爭機器」，這個名字還是我想到的，也不是我獨創的，因為那時候對德勒茲很有興趣，就用德勒茲《千山台》那本書中「戰爭機器」的名詞作爲專欄名稱。基本上就是讀書會的成員。當時還想在要用什麼名稱，「戰爭機器」在當時還蠻怪的，但大家就覺得好玩，就用了。那時候的專欄就大家輪流寫，我記得間隔時間也沒有很久，後來就跟唐山出版社陳隆昊合作出書，書系名稱就沿用專欄名稱「戰爭機器」出叢刊。（20050924）

何方（甯應斌／筆名 卡維波）：有個團體叫做「戰爭機器」，我也是列名其中。在唐山的書中還有一個成員表，告訴你「戰爭機器」的成員有誰¹⁷！這些成員當然後來都是彼此認識的，當然之中有些人是之前就認得的，然後朋友介紹朋友，就慢慢把圈子拉大或拉近。因為「戰爭機器」有的時候不只是讀書會而已，還有一起寫文章。在《自立早報》還有別的報紙，《台灣日報》之類的，就是還有別的活動就對了。所以《島邊》的背後確實是有一些相關的團體，人和人之間有些往來，又通通都拉到一起，它是這麼一個比較複雜的狀態。（20051012）

蔡其達（筆名 晏山農）：變成大家已經長期有好幾年讀書會的共識，所以後來王浩威號召一個「戰爭機器」，就是包括「梁新華」—林寶元、「南天門」—陳光興、「晏山農」就是我、「吳其諺」—吳正桓、「迷走」—李尚仁、「路況」—萬胥亭、「何方」—卡維波（甯應斌）、「平非」—王蘋和丁乃非、蔡珠兒、「楊棄」—吳昌杰、「譚石」—王浩威、「施和悌」—吳永毅、「冥冥」—楊明敏。...其實當然不只這些。

原則上就是後來讀書會久了之後，加上八〇年代後期是整個台灣社會、政治運動最澎湃，知識渴求最激昂的時代，所以變成唸了很多西方左派批判性的書、文章之後，當然會想行動。那行動也不是想組成一個政治社團，當然還是放在文化。之前是《自立早報》在1988年報禁解除之後創刊，副刊的負責人是劉克襄，不過基本上主要的編輯是顧秀賢，那顧秀賢願意提供這樣的一個園地，讓這樣的一群人有一個「戰爭機器」的專欄，針對政治、社會、經濟然後從左翼的觀點來進行文化批判。（20051015）

王浩威（筆名 譚石）：那就是這樣在讀書之餘，就聊天，論一些社會、政治、文化的事情，就想說應該要寫文章，才有「戰爭機器」的專欄，專欄後才有「戰爭機器」的叢書。因爲寫久了所以就會有各路英雄來找你聯盟，我覺得顧秀賢他能把海內外這樣的一群人聯合起來，（透過這樣的情形我才認識了傅大為、馮建三這些人），是繼高信疆之後影響台灣文壇最深的人。經過這些歷程，有了些累積，我們才想應該要辦一份雜誌。（20051003）

¹⁷ 「戰爭機器」的名單，請見《歷史成爲傷口》，1990：出版頁和《台灣的新反對運動》，1991：409。

繼上個階段高信疆在「中時人間副刊」和亞弦在「聯合副刊」的改革轉型之後，在 1988 年報禁解除後，顧秀賢的「自立早報副刊」和蔡珠兒「中時人間副刊」的「文化觀察版」，聚集眾多寫手在報紙副刊的版面上共同構築出「文化評論」這個新文類，引起一股文化抗暴的評論風潮。

而 1989 年對於當時台灣的知識份子及「戰爭機器」的成員而言，是極為重要的關鍵年份。

1989 年 6 月 4 日清晨，島嶼的對岸。中共的戒嚴部隊推進天安門廣場，對廣場前「爭民主自由」的靜坐抗議群眾進行軍事的血腥鎮壓。台灣傳唱「歷史的傷口」。六四天安門事件後，台灣國、民兩黨及主流媒體共同以「反共」一譴責對岸中國共產黨的專制極權為發聲論調，併以各自政治光譜的位置進行統、獨論述的建構。隔年，1990 年 6 月 4 日，「戰爭機器」出版叢刊第一本書－《歷史如何成為傷口－「六四」的非官方說法》提出批判。批判台灣島內主流論述大打「反共」旗幟，為統獨的政治權鬥收編「六四天安門事件」所用，並壓抑台灣「左翼」和其他對六四天安門事件的論點發聲。

另，1989 年張俊宏主編《到執政之路》一書的出版，掀起一波以「戰爭機器」為首的「人民民主論」對抗「民間社會論」的文化論戰，並在「戰爭機器叢刊 7」－《台灣的新反對運動》一書中作了全面性的批判。而這波論戰在言論空間的限制及論述觀點的統獨不容性，也促使以「戰爭機器」為主的人脈串連亟欲尋求更廣大的發聲空間。

2. 「戰爭機器」叢刊

蔡其達（筆名 晏山農）：那後來就是 89 年發生「六四」，然後那時官方的一些動員有很多問題，後來「戰爭機器」第一次把這些東西寫出來進行批判。所以後來就是跟唐山合作，出「戰爭機器叢刊」。《歷史如何成為傷口》是第一本「戰爭機器叢刊」，然後陸陸續續也出了十幾本。（20051015）

在 1990 年開始「戰爭機器」延續著在《自立早報》副刊上「戰爭機器專欄」的文化評論風格，以個人的著作或集體合作編撰的模式集結成冊。有系統的編撰一套由唐山出版社印行的「戰爭機器叢書」：此書系原本當時規劃有 14 本，最後只印行 12 本便中斷出版。在九〇年代隨著《島嶼邊緣》的停刊及「戰爭機器」成員的分散，「《島嶼邊緣》的關係「企業」－《戰爭機器叢刊》似乎也在地圖中消失」（陳光興，1996.09：197）...，但直至 2004 年萬胥亭在此書系下又出版《鼠儒主義》、《五月之磚》兩本書。

「戰爭機器叢刊」1-16 輯 列表：

戰爭機器叢刊	出版日	書名	著者、編者
戰爭機器叢刊 1	1990.06.04	《歷史如何成為傷口－「六四」的非官方說法》	戰爭機器搜索群 編
戰爭機器叢刊 2	1990.10.30	《媒體的出神狀態》	迷走（李尚仁）
戰爭機器叢刊 3	1991	《新電影之死》 －從《一切為明天》到《悲情城市》	迷走（李尚仁）· 梁新華 編
戰爭機器叢刊 4	1990.10.30	《後／現代及其不滿》	路況（萬胥亭）
戰爭機器叢刊 5	1991.10.30	《戰爭·文化·國家機器》	成令方 編

戰爭機器叢刊 6	1993.02.28	《低度開發的回憶——一種異類影評》	吳其諺（吳正桓）
戰爭機器叢刊 7	1991.08.01	《台灣的新反對運動》	機器戰警（甯應斌）編
戰爭機器叢刊 8	1991.10.01	《多重戰線》	迷走（李尚仁）
戰爭機器叢刊 9	未出版	《新政治光譜 I—民間社會的決戰》	晏山農（蔡其達）編
戰爭機器叢刊 10	未出版	《新政治光譜 II—人民民主的召喚》	晏山農（蔡其達）編
戰爭機器叢刊 11	1992	《媒體／文化批判的人民民主逃逸路線》	陳光興
戰爭機器叢刊 12	1993.02.20	《虛無主義書簡—歷史終結的游牧思考》	路況（萬胥亭）
戰爭機器叢刊 13	1994	《新電影之外／後》	迷走（李尚仁）· 梁新華 編
戰爭機器叢刊 14	1994	《小心國家族—批判的社運·社運的批判》	趙剛
戰爭機器叢刊 15	2004.10.01	《鼠儒主義》	路況（萬胥亭）
戰爭機器叢刊 16	2005.01.01	《五月之磚：：巴黎學派 68 思想》	路況（萬胥亭）

反對單一化的論述及反對向權力中心靠攏，是「戰爭機器」至「島嶼邊緣」時期的戰鬥目標。隨著解嚴初期原本戰鬥對象的鬆動及瓦解，「戰爭機器」已經不再僅限於衝撞「國民黨」的威權禁制及拆解「主流媒體」的意識形態；面對以民進黨為主的反對勢力逐漸壯大，社會二元對立的態勢逐漸明確，而逐漸擴展另一個思考的軸線：從「打破權力中心」轉向到「反對力量是否會成為新權力中心？」（或者說「打破任何可能的權力中心」）也從二元對立的反對位置跳出，以第三者（或稱邊緣）的角度同時檢視及批判執政者及反對勢力。

叢刊第一本書—《歷史如何成為傷口》，收攏了 1989 年「六四事件」的「邊緣」評論觀點。〈序言〉點明這本評論集結的出版除了補足官方及權力集團的主流論述所忽視的面向，也對當時主流媒體的單一觀點提出批判，更直接拆解媒體觀點背後統／獨問題逐漸成為權力集團政治角力的手腕。

對統獨問題展開批判，是奠基於九〇年代台灣社會情境逐漸對立的政治現況而發。推翻國民黨威權已是眾矢之地，但備予厚望的新反對政黨（民進黨）是否逐漸成為另一個權力壓迫中心？在民進黨政治運動逐漸賦予帶領一連串台灣社會解放及改革開放的色彩後，這個問題在狂飆年代下被忽略、漠視、甚至來不及提出質問。而逾越統／獨的論述定位也延伸至《島嶼邊緣》，甚至在第 8 期「假台灣人」做了最直接的批判。面對兩造權力集團以統／獨論述收攏多元的社會輿論，各自權力中心化的現象，如何使邊緣的聲音可以盡現？邊緣如何能逃離主流意識形態的控制？如何能不被收編？如何保持永遠的開放性，不被固著？握有權力時如何不腐化，不去複製主流意識形態的掌控手法？對「反對力量」的自省及批評，及「邊緣位置」的站定，成為「戰爭機器」及日後「島嶼邊緣」主要的論述軸線。

迷走／李尚仁為「戰爭機器叢刊」寫了〈總序〉，刊載在叢刊每本書的最前頁：

思想就是各種外在力量直接作用的效果，同時也因引發直接作用於外在的新力量新效果。

讓思想成為戰爭機器，就是使思想本身成為運動、成為事件，以各種不同的速度和強度穿過世界的領域，成為世界的一部份。

戰爭機器的作用就是劃出「去中心化」的「逃逸路線」，穿越封閉的「內在環境」，逃出國家機器的捕捉。「逃逸」並不是消極的逃避，而是積極的開放與拓展。戰爭機器的逃逸路線穿梭於體制片段僵化的畛域與輪廓，在不斷移位的「解除界域」(deterritorialization)的運動中，不斷佔領未開發的新領域(territory)。逃逸路線是游牧的軌跡，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沒有任何固定的領域與中心，只是不斷遷移，從一個「面」游牧到另一個「面」。相對於國家機器所規劃分割的「區隔空間」(striated space)，戰爭機器不斷開拓出自由開放的平曠空間。

舉凡科學、哲學、文學、藝術、劇場、音樂都可以成為戰爭機器。

使思想成為戰爭機器，就是實踐多元形式的游牧思想，把概念與文字當作投射的效果與釋放的量子，裝置出非片段非表象的抽象機器，在不斷關聯到外在的各種強度與速度的運動路線中，超越國家機器所「區格」的心靈空間，佔領新的思想領域與面向。

總序也正直接點出了「戰爭機器的逃逸路線是企圖逃離歷史經驗中的偏執，逃離過去不斷犯下的、複製的錯誤與問題」(陳光興，1996.09：197)。「戰爭機器」的知識份子在汲取後現代、解構的思想論述下，「反建制」、「去中心化」成為主要的動力核心，以思想、文字、言論為主要的實踐行動。

這種伴隨「解嚴」的「解構」狀態似乎也為八〇年代末、九〇年代初的時代特色：

如果要形容台灣現階段的變貌，我毫不遲疑會選擇「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和「脫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兩組概念；交錯期間構成實踐動因的核心理念，則不外爭取主體性解放的自由。(蔡詩萍，1995：40)

所以「逃避固著、具有力量、不斷思考的流動性主體」成為「戰爭機器份子」希冀自己可以成為的慾望對象。「戰爭機器」的集聚不僅僅是理論的宣揚，並意含著這批知識份子在當時動盪的台灣情勢下的所選擇接合的思想及表態。這背後所代表的思想轉型並非只是閱讀書本的置換如此簡易，更是一段「戒—解嚴」新舊規制的衝突矛盾，在內心衝撞、突破闖關，並不斷面對現況與自省的過程。

我在1987-1990的文章，基本上經過一次的轉折，由純粹的影評走向更廣泛的文化批評(包括傳播媒體、大眾文化)；由作者論與寫實主義美學的支持者，轉變為藉助精神分析及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的一些理論，來進行意識型態的解析與批判。這個變化不只是我個人在思想上的變動，也是對外在形式變遷的回應；它是諸種力量作用下的一個異質性產物，讀者在裡面不只可以見到一些延續的主題與關切，更可以見到許多斷裂、矛盾、隙縫及不協調。這些外在力量包括單一的作品、個別的事件，也包括文化環境、潮流的變化，以及台灣社會這幾年來所經歷的政經重組。這些文章是這些力量的作用，以及對這些力量的反作用所形成的產物。(迷走／李尚仁，1990：xii)

「戰爭機器叢刊」的整批書系標榜著「讓思想成為戰爭機器；讓身體成為機器戰

警」。「戰鬥」的行動慾望及對任何事物均採取「批判性態度 (critical attitude)」的立場，成爲「戰爭機器」整個的論述主軸及成員的內部趨力。思想戰鬥的論述並同時拓展至《島嶼邊緣》—「邊緣戰鬥」的定位，並貫穿《島嶼邊緣》的各期專題立場。並且叢刊後期出版的時間與《島嶼邊緣》發刊的時間並行，成爲相互提供論述資源的戰鬥夥伴。而論述型式延續專欄時期的文化評論型式，運用批判理論的思維對於現今台灣社會文化的現象進行分析及評論，也一直延續至《島嶼邊緣》時期。而面對西方的理論採取「裝置」(assemblage) 的戰略：

充滿異質性、多樣性的力量與事件，使得我們必須多方援引各種理論資源，因而產生出具有「拼貼」性格的批判論述。但我們寧可以「裝置」(assemblage) 一詞來取代「拼貼」。「裝置」是一種「拆解」與「重組」的技巧，將各種既有的異質元素轉化組合成一部嶄新的機器，電影蒙太奇的剪接技巧即可視爲一種影像的「裝置」。我們的論述方式也不外乎是一種轉化重組諸異質概念的「裝置」，一種思想的「蒙太奇」。每一理論系統都是一「抽象機器」，必須透過不斷的「裝置」而進入個別的事件系列中運作。要如何「裝置」呢？我們並沒有任何知識上的先驗判準或方法學上的必然程序可循，只有從每一「裝置」實際產生的理論效果來評估衡量。

我們希望我們的論述作爲一種概念的「裝置藝術」，一種思想的「蒙太奇」，能成爲一「歡愉的科學」(gay science)，在目眩神馳中使思想躍入狂喜饗宴的嘉年華。(路況／萬胥亭，1990：xii)

這個「裝置」戰略也直接點明了日後《島嶼邊緣》引介西方理論的位置，並非全盤西化的接收及移植，而是藉由「拆解」—「重組」的在地轉化操作，並成爲《島嶼邊緣》論述發聲形式的定位。

此時期「戰爭機器叢刊」的出版和 1990 年吳永毅、王蘋舉辦的「文化跳蚤市場」，累積出衆多人脈和能量，叢刊出版的同時也另外開始謀求籌備一份雜誌的發刊。

萬胥亭(路況)：原本只是讀書會、寫專欄，出書之後闖出了一些名號，那時就不只是讀書會了，開始跟其他人串連。出書的時候差不多是我當兵接近退伍的時候，我記得我還在服役，還曾經趕來台北參加一個活動，又趕回去部隊的一個經驗。第一批「戰爭機器叢刊」出版的時候，當時搞工運的吳永毅跟他太太王蘋在東區的「主婦之店」辦一個「文化跳蚤市場」作爲「戰爭機器叢刊新書發表會」，還有其他的團體參與，當時還有電視媒體(中視)來採訪報導，蠻熱鬧的，弄得蠻轟動的，吸引到一些「廣義的左派知識份子」的興趣，加上解嚴的那個時代氣氛...，就更多人加入了。

我們到了出「戰爭機器叢刊」的時候，人氣聚集的比較旺。因為陳光興比較喜歡串連作活動，那王浩威也都扮演一個人脈的接合點、匯合點，所以可以有那麼多的人聚集在一起。我剛開始也沒想過會形成一股氣勢，甚至變成一個客觀的條件。所以客觀的因素是從讀書會、寫專欄、出書在解嚴後形成一股氣勢；而個人的因素就是王浩威不同領域的都認識他，當然陳光興也扮演了類似這樣的角色。然後在解嚴之後的氣氛，大家覺得「廣義的左派知識分子」應該要做點什麼或講點什麼不一樣的。所以大家在「戰爭機器」出書後，決定辦一份雜誌。(20050924)

從「讀書會」到「戰爭機器」推往《島嶼邊緣》的能量累積的動態過程中，慢慢地加入以陳光興爲主要連結點的兩股人脈：因其工作地緣關係，以清華大學爲主的「清大幫」；和先前留學美國所接觸的左翼團體「L.A.洛杉磯派」。

2.1.3 「L.A.洛杉磯派」的海外歸國學人

事實上，《島嶼邊緣》的組成勢力在「戰爭機器」時期，除了「讀書會」的基本人脈中，其實另外交錯重疊（並非獨立的）一群具有西方留學經驗的「L.A.洛杉磯派」歸國學人，當時在國外早已有某種程度的陣線串連。依著前述八〇年代末期「放洋」和「本土」兩個求知管道的脈絡，約略劃分以「戰爭機器—（後）L.A.派」和「戰爭機器—讀書會派」的兩股重要的知識力量，在「戰爭機器」時期匯流。

而以「L.A.派」為主的留學人脈，就是以蔡建仁（小蔡）和在芝加哥的林孝信為首的左翼知識分子聚集，其成員包括：井迎瑞、何春蕤、甯應斌、夏鑄九、王振寰、李玉瑛、吳正桓、吳永毅、王蘋、郭文亮、曾雁鳴、瞿宛文、鄭村棋、夏林清...等人，而丁乃非和陳光興、舒詩偉屬外圍成員。這支人脈的聚集是極其鬆散的「準政治團體」，企圖對台灣進行「非學術性」的社會改革。

吳永毅：L.A.派不是像「讀書會」那樣固定的團體。它其實是一個複雜鬆散，但又是一個政治上比較清楚的團體。這些人基本上都是在海外被影響或者與一九七〇年代保釣運動變成左派的這群人接觸過。那很清楚的是，回台灣想要作一些跟直接的社會改革有關的事情，所以它不只是讀書、思想傳播而已。但它的組成又很複雜，那每個人的行動程度又不同，光譜也很複雜的就是說，我跟王蘋當時，在那派裡面應該算比較會搞活動的人。譬如說「跳蚤市場」，我們就會搞，那其他人可能就搞不出來；那卡維波（甯應斌）和何春蕤在當時還沒有這種狀況，他們還是比較在校園內想要發表，那卡維波（甯應斌）比較寫一些政論文章，就是除了學院之外，他還會創造一些跟現實比較有關的論述，譬如說「人民民主」；那王振寰可能就不是那麼直接，所以它有一個光譜。然後這群人回台灣以後，是在蔡建仁的「號召」？（王蘋：聚集。）也不能說以他為中心，但在我們聚集的時候，他就會變成看起來像是一個「領導的人」。就是說，我們在海外都或多或少跟他以及還有一個在介入「島邊」的林孝信（一個在洛杉磯，一個在芝加哥）這兩個人有關係。那回台灣以後，因為林孝信沒有回來，所以大家聚會就會以小蔡（蔡建仁）作為一個有點半領導性質的聚會。.....我們差不多一、兩個月見面一次，然後大家交換一下意見，看接下來該做什麼、有哪些方案可以突破、可以發表哪些論述，會有這樣的討論會。但沒有說誰下指令這樣，那個運作大概就是這種狀況，我們希望擴大影響的範圍，不只在學院裡面而已，希望更現實的接觸或行動，可以在台灣的現實發揮政治上進步的作用。

.....那這些成員就包括井迎瑞、何春蕤、卡維波（甯應斌）、夏鑄九、王振寰、李玉瑛（王振寰的老婆）、吳正桓（後來去喬「島邊」的）、我和王蘋，陳光興比較算是外圍的，還有郭文亮（逢甲建築系），然後曾雁鳴（鄭鴻生）、瞿宛文、鄭村棋、夏林清...都是LA派的。所以它（《島嶼邊緣》）背後有另外一個團體，雖然背後那個團體，它極度鬆散，而且沒有共識，唯一的共識就是大家想多作一些事，但在學術上的位置。（20060719）

「L.A.派」成員在解嚴前後陸續返台，部分在陳光興的串連引介下，進出過王浩威的「讀書會」組織。但這股力量初始與「讀書會」的接合是依個人人脈的關係，有深淺不一的參與程度。

王蘋：基本上我不是讀書會的成員。你可以說我從來沒去過；我如果有去過的話，那純粹是個意外，（笑）所以我不覺得我的參與是跟讀書會有任何的關係。（20060719）

吳永毅：陳光興發揮很大的串連作用，把我們這一群在政治上比較想介入現實，不只是思想理論而已的人，去和王浩威那群搞後現代理論的人結合在一起。在我自己的世界裡面，我覺得那時陳光興比較靠近我們（L.A.派）。他會跟我們分析說：王浩威他們會想要做些什麼，應該要怎樣去說服他們。但他當時也許可能也跟另外那群人（戰爭機器—讀書會派）這樣講過，我們（L.A.派）想幹什麼這樣（笑）。我不知道，因為我只看到他跟我們講的這一面！然後我聽到很多陳光興跟卡維波（甯應斌）、王浩威等人的那個讀書會，我只去過一次。那

個時候的目的不是要去參加讀書會，陳光興說叫我們出現要去認識別人，這樣才能串連！（王蘋：就是引介）等於我們藉著去參加讀書會，去建立人際關係，然後看可不可以搞串連。然後說真的，那個讀書會，我們書也沒讀，因為那時候對我們而言像「天書」一樣。好像是拉崗...（王蘋：應該是佛洛伊德。）反正是一個很痛苦的經驗。（笑）第一個書沒讀，然後他們已經討論到一個脈絡，我們中間才插進去。所以他們之前有很多討論，我們完全不知道。所以是以串連為目的，基本上我們不是讀書會的成員；那「戰爭機器」寫稿，我記得我只寫過一兩篇，但那個都很晚期了。所以從我的角度，我比較是從 LA 派的「後 LA 派」，就是 LA 派解散以後，我們希望再往前串連辦雜誌，至少這是我個人的想法。（20060719）

之後並在「讀書會」主要成員組成的「戰爭機器」之下，「L.A.派」部分成員參與共同掛名：「平非」之王蘋和丁乃非、「吳其諺」之吳正桓、「施和悌」之吳永毅、「南天門」之陳光興、「何方」之甯應斌。而王蘋和吳永毅在「L.A.派」中以活動、組織、動員為長，並在「戰爭機器叢刊」第一輯《歷史如何成為傷口？》發刊的同時，在台北忠孝東路的「主婦之店」舉辦「文化跳蚤市場」，主要以「反戰」作為串連的政治目的為訴求，動員黨外（林濁水）、文化（夏宇）、學術（何春蕤）、運動、小劇場、另類媒介（綠色小組）、學生（張釗維和「媒·文化」讀書會成員：張育章、賀照緹、蔣慧仙）...等各界人脈與「戰爭機器」成員群聚串連。

同時期 1990 年學運結束後，面對「民學聯」與「全學聯」兩股學運勢力的拆岔，「L.A.派」為鞏固「民學聯」的校園資源，蔡建仁在公開串連連署名單的粗糙操作，引發內部爭議，「L.A.派」並在這場衝突中宣佈解散。

吳永毅：回台灣以後這群人有繼續開會，那個時候以蔡建仁為核心的在辦「實踐筆記」，蔡建仁希望那一群人能夠站出來，宣佈成立一個（我忘了正確的名稱）「左翼學者學生教授聯盟」之類的。這個應該是在《島邊》籌備前、野百合結束後，「民學聯」有點落敗、居於下風，有點被其他自由主義的團體倒掉，那蔡建仁那時候我認為他想把我們這些他認識的進步、直接的 L.A 派之外，還有其他比較進步的學者串連起來，宣佈一個「左翼陣線的集體亮相」，來鞏固校園內「民學聯」這條路線的資源。因為那時候有「台灣教授協會」、「民進黨」、其他像傾「新潮流」或者其他自由派的學者，都有其他很多的資源，但是民學聯沒有。他是想要把它串連起來，但他在串連過程中很粗糙，就是他把名單都擬好了，有何春蕤、甯應斌、王振寰...，但通通沒有跟這些人講，然後他就把它拿給學生社團，那學生社團我記得當時就開始發起連署，那卡維波（甯應斌）他們是透過學生社團告訴他們才知道。那這件事情以後，有關工作方法及在當時該不該亮相其實有很大的爭議。.....我們 LA 派也乾脆宣佈解散，就永遠不見面。（20060719）

衝突結束後，解散後的「『後』L.A.派」力量也興起另辦刊物的動力，在陳光興的居中牽線下逐漸與「戰爭機器—讀書會派」接合，並與「戰爭機器—讀書會派」在文化評論上採取「裝置」策略的操作方式，逐漸凝聚籌辦刊物的共識：以引介、翻譯西方的運動性進步理論為主，並貼合台灣現實脈絡的批判為走向，以「類《南方》」和「類《新左評論》」的刊物形式為定位。「『後』L.A.派」力量並在《島嶼邊緣》刊物的籌備初期開始逐漸增加介入的程度。

吳永毅：當時跟蔡建仁解散、衝突以後，我們很清楚的是要另外搞一份刊物。也許不是一個集體討論，但至少比較積極的人，有我、王蘋、卡維波（甯應斌）、鄭村棋...很清楚地說，我們要辦一份刊物，看是不是用這樣的工作方式來集結。那不能只有我們怎麼辦？要去結合別人。這個時候陳光興就發揮很大的作用，因為陳光興作為一個橋樑，把我們這群所謂介於老左和後現代中間，因為又不是老左也不是後現代，叫新左好像也不見得像新左。某種程度我們在現實上，又是跟現實貼近，所以怎麼定位不清楚。那在當時就說要辦個雜誌了。所以

王浩威他們也有意，就比較容易接合，但就不是只有他們要辦雜誌的這一面。……而「引介進步思想理論」這個部分的共識最大。這些人湊在一起如果沒有這個共識，我覺得湊不在一起。第一個他們讀書會自己也在搞；第二個我們也不反對引介，從我們「準LA派」或「後LA派」也不反對繼續談。因為當時所謂進步性的刊物相繼停刊，我們想說總要有個替代性的東西出來吧！那《南方》是其中一個想像，類似像這樣的東西。可能我們也比較不太一樣，我們想像是和舒詩偉比較接近的東西，就是介紹西方運動性的理論、報導。我和王蘋可能比較這種傾向。那也許他們想像是比較接近《新左評論》，稍微學術理論一點，差別也不是那麼大，就是當時從進步的理論和動態的角度，我覺得是當時最大的東西。譬如說我和王蘋、卡維波（甯應斌）這種人就希望比較是偏向《南方》，談一些跟台灣現實有關的東西，只是當時人力能不能做到，不是有太大的把握。因為當時我們有去算「寫手」麻！如果要像《南方》的話，我們總得要有些寫手。第一個要和運動有關，像《南方》都是在黨外打混的人，那我們都不是。那這種人我們算一算不是那麼多，所以像卡維波（甯應斌）那種人算是在運動邊緣，按照自己的想像；那跟以前的呂昱、郭正亮那種直接在幫人家助選又從事生產理論，我覺得又不太一樣。所以我們那時候算寫手不太夠啊！但是我們還是要推啊！那我們那時最大的公約數還是傾向運動性理論的引介，把它跟台灣稍微作結合。所以那個是最大的公約數，讓它可以往前推。（20060719）

「『後』L.A.派」在《島嶼邊緣》發刊的編務成員組成中佔據某部分的比例。「L.A.派」在《島嶼邊緣》編輯顧問的人脈有：井迎瑞、何春蕤、夏鑄九、瞿宛文；編輯委員的人脈有：王振寰、王蘋、何方（甯應斌）、李玉瑛、吳正桓、吳永毅、郭文亮、曾雁鳴（鄭鴻生）、鄭村棋，另外丁乃非、陳光興、舒詩偉則為「L.A.派」較外圍的半成員。這支「L.A.派」解散之後的留學歸國人脈在《島嶼邊緣》發刊論述形構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位置，多為「後正文」策略的寫手，並在《島嶼邊緣》發刊後期製編多期專題：第8期「假台灣人」、第9期「女人國·家（假）認同」、第13期「激進神學」、第14期「色情國族」，成為《島嶼邊緣》停刊前主要的積極力量。而《島嶼邊緣》停刊後，這支人脈的部份成員繼續在學院體制裡深耕，日後挺進《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的編輯群，繼續從事學術論述的生產；另一部份則持續在「勞工」和「性／別」...等運動陣線上戰鬥。

九〇年代初期的台灣社會，沒有人知道哪裡會是快速狂飆的終點？舊有規範的鬆動，新式規範的尚未確立。社會盡是沒有標準的標準，固然紛亂，卻開放無限可能的空間。而在一系列「戰爭機器叢刊」出版後，言論的廣泛傳散、聚會活動的舉辦、人脈的相互串連，和這樣變動、亂的社會條件，均提供「戰爭機器—讀書會派」和「戰爭機器—（後）L.A.派」成員竄流的逃逸和衝撞的能量，這兩股「泛左翼份子集結」的力量也逐漸凝聚為籌備創辦刊物的基礎。

2.1.4 《島嶼邊緣》發刊

《島嶼邊緣》述說從前

20051015 蔡其達 稿

1990.06.14 王浩威打電話談及新雜誌的構想，成員包括陳光興、卡維波等原「戰爭機器」人馬。

1990.06.21 第一次聚會於王浩威家，出席者包括我、吳永毅、王蘋、吳正桓、楊明敏、舒詩偉、李尚仁、卡維波、何春蕤等人，原先想與蔡建仁的《實踐筆記》合作，不意卻不歡而散。其後一段時日，眾人曾想過尋求詹宏志合作的可能性。

1990.07.04 同一批人第二次聚會。

- 1990.08.25 趁著「無殼蝸牛」運動，進行第三次聚會。
- 1990.09.23 於陳光興家再聚，傅大為新加入。
- 1990.10.07 於舒詩偉家聚會，除原班人馬，王振寰、趙剛、鄭村棋、何東洪、林致平等人也與會。林孝信原想找杜繼平辦雜誌，尋求與我等合作可能性，未成。
- 1990.10.21 再聚會，我因事缺席。
- 1990.11.04 於舒詩偉家聚會，呂正惠、林寶元也加入。正式討論前三期的製作專題。
- 1991.01.02 唐山陳隆昊邀《新左評論》人馬（代表人有我、陳光興、吳永毅），以及林孝信、杜繼平...等統左人馬對話，洽商合辦雜誌的可能性，談不攏。
- 1991.02.02 於陳光興家再聚，商議前四期內容。
- 1991.03.31 大伙南下新竹，於傅大為家召開會議，約三十多人參加。我當主席，在《新左評論》、《雜誌》、《島嶼邊緣》三個名稱中，經三次投票後，大家妥協擇定《島嶼邊緣》為雜誌名稱。
- 1991.05.04 《島嶼邊緣》成員聚會。
- 1991.06.01 《島嶼邊緣》聚會，具體討論募款、執編（由江斐琪擔任）等問題。
- 1991.07.07 《島嶼邊緣》成員聚會。
- 1991.09.14 歡送蔡珠兒赴英留學，《島嶼邊緣》成員再聚。
- 1991.10.29 《島嶼邊緣》創刊號正式上市。
- 1991.11.16 於鄭村棋工作室檢討創刊號。
- 1991.12.16 於舒詩偉家召開第二期編務會議。

(未完)

1. 《島嶼邊緣》的籌備期

《島嶼邊緣》的發刊在個人條件和客觀條件下得以成形：個人條件是以王浩威、陳興為匯合點的人脈串連；加上當時每個人在解嚴後的社會開放下亟欲行動的心理狀態，及剛起步的個人在戰線上時間調配的允許。客觀條件是歷經「讀書會」、《自立早報》寫專欄、「戰爭機器叢刊」、「文化跳蚤市場」...等一波波力量的積累，在解嚴後的時代氛圍中，形成一股可為的氣勢及行動力。

(1) 籌備發刊的串連過程

以「戰爭機器」為基礎的人脈關係向外串連。串連過程也是一種爭奪刊物詮釋權、定位刊物路線的過程。並且是異質性個體相互碰撞下，以協商、調節、衝突、爭論...等手段，達到一個暫時性共識的過程。

馮建三：如果看編委的名單，我當時認識的人應該是只有陳光興，所以很有可能是他介紹我

進去的。那我當時直接認識的就是《自立早報》的副刊主編顧秀賢，在《島嶼邊緣》的這一批朋友，其他這些人我剛開始都不太認識，不過有些人曾經在《自立早報》副刊上有寫作的園地，這樣多多少少彼此會直接或間接知道對方。浩威當時也應該都知道有我這個人的文字寫作。(20051028)

王浩威(筆名 譚石):大家也都會想要辦個雜誌，因為《南方》一下子就沒有了，大家可能也不清楚我有在幫忙《海峽》...。但就是覺得應該要有一份雜誌，不過大家也都只是打屁一下而已。直到有一天，《南方》最後的總編輯黃志翔打電話給我，約見面喝咖啡，然後還有蔡建仁。小蔡(蔡建仁)就說你們有戰爭機器的專欄、又出書，那你們要不要編雜誌？我說是很想啊！但是沒有錢。蔡建仁就說，錢沒有問題，不用擔心，我們來幫你們想！那時候一切都很單純，就回去跟其他人講。後來就跟蔡建仁約一個時間，大家就在我家聚會，差不多有十幾個、二十個，不只是讀書會的人，還有何春蕙、馮建三，馮建三那時候在《自立早報》用筆名寫專欄。就各路人士都來開會了。傅大為、成令方也都來了。傅大為和清大有另外一票人。之前清大這一票的人，大概是跟法國幫比較有關係。齊隆壬回來後，于治中、陳傳興也回來了，這些人又跟電影有關係，就這樣開始認識。後來廖炳惠去了清華，就把他們這票人都找去，清大是一個因素。但陳傳興就沒有靠過來，可能還在觀察吧！然後夏鑄九在城鄉所有帶一票人曾旭正、郭文亮，所以我們把城鄉所那票人也找來。陸陸續續把在「自立」寫稿的人也找來。還有「台大女研社」那邊，也找了一些人來。還有一些讀書會的。還有東海的趙剛...等。等於那時候大家幾乎都在《自立早報》那邊寫稿子，就都會靠過來。還有一些是陳光興比較知道的，就是小蔡(蔡建仁)他們在美國有一些讀書會，那又是另外一個脈絡。(20051003)

蔡其達(筆名 晏山農):1990年6月14日。(我不知道王浩威之前可能跟哪些人談過了)，至少就我來講，他打電話給我是這一天。他說一群朋友大家構思要出一個雜誌，就是包括「戰爭機器」這些朋友，問我意願如何。那我當然是同意。然後差不多一個禮拜之後，我們第一次聚會是在王浩威家，出席者包括我、吳永毅、王蘋、吳正桓、楊明敏、舒詩偉、李尚仁、卡維波(甯應斌)、何春蕙等人。那原來現在在世新的蔡建仁，他當時是屬於學運兩股勢力中的民學聯系統，當時他自己出資或找錢，然後辦了一個叫《實踐筆記》的刊物。那他好像有點撐不下去了，所以他想找我們這群人合作，看是不是可以用他「實踐筆記」的那個名稱，然後加入我們這群人。不過當天聚會的時候，因為有些個人因素，然後蔡建仁跟很多人翻臉，所以那天就不歡而散。導致我們跟《實踐筆記》一個合作的可能性就沒了。我們當然另起爐灶。(20051015)

王浩威(筆名 譚石):我記得我們先見面談了以後，大家再見面跟小蔡(蔡建仁)約好談，如果他願意贊助的話，我們願意做這份雜誌。那時候要找小蔡(蔡建仁)，何春蕙還是老卡(甯應斌)就說他們跟小蔡(蔡建仁)有些不愉快，他們是不是要先離開，我忘了最後有沒有離開。等到小蔡(蔡建仁)來的時候，大家開始談的時候，就問他給錢要什麼條件啊？小蔡(蔡建仁)就生氣了，你們都只要錢這樣。這樣才發現，當初在美國的時候，小蔡(蔡建仁)是屬於保釣那一代跟陳光興中間的，所以可能有帶他們四處去找一些人串連、組讀書會，在美國串連還蠻勤快的一個狀況，所以美國回來的人都在不同狀態下跟他接觸過。只是說合作的程度不同，衝突的程度也不同。那他的意思就是說大家就只要他的錢，現場就很緊張，我不知所措，後來小蔡走了。

我忘了是當天談還是改天談，好像是陳光興的意見吧！就是我們自己辦，自己來找錢，一個人兩萬元，看能不能找到一百萬。(20051003)

吳永毅:為什麼蔡建仁要來參加《島邊》會議，那卡維波(甯應斌)、何春蕙說要迴避？就是當初(L.A.派)為了所謂「左翼陣線要不要亮相」，有一個很大的爭執：時機到不到？然後那種工作方法有沒有尊重其他人？算不算組織內民主的做法？所以跟蔡建仁就有點不歡而散。(20060719)

蔡其達(筆名 晏山農):然後1990年7月4日，我們第二次聚會，一樣是在王浩威家，有談過要跟唐宏志合作的可能性。不過後來談的結果不是很樂觀。我們開會開了很多次，其實共識都不是很快就可以建立起來的，還是都透過幾個人積極去募款，或是進行進一步的接觸，才有進一步的可能性。後來包括8月25日「無殼鍋牛」運動，我們第三次聚會。然後第四次聚會是在陳光興家。那這之間陸陸續續很多人加入，傅大為、鄭村棋、趙剛、王振寰、

何東洪、林致平等。(20051015)

傅大為(筆名 林中平):那我那個時候在《自立早報》有寫另外的東西,我沒有參加他們「戰爭機器」那邊的。但我辦《台社》的時候也有找陳光興他們過來,所以大概是這樣的一個關係。

那個時候我跟陳光興常常碰面,我們常常在清華人社院碰面,他比我晚來清華,因為那時候文學所剛成立。所以那個時候,基本上我想是比較透過他,然後認識像王浩威他們這一些朋友。當然除了陳光興之外我也比較早就認識了李尚仁,因為李尚仁那個時候對科學史有興趣,我那時候在台大歷史開過科技史方面的課,他就有來聽。然後我還有一個學生叫楊明敏,跟著我寫論文。那楊明敏、李尚仁也都是「戰爭機器」讀書會的,「戰爭機器」讀書會裡面有不少人是醫學背景的,所以大概是透過那樣的一個關係。還有認識一些像丁乃非她們「歪角度」裡面的人,因為那個時候我也參與一些「性別研究」的活動,認識幾位作台灣婦運或主張「女性主義」的一些朋友,像黃毓秀、成令方、丁乃非都有認識。所以大概是透過這樣的一個關係。

陳光興那時候想要集結一些在《自立早報》、《中國時報》蔡珠兒編「文化觀察版」那邊寫文章的朋友,在《台社》之外成立一個比較年輕的、比較不完全是學術性、又比較有點運動色彩的刊物。細節我並不太清楚,因為早期我比較專注在《台社》,《台社》是我推動起來的。所以大概是透過那樣的關係,他們說要辦一個這樣的東西,那我當然就支持啊!因為他們是我蠻好的朋友,所以當然支持。所以他們準備成立的時候,我就有出現也有參與,所以年齡層還蠻年輕的,也還蠻有活力的,那時候我的感覺是這樣。(20051109)

蔡其達(筆名 晏山農):然後1990年10月7日,當時在美國的林孝信回來,基本上他是統派的,他很明顯要找夏潮系列的人來辦雜誌,希望跟我們合作。但基本上我們標榜的是「新左派」。他那天也來了,談一談就沒有什麼交點,然後結果我也不清楚。然後1990年11月4日,就變得要開始討論前三期的內容。不過一開始前三期跟後來所做出來的是不太一樣的。那麼到了91年,唐山老闆陳隆昊就邀我、陳光興、吳永毅,我們三個代表去跟林孝信、杜繼平對話。就我所知道的是林孝信那時候要跟陳隆昊合作之前跟我們談過的那個雜誌,那陳隆昊是希望讓更多的人進來,才找我們一群人來談。那因為之前就已經談不攏了,所以這一次當然更談不攏。所以就更確定要自己辦!

我們第一次跟蔡建仁,後來談都沒有再談,後來又跟林孝信、杜繼平這些所謂夏潮系列的,也就不可能再談了。後來我們在陳光興家聚會,開始商談前四期的內容。那個時候就比較具體,就開始跟後來所規劃的前四期就比較類似。我們一開始的方向甚至名稱就準備要定「新左評論」。(20051015)

大篇幅的從整個串連及協商的過程可以看出,當中人脈串連的動態過程和人脈之間的複雜關係,以及《島嶼邊緣》愈來愈明確的自行發刊意圖及發刊路線的定位。陸續在與「(前)L.A.派的」《實踐筆記》蔡建仁和「夏潮系統」老左派的協商後,除了雙方人際的摩擦、思想的分岔,而導致合作的不可行。另外在結合各路人馬的人脈串連名單上也看出成員的多元異質性,結合學者、文化工作者、社會運動者、藝術工作者、年輕學子...等,並且多為尚無掌握權力資源、社會體制化未深的年輕知識分子,並積極投入狂飆的社會運動熱潮。

而串連過程中亦可看出各方力量在當中的權衡,並且各自投射不同的刊物想像。

(2) 創刊名稱的擬定

創刊於一九六〇年的英國《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曾經是本刊擬定刊名的重要參考依據之一。(《島嶼邊緣》,第4期:4)。

「島嶼邊緣」的刊物名稱是「妥協」之下的產物。

當時刊物原本定名為《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¹⁸，但為避免遭受不必要的壓制，故「妥協」取名為《島嶼邊緣》，又簡稱為「島邊」或「倒邊」¹⁹。

蔡其達(筆名 晏山農):再來 1991 年 3 月 31 日,這天其實很重要,因為大家就南下新竹,在傳大為的教師宿舍召開會議,下午的時候,大概有 33 或 34 個人。那天我當主席,那天第一個討論就是定名稱,大概有五、六個提議,我現在記不起來。(20051015)

王浩威(筆名 譚石):開會開很久,選了二、三十個吧!不是只有一個。「新左評論」是一個,然後馮建三有一個專欄「邊緣島嶼」,然後那時候有「邊緣戰鬥」的概念,還有很多名字。然後比較接近結論的時候,那「新左評論」那時還是有些忌諱,怕被貼上標籤之後在台大、政大、清大教書就吃不開了。所以想想還是改個名字好了。最初是想用馮建三所開的專欄名稱『邊緣島嶼』,那好像大陸是主流,有統獨的意味,又擔心獨派的會抗議把台灣當成邊緣是不是想和大陸靠攏,最後才把它改成結果就變「島嶼邊緣」,等於是對台灣的關心或檢討。(20051003)

馮建三:我印象中當時是到清大傳大為他們家去以後有談,之前也有談。我只記得在那段時間,是台灣社會在解嚴之後,一些人就想要動,那在動的過程就有些人就在報章上寫稿,或因為朋友間接認識,那這群人就會談事情。談的過程裡面,大概有聚了好幾次會,也曾經在台北陳光興他那個時候的家裡面,也曾經在清大傳大為的宿舍,談了之後就決定辦這個刊物,那這個刊物要辦什麼名字呢?當時有人提出各種不同的名字,有人提出「新論述」、也有人提出「新左評論」...這些名字都有,那後來為什麼變成「島嶼邊緣」?我印象不是那麼清楚,可能跟當時《自立早報》就有一個「邊緣島嶼」的專欄,也有關係。那是我和很多人一起的專欄,但有沒有關係我也不太清楚了。所以那份刊物有這些名字在轉,那也不知道是誰建議,就採用這樣的一個名字。(20051028)

萬胥亭(筆名 路況):那時候也想到像英國《新左評論》、德國《新德國評論》這樣。解嚴前台灣知識份子的一個狀態就是說找一些原文書,像桂林書局就是專門進口原文書,當時像是王浩威就會購買訂閱這些原文書,像是《新左評論》或《新德國評論》。辦讀書會之前我就聽王浩威說過想辦一本像《新德國評論》這樣的雜誌,那是更早解嚴前的狀態。.....記得在新竹傳大為家開會的時候,決定叫《島嶼邊緣》的名稱。

本來吳永毅本來還想一些奇奇怪怪的名稱。後來比較起來這個比較正常一點。(笑)當時于治中也有提一個「新論述」,大家好像覺得比較平常一點。然後因為吳永毅提得都比較奇怪一點,我記得那時候我和馮建三、蔡其達都蠻緊張的,很怕用很怪的名稱過關。另外就是傳大為當時提出「邊緣戰鬥」這樣的論述,他對青年學生的影響還蠻大的,他是最早提出強調「邊緣」的觀點。後來我們會這樣命名大概也跟這個有點關係,我倒不能講有直接的關係,或者說當時的氣氛是這樣,最早是講左派、抗爭,所以會去特別強調「邊緣」的論述,在當時也造成一些影響。後來不知道是誰建議用「島嶼邊緣」,現在我就有點忘掉了。印象中最後就是通過「島嶼邊緣」,後來大家就簡稱「島邊」。(20050924)

傅大為(筆名 林中平):那時候陳光興他們就到新竹來,可能我那邊比較大吧?我也不太清楚。總之後來就決定到我那邊來,我當然很歡迎,那就來了。我對那次的印象很深刻,很多人,也是《島嶼邊緣》早年的時候最愉快的一次,搞到很晚很晚、搞了很久。

中間有一個討論就是這個刊物要用什麼樣的名字?我記得卡維波那個時候很搞笑,他也想到一個名字,他還特地用一個宣紙用毛筆寫好裱起來,當他要呈現出他取的名字的時候,他還把那個掛軸掛起來、還是打開,就有點像是「恭賀新禧」那樣子。那我記得卡維波那時候就取名叫「亂」,那個時候其實有點無政府主義的傾向,而我那個時候想的就叫「雜誌」。那至於《島嶼邊緣》這個名字,記不太清楚了。那個時候大家提了一些 proposal,有講到「島嶼」,然後不曉得為什麼...那個名字就變成「島嶼邊緣」。我那個時候在社會運動的觀點,

¹⁸ 《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為國際上重要的左翼學術期刊,此份刊物在 1960 年創刊,現任總編輯為國際著名的歷史學者 Perry Anderson。

¹⁹ 「倒邊」的稱號始於《島嶼邊緣》第 6 期:86;另《島嶼邊緣》第 10 期:86 出現「倒鞭」一詞,亦為「島邊」一詞的後正文稱謂。

希望能強調「邊緣戰鬥」的東西，所以我看到「邊緣」這個字，我也很支持很贊成。但至於那四個字到底怎麼來的，我現在就有點記不太清楚了。(20051109)

蔡其達(筆名 晏山農):我後來刪到三個,有「新左評論」,這是很多人提出來的;然後「雜誌」是傅大為提的;「島嶼邊緣」是誰提的,我一時忘了。本來是前面兩個票數最高,「島嶼邊緣」是第三個,我們本來要重新將前兩個表決,那這時候發生了一個問題。就是有人那時候就直接講明說,如果用「新左評論」的話,她大概沒辦法加入,因為學校可能會對這個東西有意見,會影響到她在學校裡面的活動。她這樣提出後,某程度造成小小的緊張。

所以雖然原先的共識就是要用「新左評論」,結果當有人這樣一講的時候,其實你會覺得硬要通過的話,裡面幾個在學校教書的,大概就不會加入了。而「雜誌」這個名稱,大家又覺得很怪,因為哪有雜誌就叫「雜誌」的?你這樣推出去的話,可能會有問題。後來我跟王浩威私底下稍微談一下,因為我當主席,就我提議說讓「島嶼邊緣」復活,也能讓大家票選,後來大家複議通過。反而在另外兩個都有問題的情況下,最後變成「島嶼邊緣」。不過我想這一點大概其他人不會記得那麼清楚。所以經過三次投票,大家就選擇「島嶼邊緣」這個名稱,所以不是一開始大家就想用「ISLE」這樣的名稱,或者「島嶼邊緣」這樣的一個想法,那個是妥協的結果。可能大家很多人都忘掉了。(20051015)

事實上,馬克思的「資本論」在九〇年代初期正式引介進入台灣的出版市場,所以解嚴之後的台灣社會,「言說」或「閱讀」「左」已不再是禁忌,但是若涉及「組織化」仍會有所疑慮。這或許是當時的政治氛圍仍不利於左派的現身,並在長久冷戰時期的國共二元對立的政經情勢下,台灣極度缺乏左翼論述的土壤(這或許也是島邊四年後消逝的原因之一),所以標榜左翼的知識份子必須噤聲或偽裝。

2. 促成《島嶼邊緣》崛起的外部力量

在人脈的串連已有可為的積累、解嚴動盪下亟欲實踐的心理狀態、其他論述空間的受制、政經局勢轉變的壓迫及收縮、國際左翼情勢的變動下,具體推動《島嶼邊緣》的發刊。

(1) 人脈串連的積累及行動、實踐的心理動力

萬胥亭(筆名 路況):第三個階段就到了《島嶼邊緣》的階段,之後以王浩威為核心的拉攏各路人馬集結,也不再只侷限參與讀書會,像傅大為、做工運的鄭村棋,跟讀書會不見得直接有關了。清大本身也有一批人:陳光興、傅大為、呂正惠、楊儒賓、于治中、陳傳興...等等,這一批人也直接或間接的參與這份雜誌。還有東海也有一批人,東海社會系的趙剛、朱元鴻、王振寰...等等。美術界也有人加入,吳瑪俐和李銘盛。中央就是卡維波(甯應斌)和何春蕙,他們算和陳光興是一伙的,卡維波(甯應斌)好像是在寫專欄和出書的時候加入的。吳永毅和鄭村棋是工運的,但吳永毅也是和陳光興他們是一伙的。台大也有一批人馬,夏鑄九,城鄉所裡面還有一個張景森,還有陳志梧(後來也去逝了);台大外文也有幾個人:張小虹、廖咸浩,還有台大資深講女性主義的黃/劉毓秀。還有婦女運動、女性主義、「婦女新知」那邊的,主要有王蘋和丁乃非、成令方、鄭至慧、江斐琪。馮建三剛回國在新聞系,和陳光興他們熟,還有社會系的舒詩偉跟王墨林。(20050924)

王浩威(筆名 譚石):從讀書會開始就這樣繼續下來。這中間也發生很多事,雜誌還沒出來的時候就陸續的兩次學運,從「學生之愛」到「野百合」。「學生之愛」的時候回來的可能還不多,就是《南方》開始辦的時候。那「野百合」的時候我們人就幾乎都到齊了,所以學生運動也是促成這個雜誌動得更快的原因吧!好像有一些東西需要深度去討論,大家都有一種著急。那時候《南方》的呂昱就有愈來愈多考慮,可能對他是重要,就有好多考慮。《南方》就變成像是呂昱的財產,所以就變成他沒有辦法吸收新的人,回來的人愈來愈多,但都沒有去他那邊寫稿。反而《自立早報》他們態度很開放,顧秀賢可能當時比較傾向本土或獨派,但是他很清楚,不會在乎、考慮你是統派還是獨派。應該是說那邊有個聚合,有一股很大的

力量，大家都在講統跟獨，《島嶼邊緣》很想做出一個真的「左」的東西，才有四字箴言說：不統不獨、既統又獨、統中有獨...，我忘了是吳永毅還是誰講的。那就變成是說真的是希望打破統獨二分的思考。那有些朋友，像顧秀賢、吳昌杰就會接近比較獨的，但又跟社會主義很熟，就會猶豫，但也還好，某種程度上大家還是都會參與或認同。(20051003)

經歷讀書會及自立早報的「戰爭機器」專欄，到了出版「戰爭機器叢刊」時，人脈的串連積累提供了籌辦刊物的穩固基礎，心理狀態在面對解嚴時代的動盪，也難以按捺亟欲行動實踐的慾望。

(2) 其他論述空間的受制

「戰爭機器」份子一方面面對主流媒體的商業導向及《自立早報》、《人間副刊》...等報紙副刊又回歸文學性質的轉型；另一方面則受制於《當代》、《中國論壇》等的人文雜誌和走左翼批判路線的《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等刊物的學術性質，和其他論述空間中逐漸揀定統獨的傾向而感於言論空間的緊縮。發言的言論內容均受制於文章的格式、篇幅的限制、內容的質性、論述的論調...顯得捉襟見肘，爲了擺脫篇幅和文類格式的限制，故亟欲開創自己的發聲管道。

蔡其達(筆名 晏山農): 回復到整個八〇年代末、九〇年代初期的狀況，之所以要辦雜誌，其實很簡單，因為你受制於人很不方便。當時在八〇年代後期像《當代》、《南方》、《文星復刊》、還有之前的《人間》、然後《台灣新文化》改名稱叫《新文化》...這幾個雜誌，除了《當代》一直繼續。但是《當代》那個方向又跟我們不太一樣。所以後面那幾個雜誌到了九〇年代初期的時候陸續停刊了。

另外就是《自立早報》副刊原先「戰爭機器」的專欄，後來發生問題，沒有辦法再繼續，使得大家覺得曾經前景一片看好的文化抗爭領域，突然之間到了九〇年代初期的時候突然萎縮，這種市場如果你要持續發聲，好像要自力救濟，自己去辦一份雜誌才有可能。所以王浩威一揭義，讓大家開始動念說要成立這樣的雜誌。(20051015)

王浩威(筆名 譚石): 報紙的文章的文字很有限，或者翻譯的文章洋洋灑灑幾萬字，所以事實上辦報紙是不可能的。那時候對有系列的編書，也沒有把握，因為編書是很大的工程，那出版社對你的信任也沒有那麼高，像唐山出的就像是個人的專輯或結集這樣。所以90年時決定共同創辦一份刊物，使聲音集中且常態化。

另外也因為《當代》有很多的侷限。像吳永毅他們會搞「後正文」就是要跟《當代》、《文星》作一些區隔。《當代》就是大人，我們就像是小孩子在玩。(笑)對我都好遙遠。所以研究所的學生買《島邊》也是這樣的心情。(20051003)

萬胥亭(筆名 路況): 當然還有一個理由，因為當時覺得《當代》雜誌已經不太行、不夠了。《當代》雜誌是我在大學的時候、解嚴前的時候蠻重要的，是一份新的文化、思想的雜誌，是以前沒有的。那我在大學的時候，《文星》雜誌已經沒有了，後來也有短暫的復刊一下。所以解嚴的那段時間，《當代》雜誌還是蠻重要的，等於是一個窗口，介紹西方最新的思潮，「韋伯熱」、「新馬熱」就都是透過《當代》為一個窗口，並且也包括一種新的論述方式，一種文化評論的方式。解嚴後90年的時候，《南方》雜誌早就停了，《中國論壇》也已經要停了，而《當代》雜誌已經不夠前衛，不夠前瞻性了，於是變成一種真空狀態。所以那時覺得應該要有另外一份雜誌出來取代《當代》雜誌，在論述上或知識份子的集結上更往前一步，當時也有這樣的涵義。(20050924)

蔡其達(筆名 晏山農): 加上三月學運到五月反軍人干政的政治、社會狀況，所以沒有路了，很多雜誌陸續停刊了，版圖慢慢所小，整個文化環境有萎縮的情況，所以大家覺得要另辦雜誌。(20051015)

張育章: 那時候《島邊》出來，有一部份用意是言論空間的緊縮，所以需要有一個自己比較

可以獨立的空間，有些稿子至少沒有辦法登的時候，至少還有個退路，還有這樣的一個空間可以登。應該說也許有些東西連《當代》都沒辦法登，所以他們才會覺得需要做這個。另一方面有些想像就是希望搞刊物作人力的串連，所以還是希望搞自己的。這就是九〇年代台灣和八〇年代台灣不一樣的地方。(20050930)

在社會運動狂潮的波動下，需要更廣大、自由的活動空間，所以《島嶼邊緣》欲開創有別於《當代》雜誌的思潮引介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濃厚學術色彩的路線。而由於其他刊物以主編為中心的審稿運作模式，對於論述的多元、學術性格、編輯模式、論述限制有所侷限，也推擠《島嶼邊緣》日後的自行發刊，和往非學術性格的傾向，及影響日後去中心化的編輯運作模式。

(3) 解嚴後政經局勢轉變的壓迫造成言論空間的收縮

《島嶼邊緣》的崛起並非一蹴拔地而起，是台灣「戒嚴—解嚴」時代下各種社會力匯集並競相拉扯出的一個知識場域。也就是說，《島嶼邊緣》是台灣歷史社會脈絡中「後—解嚴」時期的一項文化產物。八〇年代的颶風過後，「有人說：九〇年代的台灣，將是『告別的年代』」(蔡詩萍，1995：110-112)。而《島嶼邊緣》的發刊也就是面對八、九〇年代之交的台灣社會力在激烈噴發後，因政經環境的轉變，群眾熱情的退卻，反對運動面臨消解及分散的時境。

張茂桂(1989a)以「資源動員」的論點分析政治力的層面上，政權內鬥、鬆動的危機牽動著台灣八〇年代社會運動風潮的興起。

沒有一個轉化中的威權體制，就沒有現在的社會運動風潮。沒有政治體局內鬥爭的需要，就不必向外製造政治機會，也不必向地方發展的政治動員。而如果沒有政治動員，那麼也就不會有現在許多人所說的「民間社會」(更正確的說，「民眾部門」)的興起。所以這個階段台灣的社會運動風潮，在政權危機得到化解之前，是不會停止的。(張茂桂，1989a：108)

這個論述相反的也點出了政權危機化解之際也可能成了社運風潮退燒之際。從1990年三月的野百合學運中，將學運收編為政爭所用的修辭，可以看出統治權已經轉換其「一體化控制」為數個行為主體的個別控制模式，並轉變其直接軍事暴力鎮壓的控制手段為協商收編的摸頭型式。而1991年五月的獨台案中情治控制的復辟，在九〇年代李登輝權力中心的逐漸穩固也代表另一波新保守主義—維持其控制系統，或將強控制系統化明為暗—的興起。

A. 1990年3月16日-22日 野百合三月學運

1988年強人蔣經國的驟然逝世，副總統李登輝繼任，國民黨政權的接班權力佈局陷入相互鬥爭的失衡狀態，由生手總統初掌尚未改造完成的老舊政治機器，也使得社會呈現一種無政府「亂」的狀態。在1990年總統改選之際，李登輝遴選副總統候選人李元簇及以投票或起立的推舉方式引發黨內的爭議，也促使黨內主流(李登輝、宋楚瑜)與非主流(李煥、蔣緯國、郝柏村、林洋港、陳履安...)的角力鬥爭浮上檯面。而以李登輝為首的主流派欲化解政爭危機，將內鬥的焦點轉移至憲政體制的改革、國民大會及

臨時條款的廢除，形塑自身民主改革的形象，並因自身的「本省省籍」身分，獲得民進黨籍國代及無黨籍聯誼會、勞工聯盟、地方的省市正副議長的支持。加上萬年國大自行通過擴張職權及延長任期的自肥條款，引發社會輿論的撻伐，成為三月學運的引爆點。

學生運動延續著昔日的七〇年代「保釣運動」、八〇年代爭取校園內部民主，或以學生身分參加政治、社會運動，轉為九〇年代大規模校際串連的動員形式，匯集成為一股「社會運動力」。狂飆八〇的結束，九〇年亂的開始。寒夜中，上千名的學生往中正廟走去。

1990年3月16日抗議國大擴權惡行的學生在中正廟靜坐抗議。廣場學生人數在學運團體的進駐及社運團體、政治團體、教授顧問...等的支援，及媒體的關注、社會輿論的聲援下急遽增加，擴大全國性串連的規模，並提出四大訴求：「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政經改革時間表」，並要求與李登輝展開對話。上千名大學生採取「柔性罷課」群聚中正廟，開始為期一週的「民主教育週」。廣場中間矗立野百合花，輪番的歌曲傳唱、演講、民主講座...。廣場內外均是一個角力的場域，學生與內部決策中心權力的相互制衡，並因應外部的政府回應、其他團體的介入或其他突發狀況，遞擅著平和、喧鬧、衝突、激進、不安、質疑...的氣氛。這股撼動台灣及國際的學生運動卻也順勢「保送」了李登輝在20日穩坐總統的寶座。翌日在李登輝接見廣場學生代表後，22日宣佈撤退聲明，三月學運就此結束。

姑且不論90年的學生運動是否為六四天安門事件的「鏡像翻版」²⁰；或學運團體內部「直接民主」與「形式民主」的爭論及日後「民學聯」v.s「全學聯」在學運路線的分裂；抑或民進黨挾以「學生的純潔形象」在幕後為自己推波助瀾；最後是否因李登輝情結而被「摸頭收編」；更甚「學運世代」究竟是一種晉升的光環抑或是一種焦慮的負擔？三月學運是解嚴之後以學生為主體起而抗爭政府的運動，那種以身體佔領空間的存在感，明顯的「反體制」色彩和抗爭的攻擊性語詞，確實在當下凝結一股撼動社會的氣勢。並且實際推動九〇年代開始的「憲政改革」，在1991年5月1日廢除臨時條款，結束動員戡亂時期；12月31日第一屆立委、監委、國大退職，結束萬年國會的運作。

野百合學運後，國民黨政府的內部鬥爭漸趨於擁護李登輝的繼續執政，言論向政權的靠攏並快速緊縮，之後的學生、社會運動難以引起像三月學運時的影響力。1990年5月2日李登輝公佈提名郝柏村出任行政院長組閣，全國譁然、抗議聲浪不斷，引發一波波學生、反對黨、反對團體的靜坐、遊行抗議。知識份子更是強烈反對，譴責李登輝為擺平黨內鬥爭，不顧民主改革的憲改期望。5月20日李登輝宣示就任中華民國第8任總統，當日由「全國學生運動聯盟」加入社運界及澄社串連起的「知識界反軍人干政聯盟」的文化界力量發動「反軍人干政大遊行」。同日在萬人萬聲的抗議下，運動訴求得不到任何的回應，國民黨中常會仍通過李登輝主席正式提名郝柏村為下任行政院長。5

²⁰ 「三月學運並不是「學」、「模倣」天安門事件，但兩者之間的確有著相似性，這種相似性可舉三月學運中的片段，而借拉康的鏡像階段（mirror stage）的理論說明」（楊明敏，1992，〈學運的精神分析〉，《島嶼邊緣》，第3期：77-89）。

月 29 日，立法院行使閣揆同意權當日，議場內國民兩黨議員爆發嚴重衝突；議場外 529 反軍人干政遊行中，一顆焚燒的汽油彈，點燃解嚴之後最嚴重的流血鎮壓。

1990 年 6 月 1 日郝柏村任行政院長。

蔡其達（筆名 晏山農）：之所以後來想要辦雜誌，我（見附錄三：〈《島嶼邊緣》停看聽〉）這邊有提到，因為 1990 年 3 月發生「三月學運」，「三月學運」過後，李登輝任命郝柏村為行政院長，然後五月的時候爆發「反軍人干政」。所以那段時間，我們這些朋友都一直參與在這樣的活動裡面，所以活動還蠻熱烈的。（20051015）

張育章：整個言論市場的緊縮，一方面是權力重整，另外一個是市場開放之後，本來以為會有更多開放的空間，結果反而是鞏固既有的《中時》、《聯合》。當《首都早報》、《自立早報》也收了，台灣原本幾個大媒體等於沒有所謂的競爭者，所以它在內容上又回到最早比較保守的東西去，它不見得願意再開放出這些空間給這些人亂搞。因為以前有一部份在亂搞的像《自立早報》、《首都早報》，他們那個時候有那樣的版面出來，一定要有很多新的寫手跟空間，當他們發現現在學校的學生好像看這樣的東西比看以前副刊那些軟趴趴的東西來得有意思、有市場，他們會想要試著去跟進，但是當競爭者一個一個都退出市場消失了的時候，他們又會回到那個部分。言論自由在解嚴之後的確有這樣的空間，但最後轉向商業化，但中間都有一些時間落差。所以我認為獨台會和李登輝有些關鍵性的原因，對於本來控制大眾媒體這些來講，已經有比較清楚要聽誰的話、要靠哪邊。在三月學運之前，國民黨也很亂，誰都有可能出來擔任總統的時候，其實就有點大家要分別去賭、壓不一樣的人，但當權力一確定之後，很多東西就靠邊了。《島邊》是在那樣的狀況下，他們本來可以在別的地方寫，可是後來發現說，他們到最後沒有地方寫，乾脆自己搞《島邊》。（20050930）

學生運動的群起固然助長了李登輝對黨國大老的權力拆卸，而另一方面也因為國民大會在陽明山開會時，感於學生運動凝聚之下的壓迫危機，黨國大老最後選擇鞏固領導中心，李登輝正式擔任第七屆的總統。繼萬年黨國大老無法扳倒李登輝的統治正當性之後，李登輝選擇非主流勢力的郝柏村置換李煥擔任行政院長，也削減了黨內非主流的反撲力量；接續著五月反軍人干政學運的民意，迫使郝柏村軍事將領的身分除役，也順勢成就了李登輝拔除郝柏村統馭軍權倒戈的勢力。而在軍事強人郝柏村高壓強權的整肅行動下，國民黨內權力的重新整備迫使社會輿論迅速向李登輝靠攏，也使得政治動盪下開放出的社會空間迅速緊縮。

延續著五〇年代蔣介石與陳誠力量對峙時，《自由中國》雜誌得以發展，在蔣介石的權力集權後，《自由中國》在雷震欲組黨前夕被捕停刊。七〇年代《大學雜誌》成就蔣經國制衡前朝元老的權力重整後，被分化而瓦解。也就是新舊體制的政治鬥爭固然造成政治言論上的空隙，但言論空間開放往往是短暫的，開放假象的背後是國民黨因應統治權力的分裂與內鬥，將「改革」轉為一個口號、一種鞏固權力的籌碼，在權力中心重新底定後，則是新一波控管言論的保守主義。所以 1988 年 1 月 13 日蔣經國卒然病逝，李登輝與黨內重臣對峙，形成主流與非主流之間的路線鬥爭，短暫開放出言論空間。如同上述往往必須在政治不穩定之時，方有出現「異議」的機會；政權的鬥爭，也方有出現「辯談」的可能。但在政治情勢上，面對國民黨李登輝政權的權力重整，隨之權力的底定，而緊縮自由的空間。所以學運後李登輝執政權的權力重整完成，也影響媒體重新回到保守的框架視角，造成解嚴後的第一次緊縮。

所以政治局勢的轉變也造成在媒體情勢上面對媒體的政治靠邊站及商業轉向。

媒體雖然在解嚴及解除報禁之後，逐漸鬆動國民黨的新聞管制。而自 1990 年國民黨內部政爭開始，《聯合報》及《自由時報》以完全不同的報導與評論，再現了國民黨內不同流派的立場與觀點，並且突破了舊有對於國民黨的報導形式：使其比過去更具有完整的敘事性，補足了往昔所沒有的情節佈局部分。（參見倪炎元，1996.7）報導形式的突破但卻也喪失多元化的報導角度，改由選邊站的對立論述形式，「主流與非主流之爭」延續至今的「藍綠對決」。

另外言論緊縮，可以從社會運動的報導量縮減及可供發聲的空間逐漸萎縮或消失來見之端倪。「三月學運」及「五月學運」的媒體報導量及關注程度的落差：五月學運並同時反對媒體壟斷訊息製播，更派出「小蜜蜂」的游擊特攻隊，以噴漆的方式表達不滿的意見，抗議部分媒體封鎖學運的消息；並且發散揶揄、諷刺的漫畫文宣。五月的反軍人干政學運繼三月學運獲得正當性之後，一方面對社會的「震撼力」略為縮減；另一方面在李登輝的權力底定後，國民黨快速的反應處理及學運喪失媒體的關注下，迫使五月學運的迅速落幕。

張育章：《島嶼邊緣》之所以會發刊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媒體的言論快速由開放轉為緊縮」，解嚴之後的開放到萎縮的這段期間其實是沒有想像中的長。

從蔣經國死掉到三月學運之前的這段時間，在台灣的政治上來講權力屬於一個不穩定的真空狀態。再加上當時報禁解除，報紙內部也有分不同的派，包括他們希望輸誠的對象也還未定，所以會有比較多的空間出來。反正剛解嚴嘛！規矩是怎樣，看法一切都打破掉，什麼都可能可以做。

那等到三月學運一結束後，最明顯的變化就是說，當李登輝確定擔任總統的權力穩固後，言論就快速找到支持李登輝的這一方。（當時的聯合報其實還沒有「反李」，它比較後來是反李。）但其實那時候來講，中時、聯合那時候速度都還蠻快的，本來還不確定的時候，本來還給學生運動很多的關注和某種支持，但權力一但定下來以後，言論馬上就收縮。所以關鍵點應該不是講三月學運，而是國大代表的那個集會後，確定沒有辦法把李登輝幹下來，李登輝就是統攬大權，就對於媒體來講是很關鍵的時刻，本來是開放但當權力確定是誰的時候，大家都靠邊、收縮。

當競爭者一個一個都退出市場消失了的時候，他們又會回到那個部分。接下來它真正碰到的挑戰反而是有線電視，應該講是「地下電台」和「有線電視」！在商業市場，有線電視瓜分掉報紙原有的市場，原來的三台加上兩大報可以有的那個市場。那一次的緊縮開始往商業化碰，之前還比較是意識形態、文化的方面，比較可以控管。到了有線電視這東西一進來後，市場原來有的廣告預算，那個大餅就要開始分了，那就必須要往商業的那邊去走。（20050930）

媒體轉向商業導向的經營模式，也從助長轉為削減社會運動的資訊擴散功能。社會運動中小蜜蜂的游擊噴漆或遊行身體的直接衝撞和肥皂箱發言台的設立及行動劇的演出均是向媒體奪權的表現，但隨著媒體商業化的機制，落入媒體炒作及共謀方能掌握麥克風的發言權及現身權，並且媒體的文字、影像仍經過媒體工業的裁減、揀選、再生產，訊息及抗爭的實際詮釋權仍不在弱勢團體的手中。弱勢團體在媒體表面假象開放的同時，實際上仍無法近用媒體來爭取自身的權益，發言權仍被剝奪，從上下二元的威權體制轉成為金字塔型層層削減的媒體近用權。並且為搶食廣告資金的資源，競爭對手由同業報紙擴展到其他媒體（雜誌、電視、電台），促使新聞、資訊的商品化，社會運動的議題性隨著風潮的減退而被迫下檔。

另外就是言論空間的消失，解嚴之後報禁解除，在言論市場上面或者大眾媒體市場上釋放出許多空間供其這些很多剛回來台灣的年輕學者和台灣的知識分子去揮灑，可是空間卻快速萎縮。《人間》（1989.9）、《南方》（1988.6）等人文雜誌早已相繼停刊。原本由副刊開拓出的新文化評論空間也隨著權力的重新底定，反對運動頓失批判對象—國民黨的式微，喪失原有的閱讀市場量；並在報業業主的靠邊下，文化評論的風潮也逐漸喪失發展的空間。

所以三月學運後第一次面對解嚴後言論的「短暫開放」或稱「快速緊縮」。解嚴以後，言論尺度的逐步開放，實際上反而使原有的參考座標「歸零」，重新開始，言論立場亟待重新歸位。在當時解嚴後原本打破舊有、開創新局面的開放浪潮，但無預期的長且激進。而「戰爭機器」除了當時對於三月學運發表多篇異於主流論述的文章，並且迫於三月學運後政治、媒體情勢的改變影響論述空間的緊縮，另外「獨台會」事件也促成了《島嶼邊緣》的出刊。

張育章：三月學運是一個點，更準確的說是國民大會開會，李登輝確定掌握大權；第二點是獨台會的事件。李登輝上台後，找郝柏村組閣，對我們來講都是一個很大的反彈，其實有出來反過一次，但不成氣候，後來出現「獨台會」事件，郝柏村上台實施宵禁。（20050930）

B. 「反政治迫害」獨台會事件

1990年「五月學運」結束後，郝柏村開始進行一波波的整肅行動。6月以影響經濟投資、社會秩序為由，宣示整頓治安八大方向，並強力掃黑及落實法制。並在8月無住屋者組織發動千人夜宿忠孝東路後，下令取締環保、工農「社運流氓」，嚴懲遊行示威暴力事件。面對郝柏村的強權整肅及國民黨軍警憲系統的運作，加上社運人士被抹以「社運流氓」的標籤，解嚴後「白色恐怖」時期羅織罪名的政治迫害一觸即發。所以「李郝體制」在政治權力逐漸底定後，保守勢力的再起，迫使社會運動無從開展，直到獨台案的爆發才重新啟動。此時以「島嶼邊緣」為名的刊物串連已逐漸成形，而政經情勢的轉變也拉高《島嶼邊緣》發刊的急迫性。

1991年5月1日，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但9日的凌晨，法務部調查局幹員闖入清華大學校園，展開搜索行動並逮捕清大史研所碩士生廖偉程。翌日並宣佈偵破史明的「獨立台灣會」²¹在台組織，同案共逮捕四人廖偉程、陳正然、王秀惠、林銀福，並以「懲治叛亂條例」起訴。對於調查局粗暴進入校園肅清的「政治迫害事件」，及警方以暴力行為驅逐「全民反政治迫害聯盟」的聲援教授、學生，引起社會高度的憤怒。

清大校園迅速動員組成「廖偉程後援會」，簽署聯合聲明斥責「戒嚴心態借屍還魂」。並在13日，清大二十八位教師連署提出「學術自由、思想無罪」的停課運動；澄社、台灣教授協會、中央研究院等學術團體結合文化界人士成立「知識界反政治迫害聯盟」，

²¹ 史明在1967年6月30日在日本成立「獨立台灣會」，並定義獨台會為「一個社會主義的黨」，矢志投入台灣獨立運動。其主張台灣民族主義、台灣獨立建國，也是少見的左派台獨組織。1993年10月26日，「獨立台灣會」創辦人史明返台一周後被捕，交保候傳。27日，高檢署撤銷對史明通緝，結束長達41年之內亂通緝。

以「反軍政」模式，發起「五二〇」示威遊行。14日，社運界及民進黨也加入聲援。5月15-20日全國的數千學生罷課並佔據台北車站靜坐聲援抗議，要求「廢除懲治叛亂條例、反對政治迫害、無罪釋放獨台案4人」。17日立法院廢止「懲治叛亂條例」。20日，在知識界及學運界及各方聯盟組織的力量匯集之下，以根除白色恐怖、廢除專制惡法、無罪釋放四青年、情治退出校園為訴求，主張「廢除刑法一〇〇條」，發動萬人反政治迫害的抗議遊行。直至1992年7月，「獨台會」案更審，台灣高等法院改判免訴。

獨台會事件除了促使「懲治叛亂條例」、「檢肅匪諜條例」的廢除，並進一步推動「刑法一〇〇條」修正案，一方面也顯現解嚴之後李登輝的執政，郝柏村仍操以情治單位控管的統治手腕，國民黨的「保守勢力」及「威權體制」仍舊持續運轉；另一方面則顯現了九〇年代以後的社會運動，社運團體的組織動員能力漸趨純熟，以往抗議運動的擴大，新運動聯盟的興起，以及運動與運動之間的相互呼應與串連。

在政治力、經濟力與社會運動的脫勾下，也促使社會運動的風潮終究在九〇年代初期的政經結構改變下趨於平靜。

A. 在政治力方面：

李登輝繼任後統治權力的重整與統治技術的轉化，一方面改變以往對社會運動高壓鎮暴的手段，轉為有限度的接受社會反對力量的抗爭論點做政策上的調整開放，並由此「借力使力」，得以制衡黨國大老的舊政權；另一方面並籠絡運動領袖、知識菁英為其政策宣傳發聲，穩固執政權力的「正當性」。而在開放黨禁後，「民進黨」的政治反對力量投入公職人員選舉，一方面與社會運動合縱連橫，並藉由「本土意識」的操弄及「政治優先論」單一化社會反對力量的出口；另一方面藉以社會運動反對力量的集結推擠進入選舉議會制度的運行，最後轉以體制內的改革取代街頭抗爭的路線，逐漸成為具有制衡能力的反對黨。但民進黨原本具有淡左／淺左的色彩，在黨內論述逐漸往右翼執政路線的靠攏下而漸形失色。民進黨為獲取選票的支持，複製、衍用國民黨白色恐怖時期的「反共愛國」策略，挾其「本土」意識形態，以75%「台灣人」的身分認同，轉化為是「多數人」的利益，全民的出口只剩下「台灣人出頭天」的口號。一則展露福佬沙文主義的威權性格；二則是權力快速腐化其運動性格。

新興社會運動在解嚴之後的能量快速分散。群眾在解嚴後失去一共同抗爭的對象，社會運動的軸線由分離主義取代合併，各類社會運動由「反支配」的政治抗爭訴求逐漸涉及文化與經濟的主題，並轉向具體的政策改革（如客家母語運動的方言及母語政策、無住屋者運動的住宅政策等），擴大到與政策對話的層次。（參見 蕭新煌，《中國論壇》354期：68-80）新興社會運動的興起雖代表台灣抗爭主體的多元，但社會運動本身在自由化產生內部組織過分「異質化」現象，瓜分了社會運動動員所需的人力、物力和內、外在的可用資源，所以也代表力量的分疏化。另一方面1989年的地方選舉後，也促使社會運動開始自省「社運主體性」的問題。社會運動的確也各自削減自身抗爭的「特殊議題性」，為「民進黨」的政治運動所收攏，與政治運動分裂後，動員力量的大餅早已被搶食剝奪。而面對政府執政權力的收編及籠絡，也消解部分社會反對力量的抗爭聲浪。

B. 在經濟力方面：

原本支撐社會運動運行的強盛經濟力，在推動社會運動拓展開放空間後，隨著政策一步步的開放，中產階級逐漸取得權力及資源，成為新的利益階級，開始站上與社會運動相互對立的位置，經濟力的解放也面對更多元的投資出口（開放台商赴大陸及印尼投資）及消費品項。台灣股市從 1990 年 2 月的狂飆萬點歷經執政內鬥、三月學運、反郝組閣；及中共不斷在國際上發言打壓（關貿總協 GATT、亞太經合組織 APEC），及不排除武力犯台的宣稱，引發台海緊張；加上外交友邦相繼宣佈與我斷交（沙烏地阿拉伯、新加坡、印尼）...，股市一路下滑。並且在 1990 年 8 月伊拉克出兵攻佔科威特首都，中東危機一度影響國際原油及黃金價格的暴漲，並重挫全球股市行情，連帶拖垮台灣股市跌破 3000 點。接續而來的盡是金融擠兌風暴、股票人頭帳戶、違規放款、非法地下投資公司的吸金、綁架勒贖事件、土地投機炒作、工程弊案、官商勾結...的情事。

另一方面抑制解放後過多的社會力，除了在街頭運動中得到紓解抑或路線的分裂、在政權鬥爭中沉淪抑或離棄，部分社會力也因為消費社會的穩固，轉化及消解部分狂飆的反對力量，轉而投入資本積累的生產勞動中，或沉浸在金錢遊戲（大家樂、股票）的猜謎中，抑或找尋符合身分品味的消費商品。面對資本主義邏輯深化的社會，社會運動的動員人力及金錢支援都顯得無以為繼。

台灣政經情勢因應迸發的社會力而快速轉變，解嚴動盪下的台灣人民逐漸回歸於生產勞動，政治鬥爭則走向地方選舉的角力，社會運動風潮逐漸退卻，也影響《島嶼邊緣》此刻的發刊；而面對國家機器管制的手段由高壓鎮暴轉為意識形態的收編，也使《島嶼邊緣》以文化批判評論作為反對的利器。

（4）國際左翼情勢的變動²²

標榜「左翼路線」的知識份子對內面對的是由解嚴後多元開放漸趨「單向化」的台灣社會情勢，對外則是社會主義政權紛紛倒台後轉型「民主－資本主義」的左翼傾頹。

台灣一九八〇年代的狂飆，一方面有台灣的特殊性，但在一切都「全球化」的時代，台灣的狂飆也未常不是全球狂飆的一部份。戰後無論左右威權專制國家，那些老的統治者幾乎都在這個年代凋謝，被他們禁錮的歷史形式因而開始鬆動；中國大陸的開放、波蘭「團結工聯」的成立、東歐自由化及蘇聯巨變，以及拉丁美洲的再自由化，都出現於這個年代。（南方朔，〈青山繚繞疑無路〉，楊澤 編，1999：28）

八、九〇年代之交的台灣也面臨著國際局勢的兩股變動：一方面社會主義的國家政權逐漸鬆動，東歐民主化及柏林圍牆的倒塌（東西德統一）、中國大陸的天安門事件、及蘇聯瓦解成為俄羅斯民主共和國...等的共產政權相繼轉型民主化；另一方面，標榜民主的威權國家在共產世界的敵人消逝之際，則面對人民衝撞威權體制，要求鬆綁冷戰時

²² 共產政權的垮台：捷克斯洛伐克（1989）、匈牙利（1989）、羅馬尼亞（1989）、保加利亞（1989）、波蘭（1989）、東德（1990）、阿爾巴尼亞（1991）、蘇聯（1991）。現今仍存在的人民共和國：中國、北韓、越南、古巴、老撾。

期因反共而實施的禁制及規範，抗爭要求改革的聲浪不斷。

回顧台灣戰後本土左翼思潮的發展路徑：五、六〇年代的白色恐怖加上冷戰時期的反共體制，壓抑了台灣的左翼視角；七〇年代的保釣運動，發展出左、右的兩造岔路，七〇年代鄉土文學論戰將統獨問題以文學論爭的包裝浮出檯面；八〇年代西潮東漸，老左的教條馬克思旁竄出了新左的文化意識形態論述。八〇年代末九〇年代初期的台灣，反對運動面臨執政國民黨的收編及在野民進黨的拉攏，原本薄弱的左翼力量，因統獨爭議又再再被削減其扎根累積的能力；加上國外左翼的政體發生了強烈的變革，社會主義國家相繼垮台與冷戰（象徵性）的結束，傳統左派思潮面臨被質疑挑戰的危機，也促使本土左翼知識分子尋找新出路：九〇年代標誌新左的新文化論述形態如何在台灣開展？

《島嶼邊緣》的知識分子在上述的背景之下，亟欲尋求新的論述空間及反對力量的集結。左派在台灣勢必要擺脫舊式反宰制的左派教條主義，提出可供社會運動實踐的策略，一個在地的新論述：「利基於當下的在地（local）情境之上，它不應受先驗的本質論教義用顯微鏡逐一檢證」（《島嶼邊緣》，第 1 期：2-3）。也迫使《島嶼邊緣》的發刊定位希冀以「新左翼」或「泛左翼」的集結，接合左傾思潮（後馬克思與後結構主義的興起）尋找新的出路，並以「葛蘭西一〇〇」為創刊號。

2.2 《島嶼邊緣》的刊物基本分析

蔡其達（筆名 晏山農）：1991 年 10 月 29 日，《島嶼邊緣》正式創刊。（20051015）

島嶼邊緣 下月創刊 記者林英◆／報導 1991-08-24/民生報/14 版/文化新聞
一本以介紹西方社會、政治運動，並針對本土相關議題，介紹西方類似議題上的討論的雜誌「島嶼邊緣」將於下月創刊，希望能成為九〇年代臺灣最前衛的、本土國際視野的理論實踐刊物。「島嶼邊緣」雜誌的成員大都是年輕的學者、媒體及文化工作者，他們認為近年來臺灣反體制意識形態的資源如女性主義、後結構主義及馬克思主義等，大部份是大陸譯本的叢書複製，基本上缺乏扣合現實的觀點，更沒有進一步提供理論工具以為邊緣弱勢團體及反對運動所運用。所以才計畫以期刊方式，藉此結合思想運動分子，不斷突破思想運動的範疇。「島嶼雜誌」初期將以專題方式出版，讀者群暫時鎖定以知識份子、關切文化運動、社會運動者為主。

《島嶼邊緣》1991 年創刊至 1995 年共出版 14 期，1996 年宣佈停刊，被視為泛左翼軸線的文化評論大集結。而在 1987 年解嚴後，這些不同背景的歸國學人、知識份子及文化工作者在解嚴後時代斷裂的縫隙中，感於邊緣弱勢受主流論述的壓迫，並識破背後統獨論述操作的偏頗，而以泛左翼的姿態結合群聚編輯雜誌—《島嶼邊緣》為同一出口發聲。

2.2.1 《島嶼邊緣》的邊緣知識份子：在地泛左翼分子的集結

《島嶼邊緣》以王浩威、陳光興為主的人脈串連，在籌備一年之後，《島嶼邊緣》的編輯委員及編輯顧問具體成形發刊。

1. 發行人：王浩威

王浩威（筆名 譚石）：我當發行人是意外。固然在我家是一個原因，那我算是比較活躍，但

主要是新聞法、出版法裡面的規定。因為我們一定會是比較另類、或比較反對的文化(另類,當初可能沒有這樣的觀念,但就一定是反對的),不要被新聞局抓辮子,所以一定要去登記。那時候出版法裡面規定發行人要「非公教人員」,所以在教育界也不能、公務員也不能,那時候我剛好在花蓮慈濟上班,我是民國 80 年 7 月去的,所以我去慈濟以後才登記的,所以出刊的時候是我當發行人。(20051003)

事實上,成員組成中尚多「非公教人員」。所以王浩威從「讀書會」—「戰爭機器」專欄及叢刊—至《島嶼邊緣》的刊物籌辦均扮演一個串連匯合的角色,故成爲一個各方「無異議」的發行人人選。

2. 《島嶼邊緣》編輯顧問、編輯委員名單²³

編輯顧問	井迎瑞、王墨林(5)、成露西、李元貞、李永熾、何春蕤、呂正惠、杭 之、林俊義、金恆煒、南方朔、施寄青、徐正光、孫大川、夏鑄九、郭博文、廖炳惠、張漢良、黃毓秀、陳師孟、陳璋津、葉啓政、楊澤、劉可強(2)、劉克襄、蔡詩萍(5)、鄭瑞城、錢永祥、鍾維達(5)、瞿宛文、瞿海源、蕭新煌、Wallias-Jugen(2)、Giluofougan A-wu(2)。
編輯委員	于治中、王秀雲(9) (12)(13)、王浩威、王振寰(2)、王瑞香(5)、方孝鼎、平 非、成令方、江斐琪、何 方、李玉瑛、李銘盛(3)、杜繼平(2) (5)、吳正桓、吳永毅、吳昌杰(12)、吳玲珠(5)、吳瑪俐、宋文里(5)(6)、王立峽(5)、林致平(5)、林寶元、柏蘭芝、侯念祖(5)、姚立群(9)、洪 凌(11)、紀大偉(11)、迷 走、倪再沁、孫瑞穗、陳光興、陳志梧、郭力昕、郭文亮、張小虹、張育章(9)、張釗維(11)、張 錯、傅大爲、曾旭正、馮建三、曾雁鳴、舒詩偉、黃瑪琍(12) (13)、黃麗玲(5)、楊明敏、楊儒賓、楊添圍(5)、萬胥亭、賈維平(12) (13)、Apple(9) (12) (13)、廖咸浩(5)、劉欣蓉、趙剛、鄭至慧(5)、鄭村棋、蔡其達、蔡珠兒、顧秀賢。

王蘋：看這個(編輯成員名單)就知道我們那個時候認識誰,認識誰就會出現在上面。……那個編委名單也不是真的喔!(吳永毅:很多都是掛名的。)就是我們的人際關係到哪裡,就像是婦女新知掛了一塊,那就是我填上去的。因為我們當時覺得要很多社會力。(20060719)

蔡其達(筆名 晏山農):按照我自己裡面的分法,其實有五個不同的屬性:

新左派:方孝鼎、吳正桓、吳永毅、吳昌杰、吳瑪俐、林致平、林寶元、迷走、郭力昕、傅大爲、馮建三、曾雁鳴(鄭鴻生)、舒詩偉、楊儒賓、趙剛、顧秀賢、鄭村棋、蔡其達...

後現代:于治中、何方、陳光興、張小虹、萬胥亭、蔡珠兒...

女性主義包括性別解放:王瑞香、平非、成令方、江斐琪、李玉瑛(王振寰的太太)、柏蘭芝、孫瑞穗、鄭至慧...

精神分析:王浩威、楊明敏...

城鄉都改派有關都市空間建築:陳志梧、郭文亮、曾旭正、黃麗玲、劉欣蓉(或女性主義)...

大概原則是分成這五類,這不是絕對的分類,因為中間很多人的身分是重疊的,但就我所認知大概是這樣。另外還有一類邊緣藝術工作者,黃瑪琍、吳瑪俐、李銘盛。如果沒有王浩威,基本上是絕對不可能聚在一起的。(20051015)

事實上,《島嶼邊緣》的成員組成是一種「人際關係串連」的聚合體,無法有明確的屬性劃分。人脈的網絡雖以某些根基(王浩威、陳光興、吳永毅、王蘋...)樹枝狀延伸,但枝節部分也呈現網狀的錯亂連結,並非單線的人拉人。

²³ 成員名字後加括號(*)爲創刊後加入《島嶼邊緣》的期數;(*)反灰則爲退出或不在成員名單內的期數。《島嶼邊緣》發刊後,編輯成員的名單隨著編輯專題的製作及串連的人脈略有增減。並且文字資料的名單並無法完全記載當時投入《島嶼邊緣》的份子及參與串連的夥伴。

《島邊》絕對不只是一群剛從國外回來大學教授資深演員的組合(傅大為、馮建三、張小虹、陳光興.....)，而是一群不以統／獨為主要認同的泛左翼，女性主義、基進、另類份子的多元結合，除了最年輕還是牙科學生的李尚仁外，邊緣知識份子蔡其達、舒詩偉、萬胥亭、曾雁鳴(鄭鴻生)、成令方、楊明敏、卡維波(甯應斌)、吳昌杰、王菲林、另類藝術工作者吳瑪琍、王墨林、李銘盛、社運人士王蘋、吳永毅、鄭村棋、與學院有關的陳志梧、郭文亮、劉欣容、曾旭正與已經離我們先去的吳正桓(老吳雖然逐漸聽不清楚，說話愈來愈吃力，但是他所有的想法、政治判斷乃至於經費的調度都對《島邊》造成重大影響)，何春蕙、丁乃非、瞿宛文、趙剛、廖咸浩、柏蘭芝、孫瑞穗、郭力昕，以及中期以後陸續加入當時還有學生身份的王秀雲、Apple、剛退伍的張釗維和張育章，現在還是學生的邊緣文字工作者洪凌、紀大偉.....這些人都在不同時期介入編委會運作。最重要的兩位核心成員，除了早期的執行編輯江斐琪外，其實是黃瑪琍與姚立群。(陳光興，1996.09：198-199)

3. 執行編輯及美術編輯：姚立群&黃瑪琍

瑪琍其實是《島邊》至始至終的鑄造者，《島邊》唯一有的一致性給予它一個奇怪的身分認同標籤，就是瑪琍的美術設計。而姚立群是《島邊》的靈魂人物，沒有他的督陣，《島邊》根本不可能出到十四期，更不可能在第八期以降造成文化圈內外的影響力。(陳光興，1996.09：199)

《島嶼邊緣》十四期封面：



執行編輯在第三期由江斐琪轉為姚立群接手，在《島嶼邊緣》後期的編輯及文章的

揀選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現為小劇場工作者，出沒於差事劇團及牯嶺街小劇場。美術編輯黃瑪琍，現為藝術工作者；在《島嶼邊緣》停刊之後也陸續與當初《島嶼邊緣》的編輯成員有合作關係，設計有「性／別」、「酷兒」、「文化研究」系列的叢書。當時黃瑪琍的封面設計和姚立群的編輯，的確構築《島嶼邊緣》風格一致的外貌及呈現版面。第8期「假台灣人」的蔣經國、鄭南榕、L.A. BOYS並置的封面設計，和第九期「女人國·家（假）認同」反面《愛福好自在報》（簡稱《愛報》）倒著排版的編輯模式均引起爭議性的討論。²⁴

《島嶼邊緣》的成員多元異質，並以「邊緣知識份子」自居，其邊緣意味著台灣反對運動的邊緣、另類媒體的邊緣、弱勢身分認同的邊緣、既統又獨（或不獨不統）的邊緣，超越執政／在野的權力分贓，代表著台灣社會的第三種聲音，以泛左翼知識份子內省式的批判為出發點，針對九〇年代政治優於社會矛盾的現象提出針貶，並認為社會運動必須配合論述的累積深化，方能有策略性的繼續前進。而當時的這些邊緣人，現今多無隨著社會禁制的瓦解而被收編至政黨、選舉當中，且並無隨著政權的輪替，成為新政權的擁護者，反而是持續保持批判視野來介入社會論述。

2.2.2 邊緣運作生產的物質性條件

《島嶼邊緣》的發刊在各路人馬的集結之後，必須還要有其他物質性條件的支撐才能成行。包括資金的籌措、編輯群聚的空間、出版流通的管道...等，沒有這些條件的支撐，《島嶼邊緣》也無法面市。

何春蕤：某一種「風雲際會」，它需要有一些物質條件，有一個空間，這空間可能是寫作的空間，或是人聚集的空間，所以當時像《島邊》當時在編的過程當中，陳光興提供他們在台北的某一棟公寓，作為《島邊》當時聚集的空間，這很重要。要不然要在哪裡見面？要在哪裡談事情？一般來講，連茶藝館都不是很流行的聚集方式，所以像這種物質空間是很重要的，要有物質的力量讓你去發行。所以《島邊》是在某一個這樣的時間點上面，有一些物質的力量，連我媽媽都捐了兩萬塊（笑），就大家湊一湊錢來發行這份刊物。那必然是在某種風雲際會之下很大的一個動力，那些動力剛好掃到了一些還算在論述生產上面有力量的人，所以會有《島邊》一個這樣的東西出來，大家出錢、出力、出地方、出點子、出時間，各方英雄都把自己的看家本事掏出來匯集，造成《島邊》那兩三年的光景。（20051012）

1. 邊緣資金的籌措

「爭取經濟獨立·懇請長期訂閱」：

《島嶼邊緣》的經費主要由編委會內部募股而來，編委成員也都同意不領取稿費，所以《島嶼邊緣》是一本不依賴任何商業或政治集團的雜誌。因此《島嶼邊緣》急需讀者長期訂閱，也設立了贊助專戶，希望藉此建立有別於文化商品通路的發行管道，是台灣的另類思考能夠存活及傳播。茲因本期篇幅擴增，雜誌單本售價提高為一百四十元，訂戶部分不變。另因營運成本日重，為維持正常運作，日後售價亦將提高，詳情請將儘速周告讀者諸君，尙祈各方賢達繼續支持、指正。

²⁴ 另外封面的設計並在〈徘徊在歧路的上上的《島嶼邊緣》—馬派，新左，還是後現代？〉（林威，《島嶼邊緣》，第6期：102-104）一文中後正文地對《島嶼邊緣》的內部關係進行嘲弄。此文以後正文的書寫方式自我爆料《島嶼邊緣》內部成員因路線分歧引發的鬥爭過程，一方面可說回應外界對《島嶼邊緣》如何統合異質成員的疑慮，並嘲弄了當時媒體以「爆料」、「內部鬥爭、分裂」的議題搶攻媒體版面或提昇銷量的媒體炒作手法。但文章中也亦真亦假的點出《島嶼邊緣》與1988年創刊的《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之間的糾葛關係。

蔡其達（筆名 晏山農）：1991年6月1日，就非常具體開始討論有關募款。

就我所知道，幫我們募款最多的就是陳光興、卡維波（甯應斌）。（翻開一本泛黃的筆記本，裡面條列著《島嶼邊緣》時期的收入及支出的款項明細）像這邊我就有羅列，早期有哪些人捐款，然後也有支付的部分。譬如我們還捐過一個菲律賓的團體2500元，還有一些手續費，然後支付江斐琪是前兩期的執編，黃瑪琍是美編。

原則上這些「編委」都要捐兩萬元。因為我們那時候畢竟不是很有錢，而那些在學校教書的人，也都剛進學校沒多久，所以錢也沒那麼多，所以都是要分幾次才湊成兩萬元。但也有人沒有捐到兩萬元的。讀者只要繳4000元，就可以變成終身訂戶。另外我們就到處去拉廣告，誠品、唐山、桂林...，所以廣告的就是這些。（20051015）

王浩威（筆名 譚石）：《島嶼邊緣》是用編輯委員認股方式募款，一股兩萬，有人一股，有人半股或兩股。那時候預定要募集一百萬（一百萬不知道這麼算的，大概是四期花光要一百萬），我記得最後只籌到七十二萬。什麼人都來了，連何春蕙的媽媽都找來了。顧問大部分也有出一到兩萬，有些當然也沒有。反正大家就一萬、兩萬這樣湊，就湊到七十二萬，就開始印。（20051003）

蔡其達（筆名 晏山農）：那講到我自己，為什麼後面那個帳號的名稱是我，其實很簡單。理論上應該是王浩威，但是好像登記的時候發生一個問題，到底是什麼問題我忘了。就是變成他沒有辦法用他的名字去當劃撥帳戶，就問我說可不可以？好吧！自然而然就變成我在管錢，譬如說有哪些訂戶啊？又變成是在我那邊。（20051015）

一般雜誌媒體多靠廣告刊登為主要經營收入來源。但《島嶼邊緣》為講求獨立性，避免商業資本的介入，主要的資金來源是由成員自行認股的形式，籌措七十二萬元為創辦基金，計畫以一年四期的季刊形式發刊。

《島嶼邊緣》的資金籌措主要有四項收入來源：

自我投資	編輯成員自行認股，一股兩萬。
募款	個人人脈的對外募款 舉辦座談會、活動時的讀者捐款
訂閱及零售	每本售價：120元→140元（第三期宣布調漲）→160元（第十四期宣布調漲，但隨即停刊） 一年訂費：440元；學生訂費：400元；美國訂戶航空郵寄
廣告來源	主要多是書局、文化團體、運動團體...等廣告主。 唐山、桂林、誠品、森大書局、當代雜誌、水晶唱片、新生態藝術環境、誠品書局、人間出版社、台灣防潮科技、現代詩季刊、身體氣象館、射日工坊、工人鬥陣、獵人文化、台灣原住民人文中心...等。

而支出的部分分為「每期固定支出」：雜誌印刷費用（佔最大部分），美術編輯黃瑪琍及執行編輯姚立群（一個月一萬元）的費用；和「不固定支出」：辦活動、座談會、贊助其他團體、出版《內爆麥當奴》一書...等雜支費用。初期為蔡其達掌管帳務，後期轉由王蘋負責。停刊後，結清讀者訂閱和代售處的帳款，尚餘七萬多元。所以資金的困頓雖是《島嶼邊緣》從發刊開始主要的運作難題，但並非是造成後來停刊的主要原因。

2. 邊緣空間的群聚

雜誌社地址：台北市復興南路二段78巷30弄2號5樓之一

編輯部地址：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7樓716室

雜誌社電話：02-3116451

《島嶼邊緣》文字資料上的編輯部地址及雜誌社電話是掛桂林圖書的地址及電話。基於經費的困難，《島嶼邊緣》無法支付承租編輯工作室的費用，所以編輯部的空間主要是執行編輯姚立群自己的住處。

姚立群：那時候因為資訊不發達，或者我自己的工作習慣，《島邊》那時候，除了新竹太遠了之外，住在台北附近的人，我都是跑到他們家或跑到哪邊去跟他們拿東西或幹什麼的。而且因為他們每次都亂跑啊！就是用這種方式，所以很多地方我都去過，去看到他們工作的地方。後來我覺得應該不要在我家裡頭了，應該要租一個地方，但那又已經到了後面那幾期才講的。因為我覺得這樣子我們都擴散不出去，至少有個工作室，是個公共區域、公共場所，大家都可以跑到那邊來，讀者也可以來，誰都可以來。在我家的話，變得非常封閉，我的路線就是我家到幾個主編家，然後主編後來都變成王浩威跟卡維波（甯應斌）了，偶爾加一個吳永毅或者王蘋給我一些資料。

但錢也是一個問題，但我們或許可以想些什麼辦法賺一點錢，到外面租一個工作室，一個小小的辦公桌也好，我們可以徵義工，我想大家應該都蠻樂意看到那些原稿的吧！應該還是有人希望可以接觸這些素材和接觸到這些人。編輯這件事情本來就不是那麼封閉的事情，然後我那麼久在編雜誌，我知道說真的不能放我一個人一直當編輯，編輯的工作應該是可以切分，多一點人做也會比較好玩的。那時候還有杭州南路（王墨林出租給舒詩偉的住所）可以去的時候，杭州南路那邊就是一個集散地。那時候我們開會也比較固定一點，好像每個月一次吧！一期差不多開兩三次的會。（20050829）

蔡其達（筆名 晏山農）：早期開會是在王浩威那邊，後來不斷地換，舒詩偉家，再來是陳光興家，還有鄭村棋的工作室，很多地方繞來繞去的。（20051015）

王浩威（筆名 譚石）：大部分聚會就常常在丁乃非爸爸的宿舍，那時候他爸爸駐外不在台灣，就在金華街的一個公寓裡面，大家都帶一個吃的東西，就聊天。這些人要麻就是剛剛畢業，要麻就是剛回國，其實都還不太有認識，他們可能在美國的時候也喜歡、互相都知道誰的文章，所以互相傳閱，那時候就會很多人這樣進來玩。（20051003）

萬胥亭（筆名 路況）：當時就是這樣各路人馬一起進來辦這份雜誌。那時候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說很多人來開會，好幾次也在王浩威家開會，有幾次開會或說聚會還有一兩次在李銘盛花園新城的家。很多人來聯誼的性質，帶東西來吃，有些人是我認識，有些是不認識的。我記得那時候還有一個逢甲建築系的（郭文亮），每次他都會來開會。所以每次編輯會議每次來來往往的人很多。還有社會系的舒詩偉，跟王浩威、王墨林都是老朋友，後來《島邊》開會都在他家開，他的房子好像是跟王墨林租的。（20050924）

張育章：好幾個不一樣的地方，我也很好奇說是不是跟開會地點不太容易搞定有關？我去過陳光興在台北的家，有陣子應該都在鄭村棋仁愛路的辦公室，是一個舞蹈教室，空間比較大，可以坐在那邊開會。我印象中最主要是這兩個地方。（20050930）

張釗維：我去過婦女新知一次。（20050930）

姚立群：以前在「發條橘子」，現在台大羅斯福路和辛亥路的摩斯漢堡的附近，《島邊》在那邊開過一個第二期的發表會，是傅大為開的，那場也很多人。那個地方一直在做一些小劇場和實驗性、行為藝術的表演。在還沒有「甜蜜蜜」之前，那算是一個蠻熱的地方。另外「酷兒」的時候我們在安和路也開了一個座談會，那次就比較簡單，比較議題取向的場合。

我印象中幾個比較大的 Party 都是到「甜蜜蜜」辦的，《島邊》不知道幾週年的時候就在「甜蜜蜜」辦了一個 Party。我還記得那天吳永毅還在那邊丟了一台相機。不知道哪一期的封面（第十期封底內頁）就是李銘盛吊在一個地方全裸，那照片我就把它全部剪開來再接起來，好像一個人被拉長了一樣。所以如果那個能量都在的時候，就是大家都在一起做什麼事情的時可以做到有一種逸樂性的取向，沒有那麼嚴肅、那麼硬的東西，那個事情大家會做的很帶勁，這是相互之間的一種狀態。這兩個地方都是一些小劇場或是一些邊緣事件發聲的地方。會來到這邊的人，在創作上就是比較邊緣的一些人，他們會聚在這邊就是比較特別的，比較有趣的。（20050829）

《島嶼邊緣》並沒有固定的開會或群聚空間，成員的住處成爲絕大部分開會的地點，包括：王浩威的住處、傅大爲新竹的宿舍、李銘盛花園新城的住處、陳光興和丁乃非台北的房子、舒詩偉杭州南路的租處、鄭村棋的工作室、婦女新知的辦公室...等。而舒詩偉向王墨林租借在杭州南路的住處和丁乃非的父親在金華街的宿舍，提供了一個較長期的聚會地點，也有較固定的開會時間。另外座談會或舉辦活動的空間，包括主婦之店、安和路 Flora 餐廳地下樓、高雄醫學院、《島嶼邊緣》雜誌代售處：高雄串門學苑、台北誠品敦南店，和小劇場和實驗性、行爲藝術的表演空間：甜蜜蜜、發條橘子...等。這些活動空間不僅是支撐《島嶼邊緣》發刊的物質性條件，也提供《島嶼邊緣》人脈串連的社交意涵，及《島嶼邊緣》標誌邊緣的符號意涵。

3. 邊緣出版的發行管道：唐山出版社

唐山出版社的負責人陳隆昊先生很有眼光的支持「戰爭機器叢刊」這套將領九〇年代風騷的本土文化評論叢書，集結了台灣當今最具創新與想像力的批評者，陳先生對台灣文化的貢獻功不可沒。(機器戰警／甯應斌 主編，1991：3)

蔡其達(筆名 晏山農)：原則上我們所有的媒體都是透過唐山去幫《島嶼邊緣》鋪貨。(20051015)

萬胥亭(筆名 路況)：當時經費上，應該是王浩威和陳光興到處去募款。而唐山書店陳隆昊也是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書都直接找他出，最早從「戰爭機器叢書」和《島嶼邊緣》雜誌都是由他來發行，某方面而言他也給了很大的幫助。比較邊緣、地下的刊物，像婦女新知、同志刊物、詩刊、文學刊物都會往他那邊擠，所以在實際的運作和發行上是一個很大的助力。不過他有一個問題就是帳目都不太清楚。(笑)好像是蔡其達和楊明敏有去找他談過好幾次，都搞不太清楚。(20050924)

王浩威(筆名 譚石)：每次開會跑帳務多少？就會講說跟唐山陳隆昊交涉很不愉快啦！然後有人就開玩笑說要扁他之類的。(笑)可是又變得很慘啦！連吳正桓去跟他談都沒有用。因為吳正桓跟他是老朋友了，他們好像是中原的室友，一直都混在一起，可是也沒有用。(20051003)

唐山書店：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333 巷 9 號地下樓。

鄰近新生南路，台大校園對面的巷弄內，沒有門面也無招牌，內行人才知道轉進的秘密地下樓。「唐山」一直是台灣「地下書局」的代表號，是台灣的地下書刊或邊緣冷門著作出版印行、流通販售的集散地。

台大人類學系出身的陳隆昊，因爲大學時期接觸「禁書」而開啓對人文、社會科學理論範疇的求知慾，進而在 1982 年成立獨立書店—「唐山書局」，販賣簡體字及左派思潮的管制書刊。並在出版業體制外的市場上，發展一條獨立經營的出版模式，「唐山出版社」是一家結合門市部「唐山書店」及發行部「正港資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的垂直複合式文化出版公司，提供出版印製並且也包含實體的店舖及通路管道。專門出版人文社會科學理論、獨立製作...等的小眾書籍，並販售香港大陸台灣社會人文書籍與期刊、詩刊、各期當代雜誌、人間雜誌、唐山出版品、有聲品、個人獨立出版品、社會科學、人文思潮、文史哲專業圖書、性別圖書...等小眾出版品。

而唐山的「地下性格」不只在其獨立、反商業的理想性情，也不只在商業連鎖書店、網路書店夾殺中的位置，也不只在獨立出版的小眾人文刊物，其經營模式及店舖位址地下室的具体空間均具有「地下工廠」的運行方式，更在極其斑駁的書籍宣傳海報當成的壁紙和腳邊成堆的書籍中感受何為「地下」。

八〇年代解嚴之後的唐山，大量編製出版人文思潮及社會科學理論的小眾叢書：「唐山論叢」、「研究與批判叢書」、「新馬克思主義論叢」、「戰爭機器」...等，供養當時的左翼知識份子及學運份子的論述養分。而面對主流出版業、書店，「戰爭機器叢書」及《島嶼邊緣》均是被排除、被掩沒的另類、小眾書刊，只能透過另類的出版管道為其發聲。唐山陳隆昊不僅與「戰爭機器」合作，編製出版「戰爭機器叢刊」的書系，並成為《島嶼邊緣》的經銷點之一，甚至在《島嶼邊緣》發刊時扮演發行及鋪貨的重要流通管道。但唐山與《島嶼邊緣》之間存有帳務不清的問題，某部分造成《島嶼邊緣》出版發行的困境，但或許「帳目不清」也是唐山反資本錙銖必較的地下性格之一。

《島嶼邊緣》鋪貨的經銷點—島嶼邊緣代售處

唐山出版社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333 巷 9 號
聯經台大門市部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94 號
書林書店	／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62 巷 5 號
誠品書店	／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 249 號
台大法學院學生活動中心圖書館部	／台大法商學院內
中興法商學院圖書部	／台北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內
政大書城	／台北木柵政治大學校園內
學生書局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98 號
師大書苑	／台北市和平東路台灣師範大學校內
東吳書城	／台北外雙溪東吳大學活動中心內
淡水文理書局	／台北縣淡水鎮英專路 56 號
文興書坊	／台北縣新莊市中正路 514 像 25 號
水木書苑	／新竹清華大學校園內
新展望書廊	／台中市華美街二段 262 號 B1
東海書苑	／台中縣龍井鄉新興路 7 巷 1 號
主恩書苑	／台中縣龍井鄉東園巷 1 弄 13 號（東海別墅內）
中正大學圖書部	／嘉義縣民雄鄉中正大學校園
新生態藝術環境	／台南市永福路二段 138 號
成大書城	／台南市城東大學校園內
高雄復文書局	／高雄市泉州街 5 號
串門學苑	／高雄市民享街 102 號
高雄敦煌書局	／高雄市五福四路 76 號
開卷田	／高雄市廣州一街 150 號（十三期加入代售）

九〇年代之後隨著大型商業連鎖書店、大陸簡體字書刊專門店進駐台大校園附近的書店商圈，唐山「地下工廠」的經營模式愈顯艱鉅，並中斷出版八、九〇年代台灣知識界的小眾書系：「唐山論叢」、「研究與批判叢書」、「新馬克思主義論叢」、「戰爭機器」等，轉把出版重心放在人文社會科學的教科書及文學作品，但仍持續出版《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及「台社叢刊」等學術的人文刊物。

唐山的地下出版業對於另類、小眾書刊的出版、印製、販售、鋪貨有其重要的關鍵

地位之外，對於當時人文思潮的傳遞及擴散更有其歷史的定位。「唐山」不僅標誌著獨立出版的經營模式，及地下小眾出版品的販售空間。「唐山」的歷史更標誌著台灣知識份子的情感記憶與歷史文化，走過戒嚴到解嚴的禁書時期，也見證美麗島事件到野百合學運的運動熱潮，更貼近台灣學術熱潮的文化脈動及社會需求：從社會學興起的韋伯熱到左派的馬克思、新左派、後現代主義、傅柯、女性主義、性別研究、本土思潮的書籍，甚至勾勒出一條反商業獨立出版的行為，面對出版業生態結構性的轉換：大型商業連鎖書店（金石堂、誠品）、網路書店、低價書店的衝擊。

4. 《島嶼邊緣》「專題獨立式主編」的編輯運作模式

《島嶼邊緣》主要由「編輯委員」進行雜誌的編輯運作，製作編輯、撰寫文章、翻譯文章...等。但《島嶼邊緣》採「專題主編」的編輯運作模式，以專題認養、發包的編輯形式，無固定主編、無固定編輯格式。而「專題」的設定多經由編輯委員的討論及同意，但專題主編對最後的專題發刊內容及編輯形式擁有相當的主導權，配合執行編輯姚立群及美術編輯黃瑪琍製作發刊，其他編輯委員則可以從旁給予支援或建議。

而編輯顧問則是主要有兩種參與形式：部分會參與編輯會議，提供意見、參與決策...（如：夏鑄九、黃／劉毓秀...），甚至是投入編輯（如：何春蕤）；部分則是合作聯盟的形式（如：王墨林的「身體氣象館」主編第6期「身體氣象」專輯；王蘋、丁乃非的「歪角度」讀書會主編第9期「女人國·家（假）認同」...）；甚至具有一種保護網或防護罩的功能，甚或是一種替《島嶼邊緣》作「背書」的形式（如：瞿海源、蕭新煌、陳師孟...），但並不干涉編輯的運作。

《島嶼邊緣》14輯（1991-1995）簡表如下²⁵：

發刊時間	專題	專題編輯	專輯要目
第1期 1991.10	葛蘭西一〇〇專輯	蔡其達（筆名 晏山農）	歷史建構、邊陲策略與「中國化」／認真對待女性
第2期 1992.01	科學·意識型態與女性	傅大為	市民社會的身體論／法西斯心態的分析／未來派與法西斯主義
第3期 1992.04	拼貼德希達	路況（萬胥亭）	學運的精神分析／有關實存社會主義危機的十二條提綱／學院知識分子的另一種工作
第4期 1992.06	廣告·閱聽人·商品	馮建三	從生產之鏡到遊戲之鏡／新左評論訪談錄／淡江夏潮路線的民歌運動
第5期 1992.10	宛如山脈的背脊：原住民專輯	譚石（王浩威）	尼采、系譜學、歷史／台灣重金屬搖滾的發展／社會主義的未來
第6輯 1993.01	身體氣象專輯	王墨林 舒詩偉	你有沒有在游泳池裡放過屁／《虛無主義書簡》序：歷史終結的游牧思考／資本主義與同性戀認同
第7輯 1993.04	佛洛伊德的誘惑	王浩威 吳其諺（吳正桓）	滅聲之石／桃源村造像／歌舞政治學

²⁵ 專題名稱反灰的部分，是原本刊登在雜誌上計劃發刊的專題。

第 8 輯 1993.07	假台灣人專輯	吳永毅 何方 (甯應斌) 王墨林 鄭村棋	「自由時代」竄改歷史！／「後正文」策略有效嗎？／在香港主流論述間隙中游激的異類「民間抗爭」
第 9 輯 1993.10	女人國・家 (假) 認同	平非 (王蘋、丁乃非)	一字之差的本土派和本土左派／愛福好自在報
第 10 期 1994.01	酷兒 Queer	紅水鮮 紀小尾 蛋糖饅 (洪凌 紀大偉 但唐謨)	妖言／出國男性聲 (黃書倩作品／新新男性)／保衛阿爾杜塞
第 11 期 1994.06	民眾音樂初探 (八月份推出) 民眾音樂研究初探	張育章 張釗維	意外之旅／酷兒啓示錄／南進：台灣「次」帝國的形
第 12 期 1994.09	阿爾杜塞專題 (九月份推出) 保衛阿圖塞	王浩威	村上春樹／一段可能湮沒的歷史／叛徒們的碑碣／民眾音樂社會學
第 13 期 1995.03	反反毒專題 (未出刊) 激進神學	卡維波 (甯應斌)	藝術與政治／與傅柯談法蘭克福學派／假台灣人專輯
第 14 期 1995.09	激進神學→女人國→國族主義 色情國族	新邪人類五人小組 (甯應斌)	在荒原上製造同性戀聲音／女人 A 檔案／仇恨女性、歧視男同性戀、竊笑女同性戀的電影救世主奇譚／批判理論的新希望
第 15 期	島嶼邊緣的少年快報→女人國 (未出刊)		
第 16 輯	島嶼邊緣的少年快報 (未出刊)		

馮建三：我想也沒有什麼編輯模式，就是「認養」。我們想個一年的東西大致上有人去認養出來做。所謂的認養就是，認養的人就是要負責供稿，那美編有黃瑪琍做。剛開始四期都已經講好了，是誰認養去弄的，次序是大家講好的。(20051028)

張育章：第 11 期準備發刊的時候，《島嶼邊緣》有個內部新的政策出來，就是討論編委能力和資格的問題，政策就是以後製作專題的團隊可以有一個人代表進入《島邊》的編委裡頭。那我之前第九期就在裡面已經是編委，所以 11 期出來後，釗維也進去了。還有 Apple 也是那期進去的，因為那期有一個專題是他們「大便報」的部分。我那個時候去談的時候有碰過幾次不一樣的人，有一次碰到洪凌他們，還有一次碰到蔡篤堅的樣子。就遇到有人來 Present 或有點看熱鬧的團隊。

第十一期的專題其實之前就已經排定了。他們也希望碰觸到一些不同的主題，然後一方面也是要看有沒有現成的內容可以做出來。(20050930)

張釗維：編輯《島嶼邊緣》第一個是「現實主義」的原則，就是怎麼樣可以做出來就怎麼樣弄，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規矩。第 11 期一開始的構想，就是把我們翻譯的一些東西湊一湊、整理編出一期。(20050930)

何方 (甯應斌／筆名 卡維波)：我覺得不這樣子的話，也許雜誌出不來吧！你總是要有個人負責。尤其前面幾期是稿子都先籌劃好差不多了，然後才能夠這樣一期期推出。有籌畫、有計劃、有分工，這是一個很正常的方式。因為我們人太多了，人太多的情況下，如果沒有一個人去負責一期的話，不一定會出得來。那一起開會的目的有個好處是說，某一個人主抓，他可以去設計，其他人可以去幫忙，幫忙的意思就是出文章，那這樣這一期就成功。這是一個還不錯的設計。

那誰負責這個東西，它主導的力量就很大。我們當然也有一起在開會，一起討論一些意見，但是往往起意去編的人就非常重要。所以《島嶼邊緣》要說是哪一個人的？！我倒覺得說沒有這樣。因為那就是非常切割的、分包的非常厲害。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分包制」的雜誌。(20051012)

萬胥亭 (筆名 路況)：並沒有設定本來就不要有，而是沒有人願意出來當主編！一開始就是沒有一個人是完全出來投入雜誌的。

當然也有經濟上的考量，如果說要請一、兩個完全專業的工作人員的話，那是一筆很大的人事開銷，那時我們也負擔不太起。所以實際上要找一個總編輯來投入，在經濟條件上也有些困難。那麼多人來參與，卻沒有人願意站出來負責，擔任一個總編的位置。王浩威就類似社

長或發行人的角色，他也不是雜誌實際思想導向的主導，在這方面他也沒有站出來主導。姚立群、黃瑪琍等於是執行的編輯和美編，不牽涉內容和雜誌的取向，就純粹只是編輯的工作。像姚立群、黃瑪琍也都類似贊助的性質，不可能靠這個雜誌來維生，給他們的薪水也不多。不成文的規定就是每一期有一個專題，每一個專題有一個主編，名義上以主編來編輯當期的刊物。就我個人的經驗來講，專題之外的文章是不太去管、去干涉的。開編輯會議時，就會討論哪一期的專題由誰來提出來大概就由誰來編，各自去和姚立群和黃瑪琍配合，然後專題時間大概排到哪時候。每一次的開會好像很多人來，大家就會稍微問一下說，最近雜誌的進度怎麼樣？什麼時候可以出刊？就由當期主編報告一下進度。大家都有熱誠或激情想做什麼，但找不到一個方向可以把它統籌起來，沒有一個很直接的工作效力。(20050924)

蔡其達(筆名 晏山農)：理由其實很簡單，如果要弄一個固定的主編，必須要有錢。那以我們的狀況，說實在是一個同仁雜誌，真的是很困難，所以只好各自認養一個主題。所以最後只有剩下三、四個人在玩的時候，它就真的玩不下去了。因為理論上如果這麼多人，一個人認領一期，那也要兩三年後認養第二期。其實基本上是可以，可是必須要有一個強而有力的熱度，可是等到這個強力熱度沒有的話，剩下兩三個人，玩不下去了。而之所以沒有一個總編輯這樣的一個人物，因為那必須是全天候的，就必須要專職，不能有其他的工作。連江斐琪到姚立群，基本上他們都是沒有別的工作的，靠著每個月我們給他們微薄的一萬元，其實這是很辛苦的。

另外我們既然標榜所謂的「人民民主」或「多元民主」，基本上也就不會去設一個「總編輯」的位置。(20051015)

王浩威(筆名 譚石)：為什麼那時候會沒有主編，可能也因為 Laclau 那時候「人民民主」的理論，我記得這是陳光興提的，基本上是用結盟的方式，讓大家在某些事情上適當的結盟，然後不適合的就離開，就是來來去去很自由。(20051003)

何方(甯應斌/筆名 卡維波)：一方面是自然，一方面是大家協議出來的共識吧！

我這樣講好了，參加的人，你可以說是當時「進步的知識分子」，但是這不表示說，我們的共識或我們之間的交情能夠有集結的程度，能夠共同推出一個總編輯的程度，我覺得還沒有。就是「他來領導我們」，我覺得沒有。因為那就表示說，我們對於這個雜誌的共識可能是更明確的。因為分包的話，我們可以每個人都把我們自己想要的面貌、想要的內容放在雜誌裡面。那我們不願意這樣子把所有的東西都給一個人作，就表示我們的集體共識還沒有高到那個程度。有相當的程度可以一起辦雜誌，但是要分開辦。(20051012)

吳永毅：這麼多勢力要妥協的，誰會要誰當「主編」！

我覺得第一個不是功能性，也不是像事後理論說是「實踐人民民主」。(笑)其中還有一個核心的因素是說誰出來或者說即使他能出來，他也覺得他不能出來，因為他怕其他人就跑掉了。像王浩威在當時的權力結構是可以通過的，但我想他也知道如果他出來的話，其他人也不一定那麼服氣。所以各方的考慮就是說那每一期一個主編。(20060719)

所以《島嶼邊緣》採行「專題獨立式主編」的編輯模式，是因應《島嶼邊緣》這個「非正式、非階層化」的組織所設想出來的編輯模式。一方面因為現實的考量，在經濟層面上，《島嶼邊緣》的資金拮据，無法支撐一個「主編」的開銷；在個人層面上，沒有人可以並被允許出面統籌並義務支援雜誌的編輯事務，故以編輯委員輪流主編「專題式」的內容發刊。另一方面是因為之前受制其他發言空間的限制：報章雜誌在篇幅、內容、文類、格式、和總編輯主觀審稿...等的限制。另外基於民主開放的考量，雜誌「主編」的設立不免會造成在內容取向及編輯形式上的專擅，及區分成員的位階性，所以「人民民主」去中心化及多元串連的立場，為避免日後《島嶼邊緣》論述的單一化，以去主編中心化的編輯形式，達到「人人都可以是主編」。並且對外開放個人及團體的專題製作或稿件、作品來函，藉以分散編輯委員輪流主編專題的壓力。

而除了專題主題多元的歧異性之外，對於文章的編輯格式及創作文類也毫無限制。「《島嶼邊緣》希望能打破任何不必要的框架束縛，嘗試任何論述創作表現的可能空間」（《島嶼邊緣》，第3期：4）。並對外廣徵「佔領島嶼邊緣」的稿件，沒有框定主軸、沒有固定格式、不限任何文類...。每期並穿插後正文廣告、文章圖片的後正文圖說。

《島嶼邊緣》封面底頁的徵稿啟事

<佔領島嶼邊緣>
「這是一個
沒有固定邊界的島嶼，
不確定的方位，
等待你的佔領來共同勾勒。
<島嶼邊緣>，
一個人人是主也是奴，
是土地也是海岸的領域，
希望你來稿！
稿子沒有長短的拘束，
沒有文類的限制，
詩·散文·小說·札記·
筆跡·塗鴉·意見·
譯介·思潮及運動報導·
平面藝術·攝影·評論·
多媒體拼貼·劇本·
歌曲·Video.....
任何你可以呈現的「作品」
都是佔領的武器」

《島嶼邊緣》站在顛覆主流的邊緣位置，也等待著自己被顛覆。《島嶼邊緣》並沒有固定的目錄分類形式，每期以「專題」單元為雜誌文本的主軸，其他則由各片段、碎裂的小單元「拼貼」而成。

而雜誌中主要的單元分類有：

- 各專題的衍伸單元：「原住民」、「身體氣象」、「假台灣人」、「妖言／出甌文學」、和「酷兒啓示錄」的小說譯文、「另翼岸譜」的民眾音樂研究、譯文...

- 特別單元：「王菲林專題」、「後正文專題」...

- 理論思潮的部分：「當代思潮」單元，包括西方理論的引介、譯文、訪談錄；「理論／衍異」單元，收錄在地與理論對話的文章，是「一個

概念實踐的操作場域」（《島嶼邊緣》，第3期：4）。

- 「本吐話」單元：非主流「本土」論述的文化評論、歷史研究...等文章。「『本吐話』小專題的設計並不在於嘲弄諧擬目前已蔚為主流的「本土化」論述，而在於激發另一些思考『本土化』問題的新可能性。這個小專題依然是一個一直多元性的裝置集合，湊泊著不同的領域、不同的立場觀點」（《島嶼邊緣》，第3期：4）。

- 「邊緣評論」：對近期文化作品的評論。包括人文書籍的「邊緣書評」、「畸片庫」的邊緣影評、「衍聚」的小劇場劇評、引介、訪談。

- 基進論戰：「邊緣戰爭」及「戰爭機器」單元，針對邊緣、後正文、南進政策的論述及新電影的操手...等的論戰文章。

- 國內外學術活動、時事的報導或評論：對台灣社會事件分析的「島嶼記事」；對當下情勢的紀錄和深入報導，或引介國外有關世界變局的「異質性」文章的「國際檔案」和「邊緣檔案」；另外還有針對1991年國大選舉的「選舉邊緣」單元。

- 邊緣文類及開創另類的表現場域：「延異／詩牆」的詩作發表、「島嶼相簿」的攝影照片展、「島嶼繪本」的繪畫藝術創作、「違章學校」校園問題的討論和好作品的連載（包括「大便報」）...等較難見容於主流媒體的實驗性創作。

另外《內爆麥當奴·Culture Studies》(陳光興·楊明敏 編, 1992)一書則是唯一以「島嶼邊緣雜誌社」之名出版的出版品。此書是 1992 年「TRAJECTORIES 文化展望·邁向新的國際性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年會的文字集結,也間接說明了《島嶼邊緣》與「文化研究」有某種相互為用,而非前後的關係。《島嶼邊緣》每一特輯的理路緊扣著現今文化研究建制化的發展主軸:身分認同、身體、消費、媒體、族群、性別、批判理論... ,與台灣文化研究主題設定涵蓋面向多有重疊,可視為文化研究建制化、學院化前的論述積累。《島嶼邊緣》當中的某些邊緣知識份子從邊緣戰鬥的位置挺進學術建制化後,也轉而進入打造「文化研究」的學門。

	<p>麥當奴內爆 TRAJECTORIES 文化展望 邁向新的國際性文化研究 1992.7.3-1992.7.22 清大月涵堂 主辦:清華大學 人文社會學學院 文學研究所 協辦: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中國社會學學會/中華民國視聽傳播藝術學會/清華大學外語系/清華大學兩性與社會研究室/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 主講人: Ien Ang / Tony Bennett / Jody Berland / Janadas Devan / Lawrence Grossberg / Geraldine Heng / MyungKoo Kang / Douglas Kellner / David Morley / Meaghan Morris / Cindy Patton / Mark A. Reid / Ubonrat Siriyuvasak / McKenzie Wark / 張小虹 / 張漢良 / 陳光興 / 陳清橋 / 廖炳惠 (《島嶼邊緣》,第4期:98)</p>
--	---

小結

《島嶼邊緣》的故事是由多個不同軸線所支撐起的多面變形體,包含解嚴後動態移轉的社會氛圍、改革開放衝刺後後繼無力的緊縮、文化評論新文類的崛起、理論當道與運動實踐的爭議、另類邊緣思維的開啓... ,還有身處其中的知識分子與文化工作者在其中的心路轉折、情感纏結。

主要針對《島嶼邊緣》的發刊過程針和邊緣運作生產的物質性條件的分析可得知:彰顯的是成員組成當中極其複雜糾結的人脈串連,和經濟層面的拮据,也促使《島嶼邊緣》必須轉為「半-地下刊物」的出版形式:沒有太多製作經費(主要靠自力救濟的認捐);也沒有真正形成一個編輯狀態(由編委輪流主編專題);也沒有固定出版時間(有時延遲時間發刊,但大體仍維持一季一刊);也沒有固定的編輯部空間(姚立群自家地下工廠式的編輯空間);也沒有大出版社支援流通鋪貨(唐山出版社代為鋪貨)。

總結第二章所談到《島嶼邊緣》的組成是以交叉繁複並多相重疊的人脈關係所串連起的「同仁團體」。每個份子都自有獨特性及自主性,各有其社會位置的戰鬥領域,或各有其不同的思想脈絡,基於當時的政經情勢及《島嶼邊緣》本身的運作邏輯和刊物本身的平台特性使《島嶼邊緣》可以作為共同發聲的出口。

一是「台灣當時的政經情勢」：解嚴之後的三月學運、獨台會的五二〇大遊行，在「知識界、文化界」凝聚一股「力量」。這股力量面對九〇年後言論空間的緊縮，社會運動的逐漸退燒，及執政／在野二元對立的論述形式，尋求「異質論述的發聲」及其發聲的「管道」，便成了各異質份子「暫時性」的「共同意識」；《島嶼邊緣》便形成「暫時性」的聯盟團體。

二是「《島嶼邊緣》的編輯運作模式」：一方面因各異質份子的加入，故採行「專題編輯」的編輯模式—無固定主編及固定的編輯形式，《島嶼邊緣》的確實提供「異質論述發聲」的空間，並開放論述內容的多元性。另一方面，《島嶼邊緣》「專題獨立式主編」的編輯模式也是因同期其他報章刊物（《當代》、《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報紙副刊...）的編輯模式而制定的，故也吸引被排斥或被邊緣化的異質份子及無法發表的異質論述齊聚《島嶼邊緣》發聲。

三是「人脈串連的平台」：接續著「戰爭機器」時期聚集人脈的能量，《島嶼邊緣》組成份子的多元異質性，也提供了知識界、文化界、運動界、藝術界...等相互接觸的平台，擴展個人陣線上的人脈資源。而《島嶼邊緣》的編務會議及活動，也因為組成份子的多元異質性，激撞出許多不同層面的思考方向。

這個故事甚至包含著群聚《島嶼邊緣》的邊緣知識份子，如何斬斷台灣社會當時所面對的二元分化的論述軸線，開拓第三條、甚至第 n 條逃逸路線，使當時台灣社會的底層、在主流的宰制—被宰制的關係結構中被忽略、被賤斥、被噤聲的一群：原住民是種族中心族群爭權的論述邊緣、假台灣人是統獨議題本省外省爭權的論述邊緣、同性戀 Queer 是異性戀男女爭權的論述邊緣.....當眾現聲／身。

第三章 《島嶼邊緣》的亂言亂語亂動作

— 「台灣的新反對運動」之酷兒操演

《島邊》打著邊緣思考、游牧戰鬥的旗號出刊四年，它的學術血脈以及接合社會脈絡而來的論述實踐，本身就是一部（多部）知識／精神史—既政治而又情色地，挑釁各種霸權結構—父權的統獨的右派資產階級的殖民的種族中心的異性戀的性歧視的……。火辣狠毒的痛踹了自（我期）許進步的當紅本土派、忠貞獨立建國者、南進的準台灣帝國先行者的痛腳；發妖的情慾論述、顛覆性／別倫常的酷異寫作則是圖文並茂，不僅讓姊妹同志的功力大增，連敵人也不能抗拒地、捧著當作情慾秘笈小書來看。（《POTS》，1995.11.24：3）

《島嶼邊緣》正是在台灣社會舊有價值崩解，新價值尚未完整確立的情勢之下崛起。集結當時多位左翼寫手及社運闖將和學院知識（滋事）份子，其所關注的焦點並不在九〇年代台灣的國民黨與民進黨的政治和選舉鬥爭中選邊站，亦非為特定政黨的政策護航。不僅僅突破社會既有的禁制規範，並透過批判理論的引介，提供社會實踐所需汲取的論述養分，並以別於主流媒體的觀點針貶時政，揭露台灣被政治鬥爭所遮掩的社會矛盾及提供被排斥的弱勢族群一個現身／聲的管道，並頑鬥地反諷當時台灣政治鬥爭、資本奪利的醜惡。

這群邊緣知識份子在特定的台灣政治、社會、歷史脈絡下聚合，面對時局快速變動下權力結構的轉型及主流論述的偏頗，在思想、書寫、實踐上採取邊緣戰鬥、後正文、人民民主論的策略，衍生製「台灣的新反對運動」的抗爭論述，意圖鬆動權力集團的控制，分頭肢解權力結構的組成部分，而所達成的影響為何？又遭遇何種阻礙及侷限？

3.1 《島嶼邊緣》與西方（左傾）理論思潮的接合

八、九〇年代之交的台灣知識領域，面對台灣社會運動的勃發及解嚴開啓的可能性，透過（前述）歸國學人、本土翻譯書刊、新人文思潮雜誌的引介，紛紛尋求新的實踐性理論。1991年創刊至1995年停刊，共發行14期的《島嶼邊緣》，在台灣九〇年代所揭櫫的是以泛左翼的理論為論述基礎，而「人民民主」抗爭則是《島嶼邊緣》接合 Laclau & Mouffe 和 Stuart Hall 的「人民民主」理論所操作出的實踐性論述。在直接進入《島嶼邊緣》的論述之前，先略介《島嶼邊緣》當時主要援用的左傾理論資源及操作理論的基調。

3.1.1 西方左翼的新實踐論述—「人民民主」（popular-democracy）

《島嶼邊緣》的成員思想背景大多延續著「左翼」的思潮脈絡而行，並以「泛左翼在台灣的集結」自我標稱。而當時的左翼路線面臨學術思想及政治經濟現實的挑戰：遭逢後結構／解構、後現代思潮的衝擊，並面對共產政權的相繼垮台、轉型，及資本主義新形態的跨界運轉，故作出了修正、轉向。

1. 馬克思學說 (Marxology) 的盲點和新馬克思主義者的修正

Karl Marx (馬克思 1818-1883) 從哲學觀點以「歷史唯物論」(historical materialism) 分析人類的階級鬥爭歷史，並全面批判資本主義運作邏輯下資產階級的不當剝削及異化，進而構築了一套普勞階級革命實踐的理論體系。Marx 將社會整體分為下層／基礎結構 (base) 和上層結構 (superstructure)，並認為下層結構經濟的生產力影響、決定上層建構生產關係的變革；也就是說，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衝突導致階級鬥爭必然推動歷史的變遷。這樣的「經濟決定論」(Economic determinism) 並進一步揭示資本主義的必然消亡和普勞階級 (The proletariat) 的最終革命。這一整套馬克思學說在意識形態化下成為「左翼」的論述資源，一方面演變為正統馬克思主義者的信奉圭臬及共產政權的信仰教條；另一方面成為知識領域中理論構築的主要對話對象。而馬克思學說的盲點在於「歷史唯物論」蘊涵機械式、進程式、普遍性 (universalism) 的歷史史觀，而「經濟決定論」和「普勞階級革命論」中的「本質論」(essentialism) 及一元論也成為日後解構批判及左翼軸線修正的焦點。

而新馬克思主義者 Antonio Gramsci (葛蘭西) 認為「經濟決定論」忽略政治與意識形態層面的鬥爭，進而將上層結構分為「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 和「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並與基礎結構統合為一「歷史性集團」(historical bloc)。Gramsci 認為社會的形成和社會領導權力是一方面透過市民社會散佈既有的統治意識形態，塑造「知識和道德的領導地位」來補強其經濟力量；另一方面與市民社會的反意識形態進行抗爭、妥協與重構，經由取得「共識」的拉鋸達成一「動態平衡」的爭霸過程。故主張由有機知識分子 (organic intellectuals) 透過「知識和道德」的領導，喚起普勞階級的階級意識，構成高度綜合性的「集體意志」—透過意識形態的有機接合成一「歷史性集團」—走向超越「階級聯盟」的文化霸權，此為 Gramsci 提出的「霸權論 Hegemony」。

Louis Althusser (阿圖塞 1918-1990) 亦著重於上層結構、意識形態的分析。Althusser 以結構主義的觀點提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進一步修正馬克思學說，並提出有別於 Gramsci 的觀點，將上層結構分為「壓制性國家機器」(RSAs, 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es) 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SAs,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進一步指出意識形態在具體社會實踐面向的「物質性」(materiality)，來說明意識形態「再現」社會既有的權力秩序。Althusser 認為社會是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所構成，三者具有各自獨立又相互影響的「相對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y)。以複雜的結構衝突和互動關係的「多元決定論」(overdetermination) 擺脫機械式的決定論觀點；但最後「經濟最後決定論」的修正觀點卻又陷回經濟決定論的泥沼。

Gramsci 和 Althusser 對馬克思經濟決定論作修正，將鬥爭場域由下層結構的經濟面向轉為上層結構的文化、意識形態面向，將階級鬥爭對象由資產階級轉為掌控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而階級主體由意識形態塑造的論點也蘊涵普勞階級主體性的消融，並揭示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關係並非只是單向由上而下的宰制。Gramsci 和 Althusser 的理論架構，雖然重新定義了社會結構的形成、下層生產關係的影響力、統治權力在上層的

運作手段；但對社會整體的分析仍抱持一封閉結構的看法，過分強調結構的穩定性及完整性，忽略了結構的歷史性，也就難以解釋結構的歷史變遷。

Gramsci 和 Althusser 的論點，使得上層結構的意識形態分析、論述分析開始成爲左翼對社會研究的重心。Gramsci 的霸權論 (Hegemony) 及文化障地戰 (war of position) 的概念，在七〇年代末《夏潮》的台灣左翼軸線開始挪用實踐 (參見 郭紀舟, 1995)；而 Althusser 的意識形態理論藉由香港盜版譯本，在八、九〇年代之交進入台灣的知識領域，左翼理論的轉向也影響了台灣左翼的思想發展，並延續至「戰爭機器」和《島嶼邊緣》檢視國家意識形態的掌控和撰寫文化批判評論的具體實踐中。解嚴後，台灣左翼力量也在面對新右派 (自由保守主義) 的興起、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新型態運作，和後現代、解構主義的理論思潮而愈漸式微；並隨著《夏潮》、《人間》雜誌和標榜新左翼的《南方》相繼停刊後的無以爲繼，和八〇年代末期新興社會運動的狂潮，顯見馬克思主義的論述仍難以跳脫本質論及決定論的觀點，並不足以解釋革命主體的形成、社會的構成，再再顯現舊有的左翼理論資源已無法提供台灣的知識份子進行社會分析及操作實踐。所以《島嶼邊緣》的發刊除了承繼左派理論思潮的遞擅，企圖突破台灣在地左翼文化的長期噤聲，也必須隨時代變遷調整戰鬥的位置、策略及目標。後馬克思主義者提出的「人民民主」理論成了《島嶼邊緣》最主要的援引工具，除了一方面具有左翼路線的理論修正性；另一方面則是貼合台灣在地的脈絡，轉化開啓台灣左翼的新實踐論述；並用以來詮釋《島嶼邊緣》成爲一偶然性、歷史性集團的動態過程，和面對理論的操作方式。

2. 後馬克思主義者的「人民民主社會主義戰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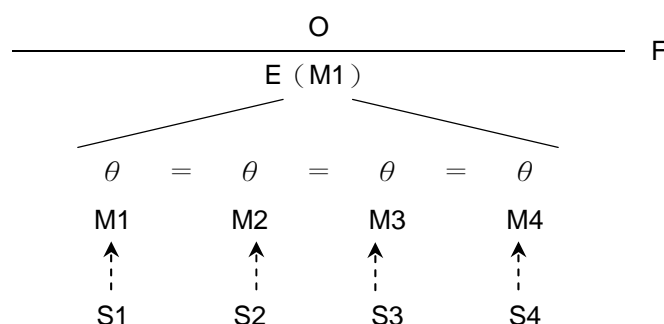
(1) Laclau & Mouffe 的「文化霸權和社會主義戰略」

英國的後馬克思主義者 Ernesto Laclau & Chantal Mouffe 面對當時西方左翼思潮的危機及一九六〇年代各式的新興社會運動和一九八〇年代新右派的政治掌控和資本主義運作，合著《文化霸權和社會主義的戰略》(Hegemony &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一書，對馬克思學說和新馬克思主義提出再修正，試圖提出左派的新實踐戰略及方向。

Laclau & Mouffe 以符號語言學的觀點隱喻實際社會現象，轉化 Gramsci「文化霸權」(Hegemony) 的論點；並以後結構主義的觀點，將論述形構的「接合實踐」轉化分析社會行動或政治實踐，說明革命主體的形成及集結。論述形構的形成是「承襲後結構主義對於本質主義及結構主義的批評，反對任何先天法則或決定論，論述理論的基本假設是：認知、思想與行動的可能性乃取決於先於事實直接性 (factual immediacy) 的意義場域之結構」(林淑芬, 2003: 44)。

Saussure 索緒爾以來的結構語言學認爲「語言是由表達觀念的符號所組成的差異系統」。「符號」(sign) 是構成聲音形象的「符號具/符徵/能指」(signifier) 與指涉概念內容的「符號義/符指/所指」(signified) 所構成的。符號具與符號義之間的等值 (而非等式)，是藉由與其他的符號具或符號義的差異關係而決定的，之間「一對一」

的對應聯結是偶然而非必然的。但如何不去預設或擺脫某種封閉結構，使符號具與符號義之間「任意性」的「等值」得以成立？也就是說，若將論述場域中的接合實踐視為政治行動的革命實踐，眾多相異的群眾如何集結為一動員整體？



圖引自 林淑芬，2003：52（略作修改）

Laclau & Mouffe 將論述場域（field of discursivity）中「游移的符號具」（floating signifier）稱為元素（element，圖示 S），所謂的接合則是意味著在不同論述中流動的符號具與不同符號義的聯結。也就是符號具由尚未被特定論述接合的「元素」經由特定的論述建構所吸收，先自我「解合」（disarticulation）改變成某個特定論述的「要素」（moment，圖示 M）。也就是圖中 S1→M1 的過程，中間的箭頭聯結以虛線表示其不穩定性，因為

接合實踐的可能性在於「元素不會完全轉變為要素」作為成立基礎，而這個基礎則必須是在「論述形構無法毫無節制地延伸其關聯邏輯（relation logic），將所有的元素納進論述中」這一條件下才能完全確定。……符徵與不同符指連結的可能性、不固定性（non-fixation）或流動性，只有在「符號義繁增」（the proliferation of signifieds）或沒有任何「先驗符號義」（transcendental signified）完全決定了符號具的內容時才會出現。（林淑芬，2003：47）

而論述形構是分殊位置（也就是「要素」M...）所構成的整體，所以在元素不完全轉變為要素的前提下，論述形構並非是必然且完全的封閉整體，也揭示了接合實踐無本質論、無先驗性、並且是多重決定的。

但實際的社會狀態並非完全漂移、散亂、無定，而是有其「散亂中的規律性」（regularity in dispersion），也就是「藉由建構『節點』（nodal point）以及降低偶然性（contingency）來暫時地捕捉『意義流』（the flow of meaning），而形成論述的接合實踐，即是我們基本的存有樣態」（林淑芬，2003：47）。而論述形構如何透過「特定的外在性」（exteriority）脈絡中，暫時地被指涉（signified）為一個整體？

林淑芬（2003）認為 Laclau & Mouffe 「接合實踐」的論點在於：

一個形構只有將界限轉為成為疆界，建立一個等同鏈（chain of equivalence）而將界限之外建構成自身的否定之後，始能自我指涉（即，建構自己本身）。唯有藉由否定性（negativity）、分裂（division）及敵對（antagonism），一個形構始能將自己建構成一個整

體化的範圍。(林淑芬, 2003: 48-49)

也就是圖示中, 系統內作為界限同一邊的 M1...M4 等要素之間的差異被取消而成為等值 θ 後, 中線在 M 也可以作為 θ 時, 轉化成為 F (疆界 frontier), 並藉由將 O (系統之外 outside, Other) 建構成對系統的否定、敵對, 也就是藉由鏡像來指涉自己成為一個整體。但是 O 的存在對於系統內, 產生了一個雙面的弔詭性: O 必須存在於界限之外, 系統方能自我指涉存在; 但又由於 O 存在於界限之外, 所以使得系統受到威脅無法完整。在這個雙重弔詭下, 系統內無法產生指涉系統整體的對象, 而產生了一個「空位」(E, empty place), 所以藉由系統內的一個符號具 (M1), 逐漸減消其自身的特殊差異, 漸空自身的符號義, 轉變成一個空的符號具, 以含納體現系統內其他符號具等同鏈的功能, 使得意義流動暫時固定, 來實現系統自我指涉的過程。這就是 Laclau & Mouffe 的「文化霸權論」。

一個藉由設立節點以及建構漸進關聯性認同 (relational identities) 所形成的相對統一的社會或政治空間, 便是葛蘭西所稱的歷史集團 (historical bloc)。結合歷史集團不同元素的聯結—不是一個具有歷史先驗性的整體 (unity), 而是一種散亂中的規則性—與我們關於論述形構的概念相吻合。如果我們從歷史集團形成的敵對領域的角度來看, 歷史集團就是我們所說的霸權形構。(林淑芬, 2003: 54)

Laclau & Mouffe 延續 Gramsci 的 Hegemony 霸權論中集體意志形成歷史集團的概念, 並援引德希達和傅柯後結構主義的理論觀點: 認為結構沒有中心也沒有本質, 所以社會的結構既非上、下層建築所構成, 也不是由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所構成, 而是轉化為以符號接合 (articulation) 形成暫時性論述形構 (discursive formation) 的過程。所以眾多本質相異的群眾, 經由接合論述建構的過程成為同值性的成員, 設定「節點」(nodal points)—藉由共同的革命價值—不斷進行群眾之間同值的相互接合, 形成一暫時性的整體的環節位置, 從而建構一個支配論述場域的共同體, 進而對論述形構進行顛覆 (subversion), 並在不斷接合的動態過程中, 隨時替代置換論述形構。Laclau & Mouffe 並以「民主革命」填補空位的操作對抗新右派和資本主義的結合: 認為應透過社會運動議題或弱勢主體之間的相互接合, 主張以「激進且多元民主」形成集體意志的共同革命價值, 形成一文化霸權的動員, 對體制進行革命實踐, 此即為 Laclau & Mouffe 提出「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戰略」。

Laclau & Mouffe 對於馬克思主義普勞階級革命理論的解構與重建, 可以分成四個主要部分, 一是在社會結構觀方面, 以言說形構替代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結構觀; 二是在革命主體方面, 以言說主體替代馬克思主義的階級主體觀; 三是在革命策略方面, 以民主革命替代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革命觀; 第四在社群觀方面, 則是以「激進與多元民主政治」(radical and plural democracy) 取代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社群觀。換言之, Laclau & Mouffe 將馬克思主義的經濟—階級—階級革命—共產社會的理論模型, 轉換為言說形構 (discursive formation) —言說主體 (discursive subject) —民主革命—激進與多元民主政治的理論模型。因此, 這四個部分其實是相互牽連, 不可分割的。(曾志隆, 2002: 92)

從而「論述主體接合」的概念在此消融了「階級」；而「論述形構的取代」在此擺脫經濟決定論的盲點。Laclau & Mouffe 除了將主導權力的鬥爭場域由「政治」層面轉到「意識形態」層面；更接合了後結構主義關於主體、差異的論述，將「意識形態」從具壓迫性的「錯誤意識」轉變為橫跨基礎／上層建築並跨越階級主體的「有機接著劑」；並打破長久以來馬克思理論中必然的階級屬性。

Laclau & Mouffe 的重要貢獻在於其批判傳統馬克思與左派的「本質主義」(essentialism)：也就是他們所謂藉著「黨」、「階級」、「革命」等絕對範疇而展開的烏托邦極權神話 (totalitarian myth)。但是他們仍然堅持尋找改變既存秩序的有效策略。這種反省與執著在理論上表現為兩個原則之間的緊張關係：民主的邏輯 (the logic of democracy) 與霸權計劃 (a hegemonic project)。民主的邏輯所指涉的是「社會」的開放性與不定性；承認「社會」的異質性、多元性、浮動性，不容被單一 (unitary) 範疇或路線所專有。但另一方面，Laclau & Mouffe 又不能接受所謂「沒有計劃的改革派實用主義」。因此強調「霸權的計劃」在實踐上的必要性。其論說重點則是在為「霸權的計劃」賦予新的意涵，使之能調和「民主的邏輯」。當然，任何在既存秩序下尋找出路的企圖，都需要一些想像。但是如何在實踐中串連成一個有效的「霸權的計劃」而又不落入烏托邦極權神話的陷阱？(朱元鴻，1991.10，《當代》，66期：)

所以 Laclau & Mouffe 企圖以「民主革命」串連其他社會運動的論點，仍難以跳脫本質論的預設及二元對立的辯證關係。(參見曾志隆，2002：188-227) 並且

Laclau 對論述理論 (discourse theory) 的過分依賴，導致他無法準確的分析事物實際運作的邏輯；更嚴重的是他經常忽略了漫長歷史的過程實際上建構了相當程度的階級屬性，縱使某些事物、符號、論述的階級屬性可能被改變、重組，甚至佔用亦然。(史思虹，1989：39)

除了上述的批評，Stuart Hall 也提出「威權式民粹主義」的分析論點和「接合理論」對 Laclau & Mouffe 的「人民民主」作批判性的展開。

(2) Stuart Hall 的「威權式民粹主義」(authoritarian populism) 和「接合理論」(articulation theory)

Hall 面對 1979 年柴契爾夫人 (Mrs. Thatcher) 執政後新右派 (新自由保守主義) 的勢力興起，提出「威權式民粹主義」(authoritarian populism) 的分析概念。

威權式民粹主義在操作層次上把「人民」建構成民粹主義的政治主體，與權力集團「在一起」，而非與其相抗；在論述內容上，訴諸民眾的恐慌以達成其高壓「法治」統治的合法性；在形式上，以人民之名達成其維持、重組、奪取霸權的政治效果，複製國家中心主義的領導位置。(史思虹／陳光興，1989《中國論壇》336期：39)

也就是說，威權式民粹主義是一種以「反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來取得人民的認同，並以「人民共識」之名，行「國家控制」之實。這揭示 Laclau & Mouffe 以「民主革命」對抗新右派的論點中可能傾向國家主義的導向，故 Hall 進一步將「人民民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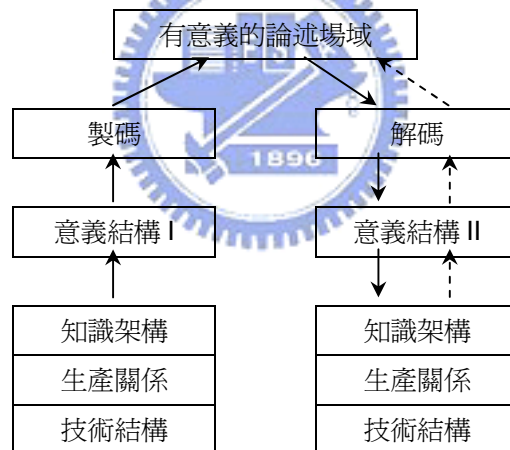
(popular-democratic) 的論述與之對立。

人民民主則在使人民成為抗爭主體，強調與權力集團之間的矛盾，動員人民的真正需求及不滿，以人民的需求為依歸。在運動中面對各種歧視等問題，不以奪權為目的而遮蓋這些矛盾，並且徹底反對以國家為一切社會事物的領導者，同時反對任何形式的威權控制。(史思虹／陳光興，1989《中國論壇》336期：39)

由此可以看出 Hall 與 Laclau & Mouffe 的「人民民主」最大的區別在於

對後者來說，階級存在於生產關係的層次，而人民民主的抗爭則存在政治／意識形態的層次，兩者之間一直存著辯證的緊張狀態；而對前者來說，階級鬥爭是人民民主抗爭的一種形式，它與其他社會運動主體的關係是相輔相成的，也只有同時面對各種形式的宰制關係，人民民主的政治才能落實。霍氏並不認為我們要從此放棄階級，而是指出各種抗爭主體的出現，必須透過其他的分析層次，才能較為完整的掌握「權力集團／人民」對立中的多重面向。這也正是霍氏一再堅持三條社會抗爭主軸的共生性：人種／階級／性別。(史思虹／陳光興，1989《中國論壇》336期：39-40)

而對於 Laclau & Mouffe 文化霸權的形成來自於符號具之間不斷的接合過程，Hall 則以大眾傳播研究中「articulation」(接合／構連)的概念進一步詮釋。



Hall, 1980 : 130

Hall 自承它的構連理論是「源自於 Ernest Laclau 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政治和意識形態》(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一書」(Stuart Hall·陳光興，1998：126)，並延續 Laclau & Mouffe 將社會化為一暫時性言說形構的動態過程，認為社會結構並非單一矛盾所決定，是各個層次相互接合的結果。

簡單來說，Hall 的「構連」理論取代了傳統的「決定理論」—任何社會事件、現象、結構，都是在「構連」許多社會實踐、鬥爭、社會定位之後所製造出來的結果，都是在主動的運動過程中形成的，而這些效果的鑄造絕非是理論可以事前預估的，都必須回到確切的歷史環境中，才能尋找出其脈絡。(陳光興，1992b：144)

Hall 認為語言符號本身具有流動的「多向指涉性」(multi-referential) 和「多義性」

(polysemy)，因為同樣的語言在不同的場合、對不同的社群具有不同的意義，也就是說，同一個語言符號可以從論述中的位置「解合 disarticulation」出來，然後「接合 articulation」在不同的位置上。

所以文化霸權的意識形態抗爭，就是藉由語言符號的流動性質，在論述場域中不斷經由反覆的「製碼 Encoding／解碼 Decoding」過程中，開啓主體自由主動詮釋意義的空間。而當製碼與解碼兩端之間達到某種意義交流共識時，也就形成短暫的接合結盟。

Hall 立基於不同意義結構的製碼與解碼模式，以多元決定論的意識形態鬥爭來看待意義的接合或統合體的接合。

一個聯結（接合）就是「可以」在一定條件下將兩個不同元素，聯結成一個統合體的接合形式。這種扣環並不是必然的、被決定的、絕對的、本質的。我們必須質疑，在何種環境下，可以融鑄出聯結？因此，所謂一個論述的「統合體」，實際上是不同的、相異的元素的接合。這些元素可以經由不同的方式重新接合，因為這些元素並無絕對的歸屬。

統合體的重要性，在於它是這個接合論述與社會力場之間的環結，經由這個統合體，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它們可以結合起來，但也不是必然如此。因此，接合理論既能夠理解意識形態元素如何在一定條件、以及某個論述內部統合的方式，同時也是質問這些意識形態元素在特定環節上，成為或不成為某個政治主體接合的方式。讓我以另一種方式來說，接合理論企圖了解意識形態如何發現其主體，而不是主體如何認定他自己的必然、且不可避免的想法。接合理論促使我們思考意識形態如何賦予人民力量，使他們能夠對自己的歷史情境有所了解，而不會將這些理解形式化約為他們的社經或階級立場、或者社會地位。（Stuart Hall · 陳光興，1998：125-126）

所以 Hall 強調意識形態並沒有必然的階級屬性，階級在政治／意識形態的層次裡，存在的是接合的過程而非化約的過程。一方面以建構知識、形成規範、塑造共識、合法化的方式進行語言的抗爭；另一方面隨著自身的歷史脈絡和社會情境位置，主動選擇進行相互接合或不接合成一暫時性共同體的過程。

「articulation」這個超越文本性的理論論述，也與「戰爭機器」和《島嶼邊緣》所立基的「人民民主論」中革命主體之間的「串鏈」概念相互為用：以「意識形態」或漂浮的符號具取得節點（共同意識及空間）「接合」其他符號具成爲一（暫時性、非必然性）的歷史性集團與主流權力集團相互爭霸的過程。

「鏈」字從「鏈謔」來，意味「辭窮而支離牽引」或「語亂」。因此，「串鏈」就是把散亂的說法完整地表達出來，或有序地說出來。這個意思和英文的用法也是吻合的；在拉丁文中 articulus 意指一分子、部分、一串（鏈）的某環節，故而英文 articulation 的意思就是：清楚說出來（那些音節或意義單位）。不過 articulation 還有另一個意思，就是「接合」，把不同部分接合成一整體，也就是俗稱的「串鏈」。所以用「串鏈」一詞可以涵蓋 articulation 的兩個意思，亦即串聯是一種透過語言將不同部分接合為一體的實踐。

如果兩個部分是被串鏈為某個整體的構成部分，那麼兩者的關係即是串鏈關係。這本書中的

某些論證假設了：一切整體的構成關係都是串連關係。

串連實踐是一種透過論述來改變事物意義的實踐，(這同時也就是改變事物所在的脈絡)，使原來不是一個整體的諸元素或事物，成為一個整體的實際構成部分。這也可能同時涉及使原來某個整體的部分，不再構成該整體，(串連往往涉及反串連)，或者涉及維持某個整體，使其構成部分的原本意義不被改變。(機器戰警／甯應斌 主編，1991：8)

「Articulation 串連」的論點更可用以詮釋「戰爭機器」和《島嶼邊緣》時期的知識分子對於西方理論的態度及運用。

3.1.2 理論之「翻譯」

繼前面章節所述，新馬克思、後結構、後現代...等西方思潮，在八、九〇年代之交的台灣知識界掀起一波論用熱潮。而這些西方新思潮理論從「讀書會」的集結開始便持續介入這批知識份子分析在地政經情勢的視角，進而在「戰爭機器」時期對西方理論以「裝置」戰略——種「拆解」與「重組」的技巧——在地轉化為文化批判評論的發聲，並成為《島嶼邊緣》構築論述的基礎，據以對在地文化、意識形態展開批判的論述資源之一。西方新思潮的翻譯、引介也成為《島嶼邊緣》專題編輯、文章登載的主軸之一。

西方思潮引介的專題，主要有第一期「葛蘭西一〇〇專題」、第二期「科學·意識型態與女性」、第三期「拼貼德希達」、第四期「廣告·閱聽人·商品」、第六期「身體氣象專輯」、第七期「佛洛伊德的誘惑」、第十一期「民眾音樂初探」、第十二期「保衛阿圖塞」、第十三期「激進神學」。除了上述理論專題的編製，尚有「當代思潮」、「理論／衍異」等單元專載理論文章的譯介。而理論翻譯文章的刊載量達文章總數量 50% 左右。(參見附錄二：文章一覽表)

「翻譯」(translation) 這個概念，和我們已經在其他脈絡中使用的「再度接合」、再度製碼 (transcoding)、跨越文化 (transculturation) 等概念有點類似。當然，我們使用「翻譯」這個詞的時候，已經加上引號，表示已經不是使用這個詞的原始形式，而「翻譯」這個詞原來的意義就只有「拷貝」的意思。...翻譯是一個重新接合和重新脈絡化的持續過程，不具有任何首要起源的概念。...就像在重新接合和重新解合的狀況中，某些元素仍舊持續相同，因為有些論點、概念彼此是共通的，但是也有新的元素出現，改變整個組構。(Stuart Hall · 陳光興，1998：67-68)

《島嶼邊緣》對於西方思潮的援引並非是輕率的橫向移植，也並不是朝拜西方思潮的基本教義派。《島嶼邊緣》對於西方思潮的「接合」(articulation 或串連)，是將西方理論視為一種爭取文化詮釋權的批判武器，而批判性論述的構成也必須貼合台灣歷史脈絡的發展，與當今社會政經文化現象對話，方能構築一套可供實踐的行動論述。

《島嶼邊緣》引介新思潮的旨趣是雙重的，一方面力求如實深入的理解，一方面亦時時納入現實的視域進行具體轉化的詮釋與應用。所有的理解都是一個詮釋與應用的過程，而詮釋與應用並不是什麼「抽象／具體」或「共向／殊相」的傳統連結模式，而是一種概念實踐的工具箱與修補術，一種思想的裝置與集合，「理論／衍異」專欄就是這樣一個概念實踐的操作

場域。(《島嶼邊緣》，第3期：4)

《島嶼邊緣》理論引介的基調，並非只是翻譯理論文章或引介理論論述，更重要的是「翻譯的在地化」，藉由「『解碼』理論－『製碼』論述」來對應台灣現實生活的詮釋觀點。故《島嶼邊緣》每期的論述都以「重寫」(Re-writing)理論作為基調，重寫哲學史的哲學家態度，重寫著理論、文化現象、弱勢族群...的方式進行論述的生產。而理論翻譯的引介，除了引進新的論述資源作在地分析，卻也在這樣重寫的過程中，一方面將西方理論作為主要的參考座標，牽涉到與西方文化知識霸權的位階關係；另一方面牽涉到與其他在地知識群體的權力拉扯，除了爭奪理論「翻譯」的正確性、理論詞彙「翻譯」的譯名、學者「翻譯」的譯名、也包括了以西方理論詞彙「翻譯」在地文化的命名過程。八〇、九〇年代之交，這波西潮東漸的文化翻譯風潮，在知識界注入新的參考座標和分析架構，甚至是溝通詞彙；卻也在去脈絡化的以西方理論詞彙轉化命名在地文化的同時，框限在地文化的發展及削減在地文化原有的特殊性。這是《島嶼邊緣》「翻譯」西方理論翻譯對在地知識文化的雙面刃。

實際上，《島嶼邊緣》所提出的理論接合及專題的製編，重點往往不在於哪個理論較貼切台灣現狀，或者是哪個理論是最新思潮，理論的詮釋是否最正確？也就是說，論述著重在對應社會情勢所接合出的理論應用，而非理論本身的學術辯證。所以針對《島嶼邊緣》所提出的論述視為一個台灣病癥的冒發—對應八、九〇年代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現狀所生出的文化產物，來加以分析。所以解嚴後的台灣社會運動情勢，如何促使《島嶼邊緣》從後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汲取養分，透過「翻譯的在地化」，轉為在地論述實踐？

3.2 「人民民主」在地（左翼）的論述生產—「台灣的新反對運動」

八〇年代末、九〇年代初期，台灣發生了一場規模不算太小的論辯，也就是所謂民間社會與人民民主的論爭，我個人所屬的陣營是所謂的人民民主派，主要的論述生產者是卡維波（甯應斌）、何春蕙、吳永毅、王蘋、丁乃非，還有在香港提供論述資源的丘延亮等人；其中卡維波（甯應斌）放棄他寫作博士論文的寶貴時間，花了兩年完成今天早已絕版但相當有原創力的五百多頁大書：《台灣的新反對運動—新民主之路：「邊緣癩尸、中心」的戰鬥與遊戲》（機器戰警編，台北：唐山，1991），有系統地匯聚了人民民主的整體論述。（在記憶中，當初人民民主論述提出的契機在於中國大陸的六四天安門事件，在看到反對陣營的統獨雙方因受制於國家主義的思考，而成為反共論述或是為中共政權辯護，因此初步地提出了人民民主的立場。）當時我們自稱人民民主派，對話對象是民間社會論；在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具體歷史時間點上，我們提出了人民民主論的基本立場，由於其時從官方、反對黨到泛左翼分子，基本上均用國家主義的措詞與框架回應六四，反共被再度拉回成為組織群眾的框架，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開始介入民間社會的論述。（陳光興，2005a：171-172）

蔡其達（筆名 晏山農）：所以《島嶼邊緣》發刊的另外一個推動的動力是以陳光興、卡維波（甯應斌）為主的，他們認為過去曾經是以「民間社會」的國家，以民進黨或是傳統社運的抗爭路線，現在似乎要有所改變。所以就改變成一種「人民民主抗爭」，所以陳光興也好、卡維波（甯應斌）也好，都是朝這個方向來進行；一方面這也是對抗南方朔為主的「民間社會」的論調。當然嚴格來講，所謂的「人民民主路線」跟原有的「民間社會路線」其實差異

並沒有那麼大，只是「民間社會」還是一個很籠統的，而「人民民主」更細部把它分到各個領域。然後發展到所謂社運這邊來講，基本上以陳光興、吳永毅、卡維波（甯應斌）他們是以反新潮流的社運路線，比較偏向鄭村棋的，所以鄭村棋在這裡有他的角色。另外一方面就是學運這裡，它變成所謂「民學聯」到「全學聯」的系統背後意識形態的主軸。因為台大那邊後來就是以林佳龍為主，他們跟民進黨的關係非常密切，讓我們覺得有一點點不應該與政治走得太近，所以後來「民學聯」大部分都接納所謂「人民民主路線」。所以你看何東洪、林致平、江斐琪這群原本屬於「全學聯」後來變成「民學聯」的這些學運分子，也變成在《島嶼邊緣》裡面有他一定的位置。所以「戰爭機器」、《島嶼邊緣》它背後有一個重要路線，就是「人民民主路線」。當然其實說《島嶼邊緣》是「人民民主」作為一個背後支撐的力量，倒也並不是，但是因為陳光興和卡維波（甯應斌）他們變得在這裡面發揮的力量和寫的文章實在非常多，所以的確也讓外界會把《島嶼邊緣》是為一個「人民民主路線」重要的基地。這跟《南方》雜誌以發展「民間社會」路線為主的，有種對抗關係。（20051015）

3.2.1 《台灣的新反對運動》的出版歷史脈絡—「Civil society 民間／市民社會」的三次論爭

「人民民主論」在台灣的提出是《島嶼邊緣》自「戰爭機器」以來的立論主軸，也是八、九〇年代之交「Civil Society 民間／市民社會」文化論述的論戰產物。²⁶

新興社會運動的風潮在 1986 年民進黨籌組反對黨成功和 1987 年解嚴之後達到最高峰，當時社會運動的「脫序」行為也代表著「破舊（序）立新（序）」的建設性意涵，並迫使新興社會運動在解嚴之後必須重新擬定新的運動策略。如同蕭新煌（1990）所言：

社會運動並非脫序、失序、解組、反制、破壞等現象的表徵，而是民間社會中的成員重新建構他們集體社會認同的過程，隱含的用意即是在像現存的國家控制體制和被扭曲了的社會規範和秩序挑戰，其中其目標必然是重建新的規範、認同和價值，就這點而言，是社會運動的勃興為八〇年代中台灣民間社會力求變、求序的一種長期性掙扎和努力，應是合理的解釋角度。（蕭新煌，1990.6.25《中國論壇》354 期：74）

「民間社會論」的提出，就是起於對八〇年代末期「解嚴」和台灣新興社會運動風潮的詮釋分析。「民間社會論」主要採自「新-後馬克思主義理論」（Neo-Post-Marxist approach），強調社會運動的興起是人民力量的結合，形成一民間社會的力量，對國家進行反支配的抗爭；並藉以抗衡「政治決定論」—政權本身的轉化和「經濟決定論」—經濟發展的外溢對社會運動興起的詮釋觀點。（參見 蕭新煌，1989.7.10《中國論壇》332 期、1990.6.25《中國論壇》354 期）（參見張茂桂，1989a）

蔡其達（筆名 晏山農）（1989.9.25）在〈打開「民間社會」史〉一文中清楚的耙梳「民間社會論」初期在台灣的發展與論述。

1986 年的下半年起，藉由「拍賣中華民國」（《前進》，1986.7）、「台灣的新社會運動」（《中

²⁶ Civil Society 中譯為「民間社會」、「市民社會」、「公民社會」則是另外一場論戰，不在內文贅述。Civil Society 最早是南方朔將其翻譯為「民間社會」或稱「民間哲學」；而石元康等人認為應該翻譯為「市民社會」：「如果我們談黑格爾和馬克思意義下的“civil society”時，最好是譯為『市民社會』，因為『市』所含的意義正是交易」（石元康，1990.3.1《當代》47 期：20）。而也有主張翻譯為「公民社會」的論點：「市民社會或公民社會似乎較接近西方的原意，也就是不僅呈現了近代社會『私』的一面，也顯示了『公』的一面」（李永熾，1990.3.1《當代》47 期：29）。

國論壇》269期)等議題的發抒,南方朔漸次將「民間社會」(civil society)的圖像予以浮現,並鋪陳為立基於台灣本土的論述(discourse)。其後江迅、木魚等新生代集結在《南方》雜誌的羽翼下,繼續將「民間社會」(還包括民間哲學)的概念予以拓深,並轉化為運動的源頭活水。(蔡其達/筆名 晏山農,1989,《中國論壇》336期:23)

〈八〇年代小辭典—民間社會〉按照南方朔的說辭,民間社會意指「在政治學上,國家之外的人民自主部門,或者是經濟上相對於國家支配的部門」,如此定義的 civil society 其實和歐美傳統的看法不侔,它的點子主要來自於波蘭團結工聯,再結合葛蘭西、尤瑞、拉克勞等人的理論而來。它的邏輯和結構未必堅實,卻因掌握了人民 VS. 黨國機器的心理需求而大受歡迎。雖然,左右兩翼曾先後圍剿這一理念,卻無損其鋒芒。其後還有人擬出「人民民主」的新策略繼續挑戰民間社會,卻也不再那麼涇渭分明。於今觀之,民間社會理論的漏洞確實不少,但它的一些基本概念,早已滲入日常生活的想法裡。(晏山農/蔡其達,楊澤編,1999:205)

一九八〇年代中葉以後,南方朔為「民間社會論」首要的引介者,江迅、木魚等則相繼在《南方》雜誌作論述的構築,並具體指陳其論述轉化了原有civil society在西方的意涵,其目的在於反對經濟決定論、階級化約論,是「針對台灣特殊的歷史結構和對統治者的分析所拈出的新策略」(蔡其達,《中國論壇》336期:26)。所以「談『民間社會』時,首先需要區分民間社會(civil society)的概念和南方朔提出的民間社會理論」(王振寰,《中國論壇》336期:7)。²⁷江迅(1987a)更認為「民間社會論」的提出,除了是建立一個新的社會分析架構,一方面是對舊有分析架構的揚棄,並企圖以「民主」的追求藉此擺脫統獨論爭對台灣反對勢力的分化,也形構一股「統獨休兵」的態勢。但之後由於對civil society在理論意涵和反對力量主體位置的觀點差異,加上論述提出者的政治傾向與位置,因而在八、九〇年代之交的台灣論述空間,陸續開啓三次文化論爭。

1. 1987年的《前方》vs.《南方》:「形左而實右」的「假左翼」

「第一次論戰應當是《前方》因意識形態不同與爭取校園資源而主動挑起的」(機器戰警/甯應斌主編,1991:37)。對於當時南方朔(1986b)〈拍賣中華民國〉一文中,主張國營事業開放民營、反對國家壟斷資本的「民間社會論」含有「自由資本主義優先論」的色彩,和江迅(1987a)在《南方》第六期揭示「民間哲學」基本理念後,左翼知識分子在《前方》雜誌(1987.5,第4期)²⁸以「形左實右的民間學者」為標題對其展開批判。由於《前方》的左翼論述仍立基於正統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立場,認為民間社會是一個資本主義階級鬥爭的場域,以此著眼於理論意涵詮釋的正確性,批判「民間社會論」對於civil society的扭曲、誤解。而江迅、木魚在《南方》雜誌(1987,

²⁷ 有鑑於此,之後內文對南方朔及《南方》雜誌提出的民間社會理論,將以「民間社會論」代表。一方面與「民間哲學」、「民間社會/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概念作區隔;另一方面則代表是理論在地轉化後的新論述。文中同樣將「戰爭機器」為主提出的人民民主論述,以「人民民主論」代表,與後馬克思主義的「人民民主」(popular-democratic)概念作區隔,亦代表是在地脈絡化後的新論述。

²⁸ 《前方》雜誌(1987.2-1987.8)共1-7期。

第 8、10 期) 反以「揚棄左派教條主義階級化約論」和宣稱「民間社會論」是「民間哲學」台灣在地脈絡化的新論述，認為階級並非是社會內部唯一的宰制關係，並反對傳統左派的經濟決定論，來回應《前方》的教條左派。

表面上看來，「正統」左派是主動出擊，然而事實上卻是對八〇年代後期的變化作出被動、迷惘的回應。換句話說，在八〇年代後期，宰制集團與反宰制集團正進行一場新的文化霸權爭戰（以南方朔的用語，就是「搶位子」），而反宰制陣營裡，不同的社會集團也正進行力量的對比。（蔡其達／晏山農，1989.9.25《中國論壇》336 期：27）

所以《前方》基於正典提出「假左翼」的批判，和「民間社會論」為「在地新論述」的宣稱，顯見雙方在「民間社會」一詞的詮釋，實際上是搶奪「civil society」一詞文化詮釋權的爭戰，並非在同一理論對話的基準點，故無法正面交鋒。1988 年 6 月「《南方》結束後，有關「民間哲學」的理論、分析文章便幾乎不見」（機器戰警／甯應斌 主編，1991：29）。此波論爭的相關文章撰寫多偏向對「Civil Society」的各自表述，並沒有產生一公共辯論的對話空間，也無引起太多廣泛的評論。

2. 1989 年的《中國論壇》：政運觀點與社運觀點的對抗

民間哲學或民間社會論在一九八六年前後出現時，本不必然是一個妨害社運觀點的論述，而一九八九年開始以民間哲學觀點對社運作學術的解釋，可能還是學術界中的一股進步的力量。此外，社運對政運的依附發展，是許多現實的資源分配問題，同樣主張「人民民主」的民間哲學不見得助長這種依附發展。但是在一九八九年，美麗島系又以新版本的民間哲學作為組織動員的意識形態標籤，突出「民主優先」，以及國營事業民營化的重要（張俊宏，1989）。這使得社運觀點不得不開始批判民間社會論。（機器戰警／甯應斌 主編，1991：185）

南方朔（1986a）在《中國論壇》為文〈台灣的新社會運動〉開始，便有許多評論「民間社會論」的文章散見在《中國論壇》。直至 1989 年，南方朔在《新新聞》（125 期）重提「拍賣中華民國」的論點，和《到執政之路—「地方包圍中央」的理論與實際》（張俊宏 編，呂昱、江夏、江迅、呂鯤協力合撰，1989）一書的出版。《到執政之路》這本書點明反對經濟決定論，批評左翼的「夏潮聯誼會」把經濟矛盾優先於政治的矛盾；並且反對階級化約論，揭示民進黨為了統合反對力量和獲得資產階級的援助，所以不宜成為「階級政黨」。《到執政之路》是以民進黨美麗島派系為主的選舉策略書籍，此書的編撰群，正是收攏了在台灣引介「民間社會論」源起的《南方》雜誌編輯群為班底，並將此書的編撰焦點集中在鞏固民進黨的政治反對黨勢力，形成具制衡國家力量的「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方可使「民間社會」得以發展。這個論點除了與原本 Gramsci 提及的「政治社會」相左；自身地方包圍中央的選舉代議論述，卻把政治邏輯的矛盾優先於社會內部的矛盾關係。「政治民主優先論」的論點引起第二波「民間社會論爭」，主要爭議的焦點在於「國家 vs. 民間社會」的對立架構和「反對黨—民進黨」的政治運作與「台灣社會反對運動」的關係。

1989 年之前，社會運動從未面臨「主體性」的思考問題。因為大多數社會運動都還在形成

階段，唯一的訴求抗爭，也只有一個共同的對象亦即國家（政府）。同時也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其他明顯政治勢力足以吸引社運團體以形成任何結盟之形勢。但在 1989 年裡，由於正好碰上大選季節，一時之間出現了許許多多新舊的政治吸引力。於是如何維持社運與政治團體或個人適當關係，使頓時成為社運必須面臨思考和選擇的課題。（蕭新煌，1990.6.25：74）

1989 年底的地方選舉，面對政治運動的動員問題，也引出社會運動主體性的問題。《中國論壇》在 335 期（1989）「解讀台灣的反對運動」專題的〈新生代眼中的反對運動〉座談（蕭新煌 主席，吳介民、李建昌、郭正亮 出席），便開始對《到執政之路》一書中隱含民進黨內部的派系鬥爭（新潮流的群眾運動路線 V.S. 美麗島系的選舉議會抗爭路線），和民進黨的政治運動與社會反對運動的問題進行檢視論辯。對於「國家 vs. 民間社會」二元對立的論點中忽視民間社會內部的矛盾（吳介民，《中國論壇》335 期：9），並隱含資產階層在民間社會擴張形成支配力量的危機提出批評（李建昌，《中國論壇》335 期：9）。並在 336 期（1989）系統性的製編「民間社會與台灣發展」專題，集中討論及批判「民間社會論」。「如何看待民間社會」座談（蕭新煌 主席，王振寰、卡維波、南方朔出席）中，王振寰認為「民間社會論」過分強調台灣社會的民主化，是民間社會自主性對國家產生反支配抗爭的力量，預設了國家全然受民間社會力量影響的中立角色（《中國論壇》336 期：8）。而卡維波（甯應斌）則認為「民間社會論」過於凸顯與國家的對立，撇除民間社會作為國家和經濟之間的中介角色，僅將「政治」成為實踐和抗爭的主要場域，排除其他面向（如性別或種族等）的宰制關係；另外批判「民間社會論」的國營事業民營化論點，將市場經濟的自由交易視為政治自由民主的體現，是將屬於左派的論述轉化為接近自由主義的論述（《中國論壇》336 期：8-9）。這個論點也部分呼應「民間社會論」是「形左而實右」的論點。蕭新煌則認為民間社會自主性的要求，並非機械式地要求國家退出，而是要求國家調整它應有的角色：要求國家增加正當性的干預來追求公平，要求國家減少不當的干預來追求自由。否則當民間社會透過社會運動向國家爭取更多自主權的反支配過程中，反而將國家的權力落入資本家之手，而使現在的既得利益者反而又成為社會運動的受益者（《中國論壇》336 期：15-16）。

社運觀點初次引人注目是在一九八九年大陸學潮及六四事件中。當時台灣籠罩在統獨之爭的架構中，統獨雙方吸納著因巨大歷史事件所激發的各種人民能量。原來台灣本有一種不滿統獨架構的觀點，這就是稍早提出「超越統獨（政治），民主優先」的民間哲學觀點，但這觀點仍是政運觀點的一種，而非社運觀點；而且許多傾向民間哲學的人已經從「超越統獨」變成「以民主來達到獨立」。（無向／甯應斌，1990.12.1，《當代》56 期：90）

顯見「民間社會」的論述形構發展，開始牽涉統／獨論徵的差異。「民間社會論爭」原本是反對運動團體基於各自的立場位置，對「civil society」各自詮釋為用，產生對台灣社會運動觀點的差異詮釋。但原本希望擺脫統獨論爭的「民間社會論」逐漸為傾民進黨的政治反對運動為用時，論述開始滲入傾台獨的政治權力操作而變質，批判的焦點開始由「理論的詮釋」和「反對運動主體位置」的爭議轉向對「民進黨的政治反對運動路線」的檢視和批判。

3. 1990 年的《當代》：「人民民主論」

正如南方朔所言，台灣目前所面臨的乃是「被壓縮了的時間」—西方二、三百年由封建以迄於後現代的制度與規範的問題，台灣必須數十年之內予以解決。相較於這種錯亂的時空，「民間社會論」也反映著類似的特性...葛蘭西的文化霸權論、阿圖舍 (Louis Althusser) 的意識形態論、傅珂的權力觀、尤瑞的政治／經濟／民間社會三分說、杜連 (Alain Touraine) 的行動社會學主張、拉克勞與莫菲的激進民主論 (radical democracy) 等，都被放在同一個理論框架。然而其中所揭露的理論弔詭確顯而易見...面對如此繽紛歧異的理論，在多元的西方社會都無法縮合為圓融的論述，在台灣社會竟能兼容並包成為「鉅型」的反宰制論述，委實令人嘆服！（蔡其達／晏山農，《中國論壇》336 期：29）

「民間社會論」的論述形構在九〇年代後逐漸成形，以「國家 v.s 民間社會」的分化和「政治優先論」的民主階段性作為主要的論點。

(1) 「國家 v.s 民間社會」的分化：

「民間社會論」反對傳統左翼的經濟決定論，轉而著重在國家與民間社會的結構，並認為「將國家權力運作納入民間社會由下而上的管制；同時，透過民間社會改革空間的確立，才能進一步抵制資本邏輯的不正義傾向」（江迅、木魚，1987：36），頗有「民間社會決定論」之姿。並延續傳統左翼「宰制—被宰制」的二元對立邏輯，將「國家」擺置於「民間社會」的對立面。一方面以「國民黨的統治」置換「國家」一詞，另一方面以「民間社會」一詞呼籲台灣統獨反對力量的集結，齊與國家權力對立抗爭，進而延伸出「國民黨政府 v.s 反國民黨政府」的分化。而其中以反對國家權力支配的「反國家主義」色彩，要求國家退出民間社會，並進而延伸出「反對國家壟斷資本」和「國營企業民營化」的主張。

(2) 民主發展階段論的「政治優先性」：

「民間社會論」反對傳統左翼以階級矛盾作為民間社會力量的集結，提出政治邏輯的矛盾優先於社會內部的矛盾關係。認為擴張政治社會的空間，民間社會的力量才能得以累積。而為了擴張政治社會的空間，所以必須統合台灣反對運動的力量，鞏固以民進黨為主的政治反對勢力。並提出以「地方包圍中央」的選舉代議路線，將民進黨推進政治社會，以實踐民間社會對民主的追求。

針對上述「民間社會論」的主要論點，第三波「民間社會論爭」主要是以「戰爭機器」為首的知識分子，在 1989 年之後以「社運觀點」為出發，從 1990 年開始在《當代》雜誌（47 期）為文，介入「民間社會論爭」。主張在左翼軸線上擺脫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經濟、階級決定論的批判觀點，接合 Laclau & Mouffe—「文化霸權和社會主義戰略」及 Hall—「威權式民粹主義」的分析概念提出「人民民主論」，以對抗南方朔及日傾民進黨的「民間社會論」。其後甯應斌更以機器戰警、何方、王大衛、無向、林威、蔡普為化名，撰寫厚達五百頁的《台灣的新反對運動—新民主之路：「邊緣顛乇乇」的戰鬥與遊戲》（機器戰警 編，何方、王大衛、無向、林威、蔡普共同協力，1991）一

書，除了為「人民民主論」的社運觀點立論，也對「民間社會論」發動砲彈四射的攻勢，論戰的灰燼也迅速延燒出《島嶼邊緣》這份刊物。

所以《島嶼邊緣》的創刊與尋求獨立自主的發言空間相關，也就是因為在這場論戰當中感受到《當代》、《自立早報》...等的論述發言空間的侷限，《島嶼邊緣》在 1991.10.15 創刊後，「人民民主論」相關的論戰即退出《當代》雜誌的版面，也因此影響《島嶼邊緣》的雜誌類型偏向專屬發聲頻道的「同仁誌」形態。所以對於《島嶼邊緣》的知識份子如何「接合」「人民民主」理論轉化為在地的實踐論述，並放置自身在地的戰鬥位置？將藉由《台灣的新反對運動》一書的撰文脈絡、論述內容進行分析，從八、九〇年代之交的「民間社會論徵」的攻防論述拉出「人民民主論」的接合過程。

3.2.2 《台灣的新反對運動》－「人民民主抗爭」

隨著人民民主論雄辯的展開，反對運動陳腐的主流論述幾近破產，踰越統獨（而非超越統獨）的新反對運動蓄勢待發；在這種情況下，自一九九〇年秋季始，便在書籍、報紙、雜誌各種媒體中展開了人民民主大辯論，之中既有友善的批評，也有尖銳的質疑，參加者也很廣泛（趙剛、王大衛、陳宜中、無向、何方、杭之、沈發惠、李長風、蔡其昌、某獨派派系、路況，還有一些未點名人民民主論的批評者）。這場轟動且方興未艾的大論戰之部分內容以收入本書（《台灣的新反對運動》）及晏山農／蔡其達（1991）。可惜的是，這段時期對人民民主論的批評，絕大部分均源於對人民民主缺乏較全面的理解所致，因而所作的批評不是誤解，便是已在人民民主論的考慮之內。故而本書（《台灣的新反對運動》）及晏山農／蔡其達（1991）的出版，以及陳光興即將出版的兩本專著，都有澄清人民民主論的作用，也幫助批評者作出一些相干的評論。（機器戰警／甯應斌 主編，1991：50）



《台灣的新反對運動》為「戰爭機器叢刊」的第七本編著。原本「戰爭機器叢刊」尚規劃出版《新政治光譜 I：民間社會的決戰》及《新政治光譜 II：人民民主的召喚》兩書（均規劃由 晏山農／蔡其達主編），收錄及編撰「民間社會」及「人民民主」的相關論點，但兩書最後流產並未上市出版，所以此次論爭中相關台灣社會運動位置的文化論點，除了《台灣的新反對運動》和「戰爭機器叢刊 11」－《媒體／文化批判的人民民主逃逸路線》（陳光興，1992b）兩書外，便一直未受到系統性的整理。

《台灣的新反對運動－新民主之路：「邊緣癡亡、的戰鬥與遊戲》書名除了是以提出「人民民主」的「台灣新反對運動」為擬定，並針對以「民間社會」為主要論述觀點的一文、二書：〈台灣的新社會運動〉（南方朔，1986a）和《近代新反抗運動》（南方朔，1987）及《到執政之路：「地方包圍中央」的理論與實踐》（張俊宏 主編，呂昱、江夏、江迅、呂鯤協力合撰，1989），在篇、書名上作一反諷的操作。另外全書實為甯應斌一人撰著，除了以機器戰警為名編著，更虛擬眾多編撰者何方、王大衛、無

向、林威、蔡普的身分掛名合撰，除了顯現去作者中心論，也對應諷刺《到執政之路》一書的眾多編輯群。而此書編撰的源起延續「戰爭機器叢刊」的出版定位：自 1989 年六四事件之後，感於台灣論述漸趨統獨二元極化，企圖針對台灣主流媒體論述的偏頗開展有別統獨的第三條路線－多元化台灣的論述，並進一步對上述兩本書中以「民間社會」的論述背後偷渡民進黨以「政治民主優先論」統攝反對運動路線的操作進行批判。不難看出「民間社會論」是本書的對話對象及欲解構的論述。

而《台灣的新反對運動》其書寫策略以「後正文」貫穿全書。該書的絕大篇幅是嚴肅地論述並理論化台灣的新反對運動，但在這些理論性陳述推演的「主流正文」之間的留白或邊緣空間中，填塞了許多「後正文」的真假笑料，以極為精神分裂式的編撰，強調認同及意義的流動。

並且甯應斌更在《當代》第 66 期，假「陳光興」之名撰寫〈流動的認同－機器戰警在電子資訊時代的形象〉，作為「《台灣的新反對運動》的書評」，徹底實踐「後正文」的書寫策略：

這本書（《台灣的新反對運動》）最引人入勝的是它的「形式」，塑造了強烈的邊緣個性，很難想像任何主流論述會「自貶身價」地採用此書的「頑鬥」形式。在這個意義下，我判斷大多數的讀者會被書的形式而非論述實質內容所吸引，而忽視了這本書幾乎全面革命化了舊反對運動的主流論述；不論對台灣社會政經結構、統獨立場、支配論述……都提出了聳人聽聞的嶄新提法。

形式可能取代內容的效果是本書的弱點，也是最成功的地方，但是這本書之所以以這種形式來呈現問題，其實不是偶然的。事實上這本書形式與內容的關係相當統一，因此形式本身就是內容，形式／內容之分也就消失在閱讀的快感之中。（陳光興／甯應斌，1991.10，《當代》66 期：134）

全書夾雜「歪讀」文本意義的書寫，除了上述書名和虛擬編撰者化名的操作外，以虛擬的編撰者身分認同，為文撰寫序、跋、作者簡介，並虛擬廣告、活動宣傳、新書介紹、書評，穿插大量大眾流行文化的電影「機器戰警 2」、周星馳、電視影集等無關正文內容的「非正文」圖文。以嘲諷、補遺的形式接合主流權力集團的意識形態，當中相互收編及改造的動態過程。

沒錯，這本書的確是台灣前所未有的「抓狂書」。五百多頁的大書，足足可以讓人每天睡覺前捧腹大笑三個月。但是，別搞錯了，這本書的「癲」覆性正是在大笑中尋找人民民主的「多重戰線」。（陳光興／甯應斌，1991.10，《當代》66 期：134）

1. 《台灣的新反對運動》－「人民民主抗爭」、「社運觀點的社會運動」、「邊緣戰鬥」

「邊緣戰鬥、社運觀點的社會運動、人民民主抗爭，實際構成了目前現階段台灣的新反對運動」（機器戰警／甯應斌 主編，1991：59）。「人民民主論」認為台灣的新反對運動就是以弱勢邊緣社運的視角為本位的社會運動，透過「人民」－社會運動或弱勢主體－之間自主性的平等互動與結盟，同時串連起各種社運觀點形成集體意志的共同價

值，以暫時性結盟的文化霸權，對「權力集團」(power bloc) 進行抗爭實踐。並且「台灣的新反對運動」認為「人民」是在論述實踐中所構成，所以必須透過「論述」與「實踐」不斷的相互為用：不斷藉由新論述和新定義，重新定義或改變反對運動的詞彙，甚至為新的邊緣弱勢主體開創論述場域。也就是，「不但和『弱勢、邊緣團體』認同，也為處於弱勢邊緣位置的社運提供意識形態資源」(機器戰警／甯應斌 主編，1991：118)。

「人民民主論」主要的論點是對上述「民間社會論」的批判辯證，除了揭示「民間社會論」的內在矛盾，提供社運團體實踐的論述基礎，更可端倪「人民民主論」的論述構築過程：「戰爭機器」知識分子接合 Laclau & Mouffe—「文化霸權和社會主義戰略」及 Hall—「威權式民粹主義」的論述資源，貼合台灣在地反對運動發展的脈絡所形構而成。

(1)「國家 vs. 民間社會」→「人民 vs. 權力集團 (power bloc)」

「人民民主論」認為

如果一個集團以論述、常識及其他手段，將反對運動固定化，(例如，固定抗爭焦點或反對焦點、固定運動目標、議題或場域等)，那麼就會在實質上壓抑許多其他的抗爭及敵意，因而可能在某些脈絡中站在人民的對立面，成為權力集團的一份子。(機器戰警／甯應斌 主編，1991：59)

所以批判「民間社會論」中「國家 vs. 民間社會」二元對立的化約架構過於簡化、極化：一方面將國家視為必然反抗的對象，並以黨國體制一元論將「國民黨政府」視為主要抗爭目標，但國民黨政府的倒台只是政權的置換，並不等於國家機器權力的消散。也就是說，忽略了政府以外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支配體系。另一方面以民間社會統合反對力量，則是忽視社運主體的差異性及自主性。因為社運主體不必然是與國家相互對立，民間社會包括眾多相異的戰線，並且相互與國家有不同程度滲透的複雜性，所以反對以「後設敘述」的理論將國家和民間社會作截然的二分，也間接將民間社會一元化視之，並且也弱化了民間社會當中資產階級與政權緊密的利害關係。另外，「民間社會論」要求國家退出經濟領域的運作，任民間社會自由運作的論點，是一種「假」人民民主論述行「威權式民粹主義」的行徑，如同美國雷根和英國柴契爾新右派政權策略的在台移植，有發展以「資產階級」利益為主體的「民間社會」的疑慮。

故「人民民主論」提出以各集團抗爭路線的結盟和「人民 vs. 權力集團」為多元抗爭的策略架構和抗爭概念，藉由社會位置上「宰制關係」和「權力利益分配差距」的不平等權力關係，來相互定義抗爭關係：

權力集團之間具有不斷重組的關係，而人民的主體群也不斷的改變—換言之，這套概念，是以主體的戰略位置為其範疇上的焦點，而不以靜態空間(國家／民間社會)為其分析的框架。更重要的是，這組對立關係的形成並非從理論出發，而是依據對社會現實分析所提出的理論切入(拉克勞 Ernesto Laclau 對拉丁美洲三〇年代以後民眾運動的分析，以及霍爾 Stuart

Hall 對七〇年代以後柴契爾主義的分析)；對立性的提出是在掌握社會運作實踐中由從屬關係 (Relation of Subordination) 中被凸顯／轉化為壓制關係 (Relation of Oppression) 過程裡所表現出來的敵意關係，因此這組策略性二分對立具有強烈的歷史意義：它不能保證各種關係中敵意的穩定性及不變性。...權力集團／人民不以形式邏輯的二分為依歸，而且能夠動態地掌握社會實踐中正在進行的多重潛在對立；如果完全放棄這種對立概念，也可能就喪失了社會抗爭的邏輯焦點、動力。(史思虹／陳光興，《中國論壇》336期：35)

也就是說，「人民」主體是不斷「被回歸式地定義 (recursively defined) 為『反支配的弱勢社會、邊緣團體』以及『和其他人民自主平等結盟的主體』」(機器戰警／甯應斌 編，1991：60) 而出現。所以「人民」與「權力集團」的位置並非固定，會隨時空改變而轉換其位置，並且「人民」主體或社運觀點的社會運動，可以不斷藉由「分化」(dissection) 與「重組」(articulation) 的形式，「建構」不同的主體或與不同的主體「結盟」。其流動性的概念也暗含原本潛藏的邊緣弱勢主體可以不斷的浮現。

(2) 民主發展階段論的「政治優先性」→反對優先論、順序說的「基(激)進多元民主」

多元民主的激進性在於爭取各個抗爭領域的最大自主性 (autonomization)，而無須臣服於其他的超越性原則 (transcendental principle)。這正是 Laclau 所謂的人民民主抗爭 (popular-democratic struggle) 的原則：任何政治勢力如果以自身意識形態為主導，壓抑其他社會運動所發展出的敵意，或是試圖將社運發展納入其自身的意識形態的指導原則，都是反多元激進民主的表現。(史思虹／陳光興，《中國論壇》336期：41)

「民間社會論」中「對抗國家」、「政治民主優先論」的論點，蘊含社會反對運動必須透過自身除外的另一超越性原則，方能正當化或達成自身的實踐。並且對於在「政治社會」以「政治優先論」的詮釋，與 Gramsci 強調「民間社會」的自主性相違背，並陷入以人民利益為號召基礎，實為增強國家或政治勢力控管的威權民粹主義傾向。所以「人民民主論」基於反對決定論、本質論及主張「社運自主性」對其批判，並且強調人民的反支配 (反宰制) 抗爭不需一基礎或一超越性原則來正當化。所以社運與政運的關係，並非階層、順序的關係，而是同值權力的兩個獨立自主團體，可能發生任何關係，但不必然有優先性。

另外因為「民間社會論」原本擺脫統獨論爭的立意，卻以「政治優先論」挾帶統合的反對運動力量逐漸走向「台獨優先論」，將其納入民進黨的政治反對運動中，所以

新民主或人民民主思維在表面上雖然批判了民間哲學，但其實針對的並不是從 1986 到 1989 的民間哲學，而是作為美麗島系意識形態資源的「民間哲學」這一特定的 (意識)「形態」，集中表達在《到執政之路》這本為選舉而作的書中。(機器戰警／甯應斌 主編，1991：14)

並對於「民間社會論爭」暗含的統／獨論述一併提出批判。

所以綜觀「civil society」的論爭，新馬克思主義者 Gramsci 葛蘭西提出「civil society」

的論述與「馬克思主義」、「左翼」的關係使得「民間社會論」與「人民民主論」之間的論戰，不只包含學術理論詮釋的比劃、反對陣營運動路線的角力，更蘊涵台灣左右翼意識形態的抗衡，這也牽涉到知識份子的批判性位置及所信仰的理論與實踐之間的互動，更包含如何將論述挪為其所偏向的政治團體及政治意識形態所用。乃至於「人民民主論」的提出，表面是對應於「民間社會論」提出的正面回應，但實際上論述的構築基礎來自於對解嚴前後台灣左右翼反對運動的論述發展歷程的檢視：對於民進黨以台獨的政治優先論統合反對力量，和傳統左翼理論在台的教條化，均進行批判檢討。

「反國民黨威權」的反對運動團體，自七〇年代「鄉土文學論戰」—從以「文學性」對「本土性」的差異詮釋—的含蓄論爭後，抗爭陣營中因「統／獨」立場已開始有了左、右路線之分。但因為自 1950 年代蔣政權遷台及冷戰體制下「反共親美」的意識形態，往往將「左翼」、「社會主義」、「馬克思」與「共產黨」劃上等號，成為政權肅清異己構陷的罪名，甚至成為不可言說的禁忌。所以七〇年代「保釣」及「鄉土文學論戰」中雖浮現「左翼」色彩，但相對於其他反對運動團體仍屬「邊緣低音」。九〇年代初期，民進黨制定「台獨黨綱」後，「統／獨」議題在台灣的政治、社會、反對運動團體中的爭辯，便持續昇高對立的態勢。民進黨在「統／獨」議題中的「台獨理念」和在反對運動中採取「政治優先論」、「地方包圍中央的選舉策略」，並隱含著中產階級為主體的「重商」意識，開始和左翼抗爭運動的路線相違背，也日漸拉大了反對運動之間的間隙。而戰後台灣兩次重要的「統／獨」爭論也都和台灣左翼運動的發展相關。也就是說，八、九〇年代之交的「民間社會」論點爭議的重要性，可以說是繼七〇年代「鄉土文學論戰」後，重要的左右翼路線的論點交戰。以左翼為主的思潮再度衝擊社會反對運動，除了是伴隨著另一些新興社會運動的發展，也因為新／泛左翼的思潮提供解嚴前後社會反對運動嶄新的運動論述和抗爭方式。更可說是傳統左翼與新左、後現代等左傾論述的交戰。

「人民民主論」的提出，雖然企圖揚棄舊有以左右意識形態主導反對力量，並提供新興社會運動主體的想像空間及戰鬥策略，但仍受限於其主張社運觀點與「民間社會論」政運觀點的相互對立。

(1) 論點自身的侷限性

「人民民主論」論點上最主要的自我侷限就在於反對力量「暫時性」的結盟，這是一個論點形構上的雙面刃。

人民民主論也有其侷限，這限制就是：社運意識形態領域裡所取得的任何資源均是暫時的，如果長久下來沒有其他草根社運的互補，就很難進行意識形態的再生產，因為社運取得一席之地的條件無法維持，而且原來創造的資源會流失。換句話說，不論是人民民主論或任何其他社運的意識形態，如果沒有被拿來作組織動員之用，來突顯社運的認同及社運的差異性，而只是「談談而已」，那麼社運也不可能壯大，而「人民民主論」這類東西也會被顛覆，其突顯社運差異的焦點也終會模糊。(何方／甯應斌，1990.10，《當代》54期：147-148)

「人民民主論」強調「暫時性」的結盟來「反中心」、「反基礎」、「反固著」；但實

實際上相伴「暫時性」的結盟而來的一方面是反對力量的無法積累、瞬間消散、無以為繼；另一方面未被提及的則是，若缺乏持續的接合互補，則亦喪失其流動的多元性，並有形成新中心的危機。

(2) 社運觀點對抗政運觀點的偏頗

陳宜中（1990）在《當代》56期為文〈人民民主與台灣的辯證〉，直接直陳「人民民主論」的偏頗：

「人民民主論」強調反對運動應以「社運觀點」為集結意識，來反駁「民間社會論」以政治優先的「政運觀點」，但其實雙方的論述攻防毋寧是一種詮釋權的較勁。

...什麼是「真正」的人民民主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民民主在各競逐的論述中到底建構出什麼意義。過去，在民間社會論中，人民民主與「民間 vs. 國家」的架構相關聯；而在台獨論中，人民民主與台獨革命相關聯；在左派人士的論述中，人民民主與資產階級代議民主相對力；在六四之後的「早期」人民民主論中，人民民主是用來超越統獨論爭的；目前的人民民主論中，人民民主變成一種「突顯社運與政運之間差異的思維」。（陳宜中，1990.12，《當代》56期：139）

「人民民主論」的「社運觀點」主張，主要遭受的批評在於「社運觀點」只是一種與「政運觀點」符號的置換，雖然理論上而言，有其內部的流動性及非穩定性，但仍受限於「（社運觀點）決定論」的框限；甚至「社運 vs. 政運」觀點實際上在台灣反對運動論述上的對立，開始切割了反對團體的陣營，不僅排除了社運與政運接合的可能性，同時對反對運動力量也形成了一種內耗。因為「『社運 vs. 政運』這種異化論述正如同統獨一樣，是一個『爛泥沼』，一個『自我消耗的鬥場』，圍繞著這個『符號性的鬥場』，我們終將一事無成」（陳宜中，1990.12，《當代》56期：143）。

並且「人民民主論」主要接收的論述資源來自於西方後結構、後現代的學說理論，「現代—後現代」理論典範的移轉也直接影響「人民民主論」的立論方向，並遭受批評指稱為是一種「後現代」與「現代」的對立關係。

基本上，何方（甯應斌）對於民間社會論及統獨優先論的批判架構，完全抄襲自國外當紅的「後現代 vs. 現代」辯論。他認為「民論」以及各種優先論、階級論，是談論「後設敘述」的「基礎主義」。而他所主張的人民民主則是屬於「後現代」的範疇，是「不相信後設敘述」的「反基礎主義」。...所以民間社會（及種種優先論）和人民民主被說成是一組對立，一組基礎主義與後現代精神的對立，一種「一元／多元、同質／異質、連續／斷裂、共同／差異、整體／部分、絕對／相對...」的對立。社運（人民民主）和政運（大敘述）的關係，至此完全等同於後現代與現代的關係，兩者乃是徹底對立、水火不容。...由於「人論」把它和「民論」（及種種大敘述）視為一種「後現代 vs. 現代」的關係，在批判「一種客觀整體的結構分析」（即「基礎」）的同時，迫不及待地擁抱後現代所主張的「潛存多元的宰制關係」，以及「跟著感覺走」的反抗哲學。（陳宜中，1990.12，《當代》56期：140）

所以挪用「現代 vs. 後現代」的後設理論典範推演出「民間社會論 vs. 人民民主論」

的論述，是主要面對的批判。另一方面，「人民民主論」實際上所宣稱接合的「人民」以對立於「非人民」的權力集團，但實際上「人民」與「非人民」之間仍是難以界定：

人民民主所識別的「人民」是什麼？其對立意象—「非人民」(the Other) 又是什麼？

有時，「人民民主論」作者僅僅預設「人民」的概念，連同其所有道德與價值蘊含，不覺得有必要明白界定。有時更坦白「聲明」所謂浮動變化的「非本質性」，以替代明確定義。這顯示「人民民主論」作者對「運作性曖昧」有相當的了解。然而落實在實踐上，我們畢竟找到了一些比較明確的定義：「人民」是自主社運主體結盟或可能結盟者的全稱。所抗爭的對立意象—「非人民」—是所謂「權力集團」。

但是這種「權力集團 vs. 人民」架構與人民民主論所反對的「民間社會 vs. 國家」架構有著同樣的弱點：都是一個粗操又不可能的二元對立。首先，如何將「權力集團」具體地界定成與「人民」互斥 (mutually exclusive) 的範疇？其次，以社運主體結盟而定義的「人民」不是「權力集團」是什麼？我們是否能一面玩著權力的遊戲，一面暗將「權力」當成個塞滿負面道德價值意涵的包袱丟給對手？這樣一個純潔的「人民」是個道地的偽善 (hypocrite)。(朱元鴻，1991.10，《當代》66期：76)

顯見「人民民主論」仍受限於「決定論」和「本質論」的偏頗。「人民民主論」對於 Laclau & Mouffe 理論僅挪用了「人民民主接合」的部分概念，而「人民民主論」與「民間社會論」的對抗，在理論觀念推演上，雙方均宣稱是台灣在地脈絡化後的新「民間社會／人民民主」論述。彼此之間理論立場上的差異，實際上來自於兩大「文化資本集團」各自挪用理論資源詮釋為己用的論述形構，用以相互對陣的攻擊利器。

「人民民主論」在 1991 年《島嶼邊緣》發刊後便少有進一步理論性的詮釋闡釋，但論點中邊緣弱勢串連的概念，具體實踐在《島嶼邊緣》去中心化的專題編輯模式、多元含納性的編輯成員組成、外來邊緣團體的進駐編撰、內容論述隨時與弱勢社會運動的結合...等面向。

3.3 《島嶼邊緣》的論述實踐—「邊緣戰鬥」與「後正文」之反常態的酷兒 (Queer) 操演

從「戰爭機器」時期開始受到當時後結構、後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如何形成「去中心化的形構」？如何成為「漂浮不定的言說主體」？如何書寫才具有「流動開放的文本意義」？成為邊緣知識分子實踐行動的思考軸線。而《台灣的新反對運動》一書對「人民民主」理論的接合，不僅提出在地化的「人民民主論」為論述內容 (context)，並由此延伸出「邊緣戰鬥」的戰鬥位置 (position) 和「後正文」的書寫形式 (form)。這些相應而出的實踐策略，並據以影響《島嶼邊緣》的編輯方針、編輯內容、編輯形式。或者說，基於「人民民主論」的觀點，《島嶼邊緣》延續並在雜誌的文字、圖片編輯具體實踐《台灣的新反對運動》所提出的論述。

《島嶼邊緣》是一個異質份子們的統合體，為保持其邊緣戰鬥的爆發力及避免戰鬥力僵化的疲軟，《島嶼邊緣》可謂是一種集體創作又各自表態的編輯形式，每期專題由

不同人針對擅長的主題抓刀，在不同編委的作用力底下，除了主題分屬多重戰線的論述積累，專題編輯源於各自戰線上所產生的立場差異，故難以將「島嶼邊緣」化約一中心論述或概念邏輯。

雖然《島嶼邊緣》14期的專題文本內容，源於14個各異的編輯脈絡、身處14條各異的戰線、對抗的是14個各異的戰鬥對象，但「每一期都可以看出它的對立面及所選擇立場代表性，例如族群的、種族的到後期性別的方面。它是以思想為政治激進來對抗各種霸權」（破週報POTS，1995.12.15）。所以《島嶼邊緣》揀定發聲的邊緣立場，其所對抗的是國家—父權—異性戀的霸權體制，也指涉著《島嶼邊緣》在兩個面向的一致性²⁹：論述上以「邊緣戰鬥」為編輯方針的戰略位置，和形式上封面、版面設計到論述形構上採取諧擬嘲諷的「後正文」風格。

3.3.1 《台灣的新反對運動》的「邊緣戰鬥」在《島嶼邊緣》的邊緣現身

延續「戰爭機器」時期，標榜著「讓思想成為戰爭機器；讓身體成為機器戰警」的「邊緣戰鬥」論述立場，除了拓展至一系列由唐山出版的戰爭機器叢書（請參見〈讓思想成為戰爭機器—戰爭機器叢刊總序〉），並貫穿《島嶼邊緣》這份刊物，並將當時邊緣弱勢的論述製編為專題：被左右意識形態夾殺的新／後馬克思主義、人文學術領域中不為知悉的科學哲學、傳播研究中冷門的閱聽人研究、原住民、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擺脫統獨的假台灣人、女性主義、同性戀、解放神學……等。《島嶼邊緣》所提與所站的「邊緣」位置亦是一個備受爭議並難以定義的觀點，雜誌編輯中並開設了一個〈影印雞辦母室—邊緣語錄〉的單元，廣集報章雜誌書籍對「邊緣」的定義及論述對話。

「邊緣戰鬥」一詞最早是由傅大為（筆名 林中平）在〈邊緣戰鬥觀點〉³⁰提出，是一個知識份子可以選擇的戰鬥位置。

從「三人行」的傅大為到「基進筆記」的林中平，這將近兩年的時間裡，《自立早報副刊》是我幾個流動性戰場中的一個重要位置。...這是個有相當意義的發言位置，它的主要意義，即是一個邊緣戰鬥的觀點。（傅大為／林中平，《自立早報》，1989.10.21）

「邊緣戰鬥觀點」的提出，是對應著台灣反對運動現況的檢討：「中心」觀點整體觀的侷限性，忽略了次級權力機器的運作壓迫。而歸結邊緣戰鬥的觀點有兩個互相調和的方向：一是它的「邊緣性」，另一則是它的「戰鬥性」。其邊緣性的展現在於論述的發言場所（「副」刊、地下刊物）、文字與概念的經營也有中心與邊緣的區別，還有就是將主題放置在政治經濟之外（學術、文化、教育等）的問題領域上。其戰鬥性的展現是在「知識／權力」的領域上，以有別於傳統性的中心戰鬥策略，相對地「與社會的邊緣人

²⁹ 其實這是一個很不智的舉動，因為《島嶼邊緣》這份刊物及論述是沒法被整體定位及化約的。對《島嶼邊緣》進行歸納固著的動作，實違背《島嶼邊緣》的行事風格。所以這是一個進入《島嶼邊緣》論述之前的險境，或說以《島嶼邊緣》作為研究或書寫對象必會遭逢的險境。

³⁰ 林中平（傅大為），〈邊緣戰鬥觀點〉，《自立早報》1989.10.21。（收錄於傅大為，1990，《基進筆記》，〈邊緣戰鬥觀點—代序〉，台北：桂冠，頁 1-5）另外參見 林中平（傅大為），〈基進的黎明〉，《自立早報》1989.10.26。

物靠在一起，站在他們『旁邊』的邊緣戰鬥策略，對正統展開游擊戰式的威脅。所以邊緣戰鬥並「不是一種中心邊緣分工下的結果，而是有意識地開拓新的空間、尋求邊際效應仍然相當高的新著力點」（傅大為，1990a：3）。

而「邊緣戰鬥」的位置何以擺脫中心誘惑的靠攏或難以成爲新的權力中心，在於其邊緣性（marginality）所指的邊緣群體並非以中心／邊陲觀點所認定的「被壓迫者」或「弱勢者」，而是更爲異質、碎裂、片斷的聲音。「如所謂的瘋人、乞丐、小孩老人、殘障、少數族群、社會底層的人渣、第三者、同性戀、某些社會位置中的女人、娼妓、愛滋病患等等（農工則處在曖昧的歷史中）」（傅大為／林中平，1993：88），均是難以成爲強勢多數或無法自主形成「中心」的主體。所以「邊緣人也不可能成爲普通自由主義者所說的「多元」社會情境中的什麼「元」。相反地，邊緣是社會中被主流強勢擠壓、碎裂至社會邊緣位置的片斷或碎片（fragments）」（傅大為／林中平，1993：88）。「邊緣戰鬥」是一個沒有本質、沒有中心，只是相應反宰制短暫接合而生的邊緣主體。

也許會在特殊歷史情境中反宰制、成爲戰鬥接合的主體（articulating subject），但這種主體只是從反宰制的這種「反面」而生，相對於戰鬥的對象與當時約盟的接合「相應」而起，當對象改變、約盟結束，反宰制的主體即逝。它完全不同於有神聖起源、有根、自我證成與延續再生產的「正面」主體。（傅大為／林中平，1993：93）

這個概念在《台灣的新反對運動》中轉化爲具「『社運觀點』的邊緣戰鬥」，認爲相對於已意識到不平等權力關係的主體而言，尚未意識到不平等的潛在主體更是邊緣。此外，還有那些被視爲「偏差」或「適應不良」，被主流道德及制度視爲「異類」者，幾乎在大部分脈絡中，均處於劣勢的權力位置，這也是當然的邊緣主體。故而，在一個運動或團體中，發覺其中的差異矛盾、喚起潛存的敵意、暴露隱藏的不平等權力，一言以蔽之，分化，就成爲人民民主抗爭的環節之一（另一個環節則是「重組」）。而在這個意義上，新反對運動也就是邊緣戰鬥。（機器戰警／甯應斌 主編，1991：59-60）

而作爲一個邊緣戰鬥者的知識份子不必然在社會位置上是個嚴格的「邊緣人」，但「邊緣戰鬥」的位置卻是可以主動選擇的策略。

邊緣戰鬥知識份子除了選擇站在邊緣者的旁邊，同時也立身自己個人性（personal）歷史中的一些被宰制的邊緣性之上，也許會使得邊緣戰鬥工作者更具有歷史性、在地脈絡性，也更遠離了各種隱藏式的中心取向權力漩渦與引誘。（傅大為／林中平，1993：III）

所以《島嶼邊緣》延續《台灣的新反對運動》認爲「邊緣戰鬥」就是不斷接合那些差異、反常態的主體，成爲「人民」主體的位置和抗爭的概念，從刊物名稱、專題的製作、編輯成員的位置、論述的軸線、編輯的生產運作，均可以將其置放在「邊緣基進」的位置。《島嶼邊緣》的邊緣戰鬥，是一種游移在弱勢邊緣的位置上，一方面與對應的霸權拉扯協商；另一方面接合更弱勢邊緣的戰鬥方式。除了將「邊緣」一詞跳出與中心二元對立的弱勢位置，並賦予其積極的主動性。接合轉化後的「邊緣戰鬥」所指稱的「邊緣」或「弱勢族群」並非是「中心—邊陲」二元對立的論調，一方面是指稱當時台灣社

會中不可見的族群（原住民...）或不被承認的身分認同（同性戀...）；另一方面則是將弱勢族群由從屬關係轉化為壓迫關係，來進行分析及重構論述。

而「邊緣」一詞的提出，伴隨著社會運動的發展，也開始成爲一個漸空的符號具供各方接合，並浮濫。

「邊緣」這個詞彙，逐漸成爲一些知識份子圈中比較流通的語言。不同於前幾年在討論「世界體系」論中的「邊陲」或「邊緣國家」等那些概念，「邊緣」一詞在一些從事文化評論及社運工作者的手中逐漸衍發了一些新的意義。...但實際上卻將這名詞、新瓶舊酒式地注入許多陳舊的意義（如「被壓迫者」、「在野民間」、「無權無勢者」、「反對運動者」、「弱勢者」等等），以致它時時失去了可能的新意義性。當「邊緣」、乃至「邊緣戰鬥」這些概念企圖在滲透與顛覆一些主流中心論述（無論是在朝或在野）時，那些主流論述也同時在積極地「收編」、新瓶舊酒式地「改造」這些被懷疑的怪名詞。（傅大爲／林中平，1993：14）

《島嶼邊緣》的「邊緣戰鬥」策略也開始面對兩個質疑：一是仍以「中心—邊陲」的立場，質疑邊緣戰鬥是以「邊緣向中心靠攏進而取代中心」或「成爲新中心」；另一則是邊緣戰鬥是站在邊緣旁邊的「反菁英」的「菁英」性格。

首先就是當「邊緣」逐漸成爲反對運動中流行的話語，邊緣戰鬥其實就成了一種「位置的宣稱」，喪失其積極流動的戰鬥性，並背離了原初想擺脫「中心—邊陲」、「宰制者—被宰制者」二元對立的抗爭意義，甚至成爲「跳往中心的踏板」。

在邊緣寫作的知識份子一直會有誘惑而走向中心，其實在〈島邊〉裡的一些人在台灣文化圈中的聲望往往超過在傳統中心媒體寫作的人的聲望，所以產生一種弔詭的情況就是你要走上中心最快的方法就是走上邊緣。（傅大爲／林中平，1993：III）

〈影印雞辦母室—邊緣語錄〉（《島嶼邊緣》，第8期：126）自認爲處在邊陲地位的文化人，其實並沒有真正去檢視自己所站的地位。我們甚至認爲，那些抱持邊緣論述的論調者，潛意識裡仍以中心者的心態自居，他們對邊緣論述的開展，不管是基於不滿或不平，多少都流露出「向中心靠攏」的心態。「瓦解中心」、「顛覆中心」，以至於向中心者奪權—這樣的戰略目標，換成另外一個角度就是「彼可取而代之也」的說法，邊陲顛覆中心的真正目的，不過在取代中心而已。.....如果按照上述那樣的線索繼續思考的話，我們會發現所謂「中心」，竟然時時刻刻不斷在挪移它的位置，而位置對調的正好就是所謂的「邊陲」，換言之，中心和邊陲論述的地位恆是變動不居的，也因此他們當中很難找出被劃分一條靜止的界線；或許因為邊陲的這種流動性質，以致文化圈從來才沒有人正面對它下過定義。（孟樊，〈消失的邊陲〉，《聯合報》副刊，1993年6月3~4日）。

這篇語錄點出「邊緣」的定義是會隨著權力場域中眾多力量的互相拉扯，來不斷重置自己在各力關係網絡中的位置。所以「邊緣」與「中心」並非是一線之隔，中間有著極大灰色地帶，模糊不清。雖然《島嶼邊緣》就是矢志要跳離成爲新中心的游移，但當《島嶼邊緣》打著逃逸或游移的邊緣戰鬥時，「邊緣」一詞被賦予「差異」／「弱勢」的統合意義後，反擁有政治性、道德性的強大力量，甚至可以影響中心的時候，不可避

免地成爲一個反抗的集合體，成爲另一個壓迫、排斥「非邊緣」的新小中心。

所以《島嶼邊緣》的「邊緣戰鬥」策略是站在一個反對「知識／權力」的「反菁英」位置，一方面反對主流中心的菁英論述，一方面反對據「邊緣」爲用的菁英論述。持續轉化「邊緣」的意義。

〈影印雞辦母室－邊緣語錄〉（《島嶼邊緣》第 8 期：121）……今天號稱「邊緣」的文化人，主要是和社會常識視爲「邊緣」的事物聯結在一起，才因而取得「邊緣」的意義，換句話，邊緣或不邊緣並非由「受不受重視」，這類因素來決定，而須視其是否和其他邊緣事物（性變態、大便、社會運動、人渣等）攪和在一起。一個菁英性的東西如果太清高、太有身段、太乾淨，不願和偏差的、不入流的、「髒」的邊緣符號並列，那麼充其量只是曲高和寡而已，不可能成爲「邊緣」。「邊緣」是在它與其他邊緣事物之關係中被界定的。（機器戰警／甯應斌，〈不拿白不拿主義－與呂正惠參商〉，《民眾日報》，17 版，1993 年 7 月 5 日）。

對於「以知識份子／菁英之姿站在邊緣旁邊代表邊緣發聲」也是主要面臨的批判聲浪。《島嶼邊緣》中，何方／甯應斌（《島嶼邊緣》，第 8 期：123-124）在評傅大爲的《知識、權力與女人》時，認爲傅大爲所說的「邊緣」有個絕對性。何方／甯應斌也進一步以「就地邊緣化」延伸傅大爲「邊緣戰鬥」的立場，試圖打破傅大爲在絕對立場上對邊緣的切割，認爲「邊緣」是「相對」界定的，不需要「站在邊緣人旁邊」，即可「就地邊緣化」。

而「就地邊緣化」的論點在《島嶼邊緣》當中，多以「後正文」的形式進行操作，逐漸成爲「『反菁英』的菁英」性格。

3.3.2 《台灣的新反對運動》的「後正文」在《島嶼邊緣》的嘲諷書寫實踐



學生都喜歡唸啊宿舍 (Althusser)，因爲她／他們都是無殼蝸牛。

蔡其達（筆名 晏山農）：再來比較好玩的就是，其實《島嶼邊緣》在當時讓人家受到矚目，並不是「正文」，反而是這些圖說、這些奇奇怪怪的照片。而這些很多是吳永毅、王蘋、卡維波（甯應斌）他們弄出來的，對於找這些奇奇怪怪的圖片，他們很重要。所以你看那時候就很好笑，因為葛蘭西他四歲的時候失足，後來就駝背的照片。...所以它之所以特殊的原因，除了文字之外，就是圖說。後來《島嶼邊緣》之所以受到矚目，以及給人家留在腦海中的印象，其實未必是這些「正文」，而是這些「後正文」的東西。（20051015）

「後正文」的書寫風格以甯應斌編撰的《台灣的新反對運動》一書爲經典範本。而《島嶼邊緣》內部主要以甯應斌及吳永毅爲「後正文」的創作主力，延續《台灣的新反對運動》一書後正文的文體貫穿 14 期的文本。其中大量穿插與文本無關的圖片或與圖片無關的圖片說明，並虛擬「機器戰警共和國」、「假台灣人」等的身分認同，大量虛構新聞報導、文章、廣告、聲明；甚至在圖片說明處以「後正文」翻轉西方理論學者譯名或對著名的人士諧取譯名。「關於

專題中的譯名問題，在人名方面力求統一，概念術語方面則尊重各家作者譯者的譯法。」（《島嶼邊緣》，第3期：4）並夾以後正文的圖片說明，例如以「夾克第一大」來翻譯「德悉達」（Jacques Derrida）（《島嶼邊緣》，第3期：3）、以「辣肛」來翻譯「拉岡」（J. Lacan）（《島嶼邊緣》，第3期：78）、以「啊宿舍」來翻譯「阿圖舍」（Althusser）（《島嶼邊緣》，第3期：79）……等的後正文譯名及圖說不勝其數。

甚至是「虛擬」學者、學術文章出處，並以〈有機知識份子們的對談紀錄—油雞、姿勢和糞仔〉／傅培梅（National Cooking University, Taipei）（《島嶼邊緣》，第5期：108-110）一文為主要的「後正文」文章範例，文中將作者「傅培梅」在注釋中為「one of Foucault's wives/wolves」、以「葛蘭母雞」來諧擬「葛蘭西」（Gramsci）、以「德雞達」來翻譯「德希達」（Derrida）、以「不雞鴨」來諧擬「布希亞」（Baudrillard）、以「婦科」來諧擬「傅柯」（Foucault）、以「鴨肚塞」來諧擬「阿圖舍」（Althusser）、以「永遠的洞」（Still Hole）來諧擬「霍爾」（Stuart Hall）、以「魚·約翰」（John Fish）來諧擬「費斯克」（John Fiske）...等。

《島嶼邊緣》的編輯成員並各自諧取眾多化名、筆名編撰文章。

王蘋：這裡面很多人的名字都是假名。而且每個假名都有意義。我覺得當時大家取假名好好笑喔！我覺得那就是一個不能面對自己的年代。（笑）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寫「櫃子」的文章。就是「性向」不是唯一的櫃。（吳永毅：假名最多的是卡維波嗎？）不一定喔。你看這裡有一個叫吳姬慧，有一個叫黃非虹，你一看就知道當時在演什麼電影。我覺得有一些電影對大家有直接的影響。（20060719）

許多文字都是以不同的筆名發表，幾乎所有的筆名都沒有使用過。用筆名的原因倒不在怕事，而是在每次完稿後，老非（丁乃非）和我最大的快感就是創造出一個新的認同，新的名字。台灣的讀者往往會因為「名字」來決定讀與不讀，或是來認定作者的立場。南方朔、杭之、張大春、……往往因為名字的簽署，影響到讀者在文字中找到新東西的可能性。簽名是正號，也是負號。為了閃躲這種困境，只好搞出精神分裂的策略，非必要時，不用本名。掀牌後的效果無法估計。其實，我總認為寫完的東西就與我沒啥關係了，也不必然堅持寫出來的論點。或許我將繼續使用這種游擊戰的筆名戰術，企圖改變原有的閱讀習慣。（陳光興，1992：x）

可謂是企圖惡搞「作者」中心論和打破「知識／權力」的基礎：除了以流動的稱謂（或稱精神分裂式的認同）來避免「定名」的固著，並避免讀者帶著對作者或學者本名的刻版印象和意識形態，對文章內容作預設立場的閱讀。

《島嶼邊緣》第三期首度加入馮光遠、李巨源的《給我報報》³¹—〈假新聞·真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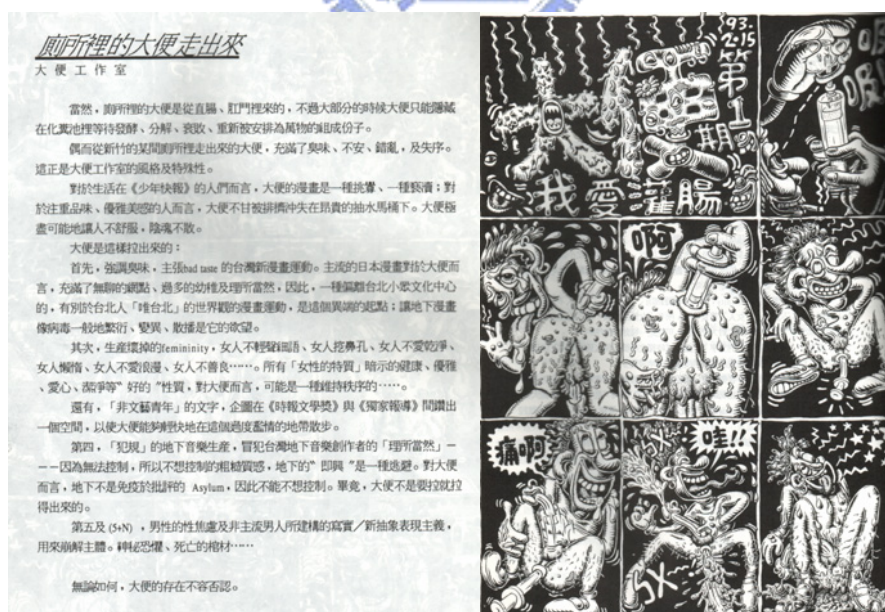
³¹ 「對我來說好笑比較有意義，至於能否批判、能否擊中重點則在其次。如果有太多的使命感，就會愈來愈不好笑。搞笑文化對一個國家的影響絕對是正面的，而嘲諷文體的表現形式也是某種藝術形式。」創意鬼才馮光遠在1991年由美返台，與李巨源設計以政治人物及時事為嘲諷主題的「給我報報」專欄，多刊載於《時報週刊》、《新新聞》、《中國時報》上，並由時報結集出版，共十一冊（1992.1-1995.12）；圓神出版四冊（1996）。並從1999年12月發行「給我報報電子報」，部分文章發表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1993年馮光遠並與李安共同編寫「喜宴」，得到金馬獎最佳原著劇本。並將平面的「給我報報」影像化及立體化：1998年以「假紀錄片」的手法

告> (《島嶼邊緣》, 第 3 期: 137), 以嘲諷文體 (Parody) 的藝術創作表現形式, 顛覆一般正經八百、講究客觀真實的新聞報導評論方式, 與《島嶼邊緣》「後正文」的書寫論述策略有異曲同工之妙。

《島嶼邊緣》(第 11 期: 27) 的邊緣語錄: 台灣島上有相當一群進步的知識份子, 樂此不疲地玩弄著要用符號來「解構」「一切權力機制」的遊戲, 有的宣稱他們的顛覆使命, 有的則乾脆拒絕回應別人的分析和定位, 因為「命名即是權力」, 擺出一副你能奈我何的態度。毫無疑問, 他們所創作的理論作品或「後正文」等等, 是高度敏銳而富創造力的, 然而也因為這一題論述(暫時無以名之)的「基進」名義, 吸引不少知識青年, 更在近兩三年以來, 造成社運、婦運、學運陣營中一些理論的「內爆」(implosion) 作用。(原載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1993.12.10, 周奕成, 給我報報地方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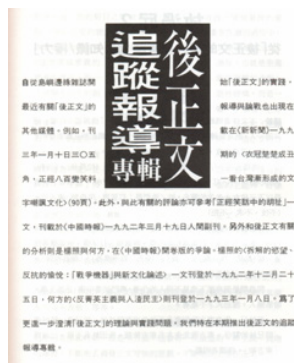
馮光遠 李巨源 的「給我報報」及「為人民服務」



大便工作室

拍攝一齣「為人民服務」(The Candidates) 的政治諷刺喜劇; 並經營紅樓劇場, 發展情境式喜劇的舞台表演。2003 年擔任金石堂書局的創意行銷總監, 將其老店翻新。並於 2006 年在敦南誠品舉辦「馮光遠攝影展」, 展出八〇年代旅美 13 年大量紀錄紐約觀察的攝影作品。

除了馮光遠政治諷刺報導的「給我報報」外，《島嶼邊緣》還加入其它「類-後正文」風格的製編團隊，如第七期大便工作室以影像圖文創作的「大便報」。(《島嶼邊緣》，第7期：115圖)



《島嶼邊緣》並在「第六期《島嶼邊緣》的『後正文』追蹤報導，集結了幾次刊內刊外的實踐案例，持續探索後正文『正宗』的質地。」(《島嶼邊緣》，第6期：2)並在〈後正文追蹤報導專輯〉專題中由屬名「媽-媽-」、「吉利」、「小、叮、噹」(打蛋器、爬蟲類、東方敗三位的筆名)執筆的〈你有沒有在游泳池裡放過屁？—從「後正文的理論與實踐」論「知識／權力」〉文章中詳細論述「後正文」的策略實踐。

何方(甯應斌/筆名 卡維波):「後正文」本身跟學術沒有什麼關係。我跟吳永毅差不多，他常常也會有一些很好的 idea，後來他去做抗爭的時候，也會想出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就是這樣。可是說我們這種風格放在《島嶼邊緣》裡面，就變成一種比較奇怪的形式，當然這是我比較主張的，我我那本書(《台灣的新反對運動》)為例，我們在談一件很正經的事情，但另外一方面我覺得你應該要有另外一種去顛覆這樣的東西。所以《島嶼邊緣》就變成一個我們實踐的對象。我們把「後正文」的東西放到裡面，但我們談的是比較政治方面的。那種風格或是幽默或是我們今天不知道怎麼講，某種程度是接近現在所謂的「kuso」。馮光遠是比較接受「諷刺」的政治寫作、時事寫作，但是那個時候其實還沒有那麼清楚的分別，但後來愈來愈清楚一點。馮光遠也希望我們可以去做「給我報報」，只是那時比較沒有時間，他覺得我們寫得太知識份子、太少數人的，要大眾去寫，後來走這樣的路線。這個是比較菁英路線，講實話，也是比較政治性的，也是比較尖銳的。(20051012)

吳永毅：搞「後正文」也不是從《島邊》才開始的。(王蘋：就是寫一些歪的東西，是一直都在進行的。就是...「本性」啦！)(笑)什麼本性！講到「本性」就超出社會學的分析範圍了。(20060719)

王蘋：我覺得會不會是某種政治高壓下的年代。有一種不能在「正軌」裡面進行所有事情的狀況，有一點像「全民大悶鍋」。有一些人他有種特質，但那個特質和那個想法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就是很容易接受像這樣的東西。不過也許我猜是因為某一個真正想講的東西不能直接講，所以就藉由一種方式講，可以講得比較基進，可以講到你想要的點，可是不用去直接衝突碰撞。你就是要講那個東西，你就是要批評它，就是有意見要發表，可是不能直接講，可能是因為當時的某一種政治或社會環境不允許。可是你用一種「歪」的方式講，你就比較能夠表達自己。也許吧！(20060719)

「後正文」的論述形式成為解嚴後的時代特色，除了甯應斌、吳永毅、平非(王蘋&丁乃非)、紀大偉、洪凌...等在《島嶼邊緣》的論述撰寫，還有馮光遠、李巨源為主的「給我報報」系列，和當時「大便工作室」等的校園刊物，和「周星馳—無厘頭」的系列電影及王偉中製作「新聞連環泡」等的電視節目，都選擇「『類』後正文」的論述形式作為發聲。

「後正文」是一方面受到西方後結構理論的影響，尋找逃逸路線的書寫策略，另一方面也是因應台灣在地主流的知識／權力集團對意識形態掌控的顛覆策略。若以《島嶼邊緣》裡的書寫來定義「後正文」，可以說是以一種抽離其文本脈絡或脫離文本的原先定義所做的重新詮釋，或摻雜某些與正文不和諧的圖片或論調來突顯其正文的偽善性或

重要性。這樣的搞歪或歪讀所具備的實踐力，是不輕易被國家或資本甚至是知識／權力集團收編為用，並具有某種程度改變國家、資本、知識結構的內涵或接受度的可能性。

「後正文」並不限於文字上的書寫，也可以是一種運動或表演的形式，是一種沒有公式化的創作。解嚴前的台灣社會，面對的主流價值是國民黨黨國體系下的大中國意識、主流媒體則是黨政軍經營的三家電視台，及傳聲筒的聯合、中時兩大報。解嚴後為擺脫主流價值操控主流媒體的一元化播出訊息，電子媒體中開始出現無厘頭又具諷寓性的綜藝節目（如：連環泡）；而報紙或雜誌平面媒體中諷刺的政治漫畫或馮光遠的「給我報報」都具有某部分的「後正文」風格：創作者均對時事或主流文化以扮裝搞笑演出或幽默的暗喻描繪，實際上均帶有針貶時政或翻轉主流意識的意味。而八〇年代末、九〇年代初期的台灣解嚴前後的社會中，各式沸騰的社會運動形式也極具「類後正文精神」：小蜜蜂塗鴉、肥皂箱行動講台...等。在當時人民言論備受箝制及行動備受壓抑的時空環境視之，「後正文」可以說是在不同層次上，講究主體能動性，以反向操作的方式超脫主流常態的邏輯，以構築新意義的反抗運動。

並且後正文的圖文並非單純的逸樂性質，具有其強烈的時事性、政治性意涵。《島嶼邊緣》後正文的部分，是脈絡性極強的論述建構，必須配合當時政經環境的時事現況，方能具有「『政治性』的解碼」。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極不需要脈絡性的論述建構，脫離當時的社會脈絡，這些文字圖說仍具有「精神解放」的娛樂性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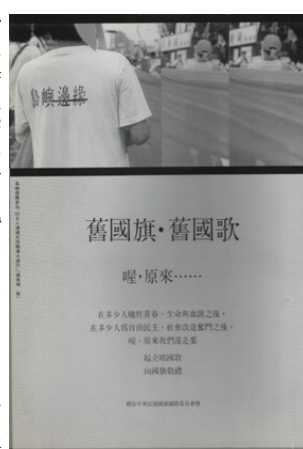
吳永毅：有時候我自己都看不懂。後來想想才想到是對應某種東西吧！其實當時包括我們在編的時候都有問題，因為從開始寫到出版都差不多四五個月。其實當時寫的時候是非常貼近現實脈絡，等到出的時候已經過去了，（問：沒有時效性了）就算懂，也就「沒趣」了，不好玩了。所以其實那些所謂後正文是要有時效性的，但是整個編輯的出版沒有辦法跟那個速度搭配。（20060719）

「後正文」的圖說也藉著政治性和時效性批判流行文化、學術精英、國民兩黨在媒體、理論、政策宣傳所單一化的意識形態塑造。

對應第二屆國代選舉的「反金牛反

吹牛聲明」（《島嶼邊緣》，第 2 期：84

圖）：在國代選舉前，學界人士及社運團體發表的聯合聲明，針對第二屆國代選舉的商業化及金權化及首次出現電視政黨廣告的形象包裝及商品化的現象進行批判。「假台灣人」專輯對應四大族群、生命共同體的論述...「舊國旗、舊國歌」（《島嶼邊緣》，第 10 期：封面內頁圖）對應著 1994 年民進黨為主導的「第二屆人民制憲會議」舉辦「新國旗、新國歌」的徵選活動。



除了政治性的批判外，《島嶼邊緣》的後正文編撰策略，也可以說打的是一種挑戰知識界的「頑鬥主義」（參見何方／甯應斌，1990.9.1，《當代》53期：75-77），對於主流的書寫及閱讀習慣進行非常態性的干擾，使其意義接合的斷裂，並在其中產生踰越的快感和新的意義建構。

……後正文的文化政治在此時台灣的意義，是一種知識頑鬥主義，挑戰的是菁英主義。……後正文的文化運動正是要顛覆學術專家高人一等的基礎。後正文運動把最精闢的見解，最深刻的分析、最言之有物的學術知識……這些主流文化，和無所謂「深度／膚淺」的另類正文並列，卻使另類正文充滿慾望、更具誘惑性，這種另類正文的書寫也是學術實踐及知識生產，但卻以「知識／慾望」取代了「知識／權力」。後正文運動是台灣邊緣知識份子，在國際／國內知識分工體系中，一方面追求自主，一方面追求平等的知識／社會實踐。（媽媽吉利小叮嚀，《島嶼邊緣》，第6期：94）

吳永毅：我覺得後來是有策略的。對我來說，「後正文」你可以用比較俗的說法是「市場考量」。就像是我這種人去參加讀書會的經驗，如果你用那種方式去講那種理論，就會搞得人家不耐煩，人家怎麼會看得懂，或者怎麼接近你。那你就要去想，是不是有別的講法。第一個來說，就是這種東西不是那麼正經八百，還可以理解的。譬如說老左派它其實從理論變成一個到跟群眾接觸的時候，它的語言已經被轉化掉了，但是可能不符合現代的這個語言。但是這些後現代和新左理論，它基本上還沒有經過群眾性的轉換。新左還有一點點，但後現代是完全沒有。所以你聽他們講就像是個天書一樣，至少對我來說，那一般人哪裡會受得了。那一大堆名詞麻！然後通通都沒被轉換麻！但新的東西一定會創造新的意義，那從我們的角度至少你要把這個東西弄成通俗的語言，讓人家知道說「那不過是一個看事情的觀點」。至少對我說來是有點策略性想要把這個東西透過這樣亂搞有點把它轉變，讓人家認為也可以這樣搞。那因為如果像後現代如果用它原來傳統的方式講，我覺得會把人家侷限於外，特別對那種不是菁英的學生。（20060719）

所以後正文具備「反菁英」的性格；另外它無規則地在正文中穿插後正文圖文，挑戰常識的線型閱讀習慣，以避免意義的縫合、固著，進而瓦解並轉變原有的閱讀接收習慣。讀者一邊閱讀「正文」一邊閱讀「後正文」；先閱讀「正文」再閱讀「後正文」；只看「正文」或只看「後正文」，眾多排列組合出的閱讀方式，除了顛覆一般的線型的閱讀習慣，也影響閱讀後產生眾多認知不和諧的詮釋意義。而這種精神分裂式的閱讀體驗，也促使讀者質疑本書中的正文及後正文的訊息並產生顛覆效應：思考而非接收。所以後正文主要目的除了顛覆、批判主流文化的意識形態也同時顛覆自身。並以一連串意象的拼貼與跳躍，進而翻轉每個人對正規行徑或主流文化是鐵板一塊的看法，並可以自行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後正文」：面對眼前已經製作好的事物（政治事件、媒體訊息、商品、道德價值...等）時，必須批判性、反對性、扭曲性的去接收及思考，甚至是自覺的生產新意義或重新看待此事物，這也就能避免事物的意義被一元化固著，以多元意義的展現來抵禦其他機制的收編或控管。

某種程度有別於主流媒體或權力集團編製主流意識形態訊息的單向傾灌，賦予閱眾主動詮釋、思辯結合文本意義的能動性，繼而延伸出反知識／權力、反菁英、反中心權威的戰鬥意涵。所以後正文是一種挑戰知識常態的書寫策略，是一種反對「知識／權力」的書寫方式。

這個權力基礎就是菁英對「知識／真理」的壟斷。所以我們要從「知識／權力」的視角來打破菁英所鼓吹的真理觀。

菁英主義的要害不只是在於菁英佔據了一個特殊的位置，比群眾更有發言權，而在於大家相信菁英的科學知識比群眾的知識更真實更深刻或更客觀。易言之，反對菁英主義也就是反對以下這種看法：「我們需要知道社會的真相才能正確地行動，而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真相，因為知道真相必須透過專門的研究或實踐」。反對菁英主義也因此就是自我肯定：我們所知道的就是客觀真理！（參見《台灣的新反對運動》，281 頁等）但是這並不表示我們不必去多聽其他論述，因為我們可以從其他論述中取用更有趣更新奇更有利的修辭、措詞、用語、說法、語彙，以便應付困難並改造世界。故而知識理論就像工具一樣，只有合不合用的問題。（媽媽吉利小叮噹，〈你有沒有在游泳池裡放過屁？—從「後正文的理論與實踐」論「知識／權力」〉，《島嶼邊緣》，第 6 期：94）。

所以後正文策略是相對主流教條式、嚴肅意義的邊緣戰鬥；是相對主流閱讀習慣及意義建構的邊緣戰鬥；是相對菁英階層啓蒙、解放群眾的邊緣戰鬥，故以「解放欲望、意義無法縫合的反讀、反菁英主義」為其戰鬥目標並以「群眾」永不停止的「接力書寫」來進行「文化抗暴」。

3.3.3 《島嶼邊緣》的暗櫃—反常態的酷兒（Queer）戰略

這本文籍的名稱「酷兒啟示錄」，擷自《島邊》裡專收酷兒文字的單元，作為對於《島邊》的紀念。文集的英文譯名，卻不是「Apocalypse Queer」（直譯即「酷兒啟示錄」）—這串英文的宗教色彩以及「目的論」並不是此文集討論的要點。我改用了「Queer Archipelago」，「archipelago」指的是島群：可能讓人聯想起「島嶼邊緣」（Isle Margin），或讓人想到台灣地理實境。複數的列島星羅棋佈，彼此遠近不一，各有高低，可以分別獨立又有整合的可能，海水的高度還可以因時改變它們的輪廓—這，比較像酷兒吧。故名之。（紀大偉，1997：17-18）

以「邊緣戰鬥」的位置加上「後正文」書寫策略的操作實踐，即是《台灣的新反對運動》接合出的「人民民主論」在《島嶼邊緣》的實踐，進一步以「Queer戰略」來分析。也就是說，Queer的戰略就是《島嶼邊緣》的戰略；Queer的現身／聲就是代表《島嶼邊緣》／第三、n勢力的現身／聲³²。「Queer理論」蘊涵的政治戰略及戰鬥能動性適切地點出《島嶼邊緣》的知識分子面對當時台灣的社會現況所接合出的在地新論述，並且Queer在認同政治上的酷異風格，具體以《島嶼邊緣》作為一個實踐操演的場域。「邊緣戰鬥」所指稱的是《島嶼邊緣》不斷游移於任何反權力集團固著意義的對抗位置，就是Queer踰越二元對立的反常態戰鬥位置；而《島嶼邊緣》（後期）多以「認同政治」為專題主軸和其虛擬嘲諷的書寫風格，就是Queer理論中羞辱轉化的攻略。

³² 或許我這樣的推論過於專斷，或許有人會對這句話嘲弄反駁，甚至氣得跳腳。但我並非是要將《島嶼邊緣》整個地沒入以Queer為名的性別運動中，也並非是要以Queer的性別解放置換《島嶼邊緣》的邊緣論述解放；而是希望透過闡明Queer在政治性面向上的解放意涵，構築《島嶼邊緣》在解嚴之後貼合社會脈絡下的政治性戰略。

1. 《島嶼邊緣》與 Queer 政治對抗性的關係：「酷兒」最不／Queer

「Queer」原是同志運動中反抗「異性戀 V.S.同性戀」「性別」二元對立的「跨性／別」運動。九〇年代初期台灣同志運動尚萌芽，性／別運動並未發展到「同性戀霸權」的形成，「酷兒」與「同志」一詞均成為指涉「同性戀」的話語，並無具備它原本顛覆「同性戀霸權」的意涵。所以「酷兒」反而成了「島邊」「最／不酷兒的酷兒」專刊。

(1) Queer 的歷史脈絡

在 1980 年代末期，隨著酷兒國族 (Queer Nation) 行動群體在美國十幾個城市的散播，酷兒一詞有逐漸取代 lesbian 與 gay 的趨勢，尤其在移民進入同性戀社區的年輕世代中，成為新的政治傾向與文化強調。酷兒的內涵至今仍然不乏矛盾與歧異。酷兒，是一項語言上的光復行動 (reclamation)：年輕世代所張揚的這個污名標籤，對老世代的同性戀來說就像是往舊傷裡抹鹽，仍然是難以忍受的冒犯 (Thomas 1995)；然而對酷兒來說，唯有收復這個污名標籤，才能消除它的傷害力量。酷兒是挑釁的政略，不斷推後自由派容忍的界線，積極的尋求遭遇 (encounter)。酷兒的理念是連結各種性取向的政略—男同性戀／女同性戀／雙性戀／變性／換裝……Queer says it all—但也是反映後現代「去中心」的政略，更彈性的生活方式選擇與認同建構的個別空間，而不為鞏固任何共同體或典範的認同模式而塑造中心。Seidman (1994：173) 在許多酷兒理論裡感到反認同 (anti-identity) 的政略立場，但其意涵並非棄絕認同作為知識與政略的範疇，而是將認同的意義與政略角色保持開放與爭議。酷兒抗拒性範疇的限制性標籤，尊重性表意的流動。「不僅在性方面，酷兒反對歸化於生活中各面向的傳統常規，更概括的說，酷兒對立的是當前的「常態化政權」。(朱元鴻，2000：203)

朱元鴻 (2000) 直接點明 Queer 的歷史脈絡和所具備的「政治性」意涵。面對西方同志運動逐漸以「異性戀／同性戀」二元對立的態勢發展，固著了性別情慾的流動認同，Queer 是有別於傳統同性戀運動在異性戀主流中心抗爭的路線，「企圖超越同性戀固定角色和身分，也企圖超越舊有的性模式和性文化」(卡維波／甯應斌，1998：32)。也就是西方同性戀運動主張認同的時候，酷兒卻對身分認同丟出問號，所以 Queer 其實是針對「反異性戀主流」—Gay & Lesbian 同性戀霸權的自省批判。

Eve Kosofsky Sedgwick (1990) 的《暗櫃認識論》(*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就是對於同志的出櫃／現身運動作進一步省思及推展。直言暗櫃內外的二元思維，強化原有的社會制度運作邏輯、同化其他性／別身分認同的異質性、僵化身分認同的多樣流動性。並從「知識／權力」的角度，點出圍繞暗櫃旁知識結構基礎的匱乏或噤聲，推使酷兒的運動抗爭位置擺脫與異性戀者二元對立的抗爭形式，將戰場擴展至整體社會制度和日常生活知識：

簡單二元的看待事物 (同／異、出櫃／入櫃、緘默／宣告、男／女)，或者單純的用種族、階級、性別、性傾向等社會因素來歸類主體，根本就無力處理性／別領域中的多重複雜不協調，結果反而肯定了原來充滿暴力的嚴格區分，抹煞了複雜社會力在主體生命和身體中的矛

盾沉澱。因此賽菊蕊的酷兒策略總是要去積極挖掘那些無法歸類的、無法定位的、以徹底的、激進的質疑事物最根本的常識思考，拒絕讓暗櫃的統治繼續框架世界。更重要的是，由於暗櫃的二元思考已經深深的根植於各種社會制度之內，也根植於最熟悉的常識中，所以酷兒的抗爭目標並不侷限於情慾領域，而包含整個社會制度和所有常識。(何春蕤，1998a：28)

Sedgwick 更在 1994 年出版的論文集及《Tendencies》對 Judith Butler《性別麻煩》(Gender Trouble) 一書中除魅化 (demystification) 和去自然化 (denaturalization) 的「性別操演」(gender performativity) 進行衍生、批判並轉化提出「酷兒操演」(queer performativity) 的概念。在〈情感與酷兒操演〉(Affect and Queer Performativity) 一文中，並以「轉化羞辱的操演」建構酷兒戰略：開始將原本辱罵或歧視同性戀等具有敵意的字眼 (如 Queer、fag、faggot、homo、dyke...)，從中轉化成驕傲的自我稱謂、挑釁現身。(參見 Sedgwick，1998.9，〈情感與酷兒操演〉《酷兒：理論與政治》)

所以西方的理論脈絡下，Queer 在性／別運動中承載著兩項重要意義：一是踰越常態、二元對立抗爭形式的侷限；另一則是羞辱詞彙的自我指涉和轉化。Queer 一詞及這兩個論點在台灣論述的轉化衍申，正是《島嶼邊緣》據以轉為操作實踐的策略。

酷兒的邊緣位置和另類抗爭姿態，是台灣非國家主義 (a-statist) 的社運思考所熟悉的，這個社運思考則是在一九九〇年前後台灣有關反對政治和社運路線的人民民主辯論中所產生的。在這個辯論和後來的餘波中提出了像機器戰警這種生化電子人 (cyborg) 作為新社運主體的隱喻，同時也創造了被外界認為是自我醜化的「人渣民主」、「後正文」、「假台灣人」(其實就是把台灣人酷兒化)、「出匱」(及出櫃和出軌的結合，因為「匱」音同「軌」、義同「櫃」；出匱就是以出軌的面貌出櫃現身 coming out as queer) 等等說法，這些前驅都是酷兒之所以有今日本土形貌的因素之一。

這些和酷兒相關的波動最早多以《島嶼邊緣》這個雜誌為基地，所以「酷兒」這個名稱是在《島嶼邊緣》首次出現絕非偶然(紀大偉、洪凌、但唐謨等人提出此中文名稱並且製作專題)。在《島嶼邊緣》停刊前最後一期「色情國族」專號中，有些文章還提出了另一個酷兒政略中常見的主題，亦即，弱勢者如何得力 (empowering，即如何培養弱勢的力量，使之增大)，擺脫受害者心態 (victimology)。酷兒的嘉年華呈現就正是要顯示同志運動是歡樂的 (gay)；酷兒對多元情慾的吸收也是另一種不斷得力壯大的企圖。(卡維波／甯應斌，1998：39-40)

由此回看《島嶼邊緣》每一期的專題制定，無非就是要批判主流「正、反」論述的排他性，並提供被排除的邊緣論述一個發聲管道。而《台灣的新反對運動》的「人民民主」、「邊緣戰鬥」；《島嶼邊緣》的「假台灣人」、「妖言／出匱文學」、「酷兒」、「色情國族」及不管是亂套、歪解、誤解、惡搞的「後正文」書寫都是基於當時台灣的在地脈絡接合出具有反抗性的思想運動。並且基於 Queer 在同性戀運動的軸線及對抗的脈絡，由性別運動衍伸出的政治性意涵—跨弱勢連結概念、反常態的羞辱轉化。

(2)「酷兒」為何不是《島嶼邊緣》最 Queer 的一期呢？

Queer 一詞最早被引介到華文世界時的譯名有二：一是一九九二年台北金馬獎國際影展的

Queer 專題電影，由香港影像與劇場工作者林奕華譯介為「同志」；另一個則是一九九四年《島嶼邊緣》第十期 Queer 文學專題，由編者紀大偉、洪凌、但唐謨轉譯為「酷兒」。(張小虹，2000：5)

當時台灣的文化情境裡，已經出現「同志」和「怪胎」等等用來取代「同性戀者」的詞語。不過「酷兒專輯」仍然執意啟用中文字典裡完全沒有的新詞，以便描述某些和「同志」形似、卻仍有所差異的眩惑和慾望。

正好，九〇年代起陸續引進台灣的「New Queer Cinema」展現了上述難以明確描述的差異性。...於是我們借取英文裡「queer」對於「lesbian & gay」(女、男同志)的反思，並為「queer」找了一個搞怪挑釁的俏皮譯名，「酷兒」。(紀大偉，1997：9-11)

Queer 最早是在 1992 年電影節被翻譯為「同志」，而最早出現在《島嶼邊緣》裡則是第 9 期—《愛報》第 2 期的預告版面，將「New Queer Politics」翻譯為「新『怪胎』政治學」(見《島嶼邊緣》，第 9 期：60)。但其後 Queer 一詞便在《島嶼邊緣》第 10 輯(1994)正式以「酷兒」專題為名翻譯引介入台。因為「酷兒專題」的製作，間接地使 Gay、Lesbian、Queer 同時期進入台灣的語境，雖各自中譯為「蓋族／男同性戀」、「拉子／女同性戀」、「酷兒」，但在台灣的脈絡中則一併以「等號」簡化來認知，成為當時指稱「同志」、「同性戀」的語辭。

《島嶼邊緣》第 10 期的「酷兒」專題由紅水鮮(洪凌)、紀小尾(紀大偉)、蛋糖饅(但唐謨)主編，主要節錄《竊賊日記》與《蜘蛛女之吻》兩篇小說譯文及「酷兒小小百科」的獨立製作。

<小小酷兒百科>是「酷兒」專輯的主要文章，由紅水鮮、紀小尾、蛋糖饅執筆，以迷你辭典的形式呈現酷兒。採取零碎形式的原因之一，不免是因為酷兒對當時三位作者而言仍然不易掌握，很難以整合的文章處理—但<小百科>活潑逗趣的形貌(及原來配置的裸男照片多幅)也引發了較大的迴響；假若當時以厚實論文呈現，可能反而不會受到注目。(紀大偉，1997：19)

但也由於缺乏「理論性」文章來闡釋 Queer 的西方源起脈絡、對抗目標、戰略運用，所以在台灣翻譯接合的過程中，喪失了 Gay—Lesbian—Queer 在美國同性戀運動中的歷史階段性，Queer 初始便在台灣的社會脈絡裡被理解為「=同性戀」。

甚至因為「酷兒」專題是接續《島嶼邊緣》第 9 期「女人國·家(假)認同」中以女同性戀為主體的《愛報》後發刊，並且專題文本中刊登多幅裸男照片，因而被指認為是與第九期相庭抗禮的「男同性戀運動」。而這樣的簡化或簡讀，除了一方面因為台灣本土同性戀運動的尚未／初步崛起³³，異性戀體制的壓迫使得同性戀身分認同的「Come

³³ 同性戀的身分認同在當時是否能夠稱得上「運動」？各自有不同的審視標準及詮釋。本文亦不以此為重點，故不贅述。但是同性戀的身分認同的確在八、九〇年代之交的台灣社會開始被「指稱」，而同性戀的小眾雜誌及活動也在檯面下活躍，但仍未在公開的言論空間中廣泛討論。《島嶼邊緣》第九輯「女人國·家(假)認同」中以「倒編」的形式刊出《愛福好自在報》(簡稱「愛報」)第一輯，除了揭示台灣日後主流女性主義及婦運團體與邊緣女同性戀的分道揚鑣外；而第

out 現身／出櫃」都難以施展，實在難以體認西方Queer源於面對Gay & Lesbian為主流的同性戀霸權的對抗性。

並因為《竊賊日記》(洪凌譯，1994)與《蜘蛛女之吻》(紀大偉譯，1994)兩本翻譯小說日後的出版，使得「酷兒專題」的焦點擺放在「酷兒文學」的翻譯及引介。所以一般認定「酷兒文學」的特徵是「科幻化」、「變態化」(參見張小虹，2000)。紀大偉則認為酷兒文學的特色就是：呈現身份的異變與表演，呈現慾望的流動與多樣，還有對於既有規範的不滿。(參見紀大偉，1997)

加上以「酷兒」一詞為中譯名，一方面因為字面上「兒」的用法，蘊含著小孩、兒童的字義；另一方面三位專題主編在《島嶼邊緣》編輯成員中相對而言屬於「年輕世代」；並且剛起步的同志運動相對於其他社會運動的發展顯得「年資淺」，而 Queer 論述的標新立異及反抗常規的表現，也都框限了對 Queer 一詞的理解，將其定位為「年輕驕傲」及「青少年次文化」的位置。促使 Queer 在西方語境中的「羞愧性」在台灣尚未轉化前便自然消散，反而增添了「另類、青少年次文化」的色彩。

不論是「同志」或「酷兒」，都在九〇年代台灣運動與文化的論述場域上開疆闢土，而主流異性戀父權社會的圍堵策略之一，便是窄化與固置「同志」與「酷兒」流動認同／慾望，讓「同志」只指向穩定性認同的「男同性戀」與「女同性戀」，讓「酷兒」單向成為性變態與科幻小說的同義字。(張小虹，2000：5-6)

「酷兒」一詞難以凸顯Queer理論將常規中「羞辱性」的詞彙做轉化性的操演，以賤斥作為自我身分認同的主張。所以有人認為翻譯為「怪胎」、「變態」較為貼適(張小虹，2000：6；卡維波／甯應斌，1998：33)³⁴。所以從《島嶼邊緣》對Queer的「翻譯」，可以看出「人們面對新詞時，往往急於詮釋，並賦予清楚定位」(紀大偉，1997)，定義新詞的過程中，蘊涵著知識建構過程中文化詮釋權的爭奪，並依著場域中權力關係的利益進行收納及排除，逐漸僵化新詞的意義變動性。「酷兒專題」的編輯文章只「接合」出了Queer的「酷異性」並未「接合」出Queer隱含的「政治對抗性」。所以《島嶼邊緣》對「同性戀」的身分認同及「同性戀」運動，雖然提供發聲空間並以學術性論述正當化，但卻也因為《島嶼邊緣》「Queer酷兒」專題的製作，在轉譯「Queer」的過程中，框限了Queer在西方語境中產生的能動力道，使Queer一詞在台灣被侷限於「同性戀運動」或「變態、科幻文學」的軸線，其戰鬥性格未得到全方位的開展。

十期的「Queer酷兒」專題更賦予某種程度的學術理論性色彩。

³⁴ 「換言之，『怪胎』不是要取代原有現存之翻譯，而是要與『同志』、『酷兒』更形雜種化一番，不斷歪斜／歪邪、持續演譯／衍異，開放出更多詭譎的想像與不確定性，讓人摸不著頭腦，探不清底細，讓正常與變態的二元對立難分難捨、你儂我儂。『怪胎』的基進性，正在於邪魔歪道終究無法被打入地牢、流放邊疆，邪魔歪道總已在家中流竄、殿堂起舞。」(張小虹，2000：6)

「台灣的同性戀運動起步不久，反同性戀的語言和態度還沒有在檯面上與運動針鋒相對，即使台灣的同性戀者有足夠的力量和自信，不在乎自我醜化，但是能否找到像“Queer”這樣適合的轉化字眼，也是個疑問。(在這方面，我認為「變態」一詞可能是唯一較適合的字眼。)」(卡維波，1998：33)

(3)「酷兒」如果不是《島嶼邊緣》最 Queer 的一期，又為何是《島嶼邊緣》最 Queer 的一期呢？

上述「酷兒為何最不 Queer？」的討論蘊涵了兩個層次的接合：《島嶼邊緣》的編輯接合西方 Queer 酷兒性別理論的在地翻譯；《島嶼邊緣》的讀者接合「酷兒專題」編輯內容的自我翻譯，所以「Queer 酷兒專題」的名詞翻譯、文章編輯、版面呈現，促使「酷兒」脫離西方語境中 Queer 的意涵，但這個兩個層次所形成的翻譯偏差（不管是「歪讀」、「誤讀」...），卻是最 Queer 的表現。

「酷兒」不等於「QUEER」

的確，酷兒並非全然等於「queer」—雖說前者是後者的翻譯。不過我也要指出，恐怕也沒有其他中文詞語可以「全然忠實」譯出「queer」—因為「queer」一詞初自英美社會的情慾歷史，既然台灣沒有同樣的文化脈絡，也就養不出「queer」這個字；如果真要翻譯，譯出來的結果就一定和原版不同、必然沾染本地的色彩。酷兒一詞雖然靈感來自「queer」，然而血肉卻是慢慢在台灣生成—也就是說，它是個文化交匯下的「雜種」。

這個雜種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對「原版」的「queer」表示出亦步亦趨的忠實；雜種之中的血液絕非僅只來自單個源頭。酷兒就是混血之後的新品種，至少要同時面對兩回事：一方面要和「queer」交叉對話並持續接受外來刺激，而另一方面也要書寫在地的歷史。（紀大偉，1997：9-11）

事實上，用「西方現代性的詞彙」來指稱一個在地存在久遠但尚未被命名的狀態、身分認同，必會溢出一些無法被包含指涉的異質結構。（請參見〈操演、Bakala 與東方主義的凝視〉一文，葉德宣譯，收錄於《跨性別》，何春蕤編，2004：145-172）所以如果是基於「反常態」的戰略，「酷兒」的確是最 Queer 的一期，因為它不僅接合西方的論述思想試圖來顛覆台灣的異性戀體制，並且也反顛覆「Queer」一詞的西方語境脈絡及學術建制的「翻譯理論」—信、達、雅的概念。所以當「酷兒」的中譯已經顛覆 Queer 在西方語境的意義時，自也就跨越西方脈絡下所指認的身分認同，顛覆了 Queer 所應蘊涵的羞辱轉化，因為「酷兒」直接接合在地的跨性／別脈絡，無需貼合西方性別運動的進程發展，可以開展出屬於台灣自身的跨性／別運動，甚至衍生 Queer 具政治性的反常態運動。所以什麼是酷兒？紀大偉提出一個弔詭的「定義」：「酷兒是拒絕被定義的，它沒有固定的身分認同」（紀大偉，1997：11）。

酷兒因此要不斷踰越被固定、被本質化的情慾，所有的情慾規範、情慾差異都要被不斷玩弄顛覆諧擬和踰越—有些酷兒不但踰越異性戀的規範或常態，甚至踰越「正常」的同性戀、逃逸同性戀的規範。（卡維波／甯應斌，1998：37）

如果 Queer 本身的羞辱性轉化就蘊涵了藉由擬仿體制常規的操演進行顛覆，那麼 Queer 作為一個符號承載具而言本身就無本質性的存在，所以「酷兒」對 Queer 的轉譯不管被視為歪譯或錯譯甚或轉化變形，是更彰顯 Queer 的能動力道及認同的開放流動性，甚至打破在地與西方理論的位階關係，這就是為何我欲藉由 Queer 來進入《島嶼邊緣》。一方面 Queer 的戰略意即以西方理論在地翻譯的觀點，擺脫西方理論的移植

性，強調與在地的脈絡關係，避免翻譯詞彙的意義僵化。另一方面將 Queer 理論打破常態的概念，由性別運動延伸至全面弱勢族群結合的戰線，以對抗常態並打破二元對立的論點，進行「串連」、「人民民主」的觀念和實踐。也就是說，了解二元對立只是強化鞏固原本的體制思想權力關係，所以對於「主流」的正／反都要予以批判性的檢視，並質疑身分認同的固著。並以 Queer 的操演概念及羞辱轉化－轉化為《島嶼邊緣》嘉年華式的展演、邊緣戰鬥的妖風。而「酷兒 Queer」專題在兩個層次的翻譯過程，某種程度也可投射出《島嶼邊緣》「接合」西方理論的運作。

《島嶼邊緣》的論述和慾望是相當不符合主流的學術及道德的標準。由於《島嶼邊緣》深受後現代、後結構、後馬克思主義等思潮的影響，也不信任社會反對運動中「本質主義」、「教條主義」、「優先性」...等的相關論點，《島嶼邊緣》與其說是台灣的「新」反對運動倒不如說是台灣「酷兒化」的反對運動。所以我不由 Laclau & Mouffe 的「人民民主」理論及 Hall 的「接合／構連」理論來切入《島嶼邊緣》的論述形構，也不想論理《島嶼邊緣》接合這些西方理論的忠實與否，反而希望藉由 Queer 來點出這些知識分子的位置和樣態，分析《島嶼邊緣》的酷兒攻略，在認同政治的層面開啓非常態的想像空間及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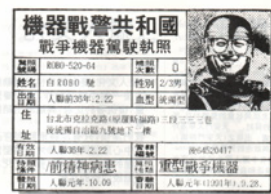
2. 潘朵拉的暗櫃－酷兒化的身分認同形構

Queer 戰略強調認同的流動性，使《島嶼邊緣》其中酷兒化的主體認同在後期肆意操演轉化。《島嶼邊緣》以「多重主體」的人民民主抗爭來揭起多重戰線的游擊戰，企圖震盪原有並穩固的象徵秩序，鬆動壓迫的社會結構。《島嶼邊緣》不正而歪的內容及打游擊的論述放炮有異曲同工之妙，搞歪的後正文圖說和文章書寫，機器戰警共和國的獨立宣言、踰越統獨的假台灣人想像認同、女性妖言惑眾的出櫃文學和同志酷兒的出櫃狂歡，甚至是噁爛的大便工作室、群眾接力書寫的蟑螂報，均是對應著解嚴時期的社會，從「邊緣」、「弱勢」的位置（原住民、民眾音樂、學生、青少年、女性、同志...等）對抗主流的意識形態分類或壓制，以文字、照片、繪畫等形式發出的雜音。並以上述思想基礎構築出具政治性的身分認同，提供想像的主體形象任讀者在不同的論述中挑選認同並隨機轉移。

（1）機器戰警共和國&假台灣人：踰越統獨的酷兒認同

在「民間社會論爭」後，「人民民主論」的論述沒入《島嶼邊緣》的論述空間中，論述主要的對抗目標一方面是對抗國民黨的黨國體制，另一方面對抗的則是由「民間社會論」逐漸轉為「民進黨」和「台獨論述」。

而對於反對運動民進黨的建制化及台獨運動沛然莫能禦的獨立建國潮，《島嶼邊緣》在第 1 期「《台灣的新反對運動》讀迷聯誼會」的假廣告上虛擬「機器戰警共和國」的身分認同（《島嶼邊緣》，第 1 期：102 圖），並在唐山販售印製「讓身體成為機器戰警・讓思想成為戰爭機器」（人民民主聯邦元年 1991 年）的機器戰警 T 恤（250 元）（《島嶼邊緣》，第 1 期：88 圖）。



如果你需要新而獨立的國家，
如果你熱愛統一，
歡迎移民機器戰警共和國！

●凡申請移民者即贈送駕照一張，來函請附回郵信封及基本資料，即可獲戰爭機器駕照，並成為本聯誼會之榮譽台交迷。

●本聯誼會專辦出國(機)戰警及共和國憲法(及統一)等相關業務，請寄信至(島嶼邊緣)編輯部。

●本聯誼會歡迎各界人士(或戰警)加入，凡為(戰警)或(戰警)不願加入，本聯誼會將予以

字子(或戰警)或戰警。

●本聯誼會歡迎各界人士(或戰警)加入，凡為(戰警)或(戰警)不願加入，本聯誼會將予以

字子(或戰警)或戰警。

●本聯誼會歡迎各界人士(或戰警)加入，凡為(戰警)或(戰警)不願加入，本聯誼會將予以

字子(或戰警)或戰警。

●本聯誼會歡迎各界人士(或戰警)加入，凡為(戰警)或(戰警)不願加入，本聯誼會將予以

字子(或戰警)或戰警。

●本聯誼會歡迎各界人士(或戰警)加入，凡為(戰警)或(戰警)不願加入，本聯誼會將予以

字子(或戰警)或戰警。

第 3 期吳永毅以「爬蟲類休息室／影印機辦母室」為名主編《腦筋左轉彎 2》：新而獨立的宣言（《島嶼邊緣》，第 3 期：123-140），虛構《機器戰警共和國（ROR）憲法宣言》作為「機器戰警共和國」的獨立建國論述，藉以嘲諷民進黨制定第一部以台灣共和國為國名的憲法草案³⁵；並且對於「台灣一獨立／中國一統一」的二元論述，《島嶼邊緣》從字面上加以拆解，以「台統」、「中獨」字彙的倒錯置換，賦予有別主流的詮釋意義，藉以打破統獨二元對立的單一詮釋。

而「不統不獨·既統又獨」是《島嶼邊緣》當時為踰越統獨爭論提出的主張，原先只是《島嶼邊緣》的論述之一，並不是主要的論述要項。但「反台獨」的暗流，逐漸在當時「四大族群」和「生命共同體」的論述提出時，以「假台灣人」專輯的製編一湧而上，並引發社會運動團體在路線上的爭議。第八期「假台灣人」由吳永毅、何方（甯應斌）、王墨林、鄭村棋編撰：

<「假台灣人」專輯說明及書目>

正如前述，假台灣人乃針對著「台灣國家機器的內部殖民下的國族營造」。所以假台灣人或假台灣國族因為「假」的可能意義而有不同的含意。簡單來說，假至少有虛幻、想像、模仿、摻假（摻雜或雜種）四種意義。以下略述之，以姐是本專題名稱「假台灣人」的意思。（葉富國，《島嶼邊緣》，第 8 期：102）

原本對應 1992 年 8 月「外省人台獨協進會」的成立，決議要製編「外省人專輯」，但其後「由於後來的稿件性質及內容難以用『外省人』來涵蓋，而且許多稿件企圖顛覆『生命共同體—外省人』論述，並且拒絕參與在目前建構外省人的主流行列中」（《島嶼邊緣》，第 8 期：2-3），所以改為「假台灣人」專輯，並製作一個筆談專輯談論台灣族群認同的歧異性。

³⁵ 民進黨在 1991 年 4 月國大修憲案結束後，5 月開辦「人民制憲巡迴列車」活動，8 月結合無黨籍、學者各界人士召開人民制憲籌備會，並公佈以「台灣共和國」為國名的「台灣憲法草案」。

專題並採取雙封面的設計，一面以 L.A.Boys、鄭南榕與蔣經國為封面人物：(《島嶼邊緣》，第 8 期：封面及封面說明)

這些人都曾經在假台灣人意識形成過程中浮現。在假台灣人的歷史中，不論是鄭成功或「原宿族」(模仿日本原宿文化的台灣青少年)，均曾以「偽裝」方式，或「想像」方式、「模仿」方式、「模擬」方式來認同「台灣人」身分。在今天台灣，假台灣人則是以「諧擬」方式來認同「台灣人」、來「摻假」台灣人。(《島嶼邊緣》，第 8 期：封面說明)



另一面則是大便工作室的圖文創作。內文中並穿插大便工作室另類的藝術創作「【假台灣人寫真集】編按：本專題特別邀請「大便工作室」製作插圖。不過本刊編輯已經原作作品之圖片重新編排，【假台灣人寫真集】之名稱亦為本刊所加。」³⁶ (《島嶼邊緣》，第 8 期：37 圖)

《島嶼邊緣》第 8 期「假台灣人專輯」可以說是針對當時「生命共同體」及「四大族群」論述形構的文化爭霸。此專輯提出「假台灣人」的族群認同並語帶諧趣的諷刺當今的主流族群意識，以對應當時八、九〇年代之交的以國民黨為社會主流意識的「大中國意識」及反對陣營民進黨初冒頭的「台灣本土意識」，均在「知識／權力」的層面上建構並召喚人民去成爲一個「正港的台灣人」。

<假台灣人—台灣的第五大族群>

.....如果像某些人主張的那樣，今日台灣存在著閩南、客家、原住民、外省者四大族群，那麼台灣其實上有第五大族群，這個新興族群就是「假台灣人」。

...假台灣人」(特別是諧擬意義下的台灣人)這一族群卻不能形成一個主體位置，也不能主動建構自己，它只是其他族群在各自建構時無可避免的「副產品」—當作為生命共同體的四大族群在建構自己時，也同時建構了「假台灣人」。一切無法在生命共同體內呈現的經驗、一切與生命共同體完全異質的符碼，都只好被丟出來去建構「假台灣人」，就像過濾後通不過篩選的渣滓丟進垃圾筒一樣。

因此，假台灣人既無主體性、也沒有什麼本質；既不可能形成什麼中心，也不可能被代表或

³⁶ 當時大便報的工作團隊由於投稿創作在第 8 期被重新編排為「假台灣人寫真集」，故在編務會議上引發激烈衝突。一方面是針對創作的被挪改；另一方面則是針對「資深」編輯委員的反彈。

再現 (represent)；這是一個沒有族群歷史或傳統的族群，一個由破碎、片斷、混亂的符碼及經驗所混雜而成的（後）現代族群。

你是什麼人？台灣外省人？台灣客家人？台灣原住民？台灣福佬人？何必這麼遜，何不和我們一樣來做假台灣人？

我們在肛交、在跳舞、在隨地大小便、在放屁，我們在搗蛋、在盜用公物、在混、在偷懶、在塗鴉、在鬧場，我們在打扮、在發浪、在賣騷、在通姦，我們在享受性愛、在爽歪歪，（你呢）。我們（都）是假台灣人。（台灣人，，1993.07，《島嶼邊緣》，第8期：44-45）

《島嶼邊緣》的「假台灣人」可說是一種哲學式、理論式推演下的辯證結果，在國民黨—民進黨的正反下的「合」或是「反『反』」，它是一種「酷兒」的聲音，一種反對「主流」也反對「反對主流」的檢討與自省。為了跳脫僵固的二分法泥沼，出現了《島嶼邊緣》的特異雜音，但外界往往仍統獨二元地簡化看待《島嶼邊緣》的論述，最後獨派將其標籤為「反台獨」，而統派則視其為「沒有立場的虛無主義」。而「假台灣人」的觀點也只能代表部分成員的論述，並不能代表編輯成員共同的論述，這也是「假台灣人」難以繼續深耕論述或解釋言說的困境。

（2）女人國的妖言／出櫃文學、酷兒、色情國族：踰越性別的酷兒認同

女人的國家認同，這原來是一個問題，是一連串的問題，我們想的是：女人是什麼？女人是誰？國／家是什麼？國／家是誰的？國／家中女人的位置在哪裡？女人有沒有國／家認同？（《島嶼邊緣》，第9期：2）

《島嶼邊緣》也試圖在性別運動上打破傳統以男／女、異性戀／同性戀的對立抗爭，試圖開放更多情慾流動的論述、更多性別流動的邊緣認同，這個性解放的軸線必須將第9期「女人國·家（假）認同」、第10期「Queer 酷兒」和第14期「色情國族」合併閱讀。

《島嶼邊緣》第9期的性別觀點與第2期《科學·意識形態與女性》著重學術中女性性別角色的出現有極大的差異。第2期主要是想在台灣開啓以科學論述為基礎與人文科學的對話，其中涉及的文化評論議題包含生命科學在台灣、學術中女性角色的出現、女性主義與反啓蒙。



第9期「女人國·家（假）認同」由王蘋、丁乃非共用筆名「平非」編撰。封面標題「女人國·家認同」上的「家」字上疊印了「假」字，專輯名稱可讀為「女人國家認同」、「女人國一家認同」或「女人國一假認同」，談論了女人認同的歧異性。

王蘋：「性別」這一期為什麼會出現，不是事先規劃的。是我和丁乃非在裡面參與，就覺得應該有一塊作這個，因為我們的關切在這裡。但是是什麼時

候開始作，大概也被延宕過。我也不確定，如果我們早點準備好，可能更早一點這個東西就會出來。那只是就是我們自己也拖，然後後來好像不能在拖下去了。(吳永毅：對，一開始好像就講要有性別的東西)

原來我們參與就想好要做這個，我們沒有即時作出來，我們就拖拖拖拖，拖到那個時候讓《島邊》有一塊「性別」的東西。我覺得「目的性」有點強，然後就作了，然後就找了當時人脈裡的一群人，有一半的人士我們透過當時的婦女新知認識的。大家就開始討論要做什麼議題，開過幾次會。另外一塊是我們有個讀書會，那裡面也談了一些女同志的議題，也在人脈的位置上認識了女同志為主的發生管道。好像是他們主動講還是我們主動問，我也忘了，反正就結合了當時的「愛福好自在報」，就集結出刊。

……(吳永毅：我記得好像有幾次編委會逼她們逼得太緊，她們還很不高興。他們就說：性別快點！到現在還沒有。她和丁乃非就很不高興。)對，我們那期應該是拖得最久的。我們就是沒有就是 0，好了就是全部一起來！那個時候弄「妖言」，主要也是我們自己跟性別有關的組織工作上提的，不是在《島邊》的聚會上。就想說要自己寫這些東西，我們就邀了幾個人寫。不過當時在會議的時候，我是剛聽吳永毅講，我覺得有一點理解，何春蕤當時並沒有參與，我們有找她，但她並沒有要進入我們這一塊。其實我也有點不知道，為什麼後來他們就開始推了。

其實那時候在弄第九期的時候就找了一些年輕的女性一起作了東西，但那群人從來就沒有進入《島邊》的討論。就像是我和丁乃非搞了一個「秘密組織」。(笑)然後他們也不知道我們在幹麻！可是我們就作了一塊，然後長了一些東西。那我自己工作的關係，就有一些小團體在進行。所以我們等於是在小團體裡面創造一些生產，把它放在這個位置上。

<女人國／家認同宣言> (《島嶼邊緣》，第 9 期：3 圖)
及專題序言<出櫃(匱)之必要>即以一種女性認同驕傲的姿態呈現，有別以往婦女運動以女性弱勢爭取平權的抗爭論述。

破櫃而出的出櫃大行動，是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雜性戀者對於家／國中，異性戀性慾的稱霸、自以為是，理(欲)所當然，極致的顛覆質疑。我們出櫃，妳／你們不再唯一、渾然天成。出櫃同時宣示，家／國之內除了規範壓迫女人的性別邏輯之外，還有規範性更強、壓迫更深的性取向邏輯。我出櫃、做愛、存在。

女同性戀出櫃；出軌的女異性戀者。我們是姊妹、親密戰友、愛人、情敵。出櫃改變了出軌的意義，如同女人出軌改變攻陷了家／國的種種藩籬。(《島嶼邊緣》，第 9 期：6)

並廣徵「妖言／出匱文學」。女性的歡愉、女性的解放—「妖言／出匱文學」也開啓了邊緣、異議性的女性文學文類。(《島嶼邊緣》，第 10 期：25 圖)

<序文：女性公共論壇的建立—介紹本期「妖言」及其意義>

《島嶼邊緣》第九期「女人國·家認同」專輯所推出的「本土女性聲」或「女性情慾 D.I.Y. 小說」中的「妖言」，在出版後得到社會廣泛的共鳴，這類寫作也被稱為「出匱文學」。

什麼是「出匱」

出匱，就是異性戀出軌、同性戀出櫃(不再躲在櫥櫃中，正大光明地肯定自己的性偏好)。「匱」和「軌」同音，又和「櫃」同義，所以我們用「出匱」來指涉「出軌與出櫃」。(何春蕤，《島嶼邊緣》，第 10 期：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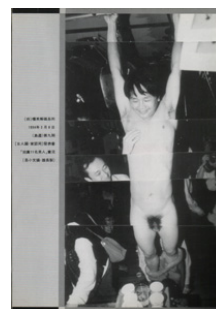
在推出以女性情欲書寫為主的「妖言」專欄徵文後，《島嶼邊緣》在後續也設計以邊緣男體為主的情欲專欄—「魔音—島嶼邊緣禁忌徵文」(《島嶼邊緣》，第 13 期：102 圖)。但 14 期《島嶼邊緣》隨即停刊，故並未刊登「魔音」的稿件創作。

「女人國·家(假)認同」之後婦運的發展由女性弱勢地位爭取平等並非轉向，而是分歧。不僅開創了婦女運動的另一條軸線—「女性驕傲」，更意味著日後婦女運動與同志運動的「分家」。《愛報》創刊號並從另外一面(「女人國·家(假)認同」的封底是《愛報》的封面)作了一個反轉編輯的設計，呈現大量女同性戀的情慾文字及圖片。(《島嶼邊緣》，第 9 期：倒 24；《島嶼邊緣》，第 9 期：封底、封面圖)



「愛福好自在」第 1 期，在《島嶼邊緣》「倒著編」，除了以編輯手法強調女同志的現身，凸顯「女同志」在婦女運動中的差異性和主體性；也標誌「女同志」在婦女運動中「不正」的邊緣位置。


何方(甯應斌/筆名 卡維波)：「女人國·家認同」和「酷兒」這兩期，有相當的聲勢。「女人國·家認同」是在女性主義運動的一個高潮中推出來的，當時是女學會第一次主辦「三八婦女講座」，那時候在現場就賣《島嶼邊緣》。然後何春蕤在現場講「打破處女情結」，當時在場大家都是非常興奮，大家很興奮地從會場走出來，何春蕤在那邊叫賣《島嶼邊緣》，那時候那種興奮怎麼化為行動？就當場掏錢就買，當時就賣的非常好。然後晚上還有一個聚會「拍賣男性」，很多人和很多《島邊》的成員都去參加，大家都玩得很高興。(見第十期封底內頁照片)



我覺得那一期對當時的女性主義絕對是有推動的力量，它的後面又是「女同志」的東西，當時在《島嶼邊緣》不是那麼多人可以理解這個東西，但大家都可以接受，也覺得很好，沒有遇到強烈反彈。「愛福好自在報」其實是想用《島嶼邊緣》的學術光環去護衛或加持這樣的女同志刊物，而且起了這樣一個「正當化」。然後「酷兒」又出現了，以一個西方新的思想方式、面貌出現，其實我覺得《島嶼邊緣》在出「酷兒」的時候...。你知道「酷兒」整個出現的背景，是西方同志運動主流化了以後，出現對主流化的一種批判。但台灣當時「同志運動」根本就沒有！或說根本就沒有到「主流化」的問題，是一股非常薄弱的力量。所以我覺得當時很多人根本不懂什麼是「酷兒」。(20051012)

何春蕤：可是我覺得那個時候的話，它出現的狀態會比較是出現在一場座談會，談到同性戀的東西，然後可能有一些小的地下組織，一些少數人內部的聚會，所以怎麼樣形成一個「社會力」的話，還不那麼清楚看到。「酷兒」這一期的確提供了很多的概念，提供了很多的語言，提供了某一種文學的生產，然後它好像有一個很清楚的文化面貌出來，這是「酷兒」那期蠻重要的一個貢獻。那對於「女人國·家認同」的話，我其實回過頭來看這麼多年的發展以後，我覺得那是一個轉捩點。1994年以後的一些女性主義發展的方向，比較不是像我們過去想像的那種充滿了憤怒的、充滿了悲情的、無力感的那種女性主義。而另外出現了一個聲音，這個聲音是歡愉的，是能夠面對自己慾望的，而且很大膽地要求更多的社會空間，好讓女人的慾望不受到威脅、不受到恐嚇的。這是真正1994年以後重大的女性主義的轉折，這是台灣的轉折，它出現了另外一種女性主義，對其他一些正統性主義的一些不太關注的議題，有非常強烈的興趣。我覺得也很少看到女性主義的聚會能夠會像當年「三八講座」那樣高昂的氣氛，那種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擋住我的感覺，那是在一般女性團體聚會裡面比較少的感覺能量。這可能是當時《島邊》一、兩個很特殊的期數裡面出現的特殊「功用」吧！它也很重要地標記了那個時刻的角色！（20051012）

第10期「Queer 酷兒」延續著第九期以女性為主夾雜女同志的性別論述，以「同志情欲」為主。



由於對酷兒 (Queer) 的愛好與酷兒論述的匱乏，我們在翻譯酷兒小說《竊賊日記》與《蜘蛛女之吻》之後，後設地試圖製作關於酷兒的文字專題，包括上述二部文本的摘譯、加油添醋的假導讀、偽年表，以及煽情噴火的前言後語，製作完碩大的胸孔與生殖器之後，我們驚覺這個酷兒娃娃居然沒有五官也沒腦袋！發現巨大的曠缺，酷兒爆破小組火速地在夜間炸藥便利店加緊趕工，縫綴出一張扭曲畸零猙獰調皮而且熱愛騷動與破壞的歹徒酷臉，再順勢塞入一根油滋滋的香腸與一顆顆甜絲絲的櫻桃，最後放進一片鹹濕無比的磁碟片，打標〈小小酷兒百科〉簡稱「小兒科」的瘋狂變態無恥搞怪兒童教育宣導片。對我們這群剛剛攻陷《島嶼邊緣》的邊緣酷兒，建構身分主體的神話並不是酷兒娃娃的製作目的；毋寧說我們希望拆解、希望搗蛋、希望上天下地開心玩樂，掀起偶像與正經人士的貞操帶。盡情偷窺、盡情地自慰自玩自戀自在！

在所有的集體意識神話裡，最強大的神話系譜是異性戀正典大多數歷史主流份子所主導的異性戀神話機制。我們並不想取代正典人，成為無趣的大多數；我們只想調侃他們、玩弄他們、擠擠他們乾癟的乳頭和龜頭，榨出幾滴不新鮮的體液嗅嗅罷了！

酷兒們，盡情地使酷、張牙舞爪、囂張橫行罷！唯有拆解掉累贅的多餘廟堂，我們的遊樂園才有空地可以開張。從此刻起，我們通告全宇宙的酷兒，一起來玩捉迷藏，逮到愈多漏洞或棍棒，積分愈高，獎品是以下的酷兒玩樂大全。

快開始嬉戲罷，酷兒！（洪凌，〈邊緣酷兒攻佔島嶼邊緣〉，《島嶼邊緣》，第10期：5圖）

現在，「酷兒」成長中.....

「酷兒」是這一期的主人翁，它誕生時，適逢《島邊》因第九期「女人國·家認同」上市，

持續地沉浸在「換鞭」時節的歡愉氣氛中，所以，它也感受到新刊發表的派對狂熱、讀者反應的如潮洶湧，甚至到了街頭釋放慾望能量之際，它也不願有任何強褌束縛；它看來會想和一些俗成意念小步共舞，但又會伺機大力反彈；它想先以極為凝煉濃稠的書寫進行文學焦點的演繹，而小小年紀，竟有晶亮繁麗之相……（《島嶼邊緣》，第 10 期：2）

「Queer 酷兒」雖在當時無引領西方性別運動脈絡上針對主流異性戀和主流同性戀的對抗意識，但確實予以台灣同志運動的學術性的正當化，並貼合著《島嶼邊緣》對抗二元主流對立的趨勢。「Queer 酷兒」的酷異風格也逐漸成爲外界給《島嶼邊緣》的標籤語彙。

何方（甯應斌／筆名 卡維波）：「女人國·家認同」起碼它的可讀性很高，也可以讀得懂，很多文章是談女性主義的部分。然後，「妖言」開始出現，就是女性情慾的對話，就表示女性情慾解放的這個東西已經開始在萌芽、生產中。到了「酷兒」這期來講，我覺得它的策略其實是一個「正當化同志」的一個策略。「酷兒」是當時代表西方最新理論的東西，然後它對當時同志運動的影響是：你看！國外有個新東西！雖然大家都不懂，沒有人懂那最好。「酷兒」不是骯髒的，是一種高深的西方包裝，我覺得是一種「正當化」作用。除了當事人洪凌跟紀大偉以外，我真的不太覺得這種思想在當時，其它的同志是不是有深刻感覺到同志運動不能夠主流化，那個議題根本還沒有到時候。所以問題不在於當時同志看得懂、看不懂，或者他看不想看這個東西，可能看了也看不是很懂，就翻一翻而已，重要的是說同性戀這個題目可以堂而皇之的變成一個學術性的東西，在這裡討論。所以賦予同性戀一個「文化正當性」，我覺得意義是在這裡。某種程度上，我覺得這兩期的《島嶼邊緣》就是強化了那個時候，人們開始對性／別議題一個廣泛的興趣。在那個時候，掀起了一股熱潮。因為「酷兒」那期也有「妖言」麻，情慾的解放、性的解放在這兩期的《島嶼邊緣》非常非常的明顯。反而「後正文」都已經不太需要有了，幾乎都沒有了。（20051012）

第 14 期「色情國族」則是甯應斌以新邪人類五人小組／悲筆（卑鄙）、夏柳（下流）、荻蒺（低級）、陶雁（討厭）、柯梧（可惡）爲名編撰「色情國族」一期。



這一期專題分成兩個部分：「邪國族」與「色情(邪)聯合國(族)」。
...邪(國)人的國家認同很簡單：邪人支持的是婦運的、酷兒的、左派的、社會主義的、邊緣與弱勢族群當家的國族認同。邪人決不保衛的是父權的、反性的、右派資產階級的、反共的、國家優先的國族認同。邪人是 Alter-native Taiwanese（假台灣人）。

「色情聯合國」部分是第九期「女人國(假)認同」及第十期「酷兒」專號的混(亂)合、雜交後所排泄出的進化異形。

「色情聯合國」就是「邪國族」的國家認同之具體內容，是我們國家精神或國魂的變遷歪斜(Alter)。

社會運動都應是邪運動(Queer movement)，都要酷兒化或邪化。

國族問題和「邪(人)現(身)」其實有密切的關連。在我們的國家中，邪人是無所不在的；我們的國家應當是個邪人國—女人國、工人國、原住民國、殘障國。沒有我們邪人，就沒有什麼生命共同體，這個國家是我們邪人的。（《島嶼邊緣》，第 14 期：3-4）

女性及同性戀和跨性／別的聲音在現今社會已不再被視爲絕對禁制，並有某種程度的開放空間，而《島嶼邊緣》當時面對的解嚴初期社會，這些聲音卻是備受壓抑，言論

箝制程度和社會包容程度，都和當今有極大的落差。面對異性戀—男性父權掌握文化、政治、經濟、家庭、日常生活，《島嶼邊緣》提倡女性出櫃文學及酷兒的跨性／別妖言便是衝撞當時被視為淫聲穢語的思想、文字、行爲。所謂的出櫃「文學」，也是要「文學」出櫃，重新定義與顛覆「文學」，出櫃文學同時也是反文學、非文學。而妖「言」，也是「言」妖，重新定義與顛覆「話語」，妖言同時也是反異性戀男性父權的話語、非異性戀男性父權的話語，讓女性及同性戀和跨性／別的聲音可以發聲並被言說。

而「色情國族」一方面與九〇年代西方「酷兒國族」(Queer Nation)的論述相互呼應，另一方面也嘲諷當時民進黨的獨立建國論述及主流的「四大族群」論述，並具有弱勢族群連結的政治性意涵，也就代表著台灣的新反對運動的進一步論述建構。

<姓「性」名「別」，叫做邪—《島嶼邊緣》「色情國族」專輯序>

由邪左派所做，原刊於《島邊》十四期。「色情國族」不免讓人想起國外著名同志運動組織「Queer Nation」。不過這個專輯的論點主要應是主張擴大陣營 (universalizing) 的策略，強調各種性弱勢者的串聯。(紀大偉，1997：19-20)

「台灣的新反對運動」也就是以「社運觀點」自主的反對運動，「邊緣」一詞是以相對性而言，所以邊緣戰鬥的位置也就是一個相對弱勢、受壓制、羞辱的邊緣位置。「邊緣戰鬥」也就是相較主流的弱勢位置上反制的頑鬥主義，它不落入二元對立的戰鬥位置採取正面對抗，而是以打游擊的方式開發逃逸路線。《島嶼邊緣》後期以「後正文」形構成出「反菁英的性／別邊緣」論述與「性／別運動」有相當大的關係，或者說某種程度這些論述具有推動運動的力量。

壯大弱勢者和擺脫受害者心態當然不是酷兒專有的主題，而是當前社會運動的基調，而這個基調則是從反本質、反固定認同、反絕對的二元對立而來，因為，在「我們」(受害，因此全善)與「他們」(加害，因此全惡)的絕對二元區分之下，我們受害者是不可能歡樂的，是不可能有力量的反擊的一因為，如果我們有力量而且是歡樂的，那我們怎麼會是受害者呢？一而在二元對立的受害邏輯的思考下，那些在現實體制夾縫內流竄、違反道德秩序、卻因此可以歡樂愉悅甚至有力量反擊的弱勢者，就被視為體制的共犯、被洗腦的內奸，而不是新抗爭力量的資源、新的可能選擇出路。換句話說，二元對立的固定認同區分固然在某個程度上開啟和培養敵我意識，但卻也同時扼殺了在歡樂愉悅(而非妒恨)中壯大自我的道路，排擠了那些不以自抑和悲情為抗爭基礎的主體。這些可以找到愉悅與力量的主體，通常不會是清純的大學生或知識分子階級，這些愉悅有利的主體通常也只具備了少許素樸的性／別意識，但是其逾越性／別規範的行徑卻常常遭到熟悉性／別政治正確語言的知識分子階級的批評，後者以貶低這些逾越／愉悅／主體為「模仿複製父權異性戀」、「強化共犯結構」、「政治效果不明」、「仍然依賴主流符碼」、「個人有限的顛覆難逃龐大結構的決定力量」等等啟蒙姿態的修辭來繼續維持自身為全體同志和女人代言的位置。(而這些修辭從來不會被運用到自己身上來反省自己的「政治正確」)。(卡維波／甯應斌，1998：40-41)

而女人國的妖言及酷兒的性／別及色情國族的情色問題：婦運與同運的分歧、婦女

新知事件及裸照的內、外部爭議、酷兒運動在台離地脈絡的正當化。

所以《島嶼邊緣》面對主流正／反論述暴力壓迫，在思想、書寫、實踐上以「社運觀點」的「台灣的新反對運動」，也是「酷兒化」的「台灣的新反對運動」。《島嶼邊緣》總是以別於背反的位置對台灣當時主流的社會論述提出批判，一種反對主流也反對（主流的）非主流的論調，劃出二元對立之外的新論述空間。面對反對運動逐漸以政治運動為結盟主軸的論述，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政治優先論及地方方包圍中央的論述，提出「台灣的新反對運動」及「人民民主論」。面對民進黨欲成為弱勢反對團體的主流位置，並以族群認同取代其他差異區分的選項，提出「邊緣戰鬥」。面對本省福佬男性的爭霸論述，提出「假台灣人」；面對婦運團體以弱勢受壓迫角色爭取權利／力的悲情論述，提出「妖言／出醜文學」，並提倡女性的情慾自主。針對反對團體逐漸形成固著的主流論述，在吸納運動力量的過程中排斥邊緣或非（人爲）道德的份子，提出「色情國族」的性／別解放觀點。《島嶼邊緣》中每每揀定的邊緣位置，和其本身的政治異議立場緊密相連。在編輯「假台灣人」、推動「妖言／出醜文學」、製作「酷兒小小百科」、建構「色情國族」時所展現的動員能力和戰鬥想像，也得力於他們之前在文化評論的書寫和政治異議的抗爭經驗中的積累。

而在對抗權力集團的拉扯過程中，反抗策略的擬定及反抗團體的集結與歷史社會之間的關係為何？如何在瞬息萬變的情勢中，對社會現象擬定自身的抗爭位置及反應策略？也就是個人主體性如何面對國家權力的反抗？《島嶼邊緣》從內部、外部觀之，均是以「邊緣戰鬥」姿態對抗書寫文字中的正文及權力集團。在九〇年代初極趨二元論的社會分類下，《島嶼邊緣》的邊緣知識份子透過「後正文」的書寫策略與「人民民主抗爭」的實踐策略構成「台灣的新反對運動」的論述軸線，以邊緣戰鬥的論述及表現形式佔據台灣反對勢力的部分地盤，企圖鬆動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主流的二元分類僵化論。《島嶼邊緣》反本質僵化的壓迫也反本質僵化的反壓迫，它所站的位置是他者（Other）多元盡現的邊緣戰鬥。

小結

延續著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之後「左眼」—左翼視野—的消失，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八〇年代「民間社會」的社運路線，九〇年代「統獨二分」的選舉動員。「島嶼邊緣」拉出的是一條有別於左右二分的「泛左翼」—文化評論路線、反對國家及民間社會的「人民民主論」—以人民為主體的社會運動路線。是有別於主流、黨外媒體傳聲筒的「另類媒介」、是出版事業發展軸線下出版或引介西方理論的「本土翻譯」、是有別於統獨意識形態下的「假台灣人」論述、男女性別爭權下「同志、妖言」惑眾的跨性／別論述。人民民主的新反對運動、邊緣戰鬥的逃逸路線、後正文的書寫策略、假台灣人的身分認同、發媚亂顛的出醜／妖言文學、機器戰警共和國或色情國族的建國論述...，甚至是新左或泛左的創刊標榜、「既統又獨、不統不獨」的表態均是當時台灣主流論述二元對反下的另類宣稱。「島邊」即是「酷兒」論述在台灣的戰鬥實踐。

「邊緣」一詞若是以相對性而言，邊緣戰鬥也就是一個相對弱勢、受壓制、羞辱的邊緣位置。「邊緣戰鬥」是相較主流的弱勢位置上反制的頑鬥主義，它不落入二元對立的戰鬥位置採取正面對抗，而是以打游擊的方式開發逃逸路線。面對主流媒體及國家政權所給予我們的是一個給定的歷史身分、歷史位置，企圖在認同政治爭辯中消音其他的異議，而《島嶼邊緣》則是企圖在認同政治爭辯中，搶得眾多相異觀點的發言權，不斷地刺激活絡主體身分認同的竄流，甚至形成「精神分裂」的多重主體，藉此擺脫認同政治中趨於偏頗的僵固及定著。《島嶼邊緣》的「邊緣戰鬥」論述，不在於顯示了何種「邊緣」，而是建構「多元邊緣」的「身分認同」，並以「後正文」的自省書寫方式，不固著所建構的身分認同的「詮釋權」。也就是說，《島邊》並非「反映／應」某少數族群的聲音，而是「建構」了另類小眾的身分認同。所以一種「反伊底帕斯」(anti-Oedipus)式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的主體位置，就是《島嶼邊緣》的主體位置。

《島嶼邊緣》的文章書寫的確做到了精神分裂式的展演，但具體的攻擊成效為何？缺失為何？《島嶼邊緣》自身的成員與弱勢族群的關係為何？是否能夠提供需要積累力量的社會運動實踐可操作的戰鬥策略？如果真如何方／甯應斌強調人人都是邊緣人，邊緣不需藉由知識菁英代為言說，知識菁英應該自己就地邊緣化，不需跑去站在別人身邊。

傅大為的「邊緣戰鬥者」顯然主要是指著知識份子或運動份子。由於這些人並不是傅大為所謂的「邊緣人」(瘋子、人渣等)，所以邊緣戰鬥者照傅大為的說法是「站在邊緣人的旁邊」。其實從相對立場來看，邊緣戰鬥者不必站在邊緣人旁邊也可以成為「邊緣」，也可以是相對意義的邊緣人。這是因為每個集團或人都無可避免地有「邊緣」(即，「異質碎片、亂流、烏合性」)，只是被壓抑下去了，而像瘋子人渣之類的邊緣人則可能只是不太壓抑這種「邊緣」而已。因此，只要我們能在各自(local)的處境中發現自己的邊緣地位，就可以從事邊緣戰鬥，而不必再離開自己的處境，跑去站在邊緣人的旁邊了。(何方／甯應斌，〈就地邊緣化〉，《島嶼邊緣》，第8期：123-124)

其邊緣戰鬥的位置和後正文的策略打著「反菁英」的旗號，認為「就地邊緣化」再加上「後正文」的書寫策略，「群眾已經無須大師指點解放之路，群眾可以就地解放，就地解決，就地解散」(媽媽吉利小叮噹，《島嶼邊緣》，第6期：91)。這樣的說辭是否真能接合《島嶼邊緣》所書寫的邊緣弱勢(瘋子、人渣)？也就是能否與邊緣弱勢相互溝通，並引起共鳴？

所謂邊緣策略講求逃逸與游移的施展，不可避諱地是一種過分強調邊緣主體能動性的菁英言論，「邊緣」彷彿理所當然沒有中心、沒有本質、並可自我證成，忽略了歷史結構變遷下的物質性基礎條件。並且，「邊緣」一詞在知識份子站在菁英位置說邊緣時被無限上綱，也逐漸有了「邊緣驕傲」的行徑。

早先我們在進行所謂的邊緣政策時比較沒什麼人注意，而今天我們在做這些「邊緣策略」、「邊緣寫作」時必須特別小心，應該避免所謂的「邊緣驕傲」、「邊緣衝動」的心態。就是認為「邊緣」一定是對的，是自我證明的，隨便你愛怎麼搞都可以。但近幾年我比較不認同這樣的作法，而認真去思考「邊緣倫理」的問題。而在這裡所說的「倫理」並不只是道德之類的東西，

而是相對立於「邊緣驕傲」；並不是想怎麼玩、自己玩的爽就可以的，因為這中間可能會產生相當大的問題，這也是我今天提出來與大家討論的原因。

...解嚴前後到今天，從我回國到現在約十年的時間，我看台灣的文化運動及邊緣策略、書寫的發展至今，它的邊緣效應似乎是愈來愈小了。我覺得台灣社會現在要做一些具有批判性、邊緣性的東西應該要更細緻地思考它的作法。因為台灣現在學術、社會、經濟各方面的發展和十年前比較起來是非常不同的，在這樣的情形下要做邊緣的批判與挑戰就沒有像十年前那麼簡單了，如果要真正有效的批判或切入的話，是需要相當的學習、研究，而不是像佛洛伊德的說法「我有壓抑所以我要解放」，就可以挑戰、顛覆一些東西，應該是要多學多看多想，才能在台灣邁入更精緻化的統治政權時完全有效挑戰。...（傅大為，1995.12.15，〈邊緣切禁驕傲〉，《POTS》，第16期：13）

立基於「身分認同」、「差異政治」的根基上，在抽象意識形態的層次翻轉辯證，實難貼近真正的「群眾」或「邊緣」，而只是學理論述上的「群眾」或「邊緣」。所以《島邊》的「邊緣、弱勢族群」在文本當中成了被挪用書寫的對象，但卻是一張張沒有面目、模糊不清的臉孔。就地邊緣化的策略的確打破某種知識份子與邊緣人的位階或說差異關係，某種程度解放了「邊緣」的意義。然而這種對於「邊緣」詞彙意義上的操弄，就如其所指稱的是「知識菁英」層面的就地邊緣化，並非其他層面的邊緣人所可以操弄的，《島嶼邊緣》當中知識菁英的性格也在「後正文」策略中一覽無疑。

吳永毅：但事後看這個策略是錯的，其實你這種搞法還是很菁英。你可能搞到很前衛的菁英，不會是主流的，譬如說馬永成、羅文嘉不會來看，但可能是黃孫權這種菁英會靠攏，那像一般學生根本就不知道你在幹麻。(笑)(陳筱茵：可能就只是覺得很好笑)甚至覺得你太怪了！這當然是事後這樣講，如果你問我當時為什麼搞後正文，就是說想要把它搞成通俗、好玩一點，就是想講的路線、方向其實沒那麼僵硬、難以理解。至少當時我是有點這樣的想法。那卡維波(甯應斌)會用比較文字的方式，在《台灣的新反對運動》那本書去弄。那我在《島邊》比較積極，用一些圖像式的，當時年輕人比較習慣的思考方式去把他的東西做得有點像圖像式的。那他事後把這些東西都有點理論化了，那還不錯麻！功力蠻高的！那當時我有幾方面的想法，一個就是說考慮讓那些理論的論述比較有通俗、好玩的面貌，包括辦活動也可能是這樣。像王蘋就會把它執行成文化跳蚤市場那樣。就是說它有一個比較可親的界面，讓這些東西可以跟一般人接觸。這成不成功我覺得是另外一回事。雖然事後來看，它還是太菁英了！可能跟以前的學術菁英不一樣，但它成了前衛、另類的菁英。那一般的學生也接觸不到，都是事後看的。那另外一個就是說，卡維波(甯應斌)事後把它理論化，因為從我們這種角度就是有點看不太爽，我們就搞它一下：「哪有那麼深，不過就是這樣而已！」那可能從其他人的角度是說：「這樣搞有點太過火了！」我覺得裡面也含了很多東西在。可是最後的反應我覺得還是有點菁英，還是用很菁英的方法去反它這樣。(20060719)

《島嶼邊緣》在第8期中更刊出陳瑞麟的〈後正文策略有效嗎？〉一文，質疑後正文反菁英的有效性。除了點明「後正文」策略自身的菁英性格，也對於「後正文」的自我顛覆導致其自身「反菁英」的論點也難以彰顯。在編者與讀者的不對等關係中，「『反菁英』的後正文」反成了「『另類』菁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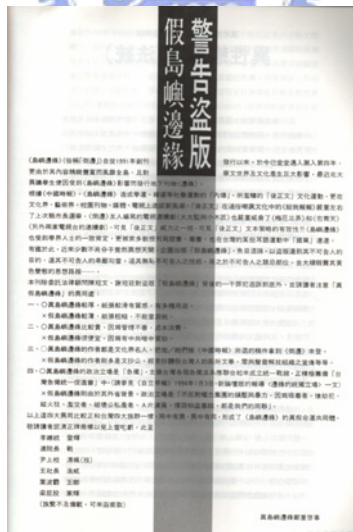
...一些批評者卻懷疑後正文策略是否有效？一種懷疑是解放慾望的部分真能顛覆嚴肅權威正經的部分嗎？另一種其實是擔憂解放慾望的部分對權威正經的訊息造成了「喧賓奪主」的效果，何方(甯應斌)則以為這種擔憂不啻暗示了後正文策略的有效性（為什麼？解放慾

望?)。現在,我要提出第三種質疑:人民民主論的持論者是不是真以為他們理論已在讀者間有了權威地位,已成功地帶給讀者間有了權威地位,已成功地帶給讀者「菁英意識」?或者人民民主論的持論者相信自己的論述力量強大到足以在讀者閱讀的傾刻,即對他們施以權力之迷藥,當下使他們相信人民民主論為一更客觀深刻之真理,故得迫不及待地用後正文來自我「顛覆」、「自廢武功」一番?

...反菁英主義者的想法:主張不能有脫離歷史、脈絡、地域、現前處境的一種絕對客觀真理,並且向讀者傳遞此一訊息,或許是對的;當一個論述形成主流、權威論述而伸展其權力時,對它進行顛覆可能是對的;當宰制者將魔手伸展至弱勢卻有潛力的論述而加以利用時,採取逃逸路線和宰制者頑鬥也可能是對的;可是如果一個從邊緣發出尚不見其躍居優勢主流跡象的論述,突然自以為已是權威而有必要自我顛覆時;一方面宣稱要爭奪詮釋權,一方面又同時宣稱自己的詮釋不比讀者已知道的、甚或自己所批判的高明時,這不免就令我們難以理解了。(陳瑞麟,〈後正文策略有效嗎?〉,《島嶼邊緣》,第8期:113-118)

《島嶼邊緣》的後正文策略在「女人國·家(假)認同」及「酷兒」和「色情國族」這幾個專輯(相形之下)的「暢銷」,看似蘊含著以女性、酷兒、同志的弱勢驕傲論述接合了讀者的共鳴,比起其他的專題有實際對應的群眾,但《島嶼邊緣》最多兩千本的銷量,仍只能算是「小眾刊物」。其鋪貨銷售地點多為誠品、唐山書店和校園書房,與一般書籍相較流通性並不高,群眾難以近用接觸《島嶼邊緣》。更重要的是,對於《島嶼邊緣》的文本論述,讀者必須具備某種程度的學識水準方能閱讀理解,所以讀者多為年輕的知識分子及運動工菁英/小眾取向的位置及緣》就是要顛覆這種對文後正文策略自我顛覆其論書寫策略,最後流於論述積極批判性,落入一種理自賞,成了「反菁英」卻

《島嶼邊緣》從初期介,後將理論論述轉為批台灣人」、「女性妖言/出兒」、「色情國族」...等的緣》這個符號具的自我架段、零碎、抽象、無厘頭貼近台灣當時的時空脈絡而衍生的操弄。而也就因為過於貼合現實社會政治情勢的特性,所以這些具政治性批判的嘲諷,在抽離時空脈絡後的閱讀,往往只剩下戲謔讓人批判它的虛無,漂浮的符號具更難以連結其意義,論述的生成更難以積累其批判的能量;但這樣的結果卻又是《島嶼邊緣》所企求的,不固著、不封閉其論述意義,成了一群自我標榜為「垃圾精英」與「學院敗類」的高度自主且高度自慰的表現。



作者,更點明其本身也是論述方式。雖然《島嶼邊本優勢型的解讀,並常以述,但過分施展後正文的的形式性,而喪失論述的論引介及菁英論述的孤芳也偏離群眾的菁英。

西方泛左翼理論思潮的引判武器,並在後期形構「假匭文學」、「同志 Queer 酷另類身分認同。《島嶼邊空,並非只單純玩弄片的後現代風格,而是極其

政治的看，後正文策略到底是「自爽」還是有效？是否把相對進步的「可能同志」當成了主要敵人來打？國際在地主義是輕忽歷史現實的道德宣稱還是可能的實踐策略？糾葛的左右統獨族群的情緒矛盾－歷史的記憶的身體的多重銘刻－成了自我／互相檢驗的標尺，總有些人是漸行漸遠了。而當〈島邊〉及其份子有漸成流行論述（你可以說是烽火遍野）與媒體寵兒（你可以說是既愛又恨）的可能時－即使用了許多掩人耳目卻欲蓋彌彰的分身化名－似乎也到了必須換血雜交的時候。

看著〈島邊〉長大的孽世代，對島邊是存有一份奇特的感情的。它一方面勾連出一個與世界基進思潮同脈的後現代跨國學術場景，讓我們的身體早早銘刻了超國族的血緣與解構顛覆的姿勢。一方面在腳踏身席的土地上，我們也看見這些基進者所採取的「邊緣戰鬥策略」，是如何側重、放大了知識份子選擇「論述實踐」的自由度，而相對削薄了結盟的厚度；又由於自覺地遠離／逃逸各種可能形成新的權力中心的誘惑近身，在「反宰制」結盟陣線之前，總要面對社會邊緣團體「階段性優先」的殷切期盼，甚至嚴厲質詢。因而可以成為我們的叛離起點，參照座標。（〈孽世代看〈島邊〉不死〉，1995.11.24，《POTS》，第13期：3）

《島嶼邊緣》每個特輯都在台灣社會中佔據不同的位置發揮影響力，故也難以對島嶼邊緣給定一個僵固的政治、文化定位。在「邊緣戰鬥」的位置上以「後正文」的書寫策略，重構讀者的思考邏輯並刺激閱者產製詮釋意義，並以台灣新反對運動為名提出頑固運動亦即「邊緣戰鬥」的方式來反抗權力集團的掌控，更進一步以「人民民主論」來修正民間哲學的公共論述，提供社運團體實踐的論述基礎。而當「前衛」、「邊緣」、「後正文」逐漸成了一種形式的彰顯，而沒有可以接合的意義時，喪失了其原有顛覆體制的流動性。並且以一種知識菁英方可操作、方可理解的策略現身時，一方面「人民」之名被挪以為用、被隱身了，不可避諱地成了一種遠離群眾阿 Q 式的自爽。

第四章 島嶼邊緣變奏曲

歷史不是一條不可違逆的直線進程，而是眾多社會力激盪出的癥狀冒發。基於這樣的史觀，《島嶼邊緣》的崛起及消逝都並非是必然性的歷史，而是一連串的選擇構成的決定，是一個經由串連、妥協的變動過程：在解嚴後的台灣社會中，異軍突起的《島嶼邊緣》以結合社會運動之姿，建構基（激）進的文化論述，向主流霸權爭奪文化詮釋權。但在逐漸開放、解禁的政治、經濟、社會背景下，《島嶼邊緣》在九〇年代初期眾社會力撞擊出的崛起，卻也注定日後眾社會力撞擊後只能成為眾聲喧嘩的背景音之一，而在外部及內部的多方角力拉扯下，也促使《島嶼邊緣》在九〇年代中期的消逝。

4.1 變形戰鬥—論述軸線的移轉

《島嶼邊緣》的發刊是延續「戰爭機器」在《自立早報》和《民眾日報》...等發言空間上，以言論批判國民黨執政權力的壓制，迫使國民黨執政權力的退讓或政策的開放為主；並面對解嚴後台灣社會的多元紛雜，試圖打破李登輝的執政權對國民黨的內部重整，及（國、民）政黨政治的二元對立導致社會論述趨於極化下緊縮的言論空間。而《島嶼邊緣》主張其「泛左翼」的論述立場，卻也是以「引介西方思潮」、「邊緣發聲空間」為前提的。本質上它是一個另類的思潮評論雜誌，開創另類的編輯模式、編撰內容及書寫形式。在面對外在政治情勢的變化及社會論述遭統獨對立詮釋的壓制下，一方面藉由思潮引介，多元化台灣當時的思想論述；另一方面則藉由理論形構，正當化另類邊緣的現身／聲；並採取多方串連社會運動組織、團體，藉以開啓主動實踐理念的其他可能性。

《島嶼邊緣》這個刊物的宗旨或精神可以說並不會有本質性的改變。但 14 期發刊當中看似呈現編輯主軸的轉移，初期著重引介西方理論的翻譯及導讀，逐漸在第七期以降轉為自製理論及自製寫作比例的增加。第 8 期「假台灣人」—由吳永毅、鄭村棋、王墨林、何方（甯應斌）主編，是累積之前「台灣的新反對運動」和「機器戰警共和國」而來的政治性論述。第 9 期「女人國·家（假）認同」—由平非（王蘋、丁乃非）主編，與女同志刊物《愛報》第 1 期合併發刊，強調女性及女同志的情欲自主。第 10 期「酷兒 Queer」—由紀小尾、紅水鮮、蛋糖膜（紀大偉、洪凌、但唐謨）主編，酷兒文學的翻譯小說和酷兒小小百科的製編，帶入同性戀和酷異的跨性／別。第 11 期「民眾音樂研究初探」—由張育章、張釗維的另翼岸譜讀書會編撰搖滾、民眾音樂等的理論翻譯文章。第 12 期「保衛阿圖塞」—由王浩威主編，多篇引介 Althusser 理論的翻譯文章，稿源主要是《南方》第 2 期被撤換的稿件。第 13 期「激進神學」—由卡維波（甯應斌）為主編（何春蕤協力），延續在《當代》的「激進神學」專題舊有累積的相關文章。第 14 期「色情國族」—由新斜人類五人小組（甯應斌）主編，開創以邊緣弱勢串聯的國族認同。

《島嶼邊緣》軸線的轉移，可以說是從「翻譯、引介西方理論思潮」轉向「性別解放的後正文風格」。視其這項轉變，促成因素並非是《島嶼邊緣》內部的權力爭奪；更正確的說，《島嶼邊緣》創刊開始，「翻譯」和「後正文」的文章均是主要刊登的文類，

而後期「後正文」類的文章版面和專題期數的增加，比重開始多於「翻譯」類的文章和專題。所以並非軸線的分殊或斷裂，而是文類比重的增減。這個趨向將從客觀大環境面對「六一二版權大限」影響「翻譯文章的減少」；內部「專題編輯制度的特點」影響「後正文文類的增加」來加以分析。

4.1.1 智慧財產權 301 條款／六一二版權大限的政策影響翻譯文章的減少

1992 年 6 月，《島嶼邊緣》發刊中期，台灣在美國的強大壓力下修訂了「著作權」法的條款。《島嶼邊緣》秉持著邊緣戰鬥的姿態，在 1993 年 4 月 22 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上發文起義連署，並將敦誠（馮建三）所撰的〈聲明：知識自由流通〉一文刊登在《島嶼邊緣》第 7 期的「島嶼紀事」中，串連批判著作權法的訂定，為美國知識生產體系變相對台灣課徵知識稅的惡行。

〈聲明：知識自由流通〉（敦誠／馮建三，《島嶼邊緣》，第 7 期：3-5）

第一版本：反對知識稅

1992 年 6 月，在美國利益的強大壓力下，台灣大幅修訂了著作權法；今年入春以來，雙方再就著作權協定的八項保留條款、真品平行輸入及有線電視法的問題，展開談判。

在這過程，我們察覺這個總稱為所謂『智慧財產權』的法律，矛盾叢生，再次顯露了當今經濟體系、國際之間與一國之內的弱肉強食定律；而雙方交涉期間，台灣官方也暴露了自身的顛預，無能保障我國民眾有效而合理使用資訊的權利。

我們是文化工作者，經常引介西方具有批判現行社會體制的知識，期望能夠對於這個島嶼改造，略盡棉薄，因此專就這個台灣及美國雙方之國家機器共同塑造之著作權法，為什麼對於引介西方批判性知識於台灣，將產生惡性影響，提出簡短聲明及因應之道。

這個著作權法，必定造成生產批判性知識的成本之高漲，而生產成本既然提高，消費金額亦必然相對爬升，其終局結果，很可能遲滯台灣社會消納，並進而生產本地批判性知識的契機，不利台灣社會的興革。

我們因而主張：

爭取自由翻譯批判性知識的權利，版權費只需適量給付。

爭取批判性知識之強制授權翻印，版權費只需適量給付。

批判性知識必須能夠真品平行輸入。……。

以上主張，基於兩項認知而來：1. 著作權法本質是政治經濟的問題，與道德無涉；2. 知識應自由流通，這是美國一向堅持的原則。

第二版本：不要掐住知識的脖子……。

面對六一二大限和三〇一條款造成原文翻譯權和圖片...等著作權的不易取得，但《島嶼邊緣》在學術的翻譯資源仍獲得國外學術期刊《每月評論》和《新左評論》及國外學術出版社 Verso 的支援：

這一次著作權公佈以後，國內的報紙或雜誌都受到了衝擊，《島嶼邊緣》也是如此。整個編

輯方向的調整，使得我們這期的出刊來遲了。在本期，翻譯的作品減少而原著增加了，有關台灣的討論成為我們的主要方向。新增加的「島嶼紀事」（對台灣社會事件的分析和「邊緣評論」（對最近任何創作的評論）就是其中的例子。「違章學校」是校園問題的討論和好作品的連載；「國際檔案」則是對當下情勢的紀錄和深入報導。

至於以前一直受到大家矚目的學術翻譯，在符合著作權法的情況下還是會持續努力。尤其《島嶼邊緣》這幾期的努力已經開始獲得相當的迴響，數家國際知名的思想期刊允諾我們無限制的翻譯權，包括《每月評論》、《新左評論》、和 Verso 出版社等。（《島嶼邊緣》第 5 期：2）

但對於翻譯其他批判理論著作仍有版權協議上的困難（授權及版權費），導致理論翻譯文章的減少。所以翻譯和引介類的文章在《島嶼邊緣》後期的版面是「量的減少」，而並非消逝。而因應此類稿源的空缺，則必須增多自製理論／評論文章的比例，增加「島嶼紀事」和「邊緣評論」...等單元，也希望論述可以更貼近台灣現實脈絡的分析，並開放外來團體的進駐編撰。而外來稿件及自製寫作比例的增加，也造成《島嶼邊緣》前後期風格的改變。

姚立群：我們跟美編也會開始比較在意（智慧財產權）這個問題。除了文字還包括圖片，以前都可以接受隨便 Copy 放上去，甚至後來有些太常看到的圖就也不要用了，也會拋出這樣的問題。身為編輯，我就開始覺得不太好編了，而且到後來大家愈玩愈...，蒐集愈來愈多圖片...，後來到第 10 期酷兒那期，我甚至自己寫「圖說」。有的圖說是寫照片人名或書名，而後來的圖說幾乎整本都「後正文」了。（20050829）

所以後期面對翻譯外來理論版權爭議的同時，迫使《島嶼邊緣》加速自產理論和在地實踐策略。而《島嶼邊緣》的編委們原本對「後正文」策略採取的是「接受但不投入」，但卻也不得不使「後正文」從邊陲文類成為主要刊登的稿源。而「後正文」何以成為後期主要的論述軸線？則與《島嶼邊緣》採取「專題獨立的編輯制度」有關。

4.1.2 專題編輯制度影響後正文文類的增加

《島嶼邊緣》以「專題主編」的編輯制度，一方面是去除編輯中心，以廣納議題的流動性，也致使沒有一固定的編輯團隊長期投入提供稿件；另一方面其偏向「同仁刊物」的性質，編輯成員無編製刊物的強制性，文章在《島嶼邊緣》的刊載也無社會、學術聲望和商業利益趨向，都導致《島嶼邊緣》稿源的不穩定性。所以也在第 3 期開始廣邀各方稿件及其他編輯團隊的進駐，一方面也顯見《島嶼邊緣》的多元含納性，也並非以「翻譯、引介西方思潮」為不變的刊物軸線。

而內部專題編輯採「去中心化」的編輯制度，沒有總編輯，也沒有一固定的中心思想，每一期就是以專題編輯的方式運作，促使專題的以專題主編為主的「個人風格化」，並隨著每期不同主編的操刀，也形構出《島嶼邊緣》無定性的特異風格，故也難去定位《島嶼邊緣》。

所以後期《島嶼邊緣》論述的轉移並非權力的推擠，而是由於論述軸線和風格的「呈現」是與投入編務的「勞動力」成正比。也就是說由於採取專題編輯制，專題主編在編輯專題權力的無限上綱，使當期編輯呈現強烈的個人編輯色彩；而後期由於多為「後正

文」色彩強烈的編委（吳永毅、王蘋、丁乃非、甯應斌、何春蕤...）擔任專題編輯，故也使「後正文文類」看似成為主要軸線，加上在後期「翻譯文章」的銳減，也促使「後正文」文章一躍成為主要刊登的文類。

而「論述軸線的轉變」也並非單純的文章文類的增加多寡，背後實際拉扯著《島嶼邊緣》編輯成員在九〇年代之後政治經濟社會的轉變下，個人的心理轉折、刊物想像的差異和投入程度的轉變。

4.2 《島嶼邊緣》的曲終人散

泛左翼的、進步的、文化的評論刊物—《島嶼邊緣》在九〇年代的起落已是個歷史，也是個突兀的癥狀。《島嶼邊緣》這個符號具對不同世代、不同族群的人代表著截然不同的符號意義。它的崛起讓霸權結構的當權者跳腳；而它的消逝讓曇花一現的邊緣弱勢感嘆。而對於曾經參與其中的邊緣知識份子，《島嶼邊緣》的停刊是邁向下一階段的動力來源；也可能是個絕口不再提的痛苦禁忌。

蔡其達（筆名 晏山農）：我最後大概 93 年之後，就慢慢慢慢比較少參加，一方面開始要為了工作。因為我本來在《中國論壇》，後來《中國論壇》在 92 年 11 月停刊之後，有一段時間我沒有工作，就拼命寫稿，幫《自立早報》寫稿。到了 93 年還有參與，但到了 94 年我去「人間副刊」工作，那因為上班的時間是在晚上，所以後來《島嶼邊緣》的會，我大概就沒有辦法參加了；所以大概在 94 年之後，我就慢慢慢慢淡出了。然後到了 96 年 3 月 17 日這一天，王浩威打電話給我，告訴我說大家討論的結果，《島嶼邊緣》要準備停刊。其實在 95 年 11 月的時候，就要想要提出停刊，但是大家並沒有正式的共識，所以又拖了好幾個月。（20051015）

姚立群：差不多是在第 12、13 期的時候。那時候就開始察覺到，《島邊》不是要改變，就可能會停刊了，那我就開始慢慢把一些問題丟出來反應。那大家的生涯規劃在那個時候也慢慢的在改變了吧！雜誌也是人編出來的，也是他們的心血，從雜誌的分佈也就可以看出他們各自在忙些什麼事情，處理這個編務的態度也都各個不同。最後一次會議就在決定要不要繼續，因為最後一期之後就拖很久都沒有再出。我就說：「因為我手上還有些稿子，如果要出的話，我們就可以拿什麼東西來出；如果你們都沒有人要再出的話，我們也要對讀者作個說明」。那天很簡單。在「婦女新知」開會，大概有十個人左右，那時候後來開會人都比較少了。那天很快就決定這件事情，因為我之前都大概溝通過要談什麼問題。那時候已經剛編完十四期，老卡（甯應斌）、小何（何春蕤）都在。王浩威是比較傾向繼續做下去，可是那時候陳光興是比較不傾向繼續做下去的。我跟大家說，如果你們現在都拿不定主意，那你們還可以再想一下。但是我一定會做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寫一封信給讀者，告訴他們會先暫停。因為你們現在也拿不出東西來，那我也沒有東西可以編，所以我們會先暫停，我會先把錢退給他們，整理所有雜務的事情。萬一我們都沒有人再動，那我們就不要再出了。這樣的處理是比較清楚的。因為我們還有一些地下性格，所以這樣也還好，這問題也不難，我只要去幾個經銷點去結清。唐山是最多的。庫存一下子放在王浩威家，一下子放到破報倉庫，有一期還有登郵購《島邊》。（20050829）

何方（甯應斌／筆名 卡維波）：大家只是不想要停刊吧！但這種東西誰能做？大家就覺得不要停刊，就做出一個結論就是「不停刊」，做完「不停刊」的決議之後就講說「不停刊的話那怎麼辦呢？」...那麼還是「停刊」，因為搞不動。（20051012）

馮建三：停刊也沒有什麼太多的「衝擊」吧！就覺得果然停了啊！真是不容易耶！現在才停！因為我們只捐過一次款，後來錢不知道誰去張羅的。其實我也不太記得了。前前後後都有開過一些會，開會也不確定是不是因為《島嶼邊緣》？在怎麼樣的情況決定停刊，我已經沒有印象了。我只記得中間有討論過這些問題。（20051028）

原本作為企圖擺脫經濟結構控制的進步刊物—《島嶼邊緣》，在歷經 1991-1995 年的時間發行了 14 期後，1996 年在「婦女新知」辦公室決議正式停刊。

《島嶼邊緣》停刊的原因，一方面來自經費的拮据。但資金的欠缺是從創刊時期開始一直存在的發刊困境，初期經由編輯成員自力救濟的「認捐」，陸續接受讀者的訂閱費用和微薄的廣告刊登費用或者其他的捐款...等的資金收入來維持發刊。

姚立群：經費也是一個問題，因為也沒有什麼經費。訂戶也還好，一刷差不多一兩千本。最後《島邊》償還訂戶完後，還有剩下一點錢。王蘋算是我們的財務長，(之前一直是放在蔡其達的名義下)，她就去把它都領出來，因為那個帳單資料什麼的都會寄到婦女新知。後來王蘋她們都離開「婦女新知」，成立「性別人權協會」，所以她就說不要再把這些東西寄到那邊去了，因為沒有人在那邊了，所以就乾脆領出來算了。好像還有七萬元。我出國前我還跟大家提過幾次這件事。我出國後在日本遇到陳光興也跟他說過我們還有七萬塊錢。(20050829)

蔡其達(筆名 晏山農)：其實一開始，我們經費都很欠缺，因為每一期就我當時所估計的都要十幾萬，印刷至少都要七萬多的費用，像第一期就九萬多，然後要付給執編每個月一萬元，然後一開始還有稿費，不過後來基本上就沒有了，還要付黃瑪琳美編的費用，所以每一期都至少要十五、十六萬。所以錢是從一開始都很欠缺。其實陳光興後來管道比較多，所以可能募到不少錢。當然錢可能是導致《島嶼邊緣》沒有辦法再繼續的一個因素，但不是絕對的。因為缺錢是從一開始，但每一期都還有辦法撐下去，重點是後來沒有人去保有那個熱情去投入，所以到了第 14 期之後，就只好宣佈解散了。(20051015)

萬胥亭(筆名 路況)：《島邊》一期大概印個兩千本吧！量不大，但是銷售量也都還好，所以後來會停，也是因為找不凝聚力，因為也不是經濟上的問題。後來遇到楊明敏，他到法國唸書回來後比較熟，他講說《島邊》停刊很多年後，有個出版社願意幫《島邊》重新出版，好像是巨流(這個我是聽說的，倒不敢確定)。但我想主要還是「人」的問題，要這些人重新出來一起辦雜誌蠻難的。一方面辦雜誌要少數幾個核心的人自己來維持正常的運作，另一方面要有夠廣的人脈來提供稿子，像《當代》那樣。但是《島邊》不太有人能夠當專業的「主編」，就算找到這樣的人，也很難像以前一樣找到各路人馬還提供稿源。(20050924)

由於停刊決議並清償讀者訂閱費用後，《島嶼邊緣》仍尚有七萬元的剩餘經費，所以顯見並非因經費的透支甚或負債而決議停刊。雖然與唐山出版陳隆吳的帳務不清，實際也壓迫到《島嶼邊緣》的經費收支。經濟的拮据的確是也一直是個問題，但並非是促成停刊的決定性關鍵。停刊原因在撇除經濟的決定因素後，就必須從其他社會大環境和人的面向來探究。

在黃孫權〈大雜燴—綜合性文化刊物〉一文中，可以顯見《島嶼邊緣》的停刊主要在於：採「專題獨立式主編」，故刊物無固定主編的統籌擘畫；「論述的轉向」，軸線由理論翻譯轉向後正文風格；「各自陣線的經營」：成員在各自陣線上逐漸各據山頭，也切分參與刊物編務的時間、精力...。

〈島嶼邊緣〉兼具第二類(學術理論)與第三類(同仁誌性格)的特性，創刊於民國八十年十月十五日，名義上的發行人王浩威，每期專題由不同的人負責，內容主題不定，由早期左派、理論性的文字轉變成關注於性別、酷兒、音樂的後正文風格。〈島嶼邊緣〉幾乎召集了台灣激進的年輕學者投入，以一種編委的方式執行製作，在停刊之前，共出 14 期，也幾乎處理了台灣社會流行的異議問題。由於它召集了年輕學者的投入，在學院裡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力，遲緩了學子對於主流媒體「進步」的感覺，同時造就了許多學院明星，各據山頭。島

邊停刊是自我解散的宿命，當編委們在其他場域、媒體空間發言愈發容易時，就注定了它的歷史命運。(黃孫權，〈大雜燴－綜合性文化刊物〉，《POTS》1996.7.26，第47期：22)

承上並總結第二章所談到《島嶼邊緣》的聚集是因為「台灣當時的政經情勢」、「《島嶼邊緣》的編輯運作模式」、「人脈串連的多元性」。而「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當上述原本促成以《島嶼邊緣》為集結的力量逐一轉變並出現罅隙時，反倒為促成《島嶼邊緣》停刊的力量之一。

4.2.1 外部政治經濟社會的發展變遷和生產條件的轉變

原本亂、後現代、解構、片段、破碎、零散、精神分裂、多重人格...等是解嚴前後威權轉化的動盪社會情境，並影響著政治經濟重組的結構條件。但蔡詩萍（1995）針對九〇年代「文化」的空間及發展，在台灣政治經濟變遷下，因市場利益導向而逐漸「商品化」的現象提出針貶。自也說明了在九〇年代初期，《島嶼邊緣》面臨當時政治、經濟壓縮發展的困境：

八〇年代台灣文化風貌逐漸成顯的激變氛圍，追根究柢導源於政治力的消退與經濟力的介入，這種轉變說明了台灣的文化發展比較能擺脫政治意識形態的包袱，保留文化論述情境（situation of discourse）的相對自主空間；另一方面，則也透露了未來台灣文化的動向，極可能落入市場律則的商業化導向，文化工作者面臨的困境將是資本主義體制裡那隻看不見的手。在這段解脫政治力支配而過渡到以經濟力為主導的激變時刻，文化人的角色顯然尷尬。就常理判斷，昔日藉政治力主控文化議題的時代既已結束，文化的意見市場自該繽紛滿目，大家都能有話要說。實際上，卻由於左右文化產品之市場的機制，逐漸被利益導向牽制，普遍的「有話要說」環境未必都可取得發言優勢；尤有甚者，當長期扼殺文化生機的政治力退卻後，文化界反而彰顯出捉襟見肘的貧乏面。這種貧乏面一則赤裸裸的暴露台灣的文化土地，久經政治傾軋後自發性生機的傷，面對激變中的文化氣候，頓然失措找不到依循方向；再者，更暴露了文化發展的泛政治化偏異走向，因為過去政治意識形態與文化議題的糾纏不分，反激出當前文化討論的「再政治化」，嚴重窒礙了想像力的萌生。（蔡詩萍，1995：20）

1. 政治力的發展壓縮邊緣發展的空間

解嚴之後，國家威權解嚴後統治手段開始轉為柔軟化，由高壓宰制控管、暴力鎮壓的手段轉為逐步解除禁制、民主開放的運行來收編反對力量。國家政權及政治反對力量加深「統獨」意識形態操控、動員人民，並雙雙轉以選舉作為角力戰場，進入議會制度來爭奪權力。

九〇年代初期為李登輝的執政時期，一方面經由「野百合學運」迫逼「萬年國大的下台」，及任郝柏村為閣揆後拔除其軍權，贏得「主流-非主流」鬥爭後，在黨內取得黨、政、軍系統的掌控權，逐漸建立起以他為中心的統治權力；但另一方面真正能給予李登輝合法統治正當性的，則是來自於群眾與民進黨的「李登輝情結」。也就是說，解嚴後李登輝的執政時期，一連串國民黨的轉變及對憲政體制的開放...均和「省籍情結」的操弄相關。

基本上，「野百合學運」在李登輝接見學生代表後，學運的結束也伴隨萬年國會的結束，日後停止「動員戡亂」（1991年）、廢除「刑法一〇〇條」（1991年）、推動「總統的直接民選」……等，對群眾而言，已為其抹上追求民主自由和台灣人執政的色彩。而萬年國會的改選，更使李登輝一方面卸除萬年黨國大老和「非主流」（以外省籍為主）的政治權力，另一方面建立新政治勢力（以本省籍為主）的支持以鞏固其統治位置。所以在國民黨內部主流、非主流的鬥爭中，李登輝以「本省籍」的出身，突破長久由外省人所佔的政治優勢地位後，攫取了台灣七成左右福佬人的情感認同。「李登輝」並成為福佬人自國民黨撤退來台後，經歷不平等壓制的宣洩出口及投射對象³⁷。

而「李登輝情結」更讓李登輝得以「借力使力」，藉由本土化和台灣獨立的意向，動員部份社會運動的能量掌控政策議題的風向，迫使國民黨內部的舊保守勢力釋放權力。所以從1989年的地方選舉和1991年的國大改選和總統直接民選的修憲，屢屢看到的是社會運動遭到政治運動的動員，和社會反對運動的無主體性。連從黨外突破國民黨壓制組黨及衝撞解嚴體制的民進黨政治反對力量，在李登輝開放民進黨競逐國會代表的選舉後，面對國民黨尚多未解禁的政治禁制，都因其李登輝「本省籍」的身分，反而顯得捉襟見肘、踟躕不定。所以被標上「台灣本土化」身分認同的李登輝，對以「台灣本土化」、「台灣獨立」為號召動員力量的民進黨，被擺置在「亦敵亦友」的位置，並影響以民進黨為首的黨外反對力量的衝撞力道。

而1993年4月台灣與大陸雖在新加坡展開「辜汪」會談，開啓國共內戰後兩岸對話的空間；但中共在1995年7月第一屆總統直選的選舉期間試射飛彈，造成兩岸關係一度緊張。而當時李登輝進一步轉為「台灣本土反共意識」的操弄，以贏得1996年的總統直選，確立了李登輝具「民意基礎」的執政權力正當性。

而其間民進黨形構族群論述和挪用對抗國民黨政府的「民間社會論」，改走群眾選舉路線。民進黨逐漸以「政治優先論」削弱及單一化人民弱勢、邊緣、反對力量的出口。民進黨並以「四大族群」和李登輝的「生命共同體」，聯手打造「新國族」論述。更在1994年的北高直轄市和省長直選中陳水扁競選台北市長，運用省籍、族群動員，社運人士被迫下「政治選擇」。民進黨的陳水扁當選台北市長之後在拆除違建和反公娼的議題上對社會運動和弱勢團體的壓制，也均引起爭議。

而在政治上兩黨政治原以「反共、民主」為名推擠出政策的開放，逐漸轉向以「省籍、族群」為名爭奪資源的分配；社會論述被迫迅速「選邊站」，沒有廣泛可供討論的時間、空間，迫使文化發聲加深「統／獨」論述的深耕，排斥其他的發聲論述及空間。邊緣弱勢的啞言嚞聲與統獨論述的大鳴大放明顯不同調。而進步的反對力量面對社會運動主體性的喪失，卻因「政治選擇」的差異，無法凝聚共同的發聲出口，也造成個人在原本陣線上選擇性的結盟和拆夥，組織戰線也逐漸呈現分裂和異質化。社會反對運動的力量分殊化，與政治反對力量的極大化明顯成為反比。

³⁷ 其後，這個「台灣人出頭天」的角色可說是由「台灣民主之父」—李登輝在2000年的總統大選後承接給「台灣之子」—民進黨的陳水扁。

2. 經濟力的發展壓縮邊緣發展的空間

而九〇年代初期股票從萬點快速崩盤的經濟泡沫化，也迫使群眾重新投入勞動生產行列，資本主義的利益導向在解嚴後的台灣社會也愈趨顯著。

另一方面經濟開放後，進入高度資本化、商品化的消費社會，面臨後期資本主義邏輯。而商業利益的導向也間接影響媒體的生產結構，引發大眾文化中高一雅俗原創性的論戰。邊緣弱勢的次文化在強勢的主流文化中，不是被漠視、丟棄，就易成為資本主義挪用的資源，以廣告、行銷、包裝的手段製造流行趨勢，並以意識形態商品化成為慾望的對象，形成思考的單一化。

另外，一方面國際紙價的飆漲，也引起出版雜誌業的市場結構重新調整；另一方面則是商業市場導向的雜誌紛紛問世：《GQ》、《VOGUE》時尚雜誌、《PLAYBOY》情色雜誌...等。而在八〇年代曾是雜誌主流的人文、藝術性雜誌在九〇年代也陸續停刊：1996年春季《島嶼邊緣》一方面因經費短缺，一方面因人力的無以為繼宣布停刊。同時期，《誠品閱讀》、《當代》等文化雜誌也因收支問題而宣布停刊或休刊：《當代》在短暫休刊募得資金後，在1997年復刊；《誠品閱讀》則改版為《誠品好讀》。顯見邊緣弱勢自力救濟的發聲，逐漸在商業利益趨向顯得難以維繫。

在外部政治、經濟、社會大環境的變遷下，除了推擠文化和弱勢邊緣議題的發展空間，也導致《島嶼邊緣》在活動空間、資金、出版通路、運作邏輯、成員的心理狀態...等內部生產條件的轉變。

4.2.2 內部因統獨爭議及後正文的外來標籤而導致人力的無以為繼

停刊最主要的原因，可以說是人心渙散。現在，成員們各自忙碌且四散各地，不太有聚首晤談的機會，情勢和當年大家都還不怎麼有名時大不相同。況且，除了洪凌、紀大偉外，並沒有什麼可靠的生力軍進入《島邊》，所以交給新人去做也不可能。所以，在這些因素下，我們便決定於今年停刊。（王浩威，《POTS》，1996：29）

1. 人力的無以為繼

王浩威在《POTS》的訪談中提到停刊最主要的原因為「人心渙散」，這包括舊成員對編務參與程度的減低和新成員難以成為編輯核心。《島嶼邊緣》在人力的無以為繼來自於「無固定主編」的專題編輯制度和成員各自在「異質性戰線」的經營。

（1）「無固定主編」的專題編輯制度

《島嶼邊緣》採取去中心化的「專題獨立式主編」，「無固定主編」也就「無固定的刊物宗旨」。但《島嶼邊緣》的「無主」制，雖以供各方接合，但卻也淪於各自表述無以累積，並必須冒著時有的「人力欠缺」和「稿源危機」。而執行編輯姚立群的編輯角色著重在「執行」而非統籌指揮的層面，沒有固定主編專注投入編輯事務，加上稿源的不穩定性也間接造成《島嶼邊緣》慣常的拖刊和最後無法持續出版刊物。

萬胥亭：大概的情況就是這樣，好像很多人來，但重點就是說，一直沒有一個「思想的重心」，這是一個問題。實際的一個人脈連結核心是王浩威，一部份是陳光興。（但還是以王浩威為主）但雜誌的走向或思想、理念上的一個方向，幾乎並沒有領導的中心。因為王浩威只是扮演一個各路人馬的接合點，而且沒有主編，所以是沒有一個中心的一個雜誌，廣義的說好像是站在一個「廣義左派」的立場，然後介紹一些西方比較新的思想，一些左派、批判抗爭的立場。……所以整個雜誌的情況持續了兩三年，沒有主編，每一期有一個專題，針對專題有一個座談會大家討論，有很多不同的各路人馬進來，可是就雜誌本身而言並沒有起一個很實質的作用。雜誌就成了少數幾個人在作，包括傅大為、夏鑄九、婦女新知、東海朱元鴻、趙剛、王振寰等等，他們都有來參與、來開會，這部分實際上並沒有在雜誌上反應出來，就等於說背後的這些人、這些活動很多是一回事，但雜誌呈現出來的只是一小部份而已。所以分兩方來看，你今天看這份雜誌倒不能只是看這份雜誌，當中發表文章的只是少數幾個，並且在當中發表文章的跟實際雜誌這些人的關聯也不見得很大，當然最後留下的是這份雜誌。但那卻是台灣當時比較邊緣、左派知識份子比較大的一次集結。……所以實際上雜誌的文本是一回事，而參與雜誌活動的人馬集結，一種廣義左派分子在台灣的集結，是兩個不同層面的事。人來人往但在雜誌上發表文章或編專題的並不多，反而是卡維波（甯應斌）和吳永毅作的最多。包括傅大為、夏鑄九在上面也沒有寫幾篇，實際上有在寫的人並不多。（20050924）

另外前述提及的「專題獨立式主編」具有強烈的個人化風格，並不足以也不能代表「島嶼邊緣」的整體。所以《島嶼邊緣》的編輯內容呈現，只能代表實際參與編輯專題的勞動力，難以呈現背後廣大、異質成員的喧鬧竄流和參與互動。隨著刊物專題的實際發行，成員對「學術」亦或「顛覆」的編輯走向和內容論述的歧見，也在「尊重專題主編」的形式民主下，無以開啓溝通對話的空間，並自我選擇緘默或移轉。

王浩威（筆名 譚石）：大部分的人好像都沒有作，但更好玩的是一起討論一些事情，但除了雜誌之外，好像沒有什麼集體行動。不像「戰爭機器」那時候還作個專欄，因為那個時候慢慢的各自都有寫專欄，但還沒那麼有影響力。慢慢開始編了幾期以後，就有一些問題，到底是要比較學術性、理論性的去談事情，還是要顛覆的？讓讀者在閱讀過程中不舒服，讓反對黨的主流文化感到不安那種情況。那這個問題因為每個人位置不同，社會位置也不同，在當時政治光譜的位置的不同，所以衝突蠻大的。那個是很大的衝突，我不太清楚是誰擺平的。我們都一直是拖刊的，並沒有準時發刊，所以就變成說，誰有主張誰就去編一期出來，就這樣一直出刊、一直出刊，真的太多量了，再來想辦法。所以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就是沒有結論。那時候吳永毅和卡維波（甯應斌）活動力最強，所以變成很多很辦、很顛覆的東西。相對於王振寰、趙剛這些就會覺得很不舒服吧！也不只，就很多人也不舒服，但也沒有說特別怎麼樣。那後來慢慢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出現了，他們就移到那邊寫，他們就是很學術性的定位，然後也非學術，可是就是不以為這樣清楚的方式有實質的幫助，但也不反對。像馮建三這個例子，基本上他立場還是左派，也不覺得統獨是問題，可是問題是他很懷疑這樣的嘻笑怒罵是不是有意義，但他還是每期的聚會都來了，但他寫得稿子也不是很多，但他都會來。因為大家的生產力都有限，後來就變成開放給大家，應該再進來更多人，可是要麻就太年輕了、太乖了，要麻就是一心想要來顛覆《島邊》的。（笑）像「大便報」，一心要顛覆《島邊》的。不是不好，可是他量那麼大，乾脆編一個《大便報》，後來果真就有編。某一個量他如果沒有機會，那是蠻好的，但如果他量那麼多的話怎麼辦？可是你若不這樣的話，誰來編？都太...。所以只要進來，積極的像裝置藝術要佔領台灣的李銘盛，然後紀大偉、洪凌。（20051003）

而後期新進編委團隊多是 1965-75 左右出生的年輕世代為主（平行「學運世代」）：「大便工作室」的清大學生賈維平（Apple）、王秀雲；「另翼岸譜」的張育章、張釗維；「Queer 酷兒」的紀大偉、洪凌...等。這支年輕世代的人脈，在九〇年代初期以形式上「平起平座」的姿態，開始進入《島嶼邊緣》擔任專題編輯或提供稿源。編輯過程中，雖仍有「資深資淺」的衝突或者曖昧的長幼、師生關係，但嚴格來說，《島嶼邊緣》內部並沒有「世代差異」的斷裂，但確有「後繼無人」的斷裂。這些新生世代，一方面《島

嶼邊緣》並非其主要的發聲空間，是以「玩票性質」與《島嶼邊緣》作選擇性的結盟；另一方面仍難以實際被認可成爲《島嶼邊緣》的編輯核心。

而這票新生世代的加入，也標示出原有的編輯成員在世代更替中社會角色的轉變。

(2)「異質性戰線」的各自經營

〈島嶼邊緣〉正式宣佈關門了，王浩威說這是完成歷史性的階段任務，如果有空間，POTS 大概會下個：「學術明星各佔山頭，攜手合擊不如分頭進攻」的標題來紀念一下島邊。
(《POTS》，1996.3.22，第 29 期：2)

《島嶼邊緣》創刊時期的成員組成多爲 1945-64 年出生的「戰後嬰兒潮 (baby boomer) 世代」，在八〇年代末期的身分多爲年輕的歸國學者、剛畢業的大學生和研究生，或是年輕的社會運動工作者...等。在解嚴後，九〇年代初期政治、社會局勢的快速變化下，使得原本就分屬不同反對陣線的成員，隨其年齡的增長及社會參與程度的加深，必須專注投入自身的工作職業或戰線經營，難以分撥時間及精力持續參與投入《島嶼邊緣》「同仁」性質的編輯事務，或難以維持初期創刊時期的「高」參與程度。

萬胥亭(筆名 路況): 後來《島嶼邊緣》會斷也是蠻現實的，就是每個人到一個階段就有自己的工作壓力，像李尚仁(迷走)後來就出國唸書回國之後現在在中研院，王浩威自己開診所，每個人都在自己的領域發展。也就是人到一個程度也就是到了中年，就不得不關注在自己的工作領域，這是現實上的條件，所以也忙不過來，抽不出時間來一起做一件事。這也都跟當時都年輕，都離開學校不久，或還都在學校的情況不同。目前來講，這一輩人的要在一起，有現實上的困難。(20050924)

王浩威(筆名 譚石): 那個時候台灣愈來愈熱鬧，每個人愈來愈忙，認識的時候也不會想到說，自己以後有一天竟然也可以出書。像何春蕙、張小虹、卡維波(甯應斌)...這些在大眾媒體上比較活躍的人，從來沒有想到自己有一天可以很權威，或是可以做怎樣的事情。就是每個人愈來愈忙，社會運動要關注的也愈來愈多，所以每個人都慢慢的去投入在不同的圈子裡面。那種投入變得讓你很難專心去編這個雜誌。(20051003)

所以隨著個人的規劃進程，在戰鬥軸線的分化和漸成山頭，實際切割內部成員參與的時間。

剛開始，五六年前，這些學者剛回來閒閒沒事就提筆寫稿，現在每個人都忙得很，有學衛生涯要照顧，甚至忙到連互相之間都有些疙瘩、溝通不良的情況，有一陣子《島邊》幾乎要停刊，主要是稿源的問題。《島邊》很明顯的，是誰出的勞動力比較多，就是誰的風格，關於「後正文」的風格，其實就只有三、四個人比較熟悉寫法，但是慢慢地變成《島邊》的風格，好的方面是接上時代精神反應不錯，但有些人就漸漸疏遠了(特別當初夢想是新左派的人)，左的味道就漸漸沒了。這裡很難評斷對錯，重要的是，如何對社會現實做好的分析。上次《島邊》內部會議，本來也想討論上述的問題，問問台灣社會今天怎麼樣了？島邊可以攻佔什麼位置？後來因為又想到錢、想到稿子從何來，又忙，就散掉了。左派也是，一忙就散掉了。
(王浩威，《POTS》，1995.12.15：14)

另外專題主編的個人風格及編輯內容無以呈現參與現，也就牽涉到個人投射《島嶼邊緣》的刊物想像具有落差，也就是每個人期待藉由《島嶼邊緣》來滿足的慾望不同。

當慾望無以得到滿足，欲力的驅向導致慾望對象的轉移，自然削減《島嶼邊緣》編輯事務的參與程度，並由其他面向尋求慰藉。

何方(甯應斌/筆名 卡維波):我還是覺得這裡面有一些人的想法跟另外一些人的想法是不一樣的。就是說,他們因為不同原因對這個東西的投入。所以每個人的動機或動力有一點點不一樣,但它一定會有一點點重疊的地方。(20051012)

王蘋(筆名 平非之「平」):《島邊》就是大家模模糊糊的來自不同的脈絡,但是聚在一起也不完全是硬被湊,然後毫無關係的。我覺得有一個簡單的關聯,就是每個都想要作一個「進步」的東西,但每個人「進步」的想像有點不同,而且立場也有點不太一樣。但是要聚在一起,要把這個東西推出來。出了幾期之後,有一點點看到社會的回應,使得大家也會繼續做下去。然後繼續在裡面的力量,除了讓大家好像模模糊糊地看到相似的東西,也體認到彼此的不同,又覺得在整個大的政治環境之下應該往前推動。

那「人際關係」是很重要的。其實我覺得還是有幾個核心,可是那個核心不是真的核心,這個核心的目的是說他把他的一些人際網絡穩固了,然後留在裡頭。我覺得王浩威會是個重要的核心,他跟「戰爭機器」那夥人之間;或者吳永毅之類的,他抓住了某種人脈在裡頭。它不是一個清楚的組織,但彼此之間有一點點因為人際、因為一點點想法的相似,而可以聚在一起。

還有一個是,我覺得《島邊》整個進行的時間有點長,第一期到最後一期差不多五年。在這個過程裡面,每一個個人剛開始從可能沒有一個地方去放他所謂進步的理想,到個別在他的人際網絡上或人生的專業規劃上有了一些不一樣的發展,我覺得這個東西不是靜態的在走,他也有他自己的脈絡。就是我一直想一個東西,你當時會參與,一定是有某種熱情,不管你知不知道裡頭有不同的人、不同的意見。可是你會離開,應該是因為熱情不見了。那某一方面,熱情也像某種需求,就是需求不在了。那需求不在了,有另外一種可能就是你在別的地方有需求可以被滿足。

像我後來會覺得參與純粹是個「義務」!就是要把一些運動的經驗帶過來,大家一起討論。比較不是說這邊是我一個運動的場域,我需要跟大家聚集,然後在這邊產生一些能量,然後再帶回到運動。就它對我來說沒有這個功能。其實就是好遙遠喔!後來他們在作什麼我都搞不太清楚。(20060719)

所以人力的無以為繼並非只是單純個人的生涯規劃或在各自陣線的積極投入,相伴而來的是一種「選擇」:選擇減少投入《島嶼邊緣》的編務,選擇投入...。或者說當初與《島嶼邊緣》選擇「接合」的點或需求是否消散?

也就是說,除了大環境的壓縮,背後動力消散的原因何在?

實際上,人力的投入與淡出是一種動態的轉變,而非靜態的全有全無。「人力的無以為繼」似乎也是各自對《島嶼邊緣》的刊物想像和對專題論述軸線有所異議的「反映」,也就是與後期的論述軸線移轉有相互拉扯的關係。原先由「戰爭機器—讀書會派」為主的編輯群最後逐漸淡出,而後期也幾乎由「戰爭機器—(後)L.A.派」的甯應斌...等人以性別解放軸線和後正文風格為主,編撰多期專題;並且在政治性的論述上由踰越統/獨二分的「不統不獨、既統又獨」的立場轉向為「攻擊台獨、批判民進黨」的立場,中間的轉變如何發生?是否推擠《島嶼邊緣》的殞落?

2. 「假台灣人」的統獨分歧與「後正文」的外來標籤

後期論述軸線明顯的由理論翻譯文章轉向自製理論的展開,並轉向「後正文」及「性別情欲」的操作。如同前述,這樣的轉向與智慧財產權政策的制定和專題主編制的特色相關。

《島嶼邊緣》的轉向除了因全球知識權力（或說美國文化帝國主義）的壓迫，所進行的論述轉型，並且因為外界的政治因素而被貼上酷異風格的標籤。《島嶼邊緣》後期的「後正文」編輯風格日重，係因主要由甯應斌操刀編輯，「後正文」也看似愈趨編輯主軸。但「後正文」策略或者對「性別情欲」議題的操作，並不是每個《島嶼邊緣》的內部成員都可以去操作或認同的。所以實際上內文的編製，不足以反應參與的現況及成員的整體意見。由於各自對刊物的想像和意識形態的分歧，導致創刊集結漸漸與雜誌文本的編輯成爲岔線，而終致停刊。

而著作權的版權問題連帶影響《島嶼邊緣》由譯介外國理論轉移爲自製理論，而以「後正文」策略爲編輯主軸，何以在後期排擠掉某些論述的出現，促使《島嶼邊緣》後繼無人或稿源及人力上的深度欠缺，導致最後停刊？

《島嶼邊緣》的內部成員對於性別或情色議題和「後正文」的操作，均持續面對爭議和歧異的雜音，而第 8 期「假台灣人」確實實際上扮演一個成員分歧的導火線。

（1）第 8 期「假台灣人專輯」：統／獨意識形態的分歧

...《島邊》的最大貢獻在於它是一次左派力量的集結，告訴人們左並不同於統；雖然並不能改變這個根植於人們心中的固定看法。或言是，人們發現了一群有處理統獨問題能力的左派。（王浩威，《POTS》，1996：29）

當時「四大族群」和「生命共同體」主流的族群論述，牽動「假台灣人」論述的提出，而原本《島嶼邊緣》「不統不獨·既統又獨」的統獨立場，在第 8 期點明批判「外省人獨立促進會」的認同政治，並引發外部反對運動團體對提出「假台灣人」論述的《島嶼邊緣》是批判台獨路線的爭議，意外拉扯到內部成員在統獨意識的敏感神經。

第 8 期的「假台灣人」專題是由王墨林、何方（甯應斌）、吳永毅、鄭村棋爲主編，形塑「不統不獨·既統又獨」的「假台灣人」身分認同，企圖針對當時民進黨的「四大族群」與李登輝「生命共同體」聯手的「打造新國族」論述提出回應，並針對「外省人獨立促進會」的認同論述提出批評。

何方（甯應斌／筆名 卡維波）：基本上好像站在社會運動的立場上，其實我們是看到兩個危機就是說，一個是民進黨當時的政治運動，就是台獨的運動，會把所有的社會運動都收編，或使社會運動萎縮的狀況，而那個時候很多社會運動也願意自己去做民進黨運動的外圍，他們認為要去跟他們合作，來奪取國家機器。第二個就是說，比較不明顯的，民進黨整個內涵裡面，基本上他台獨的操作是「族群」的東西，或是比較簡單的是「推翻國民黨」，比較沒有真正社運的內涵。就是說社會運動去跟政治運動合作，那是要政治運動本身能發展出政治層面以外的那種社會運動的價值。那我覺得好像民進黨除了環保、反核四這個東西比較多一點之外，其它的其實都不夠，其實都還是比較主流。以現在民進黨執政以後來看，社會運動的空間會比較小，很多當年跟他一起在社會運動的人士都跑到政治裡面去，那就表示社會運動沒有什麼發展。那他們當然可以說我們進入體制去工作，其實這是一種自我欺騙的東西。很多社會運動的空間和議題是不可能去體制裡面操作，它一定是要在體制外去操作，那你們只是進去又替自己解釋。但是回過頭來講，那你當時跟他的合作就有另外的目的。到現在為止，大家也都認為好像除了操作族群以外，好像幾乎沒有什麼社會進步。在後來的執政裡面，這些問題在我們的時代就已經看到了。因為他們那時候論述就有了，其實我們的東西相當程度是針對那個東西而發的。（20051012）

何春蕤：《島邊》當時的政治空間還是有的。反而現在我覺得《島邊》那些什麼「既統又獨」的口號是不容易存在的。因為現在的話反而是很清楚的狂熱狀態，只可以怎樣、只可以那樣，比較沒有多選題。那在《島邊》那樣的時期，剛剛解嚴沒多久，民進黨也還沒掌政，還是國民黨在上面執政，民進黨在下面繼續吵鬧的那種狀態，有種不穩定性，但基本上又蠻穩定的，（因為國民黨很穩定）在那個時候有一些空間可以玩，不至於付出太嚴重的代價，可是現在很可怕的是沒那個空間。當時的國民黨雖然是高壓政權，但它會為了表現某種開明；而反對黨只有點小小的空間，也沒有權利去說只准信我的，不准信別的。就變成是說上面不是很高壓，因為要玩民主的遊戲；下面也沒力氣去要求。那《島邊》的某種政治是玩得來的。我問你（卡維波）一下，當時你搞「不統不獨、既統又獨」的東西會不會現在比較難搞？（20051012）

何方（甯應斌／筆名 卡維波）：要看脈絡吧！這樣講好了，在社會運動裡面這樣的一個位置，那麼當時有一種壓力，是屬於民進黨的壓力，它基本上是說：「國民黨是反動的，那你們應該要跟我們在一起，這是不用講的，我們自然是連在一起的」。那當然這就產生一個問題，（從今天來看就知道）好像就算民進黨有問題，但我們票也就只好投給它。同樣的一個原理就等於社會運動沒有一個空間。當時這個口號主要是針對那個壓力而來。

還有另外一個脈絡就是說，台灣也有一個重疊於黨外時期的運動就是統派的運動，就是以夏潮為主的東西，他們甚至到最後有陳婉真和陳鼓應的聯合競選，那時候是蠻大的一個東西。後來因為中美建交，所以選舉停了，那個時候很多所謂的「統-獨人士」。譬如像蘇慶黎早年是黨外裡面的人；而陳婉真是獨派的人，但跟陳鼓應在一起聯合競選，所以其實那時候統獨兩方本來還有一些聯繫。然後王浩威等於是受到夏潮影響的最後一代，所以在當時統派也是另外一個反對派，就是也反對國民黨，但它不是那麼的大，並且愈來愈被污名化。那你站在社會運動的角度來講，你不應該因此就說，因為民進黨現在是西瓜大邊，那些統派的就是出賣台灣的。那個時候就是有這個問題，所以那個「不統不獨、既統又獨」其實是有點在講說面對獨派及統派，你的立場是什麼？就是說社會運動，不可以說我們不是統也不是獨，那我們也是統也是獨就表示說我們兩邊都可以接納。那就表示我們有一種「自主性」的意思。而不是我們「非獨不統」，那沒有自主性了。當然也有的團體是「只統不獨」，但那很少，那就是統派的一些外圍團體。（20051012）

何方（甯應斌／筆名 卡維波）：但那個東西（「假台灣人」）在那個時代是有一些敏感性，因為第一個就是說，我們的立場是有「政治性」的，我們搞「後正文」的這幾個是有政治性的。然後基本上《島邊》的這些文章都是學術性的，沒有那麼強的政治性，它有某一種從文化思想提倡一些新的思潮，來跟舊有的東西有點對抗的姿態。這種東西是什麼，模模糊糊的不知道，但有那樣的姿態。譬如說葛蘭西專輯，在過去國民黨的時代，馬克思是一種禁忌，所以你推出葛蘭西的專輯，其實就有一點在好像表示我們很不一樣。所以第一個我們的東西有政治性；第二個就是這樣的政治性在《島邊》的朋友裡面，不是每一個都能夠認同的，或者至少是說他認同的程度是什麼，不清楚？他們認不認同這套人民民主的說法，很難講。當然從來沒有聽到有人強烈的反對，但也沒有強烈的贊成。我覺得那本來就是蠻合理的。（20051012）

何春蕤：現在已經沒那個脈絡了，所以也看不太到。

《島邊》當時其實做很多很多這種「小動作」。對於一些當時很流行、很甚囂塵上的政治語彙想創出的一些意識型態，在那邊嘲諷，而且它以這種方式，非常直接，又好像用某一種說的方式。（20051012）

何方（甯應斌／筆名 卡維波）：像（第 8 期）這樣的一個東西。不同的人就會有不同的看法。譬如對我們來講，「作一個勇敢的台灣人」到現在還有人這樣子講，其實那是當時政治的一個話語，那我們覺得一個政治的話語應該要去包含到「邊緣」的東西，不只是孤立到政治的話語上。就像我們愛台灣，你不能到最後變成我是愛國家；愛台灣你就應該要愛台灣的自然環境，所以你就應該要去環保...，你應該要把原本的政治語言擴大到社會運動的議題，這是我們的一種觀點。所以「作個勇敢的台灣人」，所以同志要出櫃，要勇敢就要這樣子啊！可是我想有些人也會覺得：「馬的！做一個台灣人應該是一個專利（譬如說民進黨的提法），怎麼可以跟同志出櫃連在一起」。他們不會覺得這應該要連結的東西，他可能會覺得這是一個不應該連結的東西，我想應該有人會有這樣的想法。（20051012）

「假台灣人」論述的起始點源於當時「民間社會論爭」中「人民民主論」的「社運觀點」，認為台灣當前的反對運動應當有其社會運動自身的主體性，而非以「政治運動為優先」，屢屢接受政治動員；並且針對將「本土意識」被政治運動挪用、錯置為「福佬人的省籍認同」，以「後正文」筆觸諧擬形塑出「假台灣人」身分認同藉以顛覆、嘲諷。而「假台灣人」發刊後，外界並非將「假台灣人」專輯獨立出「島嶼邊緣」評論之，而是直接將「假台灣人」專題編輯的編撰風格及論述與「島嶼邊緣」整體作鏈結，而外部對此一論述批判的迫壓間接滲透到內部成員的互動關係。

馮建三：我個人是對「統獨」、「省籍」的問題意識得比較晚！我沒有太 care 這些問題，對我來講不是一個要去面對的問題，或者是一定非得處理的問題，我其實很晚才覺得這是一個問題。我想當時辦的人可能有感到一些問題，那期應該是吳永毅編的吧！那他自己可能覺得這是一個問題，他覺得要去處理，這就可能要問他了。(20051028)

傅大為：因為第 8 期的關係而淡出《島嶼邊緣》的到底有多少人？其實我並不是很清楚，其實我當時覺得我是不是非常少數的。

其實我們當初在《台社》，我就很清楚這個問題，因為很熟悉，所以這個問題對我來講已經解決了。然後我不希望一天到晚還要跟人家辯論「統獨」的問題，我們只需要一個 radical 的立場。我當時的想法是如果我們都是比較左派、比較 radical 的立場，這和你比較統或比較獨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你只要不要因為統或獨，在 radical 的問題上做了妥協；或者反而因為統或獨你才比較關心，這樣我就比較不能接受，就覺得這樣比較不好。如果你的 radical 是比較具體的東西，或是 radical 的過程裡面去選擇統或獨，那統獨反而是比較次要的東西。在那個意義上，對我來講，我在那個時候是比較接受台灣的。但早期的時候《台社》我也特別去找呂正惠，然後《島嶼邊緣》的時候呂正惠也有參加。但後來《台社》首先是有一些我想找一些比較獨的，但那些比較獨的好像又跟陳忠信比較不太合，那陳忠信是主編，就會有這樣的一些問題，那有些人就會不來了。那不來的話，也就沒有什麼辦法。那《台社》那個問題比較單純的統和獨；或者是你參加辯論的時候，你比較是那條人脈關係，是跟新潮流比較密切呢，還是其他的？我當時在沒有非常搞清楚狀況之下，參加的好像是和新潮流關係比較密切的。(笑)

但我覺得《島嶼邊緣》那個情況比較不太一樣，那個不是統和獨，而是更超越了一點，像「假台灣人」，好像要把「台灣」這套符號整個都要翻掉。那我覺得這個層次是要比像過去談統獨的東西更 radical 或更 extreme 一點。所以並不是那麼容易可以一下子就接受，這需要一個慢慢的過程。如果真的要做得這麼極端或這麼...，這可能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得到。也許有些人已經準備好了，但有些人可能覺得太快，中間顯然很多東西並沒有談清楚，是不是要把所有東西都丟掉。這個對我來講，我當時也有這樣子的保留吧。(20051109)

蔡其達(筆名 晏山農)：後來為了做「假台灣人」，紛紛把朱天心、朱天文一些人也找來開會，就開始批判「福佬沙文主義」。那就導致吳昌杰是最明顯的，他就完全沒有辦法接受，那其他很多人嘴巴不講，心理覺得不以為然。後來導致第 8 期之後原先強烈的大家一起推動雜誌的共識已經慢慢就沒了。加上後來轉變以「女人國」、「酷兒」這種方向，對絕大多數原有的成員來說，基本上是比较不可能再接受了，所以就導致共識就慢慢瓦解了。另外當然也跟每次開會都是各講各話，時間拉得非常長、非常沒有效率，所以慢慢開會的人愈來愈少。

吳永毅：第一個，找朱天心那一次，(我倒不記得朱天文有來嗎？我確定朱天心有來)，在舒詩偉家。那一次就是所謂「外省人專輯的籌備會」，但那一次也找了外獨會的崔梅蘭，而且他是當時主要的發言人。但這個其他人就都沒有講啊！好像很奇怪地說，我們這群人倒向朱天心。朱天心當時是所謂比較替外省人講話的人，但是崔梅蘭我們也找了啊！崔梅蘭是當時外獨會的秘書長，而且我們的筆談也邀了崔梅蘭的稿，但他沒有回應。最後我們另外在外省人專輯也邀了崔梅蘭，希望他對我們所有人的去稿有所回應，但都沒有回應。但大家如果不講這些，就覺得我們好像真的在政治上站邊了。我們很清楚是「反外獨會」的論述沒錯，但我們在處理論述上不是那麼清楚地用一種公平的態度在處理。那別人的理解就會變成這樣，然後我也不知道他們對這個東西的反應。

但我覺得蔡其達應該是因為某種奇怪的狀況，他受到了最大的壓力！或者他自己感受到面對到壓力，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認為其他有些人可能認為他跟我們有關係，因為蔡其達是跟「夏潮」有點關係，那可能就是比較獨派的這些人就會覺得他跟我們一夥的。但蔡其達這種人又有點像王浩威，他比較沒那麼鮮明，所以他可以跟各派的人在一起。所以我猜想有些獨派的人會向他抱怨，你們這些人都亂搞這樣！所以我覺得他壓力很大，很顯然他也沒有跑來跟我講，他可以跑來跟我講，也可以認同我們這種搞法不對，也許不是從台獨的角度批評，但他可能也就覺得我們有點亂搞這樣。所以他變成是一個承受壓力很大的人。但至少我現在看，不太能理解到底是怎麼回事？那他的火力就整個說我們沒搞好。

……「吳昌杰」顯然變成是一個蔡其達認為的指標，那從某個角度我認為吳昌杰也蠻冤枉的。因為吳昌杰從頭到尾都只是掛名而已，我的印象中他一次編委會也沒來參加過。或者只來參加過一次，最多可能只來參加過一次吧！在什麼場合我也忘了。至少編委會或積極討論籌備到有專題有爭論，他都不在場啊！甚至我覺得他沒有來過編輯委員會，或者可能來也只是露個臉。那他最初跟整個《島邊》能不能運作其實不是關鍵的因素，但他那時在「假台灣人」之後的第二期還是第三期，作了很明顯的動作，所以就變成一個指標。好像變成壓垮《島邊》的稻草。但我覺得根本就不是這樣。他也沒提出過編輯，然後他也不是積極參與的人。（20060719）

何方（甯應斌／筆名 卡維波）：所以我覺得那始終是個問題，就是「人民民主」的這個東西怎樣？到了《島嶼邊緣》—「假台灣人」這一期確實是個可能爭議性非常大的一期，據我所知，這一期出來以後，就有很多人有很多的不滿的狀態，主要是外面，但外面會反應到裡面，裡面有多少人認同這樣的東西，也不知道？這是一個比較有爭議性的，也是唯一一期明顯有政治性的一期。不可否認的，「後正文」這個東西不是佔據《島嶼邊緣》篇幅最大的東西，但是它卻是一個很新奇、很有趣的、甚至是很多人看得懂的東西、或是不喜歡看的東西，因為沒有看過這樣的東西，所以它反而有點喧賓奪主，我覺得。就像你講的，很多人提到《島邊》，就會提到那部分，那是一個很有意義的現象。那個東西又連繫到某種政治立場的時候，使它的爭議性就更大。

我們不是一個很緊密的團體，在那個過程裡面，是不是內部有人不滿意，我不知道。也許有人不滿意，他就慢慢不去加入這個雜誌了，這是一個可能的結果，這也許也是《島邊》後來沒有的原因。因為《島邊》開始變成一個符號：就是搞「後正文」、「人民民主」，而這個東西又被人家解讀說這是針對反對黨的，或者是針對台獨運動的，會在外界慢慢有這樣的等號去連結起來。但我的意思不是說，這個東西多大程度去影響到《島邊》的存在，這個我實在不知道。因為那個時候，大家的統獨現象也沒有那麼明顯，《島邊》裡面統獨兩派都有朋友的，如果你說比較傾台獨，他不喜歡這個雜誌，那你比較不傾台獨，就會比較喜歡這個雜誌，好像也沒有。它的政治會是一個問題，但會不會是一個決定性的問題，我懷疑。但它的確是一個問題。

因為自己在做這個東西的時候，我也要考慮到一些東西，就是說我也不喜歡把這個雜誌太過分地去扯到別的人。我的政治觀點是這樣，但是因為外界他們搞不清楚我跟這些人的關係是什麼，他們有可能認為這就是你們《島嶼邊緣》裡面全部人的立場，這可能會帶給那些人困擾，我也是盡量不要跟他們混。那他們那些人，他們倒也沒有很緊張，要跟我劃清界線，那倒沒有。因為我覺得大家多少還是有一種「友情」，有這樣的一個因素在。譬如說，他們今天贊成我這樣的觀點，但他不是我，所以贊成和強烈支持是有不同程度的，所以他不見得會跳出來說；反過來講，他不贊成，但他有沒有強烈到反過來討厭我，那也未必。可能是這樣的狀態。但是「假台灣人」確實是一個招惹到外在壓力，那個壓力可能某種程度回應到我們的內部來，多多少少有一點點這樣。「假台灣人」這個是有寫編輯的，「假台灣人」之後，大家可能就覺得那就這幾個人負責吧。（笑）或者是怎樣？當然這裡面很多人都有寫東西。

「假台灣人」接下來是女性主義的東西，所以事情倒也沒那麼嚴重，還有一個是我們當時看到很多我們後來變成所謂獨派的人，其實當時並沒有那麼強烈的傾向，譬如說黃毓秀就是劉毓秀，她後來好像變成跟陳水扁非常密切的一個人，可是至少在出「女人國·家認同」的時候，她並不是這樣的，她還跟我們都混得很好啊！婦女運動剛開始的時候，都非常密切。好像也沒有說因為你們出了「假台灣人」，我們就要跟你劃清界線，不是這樣的。（20051012）

王蘋：不過我覺得這樣的理解，有點是從完全掌握《島邊》的狀況去看一期的《島邊》。應該要想，第九期是我們在編，我們是自己找第九期寫的人，我們是獨立在操作，這跟整個《島

邊》是無關的。所以我找的那些人，可能從第一到第七期的都沒有參與過，根本都不知道。而她答不答應投稿，跟第八期有可能是無關的。就是那是另外一個網絡。這是我自己的理解。(20060719)

雖然「假台灣人」並非造成內部的強烈對立，但統獨議題確實造成意見和立場上的分歧，導致部份編輯成員退出或減少投入的程度，而由於外來團體及稿件的增加，專題編輯和執行編輯的角色也日重。也就是說，甯應斌後期的獨挑大樑和執行編輯姚立群在除了專題之外的稿件刊登權上的偏好選稿，其角色便日顯重要。

何方(甯應斌/筆名 卡維波):姚立群是《島嶼邊緣》相當重要的靈魂人物，再來就是黃瑪琍美編。因為沒有姚立群就沒有《島嶼邊緣》，因為實際上是他要把所有的東西通通放在一起的，那他跟美編的合作，整個的設計就非常重要。像很多《島嶼邊緣》表現出來的風格，就是他們兩個的設計、合作。你現在看到的樣子，其實是寫文章的人沒有辦法去想像的。除了有一期吳永毅在負責「假台灣人」的時候，我不知道他和姚立群合作的程度是怎樣，但吳永毅也是一個點子很多的人，他有可能搞了很多，也許有些是他的 idea，這個中間我不清楚。像第六期「身體現象」後面「後正文」的部分是我跟吳永毅在搞的。所以不看這個，我都忘了自己曾經作過這個東西。

姚立群是個非常非常重要的靈魂人物。(20051012)

姚立群:每個人對《島邊》參與的深淺不一樣。也許對研究來講，《島邊》是一個焦點，可是對所有的編委來講他們不一定有那麼深的感覺。像舒詩偉在北埔做社區總體營造，超忙的，而且他不一定會想談這些東西。舒詩偉有一陣子住在杭州南路王墨林的房子，我們都在那邊開會，他那時候剛回來台灣沒多久，還跟台北這個都市文化很有關係的時候，他還願意玩。但翻譯文章的貢獻效果真的會比較慢一點，也許我們找不到什麼資料，所以希望有翻譯，但翻譯的效果和速度真的比較慢，所以他並不是特別快樂吧！他常常是我們的救火隊，有時候我們要發表的時候，他生產的能量和速度蠻高的。你也可以找張釗維，他雖然沒有很深入參與，但他是一個很好的觀察者。他們都是看《島邊》長大的。

我可以告訴你的東西很粗淺的，只是大概的一些狀態。對我來講《島邊》的影響力，我沒有辦法直接引用。《島邊》我不是拿來用的，我比較像工廠的那個環節而已。(20050829)

何方(甯應斌/筆名 卡維波):因為《島邊》是那麼分散的東西，也許有人不贊成，這可能要從訪問去發現，但起碼不是檯面上去反對的東西，而且主要是說，如果姚立群喜歡這樣的東西，那當然他的影響力就很大。我知道後期姚立群非常非常喜歡和贊成那樣的走向，而且可以發揮他編輯的所長，他可以更自由的發揮，因為比較死板的話，他的發揮力也不夠，這當然從他的角度出發是這樣子。(20051012)

姚立群:有的人寫了稿子過來，我沒給他登。那時候就有人跟我說:你要登他的稿子，不然他會罵。(問:所以也有這方面的壓力)對，所以我說:不需要這樣子吧!有的時候不適合啊!有的時候也不是適不適合的問題，而是不要再寫這個了吧!還有很多很多東西要進來，我們也會問說有沒有人有什麼東西，是可以在平面呈現出來的，例如有些藝術家可以容納進來，相片是最容易登的，像我們也登了幾次相片的東西。一方面是希望版面可以活潑一點，二則是希望不要只是固定的處理幾種類型的稿件。譬如這個人寫寫詩，這個人寫寫散文就要登，好像你的文學創作沒有地方登了，我就要登，我想也沒有那麼一回事。或者是你的稿子沒有地方發表了，就要拿來這邊發表。我們把所有稿子拿在手上，看一次之後，就可以知道這期要登什麼了。更不要說後來的企劃愈來愈活的時候，就不一定要登。(20050829)

所以原本這群邊緣知識份子一方面在逐漸投入自身的戰線經營，瓜分了投入《島嶼邊緣》時間的分配，只剩少數的專題編輯仍持續支撐發刊；另一方面因為編輯風格的個人化，加上編輯議題的異議性造成內部的歧見，而編輯無中心化導致無溝通管道處理歧異性的聲音，內部舊編輯成員逐漸淡出甚至退出編輯事務，雖然其間有新編輯團隊的進駐，並確實大幅開放空間供其他論述的佔領：

<編輯報告>

搖搖晃晃地，島嶼邊緣也出版了十二期的季刊，算是三年的份量了。雖然目前仍拖刊近半年，但比起當初只集資一年的心情，還是令人意料之外的驚喜。

這期【保衛阿圖塞】專題，正如以往，總是較人不盡滿意。在思潮介紹方面，除了馮建三負責的那一期，幾乎都一直有急就章的遺憾。關於這一點，也許是島邊同仁該檢討的。

在原計劃裡【E. P. Thmpson】專輯，恐怕更要姍姍來遲了。然而更多的投稿。更多樣化的寫稿風格都是島邊近來的特色。包括【妖言】在內，這一期恐怕是非同仁之來稿所佔比例最高的一次。也許這是島邊的走向—越來越大的空間開放給大家來占領了。（《島嶼邊緣》第12期：3）

但後期論述軸線的移轉，一方面由於專題編輯及執行編輯在稿件編撰、撿選的影響性逐漸加重，更難以接合《島嶼邊緣》其他成員的論述意見。也就是說，相對龐大編輯委員的少數主編所編輯的文本逐漸不能也無法反映《島嶼邊緣》參與成員的意見紛雜及互動。後期開始以「後正文」風格為主的甯應斌開始編撰多期專題後，隨之而來對《島嶼邊緣》的「標籤化」，使內部成員不得不開始面對並選擇性的接合。

蔡其達（筆名 晏山農）：而過度使用後正文表現，開始玩物喪志，就是傅大為對吳永毅的質疑。對於「假台灣人」、「酷兒」之類的虛無主義的做法，不以為然的更多。因為以王振寰、趙剛為首的這樣一個東海大學的一群人，基本上已經不認同這樣的一個方向。

……第9期「女人國·家認同」、第10期「酷兒」、第11期「民眾音樂」、第12期「保衛阿圖塞」...，後面的東西其實我就沒有那麼清楚。但是基本上很清楚，已經愈來愈少人參與了。大概包括傅大為，大概差不多第8、9期之後，他就開始質疑這種圖片愈來愈聳動，目的是什麼？傅大為有一次就很明確的問吳永毅，吳永毅的意思就是說好玩...。後來傅大為也就淡出了，幾乎沒有再來了。後來是慢慢慢慢整個...，一方面大家也開始忙了，一方面是第8期讓內部那種省籍統獨問題，整個造成內部的衝擊，雖然只有一個吳昌杰退出，但是很多人也不以為然，另外就是後來所謂的「酷兒」、「性別」、「情色」的轉向，讓更多人淡出，像我...，我一方面是進副刊，也是因為另外一方面我沒有著力點。包括我問過馮建三，當然也是一樣。後來實際在投入的，大概只有像王蘋、卡維波（甯應斌）、何春蕙、吳永毅，大概只剩下他們幾個人，那這樣搞，已經不可能。

所以第8期是關鍵的，原先大家想說不要碰，但是一碰到那個東西就造成內部的緊張。不過後來變成創刊之後沒多久，很多的標籤就來了，像原先的台教會比較親近民進黨的團體，和我們是保持很大的距離，然後就用「新統派」標籤我們，因為嚴格來講也沒有錯，因為裡面絕大多數都是「外省人」：于治中、方孝鼎、平非、成令方、何方、吳永毅、吳瑪琍、柏蘭芝、陳光興、郭力昕、張小虹、傅大為、舒詩偉、萬胥亭、趙剛...至少一定是超過一半以上的外省人，而且常去開會的基本上也都是外省人，所以他們就把它貼上「新統派」的一個標籤。然後「墮落的虛無主義」的標籤是統派的、夏潮系列、《海峽評論》的那些人丟給《島嶼邊緣》的。所以獨派的不喜歡它，統派的也覺得我們搞這些東西是很虛無主義、很墮落的。（20051015）

傅大為：像我就是朋友跟我抱怨，我只能說：好，我其實並不贊成「假台灣人」主要的提法。（我當時有個印象但也忘了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當時「假台灣人」的編輯會是這樣子？）當時我們有開過會，有討論一下這樣子的東西，我記得我那個時候的意見就跟吳永毅他們不太一樣。所以那個時候吳永毅就希望大家寫些文章來討論，可是我那時候就有一個感覺就是說，我記得我那時候很用心的在寫那篇文章要來討論，可是我後來對「假台灣人」這期的編輯我有點不太滿意，怎麼說不太滿意呢？（翻閱第八期的期刊目錄）你看在很多地方蠻強調「假台灣人」的主調，他們的文章其實寫得很短，就一兩頁、一兩頁這樣，但在這個專題裡面就非常凸顯這樣的一個議題。那我覺得說我們當時有談這樣的東西，我當時還蠻用心的寫個不同的意見，但是後來的處理，（翻閱《島嶼邊緣》，第8期：91-96）就是在一堆筆談中間擺下來。其他一些觀點就變成主調，我這樣寫但卻在編輯策略裡面是被隱藏或「邊緣化」。

所以我那時候有點不太滿意。

所以那時候我有些朋友說你們「假台灣人」就是怎樣怎樣...。我就會問他，你看到我那篇文章沒有？他說你有文章嗎？我就會說我在這裡，請你仔細看一看。後來有幾個年輕朋友，他知道我一篇文章在這上面，會知道意見跟其他人有些不太一樣。但是這個反正已經不重要了，「假台灣人」給人家一個主流的印象已經形成。對我來講，反而是更需要...，遇到別人問：你是《島嶼邊緣》的嗎？我只好開始想我到底要怎麼樣來回應？

我其實那時候有點搞不太清楚，因為我們在清華也在忙我們自己的事情。就是說這邊幾位比較主要編輯「假台灣人」的人，有一種「氣」，我不曉得他們在生什麼氣？是很大的一種東西。說不定他們有些道理，他們可能在另外一種衝突的狀況底下，引發他們做這樣的一個東西。可是我沒有在那個脈絡裡，我們是在弄另外的一些東西。《島嶼邊緣》大部分的人都是在台北，我其實在清華花很多時間搞新竹方面的東西，那時候我們強調要有地方色彩，因為我在新竹，我不希望變成台北人。我們花了不少時間弄了一個新竹的地方刊物，叫《新竹風》，所以跟那個時候混在一起了。我不知道他們到底是怎樣了，在台北生什麼樣的氣，我其實有點不太清楚。

然後大家就已經開始定位《島嶼邊緣》了，所以在意義上我們也必須要作個處理。(20051109)

吳永毅：有聲音，我覺得編（「假台灣人」）的時候就很清楚的知道有不同的聲音，所以才會有筆談的方式去處理不同的聲音。那事後不同的聲音已經變成一種政治選擇的時候，我們其實不知道，我們到很晚，甚至到《島邊》結束以後才知道。（至少從我現在回想當時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像傅大為對於稿子被放在筆談位置的不滿和抗議，從這種角度我真的蠻錯愕的！那我事後檢討，我剛就講沒有人在組織這群人的位置。那我就是按照形式上說，第一個我用筆談讓不同的聲音出來，他有寫來的我就把它放上去。我現在才發現原來其實這樣還是不夠的。他是一個要跟我切割的聲明，但我就沒有考慮到那麼多，我就依照形式上對大家都公平，我就讓它全部跟大家呈現。那我根本就沒有想到他是一個要跟我切割的公開聲明信。假設我想要把《島邊》繼續維持在那麼高的位置，那我就會想說是不是要把它放在不同的位置，讓不同的聲音覺得被滿足了，被看到了，我們不是封殺他。那可能他就會呆下去，或者我也不知道，可能他也沒有理由離開。但我當時根本就沒有去扮演這種角色。那中間聽到傅大為抱怨的這些人，譬如蔡其達可能聽到了，但他也沒有準備要上那個角色，或者他也不會來告訴我。那就變成說，傅大為就走了。那蔡其達就說傅大為走了，好像我也不想跟那群人在一起了。（笑）那大家都不講，就會變成最後那個狀態。

但我認為這還不是停刊最主要的原因，停刊最主要的原因是大家沒有東西可以生產了，就是沒有東西可以繼續做下去。中間當然是有一些疙瘩，但如果沒有那些疙瘩最多也只能再出兩期到三期。（王蘋：停刊是哪一年？）95年出了最後一期，96年正式停刊，當時已經沒有東西再作了。（20060719）

「假台灣人」開啓政治爭議性的議題，並突顯了專題主編制的缺陷，沒有主編性的角色協調共識。到後來「女人國·家（假）認同」和「酷兒」、「色情國族」開始切入「性／別」議題，也引起某部份的爭議。

（2）第9期「女人國·家（假）認同」、第10期「Queer 酷兒」、第14期「色情國族」：性別解放的認同政治和酷異惡搞的後正文風格

《島嶼邊緣》後期偏向「後正文」、「情色」、「妖言」的部分，雖然並非是所有編輯成員認同的走向，甚至可以運用的書寫策略，但確實被外界標籤為《島嶼邊緣》的風格。

何方（甯應斌／筆名 卡維波）：它為什麼會走到盡頭，我很難去談這個問題。但是我覺得說，大家的投入沒有那麼多吧！或者是《島邊》後來變成比較「奇怪」的風格，可能有些人會這樣認為。因為《島邊》一開始的風格跟後來的風格是不太一樣的，雖然它有一些形式的統一性。好像前衛、亂七八糟、惡搞的，現在講是「KUSO」的風格。究竟整個編輯對（後期）這種風格的認同度有多高，我不知道，這是一個。第二個他們不知道能不能在這樣一個風格裡面去生產什麼東西，也許有人覺得他不太夠生產這種東西，那就覺得這個我就沒有辦法幫忙。這也是有可能性，其實我並不清楚。

它自然而然就沒有辦法、就無以為繼。這是一個問題，另外就是「經費」，就是說還有沒有人再張羅經費，或是再費力氣去找人支持，都是反映了大家對這個東西的投入程度開始減低。因為一個編輯需要很多人的 support，我可以生產一些東西形成一期，可是我自己覺得我不是一個重要總編輯的人才。所以我沒有辦法作。

所以《島邊》如果有總編輯那很好，可是就不是《島邊》一開始的狀態。《島邊》為什麼不要總編輯？我覺得大家一開始就希望這是一個比較民主的刊物，這麼多人在這個裡面，如果有總編輯的話，好像就變成某種獨裁、權力的，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會願意支持一個總編輯去做一件事情。大家就寧可把「島邊」這個符號，並沒有落在哪一個人的身上。所以刊物上應該沒有寫總編輯吧？只有寫「專題編輯」吧！（20051012）

傅大為：我也不曉得第 1 期蔡其達他們為什麼用「葛蘭西」這樣子？第 2 期就用這個？大概有點像說，某一期就由某幾個人來弄、來作，那幾個人就會特別把他喜歡的東西或他想特別強調的東西，把他做出來。但是有的時候會比較有影響力，或有些人看了會覺得驚訝，甚至有些朋友看了就會很生氣。這樣子的東西出現時，大家就會覺得《島嶼邊緣》就是這樣的東西啊！也許有些人看了覺得很 exciting，也許有的人看了覺得很生氣...。也許在這個過程裡面，反而是藉著外面讀者的 impression，慢慢的來定位《島嶼邊緣》是個什麼東西？是這樣子的狀況。

我不曉得後來幾期的時候，好像是「假台灣人」那時候，我記得那時候我出去，就有朋友還不錯，還蠻願意跟我講的，跟他們聊天的時候，有的朋友就說：阿呀！你們辦《島嶼邊緣》的怎麼這樣子？！就說：我對你們裡面的東西，很有意見.....。那我就只能說，那個我也沒辦法負責，我只能跟你講說那個不是我做的，是《島嶼邊緣》另外一些人做的。而且我也跟他講說，我也不見得贊成。但是因為那樣的因素，因為那樣大家會來傳，無論是覺得 exciting 或是覺得生氣，在這樣的過程，你就得去定位出《島嶼邊緣》是什麼樣的東西？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島嶼邊緣》的定位逐漸被形成出來，那我也沒有辦法。可是如果有一天《島嶼邊緣》它已經逐漸被認定是某一個東西，而我不能認同的話，我就會跟《島嶼邊緣》產生距離，所以是這樣的一個狀況。我不希望讓其他的朋友或其他的讀者認為我就是跟《島嶼邊緣》完全一樣。大概是有這樣的一個關係。（20051109）

所以所謂「酷兒化」的風格標籤並非是《島嶼邊緣》自行主張而來，而是與外界互相底定而來。也就是「島邊」是一個後人看來具有象徵意涵的「文化符號」，但實際上絕非一個可以標誌編輯成員整體的「標籤」。

而對於「後正文」的書寫策略，《島嶼邊緣》眾多成員採取的態度是「接受但不投入」，或許不是直接的反對，但卻也是一個弔詭的宣稱。

王蘋：譬如說，第一期就把葛蘭西很正經的文章旁邊放了一個可怕的圖片。某個人據說去影印的時候，必須要把那個圖片遮住，他才能放心大膽地把它印出來。因為照理說，這應該好像類似《新左評論》這樣的刊物，他為了把他的文章印成鉛字給別人看，就必須要把圖遮住。那是個最誠實的說法，其他人心理都這麼想，但都不敢講。（吳永毅：有講吧！有一次編輯，但我不記得誰講的。）不會講得那麼具體。但是意見應該有表達。（20060719）

王浩威（筆名 譚石）：對「後正文」其實有很多人就不愉悅。（問：就離開嗎？）沒有決裂，但的確有些人會慢慢地有點距離，聚會比較少來。如果大家對這個方向有問題，就變成各自主編專題。而且後來拖刊愈來愈嚴重。（20051003）

王蘋：也不是苟不苟同，就是當時變成是一個「政治正不正確」的狀態。你是不是有投入跟是不是很正確不太一樣。你如果覺得正確就應該會支持，有人作那就很好，可是沒有人作，你也不會主動作啊！因為對你來說，不是你的議題。（20060719）

傅大為：我覺得還好。因為第一個《島嶼邊緣》當時的許多朋友是不同的理論來源。其實我也不清楚「後正文」的東西，因為我們都有自己的理論傾向，我沒有時間去讀「後正文」的東西，他們也沒有時間讀我的東西；只是當時大家在很多問題上面有類似的看法，作一個合作。《島嶼邊緣》很多情況是這樣子的。那我當然比較新的、比較想接觸的是女性主義和科

學、醫療的東西，可是那些東西可能跟「後正文」的東西不太一樣。那不太一樣的話，我會去尊重，而且他們弄一些奇怪的名字，我們也覺得很好笑啊，很有意思啊！那個時候也學著去 appreciate 他們的一些東西。而且你要了解，並不是全世界都是「後正文」，就是《島嶼邊緣》啊！我們在《台社》或其他的地方還是可以弄一些其他的東西。所以並沒有嚴重到你是「後正文」還是不是？因為我們有很多場域，那這個場域我們對於「後正文」那套東西也覺得很好。所以我覺得大概還好。但是如果後還碰到一些像「台灣」這樣的東西，就會比較敏感、比較有些問題。(20051109)

萬胥亭(筆名 路況):我覺得「後正文」只是一個講法而已，這樣的一個方式跟「給我報報」是類似的，只是立場更尖銳一點，只是用了「後正文」的這個名詞，我覺得那時解嚴後論述的情境或狀態就是這樣子。我記得我寫過幾篇談台大學運的文章，基本的觀點就是說在文學上來講就是一種「諧擬」，就像是我們現在講的「模仿秀」一樣，來突顯對象很可笑。這是本來就存在的，從表演、文學的表現或電影的表現都存在，那他講的「後正文」是嘲弄某種文本，以嘲弄的方式去模擬一個文本，以這樣的風格來突顯這個文本或位置很可笑。模仿某種偵探小說、言情小說來突顯這個東西很可笑，就像電視模仿某個名人一樣。只是用了這樣的一個名詞，比較學院一點。但這本來就存在，並且到目前為止都有的一種批判、顛覆的手法，以模仿批判的對象來突顯對象的可笑，來達到顛覆的效果。只是吳永毅、卡維波(甯應斌)他們特色藉著這個雜誌來突顯出來，跟「給我報報」馮光遠，在當時氣氛下作出來的東西還是很好笑。但這倒不是太大的問題，當時《島邊》的成員，我和王浩威、李尚仁都可以接受，類似像王浩威、吳昌杰比較不能接受的還是在意識形態層面的問題，而不是這樣的表現形式。(20050924)

所以「後正文」的論述形式在內部雖有歧見，但並無引發內部激烈的衝突。《島嶼邊緣》被迫開始面對集結後最大的內部歧異，也是《島嶼邊緣》實踐「人民民主」串連接合後的最大挑戰，在於「假台灣人」專輯不僅點明《島嶼邊緣》內部的態度：「統獨」意識形態的分歧重於「後正文」表現形式的分歧；也暴露了《島嶼邊緣》「內部民主」的脆弱及矛盾。

3. 「內部民主」的溝通機制

面對論述轉型後的走向和反對運動中的「統／獨」議題的歧見，邊緣知識份子之間確有不同的立場和對局勢的評估。「酷兒化」，固然使得《島嶼邊緣》吸引更多廣大、年輕的閱眾，並試圖以「酷兒／斜國族」的構築作為動員的號召，將性別認同轉變為運動議題，甚至得以避開過多理論引介翻譯文章的學術僵化性格。但是《島嶼邊緣》面對「假台灣人」之後成員基於各自在「統／獨」、「省籍」的自我認同及所選擇的政治路線有了位置上的差異，「台灣社會反對運動的串連是否應以政治運動為優先」？「泛左翼運動是否必須走向酷異化的路徑」？這些歧異無法面對《島嶼邊緣》內部民主的考驗，成員之間並未充分得到討論及接合，而逐漸達到高峰的「靜默」很快地就緊縮了《島嶼邊緣》的運動能量。並面對外部外部社經環境社會力的緊縮、生產條件轉變後的困境也迫使《島嶼邊緣》宣佈停刊。

王浩威：一開始編的時候是聚會比編務更好玩。通常都是這樣。隨著雜誌的事情愈來愈多，瑣碎的事愈來愈多，聚會就開始變不好玩了，每次就要跑帳務多少？跟唐山陳隆吳交涉很不愉快啦！然後有人就說要扁他之類的。可是又變得很慘啦！連吳正桓去跟他談都沒有用。因為吳正桓跟他是老朋友了，他們好像是中原的室友，一直都混在一起，可是也沒有用。反正就是瑣碎的事情讓大家都煩，費很多時間處理。最早的時候，大家都沒有地方去的感覺，所以就將這些蠻好玩、味道比較近的這些人，慢慢散出去，各自來玩一下，有空的話就來玩，如果在報告編務的瑣事的話，就不會來。後來大家就會約好，瑣碎的編務不可以超過多少時間。(笑)大家還是要聊天。然後辦的空間，後來丁乃非的爸爸回來了還是怎樣，不知道有

沒有影響，就比較沒有那麼舒適在一個地方，還是一直到結束都在他家，我也忘了。
(20051003)

而無固定主編的統籌規劃，必須透過內部民主的多方協調以維持《島嶼邊緣》的正常運作和決議刊物走向，過於耗時；另外無人得以出面持續凝聚力量並協調共識。

蔡其達（筆名 晏山農）：我在（附錄三 <《島嶼邊緣》停看聽>）文章有提到，重點就是第 8 期「假台灣人」。「假台灣人」其實是很重要的一個標竿，就是在之前葛蘭西也好，科學、意識型態與女性、德希達、傳媒...，我們都是針對...。後來有一個因素是因為「六二大限」，就是「版權」問題。因為我們之前很多都是翻譯的，那「六二」你也知道，你要是沒有授權不能夠隨便翻譯，所以變成往後我們被迫必須調整我們的策略，因為你不可能再以翻譯為主。那不以翻譯為主的時候，你要怎麼走下去？就是一個關鍵。然後第 8 期的關鍵應該是吳永毅他們。老實說一弄出來的時候，就造成內部的緊張，因為當初大家都是撇開統獨，針對整個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各方面的現象來進行批判，可是當吳永毅他們弄出「批判假台灣人」，整個焦點就變成「批判台獨」，所以裡面吳昌杰就正式宣佈退出，然後裡面有些人也有意見，只是並沒有講出來，沒有講出來並不代表認同，但就變成大家愈來愈沉默。所以重點在第八期之後，以後開會整個氣氛就怪怪的，而且人數愈來愈少。當然人數愈來愈少，我裡面也有提到，要長期投入真的很辛苦，然後因為我們在開會的過程，基本上是很沒有效率的。那沒有效率的話，常常一開就是三、四個小時，長期下來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慢慢慢慢很多人覺得意興闌珊。變成從第八期之後，後來整個方向並沒有放在「政治」，但是後來慢慢往「情色」、「酷兒」的方向，這樣的方向也導致很多人愈來愈那個，因為跟原先開始標榜「新左」的方向已經有偏離了，大概往後，像王振寰、方孝鼎這些東海出身的學者，幾乎都不再來了。(20051015)

吳永毅：因為《島邊》是太多人不同的組合，那又沒有一個總編輯，或者類似總編輯的人去組織這些人不同的意見。所以就變成有時候有些人的反彈我完全不知道，那就沒有辦法解決。那我們當時也沒有將自己放在一個「組織者」的位置，其實應該主動去想，有沒有哪些人會反彈？那我們顯然都沒有人去上這個位置，頂多就是把我們那期做完。主觀的考慮就好，可能有些議題你還是要小心一點比較好。但一般編務都有一個組織者的工作，想想哪些人可能不被尊重？哪些人的狀態你要去理解？你要去主動關心一下，他就不會反彈。像是報社那種邀稿人就會扮演這種角色。編務除了對外呈現之外，對一群各自很難搞的人，你要怎麼處理他們的情緒。這可能是總編輯在作，也可能是總編輯旁邊的人在作。但是我們雜誌就很清楚的是，沒有人在做這件事。姚立群也不可能上這個位置，因為他不太可能做政治考慮，因為他也不在每個派系裡面，他也沒被賦予這個位置。他做得是比較執行的，當然也超過有作到組織者小小一點的工作，但就是他沒有全盤針對每個人的力量作考量。所以很多人在那邊憤怒，然後我根本就不知道。然後有些人反彈，如果人際關係近的，我們基本上會知道、處理。但總而言之就是不知道。那《島邊》會提早結束也不是沒有原因的。
(20060719)

所以《島嶼邊緣》內部論述的歧異發生後，並無溝通機制可供討論的機會和空間；而原本作為人脈匯合點的結點，也無在此時發揮協調磋商的角色扮演。所以終究導致共識的瓦解、內部多元的消失而「解合」。

傅大為：《島嶼邊緣》每一期不是有非常核心的幾個人在操控，有點像是 de-centralize。但其實追根究底也不見得完全是這樣，某個程度上我們會一起開會。譬如說剛開始要做四期，我就剛好提議要做這一期，大家就贊成，其他人也沒有表達意見，那 somehow 就這樣去運作。那情況到後來運作方式我覺得有點變了，運作方式到後來已經沒有像早期開得那麼多，那種很多朋友大家一起聚會討論了。

後來卡維波（甯應斌）的色彩比較重，其實有的時候是我們看到新出來的《島嶼邊緣》的時候，我們才有那樣的感覺。但是那個過程到底是怎樣，到後來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大概就是會有這樣的問題。我現在想起來的話，卡維波（甯應斌）在裡面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可是他那個角色是隱形的。後來沒有像早期大家很多朋友聚一聚，討論出來的一個結果。那曾經

有一兩次，我想說現在到底《島嶼邊緣》是誰在負責啊？我想表達一些意見或幹麻的，你不曉得跟誰反應？然後那個時候有一個執行編輯姚立群，那要向姚立群反應嗎？那我打電話找他他也找不到人，最後我是寫一張紙，傳真 Fax 給他，因為他有一個 fax-number，但是後來也沒有結果。

那當然整個事情你要這樣子來看，那個時候台灣的變動很大，大家的事情都非常多。我們有社會的事情、社會運動的事情、《台社》的事情、《島嶼邊緣》的事情還有清華自己這邊的事情，我們清華這邊那時候也搞教師聯會，所以那個時候事情是非常多的。我們不可能說來盯每件事情這樣子的狀況。就像當初加入《島嶼邊緣》，也是陳光興和幾個朋友主動希望我或少數幾個朋友加入，可是一方面其他事情很多，另外一方面沒有像當初一樣 dominate 大家投入參加。所以在那種情況的話，我們就是說看到《島嶼邊緣》出刊才發覺是那樣子的情況，其實是有點奇怪的。但當然有的時候也是接受，只是覺得反正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見麻。可是後來慢慢有一個情況就是說，外面開始逐漸對《島嶼邊緣》有一個看法，那個看法就變成你必須要說，你對大家對《島嶼邊緣》的 image 你是不是能夠認同？或者說不是能夠認同？那如果不能認同也可以，假如說還是有幾個人積極的一天到晚要把大家找過來一起開會、辯論或來談，那這樣的話就真的可以有個會議可以討論。如果說這些當初能夠扮演角色的人到後來也沒有積極扮演這樣的角色，這樣子的話，有時候我可能對於《島嶼邊緣》的事情想要講幾句話，可是要對誰講呢？討論的機會又比以前要少很多。

我當時有個印象是後來就涉及到《島嶼邊緣》有一陣子錢不太夠。那錢不太夠，就希望大家再捐點錢。大家在要捐點錢的時候就有個議題，就是如果你要大家捐錢，那大家就要有機會可以說話，說說我們現在對《島嶼邊緣》的看法是怎樣...等等之類的東西。所以我那時候，好像是與這件事情有關，我就想發表一點意見，但後來大家也好像沒有什麼回應，所以就是當初大家討論的環境到後來都不太存在了。那不太存在的話，另外我們也在忙其他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可能《島嶼邊緣》裡面少數幾個人非常積極在編輯後面幾期的《島嶼邊緣》。然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結束了。

那我記得當初中間有一次開會，在「女人國·家（假）認同」那一次之前，還是「假台灣人」這次之後。我記得有開一個比較大的會，之後的《島嶼邊緣》到底是誰來編，還有我們現在對《島嶼邊緣》有些不同的意見或幹麻，那個時候有略為談一談。可是談一談，後來也沒有什麼結果，就是說大家的意見好像已經不太一樣了。大家就選擇 quiet。（20051109）

因為「內部民主」去中心化、廣納邊緣的要點，使得編輯權的無限上綱，卻也壓迫內部歧見的發聲。《島嶼邊緣》的成員對於接合的錯位，選擇安靜的淡出或退出，內部並沒有溝通的管道及協商的機制。內部面對成員接合下差異性的浮動，在「道不同不相為謀」的結盟共識下，主體可以藉由「解合」選擇自由來去；但卻也喪失了內部民主原本在團體內部拉扯的張力、自省檢討的自我批判空間和推動內部進步的積極力量。

這是極其重要的一點，因為《島嶼邊緣》的文本主要以「專題主編」的風格呈現，實際上並無法反映出當時人際互動串連的豐富度和複雜性；並且沒有任何一位編輯成員可以代替《島嶼邊緣》全員發言；甚至《島嶼邊緣》的出刊專題只是呈現專題編輯的意見，並不代表《島嶼邊緣》的全員意見。這樣的反應代表著《島嶼邊緣》文本的侷限性，文字的呈現並無法反映這些邊緣知識份子當時的身體感覺。所以《島嶼邊緣》雖然在當時實際做為一個同仁串連的組織形式或團體結盟的平台；並且具體呈現《島嶼邊緣》內部民主的實踐及對異質意見的包容性，但內部民主的實踐最後隨著時間的變遷而產生外部的鏡像反射，欲貼上固著框限《島嶼邊緣》的標籤，而終致《島嶼邊緣》內部民主產生變質。

蔡其達（筆名 晏山農）：到了 5、6 期之後，版權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導致它不得不轉向，所以接著第 8 期的國族論述。.....後來吳昌杰退出了，開會的人愈來愈少後，其實跟原先熱烈的反應已經就不一樣了。所以原先《島嶼邊緣》包容不同型態的組合，原先想辦雜誌把

各式的人全部以「人民民主」為主軸的左翼新路線能夠串得出來，最後導致只剩下少數兩三個人，在四處飛奔，內部的多元不見了。所以財務狀況雖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但是真正關鍵的因素還是「人」的熱情，因為人數不足的時候也只好宣佈解散。雖然解散之後，王浩威曾想在短期之內再辦一份雜誌，但是基本上已經是不可能的。再加上說你現在再看這群人，按照現有藍綠的光譜來看都有，所以很多人現在正站在敵對立場，已經不完全像當初那樣子了，所以根本不可能。後來其實很多人都轉到《台灣社會研究季刊》，而那一批人就變成跟「民主學校」一泛藍的那批人走得很近，被歸類到那批人裡面，所以跟後來很多人又不太一樣。所以目前來講，你要再做這樣的一個組合，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我剛開始也有講過，要不是王浩威，這五、六路人馬基本上是不可能碰在一起的。所以那是一個偶然的因素，那一旦這樣偶然的因素不見了，那就真的大家各自分散了。(20051015)

《島嶼邊緣》宣稱透過內部民主的編輯模式開創泛左翼邊緣的發聲空間，但當中稿件刊登的揀選及專題編輯的規劃和編輯成員的串連流動，都無可避免有著一個吸納／排除的運作邏輯，在「人民民主」的「串連」概念下被稀釋掉了。加上後期性／別議題及酷兒和情色專題等的「後正文」風格引發外部標籤化和內部論述的排斥性，也促使軸線往性別認同和後正文風格的全面轉移，更造成部份成員（尤其是「戰爭機器－讀書會派」的成員）無以著力甚或拒絕外界的標籤化，選擇淡出《島嶼邊緣》的編務。

吳永毅：各自在其他的運動上找到發聲！至少我們搞運動的人覺得它已經沒有運動的作用了，事後來看。(20060719)

何春蕸：那時候必須要從一個動態的變化當中去理解，當那個動態的狀態逐漸在變化，社會的氛圍逐漸在變化以後，《島邊》生存的動力在哪裡？《島邊》願意做的一些什麼事情在哪裡？就會慢慢開始鬆散掉。像末期的時候，93、94年的時候，「婦女運動」開始分裂，也會使得《島邊》裡面原先一些婦女運動的理論人士退出，像黃毓秀就退出了、離開了。在某個階段的時候，政治立場不是一個很重要的考量，我們的某一種搞法被人家視為有顛覆性的時候，大家還可以合作。可是到後來當某人已經擁抱某一種政治以後，她就覺得不可以跟你在一起了，她就慢慢會飄離了。還有另外像一些人，有一些年輕的去讀書，繼續學業，或者其他的工作，當然就會沒有那麼大的凝聚力量。《島邊》是一個很講求「慾望」的刊物！這是陳光興在講的字。(笑)「人們有慾望的時候，我們繼續搞；人們沒有慾望的時候，我們不會讓它苟延殘喘！做出個四不像！」(20051012)

蔡其達（筆名 晏山農）：《島嶼邊緣》顯然在學生圈裡面應該有得到很多的迴響，甚至現在還很多人在回顧九〇年代初期，整個《島嶼邊緣》帶給閱讀、思考方面的一個衝擊。然後《島嶼邊緣》的重要不在於文字本身，而在於圖片相關介紹、廣告之類的「後正文」。所以《島嶼邊緣》我哪一期也好、傅大為那期、馮建三那期，我們基本上還是用那種類似《當代》、《南方》的那種文字本身還是很正經八百的東西，只是穿插很多情色味道濃厚的圖片，圖說也是很顛覆。所以在這麼多年裡面，它的確提供了另類的選擇。

另外就是成員之中包括陳光興、傅大為、卡維波（甯應斌）、何春蕸，他們慢慢已經他們的領域建立強而有力的知名度以後，就慢慢他們做他們自己的事，所以投入的比例也比較低。因為九〇年代初期的時候，他們可能剛回來，所以大家都有心、有時間，也需要集體的努力才能建立...，但等到93、94的時候有些人知名度已經打出來了，就不需要再靠這樣一個集體的努力；或是他們原有的研究計劃可能已經讓時間繃得很緊，不可能在外頭再那樣投入一個雜誌型的工作，所以慢慢共識就瓦解了。

吳永毅：後來我有點意外的是為什麼會變成卡維波（甯應斌）、何春蕸、平非（王蘋、丁乃非）成為主要的，其他的讀書會派的最後都沒有了生產力...

所以卡維波（甯應斌）人民民主的難題怎麼解決？(笑)就是說，形式上有個形式民主，誰來搞這個就誰主導。理論上大家都有一樣的機會，但最後證明他是最大的麻！那怎麼辦？(笑)那就只好給他主導。(笑)

但是當時原來的設想是很多人還會去主導，但那些人後來都沒有出來，甚至連翻譯的東西最後也沒有出來。我也覺得很奇怪？那些理論上應該有些生產力的人，為什麼到後來會沒有生

產力？我還在想的是，（應該是我論文要寫的才對）（笑）是不是跟運動的關係？就是作為一個「論述」，跟實際「運動」有沒有接合？我覺得《島邊》真的比較有發揮作用的是在「性、情慾」這一塊，在運動上有一個實際對應的群眾，其他的運動是沒有的。譬如說「工運」根本就沒有，所以做工運的每個都在嘲笑我。就是它企圖在運動上發揮作用但沒有。那你至少在事後看是在「性別」，好像還發揮一點作用。雖然我還是覺得有點菁英，就是說它會拉到一些比較菁英性的群眾出來，可能也許性別在都會裡面不得不這樣，但至少它還有個運動面作對應。那其他人這些什麼「逃逸」啊！它到最後沒有一個實際的力量在對應。那我覺得他的動力就會沒有。我猜想啦！

還有一個有趣的就是說，我認為有一個點可以去看的是，《島邊》是唯一左派可以在學術裡面作為生存的歷史階段。你看從《夏潮》到《南方》，都不可能，他們在校園內都不可能講「左派」。到了九〇年代，解嚴以後，在校園裡面你可以大談左派，招收學生。那他某種論述的慾望被滿足，那因此他就不需要那麼運動的刊物作為他熱情的動力。但這種「奇怪的性」在當時好像還不行，至少在95年以前，那它又有一個運動作對應，所以它極具生產力和多樣性。那其他的運動都沒有麻！我不曉得啦！這可以往前看的。（20060719）

所以除了因為上述內部多元的消失，另外對於《島嶼邊緣》所開創的虛擬、形上的反對論述，雖宣稱是一條躲避政府當局施壓的逃逸路線，也打破了原有反對運動固有的想像空間，但實際上對於政權的反抗影響力往往流於虛晃一招、無法著力，難以產生威脅性的撼動。加上前述邊緣戰鬥及後正文之酷兒操演的菁英論述難以接合群眾，逐漸走向偏離群眾的另類、菁英、小眾的刊物風格。事實上，外部的政經環境快速的轉變、新媒介型態的出現及媒介議題的解禁開放，內部刊物稿源的短缺及成員的高流動性……等均迫使《島嶼邊緣》停刊的因素之一。

何春蕤：中間有很多的討論及專題的營造，而當時的互動看來也有點小脆弱，因為後來也沒有拉得那麼緊。也是因為大家在那個時節點看到一個可為的空間，文化上的某一種轉變，某一種介入，有人提供了這樣子的一個園地，然後所有的事情別人都幫你做完了，你只要生產就可以了。後來的話，譬如說像學術的人，會愈來愈忙，因為台灣的學術專業化也開始腳步愈來愈快，學術專業化會迫使某些人要寫什麼樣的東西，時間上怎麼分配的話會有一些考量。當然《島邊》本身沒有足夠的人力、物力足夠讓它繼續支撐。

另外你看《島邊》的版面，它是跟一般雜誌不一樣大小的，其實在檯數上來講影響很大，其實會浪費一些紙張，整個大體切起來不會是最工整的那樣，所以你只要把書改變一個大小或型態的時候，就會影響生產原來的成本。然後閱讀的人口群還不是那樣的大，因為就是這麼多人，你也不可能一次賣個一萬本，在收入上來講是沒有辦法可以去維持它的，它畢竟要變成比較小眾的閱讀品，當然它影響到的是「菁英小眾」。我的意思不是說象牙塔裡面的那種菁英，而是在運動領域裡活力很旺的人，像吳永毅在工運裡面很重要的人，也可能是知識界生產力能一領風騷的教授們，也在這裡面得到一些滋養。也就是說在學術圈裡面的狹窄空間，使得他們可以在《島嶼邊緣》裡有另外一種表達他們的意見，寫他們不是最直接跟學術相關的學術論文，而是他們另外一些對社會文化的批判。（20051012）

吳永毅：《島邊》的讀者還是太菁英了，我覺得。我覺得那是困境的地方。（王蘋：很小眾）從我們當初希望它是一個《南方》性質的雜誌，到最後我們很歪搞，而那種歪搞也是需要很菁英的才懂那種歪搞，就是歪在什麼地方。它就沒有辦法變成能夠影響一般學生的雜誌。……我就是說我們吸引到的還是像以黃孫權為標籤化的這種人，就是擁有一些文化資本的邊緣知識份子，很菁英。那一般從中南部上來的學生有熱情投入社運的，那種就沒有辦法影響他。但會影響那種在都會區裡，某種程度他知道你在搞什麼，他知道你試圖講一種不同的語言，就是這一群人，那這樣算發揮什麼作用？就蠻有趣的。黃孫權我覺得某種程度是我們影響的，應該也是被我們影響的人！（笑）（王蘋：會對這個有興趣）（陳筱茵：有影響，但是他們也會反過來批判《島邊》的那種人）。我覺得「破」某種程度看到我們的侷限，所以它又試圖想要再大眾化一點，雖然我覺得還是跟我們的路線很像。就是都會中堅的前衛菁英。雖然它所謂草根，但我覺得並沒有辦法繼續。當時我們的想法是說至少各有一部份，你可以有一些理論，然後也有一些很前衛的；會吸引像當時我們想像中小劇場的觀眾...等基進的

人，但也應該要有一般人或一般學生可以看的東西。...但這樣某種程度還是很菁英，因為語言就朝向那個方向去了，所以就沒有一個大多數人更草根語言的那一塊，就完全沒了。那這個可以檢討，因為就沒有運動性質了，或說運動只發揮一個很小的功能。雖然一開始也有這樣的希望，至少在校園裡面講些不同的聲音讓別人聽到，（因為當時所有的雜誌都沒有了）。希望講完後。可以吸收一些人來跟運動結合，但這個功能就沒有了。看有沒有吸收到一兩個人。（20060719）

所以總結前述《島嶼邊緣》以「邊緣戰鬥」和「後正文」實踐論述遭遇的侷限性及批判外，政治、社會、媒體在解嚴後的快速變遷，也就是資本主義生產環境的結構性轉變所遭遇的新困境，影響內部成員的時間切割；而論述的路線轉向，也迫使內部民主、新舊成員交替的世代差異等問題浮上檯面，迅速緊縮《島嶼邊緣》原有的開放性及運動能量。而解嚴氛圍下知識份子與各方思潮的聚集、竄動、交流是雜誌的內容無法呈現的狀態。初始的創刊集結漸漸與雜誌文本的編輯風格形成岔線，後期（第七期之後）論述軸線的移轉引發一連串的內外效應，終致《島嶼邊緣》的停刊。

而這項轉移不免備受外人質疑是牽涉《島嶼邊緣》內部在學院內外的路線之爭或新舊成員的權力鬥爭，促使《島嶼邊緣》呈現初期重理論、國族、歷史，後期偏重外來投稿、情色、慾望的轉變。《島嶼邊緣》由理論引介的學術性轉向政治性實踐的批判角色，其論述軸線的改變，必須配合對其思想論述、主張的闡明，並配合歷史性脈絡的分析，才能更確切掌握其轉折迭起。若忽略時空因素變遷的影響，就難以擺脫《島嶼邊緣》的內部觀點，落入《島嶼邊緣》係單純因內部關係推擠而導致轉向的獨斷。所以「前後期《島嶼邊緣》的風格改變，可以說是權力的轉移，但不能說是權力的爭奪」（王浩威，《POTS》，1996.4.12：29），是因應社會條件的變遷由外部及內部造成論述的轉向。

論述軸線的轉向是一個內外部力量相互纏繞纏繞的拉扯推擠，非靜態的線性發展，更難以因果斷定。《島嶼邊緣》異質化的成員組成，在解嚴後政治、社會局勢的快速變化下，使得原本就分屬不同反對陣線的成員難以分撥時間及精力參與投入《島嶼邊緣》的編輯事務。而內部專題編輯採「去中心化」的編輯制度，並且沒有一固定的中心思想，促使《島嶼邊緣》專題主編的色彩風格強烈，都導致《島嶼邊緣》稿源的不穩定性。另外美國壓制台灣在智慧財產權政策的制定發展，與《島嶼邊緣》論述由理論翻譯文章轉向自製理論的展開和含納新的編輯團隊進駐編撰，也有不容忽視的互動關係。而現實政治論述的發展也與《島嶼邊緣》「假台灣人」論述的提出息息相關，並引發外部反對運動團體對其統獨路線的爭議，進而產生內部的壓力迫逼，也拉出了《島嶼邊緣》「內部民主」的矛盾。歧異性的難以解消也進一步削弱了內部舊編輯成員的投入並逐漸淡出編輯事務，其間新編輯團隊的進駐產生的世代差異，反向又加重了專題編輯及執行編輯在稿件編撰、檢選的影響性，而「後正文」的寫作策略在此便逐漸成爲外在標籤化《島嶼邊緣》的酷異風格；也間接在此產生排斥其他論述形式的現象。加上《島嶼邊緣》論述的菁英性，難以與群眾、人民接合，逐漸走向另類、菁英的小眾刊物，也失去了原本激進多元的運動能量。在共識的逐漸瓦解，結盟主體的離散，終而停刊。

《島嶼邊緣》的停刊與崛起相同，並非是線性的因果邏輯所能斷定的，必須要理解當時社會條件、經濟基礎、內在動力的轉變，方能理解其最後的停刊決議。而「停刊」

也並非代表《島嶼邊緣》被其他力量所「消滅」，而是「轉化」、「轉進」。也就是說場域中受到內、外「社會力」的拉扯，促使組織產生「異質化」，內部成員轉向或專注於其他路線或戰場。島邊的生死紀事並非歷史必然的結果而是歷史偶然的漣漪；島嶼邊緣的邊緣人仍舊身處於島嶼的邊緣或志在處於邊緣。

並在當時及爾後面對何種社會評斷？《島嶼邊緣》所衍生開拓的戰鬥路線，轉型在何種場域上延續其命脈？或開啓之後台灣反對運動怎樣的可能性？

4.3 九〇年代的後續

八、九〇年代由副刊轉型引領的「文化評論」風潮，隨著《島嶼邊緣》的停刊及成員的分殊化在九〇年代後半，間接以論述形式或成員直接投入的方式，主要轉進《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破週報》的編撰、「國際邊緣」網站的架設、「文化研究」的學院建制化...等領域。

4.3.1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988.2 創刊）是標榜新左批判路線的同仁誌學刊，提供以學院學者為主的發言管道，與台灣的社會理論發展和實踐運動對話。（另可見本文頁 15）

《台社》也是在八、九〇年代之交與《島嶼邊緣》並行的學術理論批判性刊物，初期編輯成員在名單上多有重疊：王振寰、李永熾、呂正惠、杭之、林俊義、徐正光、夏鑄九、陳光興、傅大為、柏蘭芝、錢永祥、鄭村棋、瞿宛文...等的學術體系成員。因其編撰形式要求嚴謹的論文撰寫格式和學術性的審稿制度，另對編輯成員亦有嚴格的審查制度，也推擠出《島嶼邊緣》當時創刊時，偏離過於學術性、理論性的酷異定位，並容納非學術性、理論性的文章類型，甚至多元含納各方人脈的進駐編撰。

傅大為：《台社》那個時候已經都在發展了。《島嶼邊緣》出刊的時候，《台社》是第三卷第一期。《台社》那個時候就逐漸上軌道，那個時候你就可以看得出來它跟《島嶼邊緣》的不一樣。我不知道中間有沒有那樣的一個關係，《台社》在發展的時候，已經到第三卷的話，陳忠信經掌握了整個發展的韻律，有的時候可能杭之的意見也會蠻強的，這就涉及到一些比較敏感的情況，可能在這個意義上，有些聲音或者更 radical 或更奇特一點的東西，可能在《台社》那邊，聲音不見得容易出來。那時候有一個可能性的說法，說不定《島嶼邊緣》可能比較不會受那麼多的限制，比較亂七八糟或比較奇怪的東西可以更出來。（20051109）

萬胥亭：《島嶼邊緣》的各路人馬裡面包括《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當然裡面有些人是重疊的，趙剛、陳光興、馮建三、瞿宛文、夏鑄九。《台灣社會研究季刊》與《島嶼邊緣》是一段平行的發展，號召力還是沒有《島嶼邊緣》大，但它還是繼續持續下來，相對它有一個形式上的凝聚力量。相對而言，《島嶼邊緣》就沒有嚴格的審稿機制。所以《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可以維持，基本上就是採取學報的性質及運作的體制，並且經費上可能沒有太大的問題。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也實際有參加一些社會運動，也有辦一些座談活動，照理講他們應該會有更大的影響力。

辦《島嶼邊緣》之前，大概是讀書會、「戰爭機器」專欄的時候，《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就有了。我參加過一個小劇場的「重審魏京生」的座談會，最早好像有杭之參加，當時的年輕人和地下團體當時都很景仰《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的人，好像他們剛開始是代表著台灣當時進步、開明、批判的立場並且學術嚴謹的學者。但或許後來這樣的形象有漸漸被《島嶼邊緣》取代，但當時年輕人對《島嶼邊緣》也不是一種對學者的景仰，而是另外一種心態，辦活動時的看到不少年輕學生來參加，是某一種期待或仰慕。可能當時《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的形

象是比較古典、嚴格、嚴謹也比較有格調的學者，它有點像更早解嚴之前的《中國論壇》當時的那批人，像李鴻禧、瞿海源、楊國樞...等廣泛自由主義者。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像傅大為我就覺得好像是從《中國論壇》那一類型的知識份子轉換到我們《島邊》，他是介乎這個中間的。那《台灣社會研究季刊》那批知識份子也就像是這樣子，包括傅大為、趙剛、馮建三，他們像是從自由主義更往前走左派的立場。

相對而言，《島嶼邊緣》就代表著一種形象上更年輕、活潑的知識分子，比較廣泛的文化評論者，結合西方前衛的理論直接連結實際的社會文化現象、流行文化的現象，這可能是當時《島嶼邊緣》比較具號召力、感染力的地方。另外一個可能就是一陣子的熱鬧，現在想起來也蠻難得的，不管是開會或辦活動。《島嶼邊緣》與《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在當時是平行的，《島嶼邊緣》如果開會，那邊的人都會過來，可是《台灣社會研究季刊》開會，我們是不會過去的，他們是比較對內的，而我們則是各路人馬都會來參加，但力量也比較分散。不過相對而言，《島嶼邊緣》還比較沒有參與實際的社會運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還比較會以社團的名義參與活動，但公共的形象還沒有建立起來，所以還是比較一個嚴肅的形象，和年輕人還是比較有距離。《台灣社會研究季刊》是比較老左派的立場，焦點還是比較擺在政治、經濟、社運的批判，而文化的問題有，但不多。他們多是以社會、政治來批判文化的問題，這或許也是他們的一個問題，就是比較沒有切合一般群眾、年輕人關注的問題。這些議題也不能講不重要，但與群眾、年輕人比較不切身，關注也就相對少一點，或許因為這樣《台社》與學生比較疏遠一點，相對《島嶼邊緣》一開始就是以比較廣義的文化形象來涵蓋政治、社會。當然《台社》也有一定程度的專業學術的價值。(20050924)

所以《島嶼邊緣》與《台灣社會季刊》相比，形象相對年輕、靈活、酷異。而其後，《島嶼邊緣》部分在學院內的編輯成員，透過「戰爭機器」和《島嶼邊緣》...等的論述累積和學術場域上的文章發表，從1993年開始，何春蕤、馮建三、趙剛、甯應斌、丁乃非...等，也開始陸續挺進《台灣社會研究季刊》擔任編輯委員。這支「島邊派」人脈的轉進，也「島邊化」了《台灣社會研究季刊》，某種程度轉變了《台社》原本僵硬的學術形象，也可視為《島嶼邊緣》停刊後力量的移轉。

何方(甯應斌/筆名 卡維波):《島邊》後來很多跑到《台社》去了，某種程度上。當然《台社》這些人比較不是「戰爭機器」(讀書會派)的人。那種緊張關係只是說《島嶼邊緣》的人怎麼慢慢進入《台社》，我覺得當時是有這樣的緊張。就是當時《台社》變質了，是有《島嶼邊緣》的人跑進去了。(20051012)

何春蕤：陳光興是最早進《台社》的，你(甯應斌)很晚才進的，你(甯應斌)在我和丁乃非之後，最晚進去的。

當時就記得《台社》和《島邊》有某種比較緊張的關係，因為《台社》有點怕「被島邊化」，尤其是島邊的人進去以後，我們逐個逐個進去以後，其實他們是有點擔心會「被島邊化」，畢竟這兩個路數有點不太一樣。

大家都講說《島邊》很多人進入《台社》，可是事實上，《島邊》的人在《台社》並不以《島邊》的身分出現，我們還是以《台社》的社員身分出現。當然在《台社》裡面《島邊》的成員是會有一些很奇怪的位置，比較《台社》裡面的某種怪胎吧！

《台社》是長久存在的，比《島邊》還早，我們都是後來慢慢逐漸進去的，等於是我們學術的位置更加確立以後。因為《台社》不是隨便收人的，《台社》的入門是有一定特殊的審核，要有社員推薦和一定的表現，他們覺得夠格才可以進去。不過我們現在已經過了被審核的階段，因為我們現在已經算是老人了。《台社》現在都是年輕一代的，像徐進鈺、夏曉鶯...這些年輕一代的已經接手了。我們也不必再讓《台社》有一個兩難的狀況：這些人活動力很高，但不能靠他們...(大笑)(20051012)

馮建三：兩邊本來就是不同的人。《島嶼邊緣》的文章是不用評審的，但《台社》不行，你一道道程序還是都要。那這個就是刊物的設定對象並不相同。那《台社》是有一個總編在抓著一個編輯方針，可是《台社》每個人開會的時候會貢獻意見，《島嶼邊緣》就是你認養一期，那是不太一樣的。

《台社》最理想的狀況其實是企劃式的編輯。譬如我覺得這個議題重要，要讓它被知道，要鼓勵人家寫這方面的論文，就會開始規劃，找幾個有能力的人來寫。可是他們寫的東西還是要經過評審程序，所以沒有辦法把握說他們寫的一定可以照登。就是要去經過這樣的程序，這樣下如果要講它嚴謹，它是比較嚴謹；如果說它比較僵硬，它就是比較僵硬。

而《島嶼邊緣》主要是因為沒有明確的宗旨。相對於《台社》至少搞得比較久，那《島嶼邊緣》其實不太一樣。兩邊的人馬其實有部分重疊，那《台社》還在搞，為什麼《島嶼邊緣》會停呢？一個因素也許是，《島嶼邊緣》是不是都要靠募款？《台社》至少沒有這個問題，因為有（唐山）出版社幫你出費，所以只要出編輯的人力就好。另外《台社》的定位如果是在學術和搞運動，並且以學術為主，那可能學院的人相對投入的意願就高，因為這跟他的工作是有連帶關係的。那《島嶼邊緣》也不能說跟工作沒有關係，只是在《島嶼邊緣》做的東西比較不能夠直接聯繫到自己的工作。雖然《台社》也不能說直接聯繫，但關聯性比較大。因為文章性質不一樣，所以《島嶼邊緣》可能相對被認定為一種「文化刊物」，不是工作場域的東西。那基本上《台社》要能夠存活，就要被定位為要有發言權，它就要有一定所謂的「學術水平」。那這可能跟兩邊的差異有關。而《台社》可能一開始跟有傳大為這樣的人長期在耕耘也有關。（20051028）

所以有別《島嶼邊緣》開放的編輯模式和論述形式，及需自行籌組資金的發刊方式，《台社》以嚴謹、僵硬的學術論理特性，並由唐山出版社直接印行出版的經費支援下，持續提供學院運動型的學者批判文化、社會的發聲管道，成為九〇年代至今仍存在的左傾刊物之一。

4.3.2 《POTS 破週報》

1994年9月，《破週報》以「《台灣立報》週末版」一兩張八版的形式開始。一方面《島嶼邊緣》的後正文風格部分提供《破週報》形式上的想像資源，與流行文化和主流新聞的直接對反為編撰重點，以邊緣、冷僻的主題加上後正文剪接而成的文化評論型式發刊，對於「青少年次文化」、「邊緣另類的藝術文化資訊」...等多有報導。相對而言，《破週報》呈現的是年輕世代的聲音，以「我們在島嶼的中心爆發·作為島嶼邊緣的鏡子」為宣稱和以「有破才有立，有立必有破」的孽世代自居。在1995年9月從《台灣立報》分立出獨立周刊，獨立擁有訂戶、零售點、文字記者。

另一方面，《島嶼邊緣》第10期「酷兒 Queer」專題主編的紀大偉、洪凌、但唐謨，和第11期「民眾音樂研究初探」（另翼岸譜）專題主編的張育章、張釗維為主的年輕世代編輯成員，均前後進駐過《破週報》擔任特約撰述或文字記者，其中張育章、張釗維甚至是以《破週報》為當時的工作志業。而《島嶼邊緣》其他編輯成員也偶有在《破週報》為文撰稿。《島嶼邊緣》與《破週報》形成一種既是「批判世代」的差異對話，某種程度又是相互為用的「戰鬥夥伴」。

4.3.3 「國際邊緣 InterMargins」網站 <http://intermargins.net/>

國際邊緣的「國際」是在國家的邊際（margins of nation-state），也是國際主義精神下的國際（international）。

社會存在著多個邊緣，我們不只是自居於某個邊緣的中心，我們必須遊走於眾邊緣之間，在邊緣的邊緣流動，連結群眾邊緣，使眾邊緣的力量得以彼此流通、互相傳送。（「國際邊緣的

前世今生」網頁)³⁸

《島嶼邊緣》停刊後，以甯應斌、何春蕤、丁乃非...等為主，隸屬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的編輯成員，架設「國際邊緣」的網站。「國際邊緣的前世今生」網頁中，直接點明了「國際邊緣是繼承了島嶼邊緣的精神，並在新世代繼續轉戰。網羅了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等知名社團加盟」：「T 灣新銳文化工作坊」、「台灣社會研究季刊」、「文化研究學會」、「青少年解放陣線」、「性政治」、「苦勞網」、「性別人權協會」、「反對假分級制度聯盟」、「性／別研究室」、「夏潮聯合會」...等邊緣左傾團體，持續以「邊緣戰鬥」的立場和「後正文」的惡搞風格轉戰網路世界串連人脈。以專題討論、名家專欄、無情批判、邊緣枝葉...等分類，收攏各類邊緣、激進、批判的文章觀點，並成為邊緣訊息、活動串連的資訊平台。

除了以「T 灣，舊稱台灣，是一群假台灣人創立的破國家」，來延續《島嶼邊緣》時期的政治立場。並架設「島嶼邊緣」的連結網頁³⁹，近期更進行將《島嶼邊緣》1-14 期全文上網的工作。現今已有《台灣的新反對運動》一書和《島嶼邊緣》第 2、9、13、14 期的全文上網和《島嶼邊緣》第 8 期的部份文章。

4.3.4 「文化研究」的學院建制化

隨著市場的緊縮、政治權力的改組完成、反對性社會運動能量的體制化，原來相對存在的激進縫隙逐漸消失，媒體呈現相對保守化的現象—或許有人會認為之前副刊的功能被民意論壇所取代，但是真實的狀況其實是：不但具有批判性的文化副刊倒退成不痛不癢的文藝副刊，而且由於民意論壇的特殊時勢現實性質與「新聞性」性格，使得之前文化副刊那種帶有烏托邦色彩、超現實但又貼近現實的性格、不受限於現實邏輯、主流思惟邏輯、或純粹邊緣、有攻擊性的文章都不可能刊登，所以事實上媒體民意論壇版雖然有某種自由化的公共論壇的性質，也確實是之前報紙媒體所沒有的，但是它畢竟排除了某些文類，這也是台灣公共論壇的危機—只有符合一定書寫形式、立場的文字才能進入所謂公共論壇。學院在這些轉變下，才慢慢成為這股力量的集散地，以文化研究的形式來出現。當初參與在這個過程中的寫手，學院中人其實只是一部份（以《島嶼邊緣》為例，它的組成份子相當多元混雜的），而且也相當不認同我們所處的學院菁英位置，例如在書寫上不斷用不同的筆名來置換跟自己的謀生職業黏在一起的名字，一直到今天轉變成必須強迫自己接受，當初之所以有發言位置的文化資本，不僅僅來自於我們的快筆及市面上沒有的怪想法，而確實與我們盤據了學院位置的客觀事實有關。（陳光興，2000：14）

八〇年代末期副刊轉型的「文化評論風潮」的確在《島嶼邊緣》做了收攏，而《島嶼邊緣》每一特輯的理路緊扣著現今「文化研究建制化」的發展主軸：身分認同、身體、消費、媒體、族群、性別、批判理論...，與台灣文化研究主題設定涵蓋面向多有重疊。並且「島嶼邊緣雜誌社」唯一的出版刊物《內爆麥當奴》是 1992 年文化研究年會的文字集結，可以視為「文化研究」建制化前的論述積累；但難以證成《島嶼邊緣》當時的

³⁸ http://intermargins.net/index_pics/whaTwan.htm

³⁹ <http://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IsleMargin/index.htm>

「文化評論風潮」與「文化研究建制化」有某種承繼或因果關係。

一方面八、九〇年代之交的「文化評論風潮」和「文化研究」在九〇年代末期的勃興，有著時間上的斷裂。而「文化研究 **Cultural studies**」這個新詞彙，在八、九〇年代之交仍在進行裝填其在台灣的符號意義，是否要用「文化研究」一詞含納當時的「文化評論風潮」，仍有待討論。另一方面《島嶼邊緣》編輯成員中，主要是相關傳播、外文、社會...等學門的「學院派」「歸國學人」，在九〇年代後期，逐漸從邊緣戰鬥的位置挺進學術建制化的文化研究學門：清華的「亞太／文化研究室」、中央的「性／別研究室」、交大的「新興文化研究中心」、「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和「文化研究學會」...等建制單位和研究單位。

《島嶼邊緣》當時剽悍的邊緣戰鬥性格，在學院建制化後與其他學門的角力，的確削弱其社會參與的程度，並逐漸轉往學術、知識界的資源串連。但《島嶼邊緣》接合西方理論的文化評論形式和酷兒化的批判風格，一方面某種程度提供「文化研究在台灣」的想像空間及論述資源，但另一方面「文化研究」也往往因此遭受外界偏離現實的批判，和傾後現代、去歷史中心的刻板印象所框限。



第五章 結論

5.1 《島嶼邊緣》的生死紀事：讀書會→「戰爭機器」專欄／叢刊→《島嶼邊緣》

1987 年解嚴後，以王浩威為匯合點，組織一開放性的讀書會，閱讀西方思潮理論並藉以串連年輕學者及歸國學人。

1988 年報禁開放後，報紙副刊大幅度由文藝性質轉型具政治性的「文化評論」，經由顧秀賢「文化抗暴」的號召下，以「讀書會」基本成員和「(後) L.A.派」的歸國學人為主，在《自立早報》開設「戰爭機器專欄」，以寫作專欄作為平台，串連其他批判寫手，並點燃一波「拆解」西方理論—「重組」在地論述的「文化評論」寫作風潮。

1989 年彼岸六四天安門事件後，「戰爭機器知識份子」感於「反共」意識為統獨論述所對立、挪用，遮掩左翼反體制的視角，由唐山出版社印行《歷史如何成為傷口—「六四」的非官方說法》一書，並計劃性編撰出版「戰爭機器叢刊」1-12 本，整套書系標榜「讓思想成為戰爭機器；讓身體成為機器戰警」，試圖劃出「去中心化」的「逃逸路線」。

1990 年以「戰爭機器」為主的知識份子，在《當代》(47 期) 為文介入 1986 年開始的「民間社會論爭」。是以接合 Laclau & Mouffe 的「文化霸權和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戰略」和 Stuart Hall「威權民粹主義」的分析概念及對 Laclau「人民民主」的修正開展，由甯應斌以「後正文」為書寫策略編撰《台灣的新反對運動—新民主之路：「邊緣癡亡メ」的戰鬥與遊戲》(機器戰警 編，何方、王大衛、無向、林威、蔡普共同協力，1991) 一書，提出「社運觀點」的「人民民主論」及「邊緣戰鬥」為戰鬥位置的「台灣的新反對運動」，對應以南方朔、江迅、木魚為主的「政運觀點」的「民間社會論」。另，感於 1990 三月「野百合」學運、五月「反軍人干政」抗爭後，李郝體制新保守主義和威權民粹主義的傾向，在 1991 年串連人脈發刊《島嶼邊緣》(1991-1995, 14 期)：「葛蘭西一〇〇」、「科學·意識形態與女性」、「拼貼德希達」、「廣告·閱聽人·商品」、「宛如山脈的背脊：原住民專輯」、「身體氣象」、「佛洛伊德的誘惑」、「假台灣人」、「女人國·家認同」、「Queer 酷兒」、「民眾音樂初探」、「保衛阿圖塞」、「激進神學」、「色情國族」。

《島嶼邊緣》在面對前後期《夏潮》、《人間》、《南方》、《當代》、《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等人文、思潮、批判性刊物的編輯模式及立論軸線，採行「專題獨立式主編」的編輯運行模式，開放「去中心化」的編輯權。《島嶼邊緣》初期專題以引介西方理論思潮為主：Gramsci、Derrida、Freud、Althusser... 等的理論。1993 年遭逢美國在 301 條款—智慧財產權上對台灣施加壓力，在六一二大限後西方理論翻譯版權的不易取得，迫使《島嶼邊緣》在第七期之後「理論翻譯」文章的減少；並因專題獨立編輯的個人風格化，轉為認同政治的自製專題並加重「後正文」、「性別解放」的酷兒風格。

在面對李登輝和反對黨—民進黨以「生命共同體」和「四大族群」的論述建構「台灣新國族認同」，王墨林、何方(甯應斌)、吳永毅、鄭村棋製編第 8 期「假台灣人」專輯，藉以諧擬嘲諷「外省人台獨」的認同形構，但《島嶼邊緣》以「假台灣人」的之姿

並無踰越統／獨二元對立的泥沼，「反台獨」論述反而將省籍、統獨意識形態的分歧拉進《島嶼邊緣》的內部。後續再第 9 期「女人國·家(假)認同」、第 10 期「酷兒 Queer」、第 14 期「色情國族」的「後正文」、「酷兒化」的風格引起形式重於內容的標籤化，及內部對於「學術／另類」批判分際的差異立論觀點，逐漸暴露內部民主機制的健全。

另外「邊緣戰鬥」邊緣身分認同形構及「後正文」的書寫策略，原本打著「反菁英」的論述實難以與普遍群眾相互接合，逐漸流於另類、小眾的菁英論述，成了「『反菁英』的菁英」。

在內部逐漸喪失多元流動的因子和其論述與群眾、運動的無以接合，和各自戰線經營的漸成山頭，均削弱參與《島嶼邊緣》編輯事務的內在動力。《島嶼邊緣》發刊 14 期後，在 1996 年正式宣佈停刊。

5.2 泛左翼、邊緣另類的文化刊物

從台灣戰後左翼發展的軸線視之，《島嶼邊緣》是八、九〇年代之交新／泛左翼的文化批判刊物。而以雜誌、媒體的類型視之，《島嶼邊緣》既也是台灣在解嚴之後的另類媒介、小眾媒體。

5.2.1 左翼文化批判刊物的軸線

從國民黨反共抗俄的年代開始，Marx 馬克思、社會主義或是簡體字的書籍，一直被視為一種禁忌。但是戒嚴政策的禁制仍擋不住求知的慾望。而左派的思想在七〇年代的保釣運動後，逐漸成為台灣在地知識分子的論述資源。

歷經二二八事件以及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台灣左翼運動，至 1955 年台灣自日據時代以來的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義、反資本主義的左翼運動，在國民黨政府強大的、專制的、一元化的軍事、政治鎮壓下，從地下組織到外圍群眾、甚至思想上的清算，只要沾上左翼的人一一被槍斃、構陷、牢刑、拆解、清除，掃蕩到幾乎乾淨溜溜的地步。然而從 1970 年代開始，自保釣運動以迄民族主義座談會、新詩論戰、到鄉土文學論戰及美麗島事件止，在每一次的政治、社會、文化運動之間，幾乎存在著左翼思考的論述文字，甚至實踐行動。(郭紀舟，1995：3)

五〇年代的「白色恐怖」在思想上及身體上的規訓之後，台灣的人民逐漸失去了「左」邊的眼睛，看不見或不敢、不願看見左翼思潮背後所蘊含的「人民反體制力量」。六〇年代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所引發的反體制風潮狂飆席捲全世界：由毛澤東刻意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 1966 年的中國大陸如火如荼的展開，這場延燒十年的運動，影響到六〇年代國際上反資本主義的狂飆運動。法國 1986 年 5 月學運後，西方知識界興起一股左翼思潮熱，七〇年代留美的台灣學生在海外除了接收到美國自由主義的洗禮，也不免遭逢左翼思想的撞擊，自然也逃避不了這整個狂飆的思潮。併以愛國的「民族主義」串連海內突破壓制、尋求自由的保衛釣魚台運動，左翼思想的土壤重新被激活。即使在戒嚴體制下的台灣知識份子，也感染到這股國際氣氛。

《夏潮》—「一本社會主義的雜誌」發刊後，企圖在台灣社會中型塑一股批判性的左翼論述。而之後接續發生的新詩、鄉土文學、民歌論戰，實際上可說是非僅關乎文學、文藝，而甚關乎政治意識形態的角力，藉由隱晦的「文學的語言」來開展左翼的「政治的力量」。

1986年《夏潮論壇》宣告結束後，夏潮系統正式分殊出路線不同的理論論述型態，以新馬克思主義者姿態興起的《南方》首先於1986年10月創刊，發行人林永豐，社長鍾肇政，副社長呂昱，主要編輯為王杏慶、江迅、黃志祥等人，《南方》的基調在於青年學生的啟蒙工作，並積極帶入文化批判的知識領域，八〇年代後期學生運動的興起，《南方》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郭紀舟，1995：247-248）

而《南方》原以反國家霸權、資本主義霸權為核心，鼓吹「民間社會論」的興起，1988年停刊後改組「台灣政經研究室」，帶動大學生進行社會運動的組訓與串連，極具實踐性格。但標榜新左翼的《南方》在「民間社會論」提出「政治優先論」、「資本自由開放」的論述，逐漸傾向台獨、重商立場。而原本薄弱的左翼力量，因統獨爭議又再再被削減其扎根累積的能力，加上國外左翼的政體接續發生強烈的變革，也迫使台灣本土左翼知識分子尋找新出路。

八〇年代左翼運動的分殊路線也逐漸呈現多元紛雜的面貌，在左傾的報導文學性刊物《人間》的停刊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要求學術論文審稿制度的學刊型式，和《當代》也偏重學術論理的擠壓，均難以凝聚收納邊緣左翼的反對力量。邊緣左翼慢慢從傳統左翼的旁邊竄出，由關注經濟生產力的面向轉向文化、意識形態層面的抗爭。一方面逐漸擺脫傳統左翼經濟決定論的觀點，以爭奪文化詮釋權為抗爭手段。另一方面也極欲擺脫台灣左翼的統派立場，以「踰越統獨」作為邊緣左翼發展的軸線。邊緣左翼知識分子以泛左傾的反抗意識集結，伴隨著一股解嚴和報禁開放後的文化評論文體，企圖在台灣形成一踰越統獨的左傾批判性論述—《島嶼邊緣》—1991年創刊至1995年停刊，共出版14期，並被視為泛左翼軸線的文化評論大集結。面對台灣八〇年代末期解嚴後國家更細緻的統治手段，及邁向資本主義強勢傾銷的消費社會，企圖在社會改造以及理論基礎上，提出一套爭奪文化詮釋權的運動理論及尋找逃逸路線的行動策略，亟欲尋求新的論述空間及反對力量的集結。

而《島嶼邊緣》後期以「個人即政治」的認同政治途徑，透過「後正文」及「酷兒化」的方式對抗主流文化符號的操作及社會多元的型態，來標誌、塑形自身的認同位置並開創新的認同空間。但這樣的走向使《島嶼邊緣》開創出的「文化評論」寫作文類，逐漸將左翼運動的發展帶往面貌模糊的菁英小眾、次文化、性別運動中。

5.2.2 解嚴時期的文化產物、另類小眾的同仁誌刊物

解嚴後報禁開放，外部的知識份子面對言論空間開放後的亟欲大鳴大放的心態，報社內部也必須因應增張後的版面需求，加上消費者市場導向的驅使，及《自立早報》副刊編輯主編顧秀賢在報社結構的位置及新左、文化研究推手的角色，各報競相在副刊開

放出由文學、文藝評論轉向文化評論的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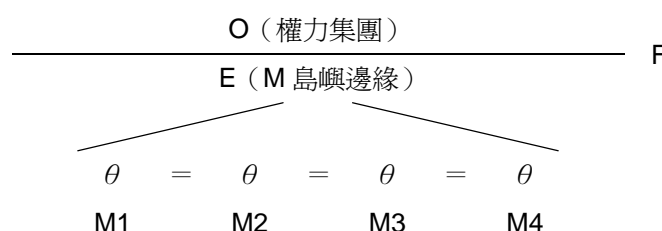
另外面對左翼刊物的式微，和感於其他言論空間在論述內容及論述格式的限制，《島嶼邊緣》有別於其他雜誌的編輯運作，以「同仁誌」—志同道合的人集結而自覺出版刊物的手工編輯模式—編撰的「雜誌書」型態發刊。《島嶼邊緣》以直接民主又地下工廠型的編輯運作模式，形塑出一個議題相異性極高的綜合性文化刊物，但卻也開放出一個流動的空間，具有吸納與擴散議題的功能。並具備新知資訊整理，和透過在地「翻譯」的理論引介，開創新的反對運動軸線和作為論述開展的平台。《島嶼邊緣》在資金、編輯出版、流通上以「非商業發行系統」的運作模式，相較主流論述提供「批判性」的激進論述，關注邊緣弱勢的「小眾」，成為九〇年代初期的「另類小眾媒介」之一。

5.3 八、九〇年代之交泛左翼知識分子的「接合」

以組成形式視之，《島嶼邊緣》是台灣八、九〇年代之交泛左翼知識分子的集結，更是「人民民主論」的理論實踐或應證。

《島嶼邊緣》不僅接合 Laclau & Mouffe 的「文化霸權和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戰略」，提出「人民民主論」以提供台灣的社會反對運動實踐基礎。而論述場域中論述主體的接合過程，也進一步理論性的闡釋《島嶼邊緣》的起落。

也就是說，《島嶼邊緣》在人脈的串連上，這群本質相異的邊緣知識份子即是原本在台灣社會言說場域中眾多游移的要素，因感於多重歷史力量匯集下的時代變革，欲爭奪文化詮釋權而企圖掌握節點，凝聚一種「以文化論述進行社會改革」、「串連弱勢集體發聲」的（暫時性）集體共識，不斷與其他要素同值進行串連接合。並以「島嶼邊緣」為名的刊物形成一暫時性共同體的環節位置，接合「反權力集團」的主體，形成暫時性的結盟，集結統合在《島嶼邊緣》發聲批判，對抗「權力集團」。所以《島嶼邊緣》的起落就是「人民民主」論述的實踐場域：從人脈的結合、刊物的命名、編輯的運作、專題的制定、文本的內容、書寫的策略、甚至是停刊的消逝...均展演了一套「接合／解合」的歷史行動。



《島嶼邊緣》從讀書會對理論知識的積累，到《自立早報》的「戰爭機器專欄」、唐山出版的「戰爭機器叢刊」，運用西方傾左、後結構理論剖析台灣當時的社會文化現象，引起一股「文化評論風潮」。在面臨政經重組後媒體空間的緊縮，開創不為國家及資本收編的逃逸路線—自我投資《島嶼邊緣》的發刊，並被視為「泛左翼知識份子的集結」。《島嶼邊緣》在八〇年代末期、九〇年代初期的定位，不只是一群泛左翼知識分子的集結、散落，也不只是面對當時台灣政經文化環境所提出的批判論述：「邊緣戰鬥」、

「人民民主」、「假台灣人」、「妖言」、「酷兒」...的匯集及最後的消音。在另一個軸線上，也說明新左派／新馬克思主義、後結構／解構、精神分析...等西方當代的批判理論，如何在解嚴前後動盪的台灣社會情境、政經的結構條件及邊緣知識分子主體的心理狀態...等力量的聚合下，被「串連」、「接合」到台灣，形成可供台灣知識份子言說、運用的資源。而這個暫時性的結盟，在強調主體接合／解合的自主性下，面對統獨、省籍的意識形態分歧和「後正文」酷兒風格的過度操弄下，無法透過內部民主溝通的管道凝聚共識，而各自離散。

5.4 九〇年代初期左翼反抗的新實踐論述

從內容論述視之，《島嶼邊緣》是台灣八、九〇年代之交，左翼的新反對實踐論述。

《島嶼邊緣》所處的台灣政治環境及面對的對象，是從二戰之後國民黨塑造大中國意識形態以維繫在台灣的統治正當性，及接續七〇年代「鄉土文學論戰」中對「本土」意識形態詮釋的左右二分，和八〇年代黨外反對運動勢力在政黨組織化後，以「台灣本土」的族群認同動員獨立建國的論述，原本為兼顧弱勢的「族性」成了維護利益階級權力的動員口號，「差異政治」所賦予反抗力量的主動性，也頓時轉化成新保守主義的危險性。

「戰爭機器」為首的知識分子，在 1986-1991 年的「民間社會論爭」中，提出「酷兒化」的「台灣的新反對運動」：以「人民民主論」為論述、「邊緣戰鬥」為位置、「後正文」為書寫策略，針對新興社會運動的發展軸線與民進黨政治反對運動之間隱藏著內在緊張的互動關係，形成以「人民民主論」的「社會運動觀點」對抗「民間社會論」的「政治運動觀點」的文化爭霸。所以，「民間社會論 v.s 人民民主論」論戰背後的統／獨動員問題，不僅是個人身分認同的情感投入，也潛藏著解嚴後政治運動與社會反對運動的抗衡。針對社會反對運動主體性的詮釋，更隱含著知識／權力在當中的操控。

「人民民主論」是接合 Laclau & Mouffe 和 Stuart Hall 的「人民民主」理論的在地「翻譯」論述。以「人民 VS. 權力集團」的相對定義，批判「民間社會論」以「民間社會 VS. 國家」的絕對二元對立；並以動態結盟當中任何主體隨時有選擇「接合／解合」的自主性，無須藉由任何超越性原則達成自身的實踐，批判傾民進黨政治運動的「民間社會論」以「民主政治優先論」和「推翻國民黨政權」統合反對力量的出口。

「人民民主論」原本立意為一「反菁英權力集團」的實踐性論述，標榜「邊緣戰鬥」的立場來反菁英領導解放群眾的論述，以「後正文」的亂寫歪讀的形式來反菁英啓蒙群眾的論述。這群邊緣知識分子或許並無以「邊緣」之名往中心靠攏之實，但不可避諱地確實掌握「知識／權力／真理」的文化資本位置。一方面挾「邊緣」以自重，各擁山頭；一方面操弄必須具備某種程度智識能力方能辨識的「後正文」書寫，尤以《島嶼邊緣》後期「酷兒化」的邊緣身分認同形構：「機器戰警共和國」、「假台灣人」、「女性妖言」、「同志酷兒」、「色情國族」...等為著，形成「讀者 VS. 編者權力集團」的對立，反而遭致過於菁英論述的批評。也就是說，「邊緣戰鬥」與「後正文」的反抗內涵並無法與

《島嶼邊緣》其號召以「人民」為名的群眾接合，也就喪失了作為台灣新左翼實踐論述的反體制抗爭性。而其標榜垃圾精英與學院敗類「就地邊緣化」的高度自主及自慰的表現風格，逐漸偏離傳統左翼和人民群眾站在一起的人道關懷，流於以「知識／權力」形構邊緣身分認同的操弄。

所以《島嶼邊緣》其後反對運動的接合，必須先檢視之前解合的原因；如果選擇漠視、隱匿則落於重蹈覆轍而顯無意義。台灣的新左翼反對運動擺脫傳統左翼過分關注經濟生產的思考軸線後，轉向意識形態抗爭的文化爭霸，而「反本質主義」的走向卻也落入過於「後現代」式的抗爭展現，新身分認同的形塑與展演確實奠基了「跨性／別運動」的抗爭力量，但流於形式的操弄，及漠視身分認同的歷史變遷力量，也致使在統獨問題上無以著力。所以「人民民主論」接合後的難題，也幾是所有進步左翼都面臨的難題：

Charles Landry and David Morley 等人曾做過一個研究，分析英國七〇年代左傾小眾刊物紛紛失敗的原因，頗值得參考，雖然這是個印刷媒體的例子，但因時跨十年，研對對象至少有七十七個，故在多方面具有小眾媒體困境的代表性，也可作為錄影小眾媒體參考。

這些小眾媒體運動者主要是戰後嬰兒潮的一代，他／她們創生並經驗到後工業／後階級／後匱乏社會。這些小眾媒體關注的議題集中在性別、種族、社會主義、性偏好和在地的議題上，這種非大眾化的定位不可避免的產生經濟困難。原來的雜誌市場已經不大，具有政治特殊性的小眾媒體只有更小的市場佔有率，讀者群非常少。

除了經濟問題，這些刊物還面臨團體內部的經營問題。這些案例都崇尚完全民主、非正式、非階層化的組織形式，因此他／她們採用集體決定的決策模式。問題是這種方式的責任由成員均擔，所以沒有人可以為任何事負全責，也無法明確分工，清楚劃分個人責任。在薪給上，採每人等薪制，所以公平性只維繫在薪給平等上，對分工並不公平。最後，在整個大環境的脈絡方面，也有極大的轉變，在六〇至七〇年代期間，多由左派界定議題而由右派因應；但自 1979 年大選後，右派勢力開始佔優勢，使這些小眾媒體遭受斷傷。在內外交攻的情形下，這些刊物不是關門，就是組成成員進入社會結構中的權力位置，使去原有的基進性。（賀照緹，1993：152）

《島嶼邊緣》編輯內部經營及路線策略的轉移所含納的內部民主的問題：歧異的處理，還有世代差異的問題，並非是《島嶼邊緣》所特有的困境，是台灣大環境下進步團體的宿命，也是社運團體發展的必經過程。

「島邊史」並非是一線型歷史進程中的一小截、也並非歷史必然性或偶然性的產物，更非循著歷史進化的軸線前進，而是一個個「人」面對當時的歷史、政治、社會、環境...「做選擇」而構築的。也就是說，「島邊史」的開始、過程、結束均是一連串的「選擇」所下的定奪，而「島嶼邊緣」則是每個人自由選擇意志下支撐起的帳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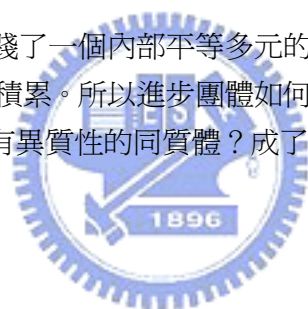
《島嶼邊緣》是掌握八〇、九〇年代之交的台灣思想狀態的重要取徑。藉著解嚴前後台灣左翼思想史或政治史及社會運動史的發展脈絡，接合後結／解構和新左翼思潮的理論，在地化為實踐論述，並彰顯新左翼及文化評論風潮在台灣的時代意義，更以「多元邊緣身分認同」的形構開創反對運動軸線的想像空間。但由八、九〇年代後左翼思潮

在台灣的發展，可以看出新左翼思潮在「文化轉向」後的兩個走向：「另類、邊緣的小眾論述」和「學院化、建制化的菁英論述」，這兩個走向無可避免地偏離與群眾溝通的管道。另外過度宣揚「酷兒化」的「性解放」、「邊緣解放」的觀點，仍陷於某種偏頗的決定論觀點。並且所謂的「邊緣」逐漸成爲一種抗爭位置的宣稱，成爲泛空的符號具時，甚至連主流都挪用自我標榜爲「邊緣」時，已與真實的群眾人民產生解合，不具任何主體意義。或者說只具備學術論理的意義，亦也成爲偏離群眾的菁英論述。

如何走出菁英小眾和拆封酷異惡搞的標籤，是新左翼思潮現今在台灣必須自省面對的首要困境。

《島嶼邊緣》作爲八、九〇年代左翼的新實踐論述，是踰越二元對立的第三／n種反對權力集團的力量。以游移「邊緣身分認同」爲志，反對以「反威權／權力集團」作爲道德標準，在形式上的諧擬嘲諷開展對立性的攻擊論述，但自身仍不免陷入「反『反威權／權力集團』」的反抗邏輯當中。而原本內部民主去中心化的編輯制度，除了成員世代的同值，開放外來團體的進駐並彰顯內部的多元性；但在砲口對外的不一致的差異時，暴露了過分講求內部民主，造成內部溝通協商機制的失衡，編輯成員雖擁有自主性的與《島嶼邊緣》解合，卻也喪失內部的多元性。

《島嶼邊緣》的歷史已實踐了一個內部平等多元的暫時性接合，但卻坐視內部歧見的無能解決和力量的難以持續積累。所以進步團體如何經營開放發言空間，避免法西斯式的吸納與排除，形成一個保有異質性的同質體？成了台灣新左翼知識分子下一步無可逃逸的難題。



【參考書目】

【島嶼邊緣】

- 《島嶼邊緣》，1991.10，第一輯：葛蘭西一〇〇專輯
《島嶼邊緣》，1992.01，第二輯：科學・意識型態與女性
《島嶼邊緣》，1992.04，第三輯：拼貼德希達
《島嶼邊緣》，1992.06，第四輯：廣告・閱聽人・商品
《島嶼邊緣》，1992.10，第五輯：宛如山脈的背脊－原住民專輯
《島嶼邊緣》，1993.01，第六輯：身體氣象專輯
《島嶼邊緣》，1993.04，第七輯：佛洛伊德的誘惑
《島嶼邊緣》，1993.07，第八輯：假台灣人專輯
《島嶼邊緣》，1993.10，第九輯：女人國・家（假）認同
《島嶼邊緣》，1994.01，第十輯：酷兒 Queer
《島嶼邊緣》，1994.06，第十一輯：民眾音樂研究初探
《島嶼邊緣》，1994.09，第十二輯：保衛阿圖塞
《島嶼邊緣》，1995.03，第十三輯：激進神學
《島嶼邊緣》，1995.09，第十四輯：色情國族

【戰爭機器叢刊系列】

- 戰爭機器叢刊 1：戰爭機器搜索群 編，1990.6.4，《歷史如何成為傷口－「六四」的非官方說法》，台北：唐山。
- 戰爭機器叢刊 2：迷走（李尚仁），1990.10.30，《媒體的出神狀態》，台北：唐山。
- 戰爭機器叢刊 3：迷走（李尚仁）・梁新華 編，1991，《新電影之死》，台北：唐山。
- 戰爭機器叢刊 4：路況（萬胥亭），1990.10.30，《後／現代及其不滿》，台北：唐山。
- 戰爭機器叢刊 5：成令方 編，1991.10.30，《戰爭・文化・國家機器》，台北：唐山。
- 戰爭機器叢刊 6：吳其諺（吳正桓），1993.2.28，《低度開發的回憶－一種異類影評》，台北：唐山。
- 戰爭機器叢刊 7：機器戰警 編（甯應斌），1991，《台灣的新反對運動－新民主之路：「邊緣癡亡々」的戰鬥與遊戲》，台北：唐山。
- 戰爭機器叢刊 8：迷走（李尚仁），1991.10.1，《多重戰線》，台北：唐山。
- 戰爭機器叢刊 11：陳光興，1992b，《媒體／文化批判的人民民主逃逸路線》，台北：唐山。
- 戰爭機器叢刊 12：路況（萬胥亭），1993.2.20，《虛無主義書簡－歷史終結的游牧思考》，台北：唐山。
- 戰爭機器叢刊 13：迷走（李尚仁）・梁新華 編，1994，《新電影之外／後》，台北：唐山。
- 戰爭機器叢刊 14：趙剛，1994，《小心國家族－批判的社運・社運的批判》，台北：唐山。
- 戰爭機器叢刊 15：路況（萬胥亭），2004.10.01，《鼠儒主義》，台北：唐山。
- 戰爭機器叢刊 16：路況（萬胥亭），2005.01.01，《五月之磚－巴黎學派 68 思想》，台北：唐山。

【破週報 Pots】

- 《破週報 Pots》，1995.11.24，13 期：3，〈孽世代看〈島邊〉不死〉。
- 《破週報 Pots》，1995.12.15，16 期，〈「世代誌異」座談會—從〈人間〉談起〉。
- 《破週報 Pots》，1995.12.15，16 期：14，〈左派啞啞不如同志〉。
- 《破週報 Pots》，1996. 4.12，32 期：29，〈一次左派的集結—訪王浩威〉。
- 《破週報 Pots》，1996.7.26，47 期：15，〈九零年代的另類媒介〉。
- 《破週報 Pots》，1996.7.26，47 期：22，〈大雜燴—綜合性文化刊物〉。

王天濱，2002，《台灣新聞傳播史》，台北：亞太。

王天濱，2003，《台灣報業史》，台北：亞太。

王浩威，1994.8.10，〈分裂的人格，困惑的堅持—代序〉，《一場論述的狂歡宴》，台北：九歌，頁 7-17。

王浩威，1995，《台灣文化的邊緣戰鬥》，台北：聯合文學。

王乾任，2004，《台灣出版產業大未來：文化與商品的調和》，台北：華文網。

王振寰，1989，〈台灣的政治轉型與反對運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二卷第一期，頁 71-116。

王振寰，1993，《資本、勞工、與國家機器：台灣的政治與社會轉型》，台北：唐山。

木魚，1987，〈從「民間哲學」到「民間社會理論」之確立：迎向一個人民民主實踐的年代〉，《南方》，第 8 期：37-44。

丘延亮，1995，〈人民民主抗爭與階級鬥爭之辯——一場發生在芝加哥的左翼辯論紀實（上篇）〉，《後現代政治》，台北：唐山，頁 1-47。

台社編委會，2004，〈邁向公共化、超克後威權—民主左派論述的初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53 期：1-28。

石元康，1990.3.1，〈個殊性原則與現代性〉，第 47 期【市民社會專輯】：20-28。

卡維波（甯應斌），1998，〈什麼是酷兒？〉，《性／別研究—酷兒：理論與政治》，頁 32-46。

史思虹，1989.9.25，〈人民主義—超越國家／民間社會的新焦點〉，《中國論壇》，第 336 期：34-42。

江迅，1987a，〈謝長廷對趙少康：意識型態的黃昏—從統獨迷思到民間哲學的確立〉，《南方》，第 6 期：34-41。

江迅、木魚，1987，〈為民間社會辯護！〉，《南方》，第 10 期：33-39。

江迅，1987b，〈原鄉已遠，鄉土更親—台灣：人民民主實踐的起點〉，《南方》，第 12 期：62-73。

朱元鴻，1991.10.1，〈非人民—人民民主的想像〉，《當代》，第 66 期：72-81。

朱元鴻，2000，〈從病理到政略：搞歪一個社會學典範〉，《我們活在不同的世界—社會學框作筆記》，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頁 179-205。

成令方 編，1991.10.30，《戰爭·文化·國家機器》，台北：唐山。

何方（甯應斌），1990.3.1，〈從「民間社會」論人民民主〉，第 47 期【市民社會專輯】：39-52。

何方（甯應斌），1990.6.1，〈人民的慾望與人民的民主〉，《當代》，第 50 期：84-98。

何方（甯應斌），1990.9.1，〈人民頑鬥主義—從無住屋組織的幽默風格談起〉，《當代》，第 53 期：74-78。

何方（甯應斌），1990.10.1，〈人民民主與後現代〉，《當代》，第 54 期：136-149。

何方（甯應斌），1991.6.1，〈政治民主、拉克勞與慕芙—對一些批評的回應〉，《當代》，第 62 期：136-149。

何春蕤，1998，〈Eve Kosofsky Sedgwick〉，《性／別研究—酷兒：理論與政治》，頁 26-31。

何春蕤，1998，〈從左翼到酷異：美國同性戀運動的「酷兒化」〉，《性／別研究—酷兒：理論與政治》，頁 260-299。

李永熾，1990.3.1，〈市民社會與國家〉，第 47 期【市民社會專輯】：29-38。

李孝悌，1989，〈再論市民社會：從黑格爾到葛蘭西〉，《中國論壇》，第 340 期：73-80。

林淑芬，2003.3，〈政治行動的可能性條件〉，《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 4 期：29-72。

林淑芬，2005，〈「人民」做主？民粹主義、民主與人民〉，《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 12 期：141-182。

林惠萱，2000，《台灣黨外雜誌之研究—以《蓬萊島》系列為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孟樊，2002，《台灣出版文化讀本》，台北：唐山。

尙·惹內 著，洪凌 譯，1994.9，《竊賊日記》，台北：時報。

拉克勞、莫菲（Ernesto Laclau & Chantal Mouffe）著，陳璋津 譯，1994，《文化霸權和社會主義的戰略》（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台北：遠流。

林正杰，1994，〈戰後新生代的養成期〉，楊澤 編，《七〇年代：理想繼續燃燒》，台北：時報，頁 85-91。

吳全成 編，1996，《台灣現代劇場—1986~1995 台灣小劇場》，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 吳平非，1989.6.21，〈人民民主是什麼？〉，《自立早報》副刊。
- 吳其諺（吳正桓），1993.2.28，《低度開發的回憶——一種異類影評》，台北：唐山。
- 杭之，1990，《邁向後美麗島的民間社會（上）（下）》，台北：唐山。
- 紀大偉，1997，〈酷兒論——思考當代台灣酷兒與酷兒文學〉，紀大偉 編，《酷兒啓示錄》，台北：元尊，頁 9-24。
- 胡芝瑩，2001，《霍爾 Stuart Hall》，台北：生智。
- 南方朔，1986a，〈台灣的新社會運動〉，《中國論壇》，第 269 期：36-40。
- 南方朔，1986b，〈拍賣中華民國〉（專題），《前進廣場》，第 4 期：46-67。
- 南方朔，1987a，〈國家·資本家·人民——八〇年代台灣的「社會力場」〉，許津橋、蔡詩萍 編，《1986 台灣年度評論》，台北：圓神，頁 63-87。
- 南方朔，1987b，《近代新反抗運動》，台北：久大。
- 南方朔，1989，〈拍賣中華民國〉，《新新聞》，第 125 期：74-77。
- 南方朔，1999，〈青山繚繞疑無路〉，楊澤 編，《狂飆八〇》，台北：時報，頁 20-29。
- 施威全，1991.9，〈人道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話——評「機器戰警」〉，《當代》，第 65 期。
- 徐正光·宋文里 合編，1980，《台灣新興社會運動》，台北：巨流。
- 徐進鈺，1989，〈住宅運動與人民民主：對國家 v.s.民間社會的質疑〉，《中國論壇》，第 336 期：43-47。
- 馬努葉·普易 著，紀大偉 譯，1994.9，《蜘蛛女之吻》，台北：時報。
- 高承恕，1990，〈台灣新興社會運動結構因素之探討〉，徐正光、宋文理 編，《台灣新興社會運動》，巨流，頁 9-18。
- 倪炎元，1996.7，〈主流與非主流：報紙對一九九〇年國民黨黨內政爭報導與評論的論述分析〉，《新聞學研究》，第 53 期。
- 孫善豪，1989，〈「民間社會」與「文明社會」：民間社會論對葛蘭西的誤解〉，《中國論壇》，第 336 期：30-33。
- 迷走（李尚仁），1990.10.30，《媒體的出神狀態》，台北：唐山。
- 迷走（李尚仁），1991.10.1，《多重戰線》，台北：唐山。
- 迷走（李尚仁）·梁新華 編，1991，《新電影之死》，台北：唐山。
- 迷走（李尚仁）·梁新華 編，1994，《新電影之外／後》，台北：唐山。

郭紀舟，1995，《一九七〇年代台灣左翼啓蒙運動：〈夏潮〉雜誌研究》，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郭紀舟，1999，《七〇年代台灣左翼運動》，台北：海峽。

郭崇倫，1994，〈理想與激動的背後－威權體制的變遷〉，楊澤 編，《七〇年代：理想繼續燃燒》，台北：時報，頁 135-141。

許津橋，1987，〈人文雜誌的脈動－從《當代》、《文星》、《台灣新文化》到《南方》〉，許津橋、蔡詩萍 編，《1986 台灣年度評論》，台北：圓神，頁 241-258。

陳子恆，1989，〈多元主義的神話：回應〈國家自主性與民間社會論〉一文〉，《中國論壇》，第 320 期：76-78。

陳宜中，1990.12.1，〈人民民主與台灣的辯證〉，《當代》，第 56 期：138-149。

陳光興，1991.7.1，〈從統獨僵硬軸線中「逃逸」出來－五月人民民主抗爭省思〉，《當代》，第 63 期：78-91。

陳光興，1991.8.1，〈飛躍杜鵑窩〉，《當代》，第 64 期：126-134。

陳光興（此文實為甯應斌借名撰寫），1991.10.1，〈流動的認同－機器戰警在電子資訊時代的形象〉，《當代》，第 66 期：134-139。

陳光興，1991.11，〈社會運動的危機及轉進〉，《中國論壇》，第 374 期：49-52。

陳光興・楊明敏 編，1992，《內爆麥當奴・Culture Studies》，台北：島嶼邊緣。

陳光興，1992，《媒體／文化批判的人民民主逃逸路線》，台北：唐山。

陳光興，1996.09，〈《島邊》的折射，浩威的 S/M〉，吳全成 編，《台灣現代劇場研討會論文集－1986~1995 台灣小劇場》，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頁 197-202。

陳光興，1997.10.1，〈霍爾：另一種學術知識分子的典範・「文化研究重鎮：霍爾專輯」〉，《當代》，第 122 期：20-49。

陳光興 編，2000，《文化研究在台灣》，台北：巨流。

陳光興，2001.4，〈台灣消費社會形成的初步思考〉，文化研究月報第二期：http://hermes.hrc.ntu.edu.tw/csa/journal/02/journal_park_6.htm。

陳光興，2001.9，〈為什麼大和解不／可能？〉，《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43 期：41-110。

陳光興，2005a，〈亞洲作為方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57 期：139-218。

陳光興、錢永祥，2005b，〈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之下的學術生產〉，反思會議工作小組 編，《全球化與知識生產：反思台灣學術評鑑》，台北：唐山，頁 3-30。

- 陳國祥、祝萍，1987，《台灣報業演進 40 年》，自立晚報。
- 陳福裕，〈從反帝人民運動到右傾機會主義〉，「夏潮聯合會」網頁：
<http://www.xiachao.org.tw/?act=page&repro=4>。
- 張小虹，2000，《怪胎家庭羅曼史》，台北：時報。
- 張育章，2003.04.03，〈關於「島嶼邊緣」、「破報」的二三事〉，「tm's house pad | 奶爸在家無聊筆記」網頁：<http://tm.tamshui.org/archives/2003/04/eaecaaacacaeaea.html>。
- 張炎憲，1991，〈序言〉，薛月順、曾品滄、許瑞浩 編，《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一）從戒嚴到解嚴》，台北：國史館。
- 張俊宏 主編·呂昱、江夏、江迅、呂鯤 協力，1989，《到執政之路—「地方包圍中央」的理論與實際》，台北：南方。
- 張釗維，2002，〈在思想滅絕的島嶼—「青春之歌的殘響」〉，「米蘭昆的 Renaissance」網頁：
<http://milankun.blogs.com/renaissance/2006/02/post.html#more>。
- 張茂桂，1989a，《社會運動與政治轉化》，國家政策研究資料中心。
- 張茂桂，1989b，〈讓人民成為政治的主動體〉，《中國論壇》，第 341 期：20-21。
- 張茂桂、林東泰，1989，〈民意調查的政治與社會建構〉，《民意》，第 136 期：117-142。
- 張茂桂，1994，〈臺灣的族群、階級以及覺察之不公平〉，劉兆佳 等編，《發展與不平等：大陸與臺灣之社會階層與流動》，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頁 291-332。
- 傅大為，1990a，〈邊緣戰鬥觀點—代序〉，《基進筆記》，台北：桂冠，頁 1-5。
- 傅大為，1990b，〈基進的黎明—代序〉，《「知識與權力」的空間—對文化、學術、教育的基進反省》，台北：桂冠。
- 傅大為，1991，〈片斷、游牧與戰鬥邊緣—一個社運新論述的提出〉，《中國論壇》，第 374 期：53-57。
- 傅大為，1993，《知識·空間與女性：台灣的邊緣戰鬥》，台北：自立晚報。
- 傅大為，1995，〈我與台社十年〉，（後收錄於《台灣文藝》，1995.8，第 10 期：50-55）
http://sts.nthu.edu.tw/dwfu/miscellaneous/taiwan_society.pdf。
- 無向（甯應斌），1990.12.1，〈社運觀點的發展與問題意識—有關晚進社運論述的考察〉，《當代》，第 56 期：88-95。
- 黃茜如，1989.7.10，〈國家自主性與民間社會：相關理論與研究的介紹〉，《中國論壇》，第 321 期：72-80。

- 曾志隆，2002，《拉克勞與穆芙—Laclau & Mouffe》，台北：生智。
- 馮建三，1995.8，〈異議媒體的停滯與流變之初探：從政論雜誌到地下電台〉，《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20 期：177-234。
- 賀照緹，1993，《小眾媒體·運動文化·權力—綠色小組的運動形式及生產條件分析》，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敦誠（馮建三）等著，1992，《邊地發聲／反主流影像媒體與社會紀錄》，台北：唐山：。
- 楊秀菁，2005，《台灣戒嚴時期的新聞管制政策》，稻鄉出版社。
- 楊渡，1988，《強控制解體：解嚴前後台灣社會的變貌》，遠流。
- 楊澤 編，1994a，《七〇年代：理想繼續燃燒》，台北：時報。
- 楊澤 編，1994b，《七〇年代：懺情錄》，台北：時報。
- 楊澤 編，1999，《狂飆八〇》，台北：時報。
- 鄒秦，1988，〈國家自主性與民間社會論〉，《中國論壇》，第 316 期：34-37。
- 路況（萬胥亭），1990.10.30，《後／現代及其不滿》，台北：唐山。
- 路況（萬胥亭），1993.2.20，《虛無主義書簡—歷史終結的游牧思考》，台北：唐山。
- 路況，2004.10.01，《鼠儒主義》，台北：唐山。
- 路況，2005.01.01，《五月之磚—巴黎學派 68 思想》，台北：唐山。
- 趙剛，1994，《小心國家族—批判的社運·社運的批判》，台北：唐山。
- 趙剛，1998，《告別妒恨—民主危機與出路的探索》，台北：唐山：台灣社會研究叢刊。
- 廖仁義，1990，《異端觀點—戰後台灣文化霸權的批判》。
- 廖仁義，1999，〈八〇年代台灣的思想風景〉，楊澤 編，《狂飆八〇》，台北：時報，頁 51-60。
- 廖咸浩，1999.8.1，〈合成人羅曼史—當代台灣文化中後現代主義與民族主義的互動〉，《當代》，第 144 期：110-131。
- 劉平君，1990.7，〈文化研究的「翻譯」：從英國到台灣〉，《新聞學研究》，第 64 期：33-72。
- 劉依潔，2000，《《人間》雜誌研究》，東吳大學中文學系碩士論文。
- 劉進慶 著，1992，《台灣戰後經濟分析》，王宏仁、林繼文、李明峻 譯，人間出版社。
- 鄭瑞城等著，1993，《解構廣電媒體—建立廣電新秩序》，台北：澄社。
- 戰爭機器搜索群 編，1990.6.4，《歷史如何成爲傷口—「六四」的非官方說法》，台北：唐山。

機器戰警 編（甯應斌），1991，《台灣的新反對運動—新民主之路：「邊緣癡ㄍㄨㄥ」的戰鬥與遊戲》，台北：唐山。

蔡其達，1989，《葛蘭西文化霸權概念之研討》，輔大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蔡其達，1989.9.25，〈打開「民間社會」史——一個反宰制論述的考察〉，《中國論壇》，第 336 期：23-29。

蔡源煌，1989，《解嚴前後的人文觀察》，台北：遠流。

蔡詩萍，1995，《騷動島嶼的論述反抗》，台北：聯合文學。

薛化元，1996 《《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1950 年代台灣思想史的一個考察》。臺北：稻鄉出版社。

蕭新煌，1989a，〈社運動動與社會啓蒙〉，《中國論壇》，第 328 期：63-65。

蕭新煌，1989b，〈民間社會的「反支配」性格：社會運動本質的界定〉，《中國論壇》，第 331 期：60-64。

蕭新煌，1989c，〈政治自由與經濟公平：社會運動階段性使命的定位〉，《中國論壇》，第 332 期：65-70。

蕭新煌，1990，〈台灣新興社會運動的分析架構〉，收錄於徐正光、宋文理合編《台灣新興社會運動》，1990，巨流，頁 21-46。

蕭新煌，1990.6.25，〈解嚴後社會與國家關係的重組〉，《中國論壇》，第 354 期：68-80。

蕭新煌、張景旭，1994，〈臺灣的階級結構與階級性格：對中產階級的進一步觀察〉，收錄於《發展與不平等：大陸與臺灣之社會階層與流動》，劉兆佳等編，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頁 251-289。

蕭新煌、王振寰、卡維波、南方朔，1989.9.25，〈座談會：如何看待民間社會〉，《中國論壇》，第 336 期「民間社會與台灣發展專號」：7-22。

羅葉，1999，〈人怎樣成爲自己——記八〇年代台大學運〉，楊澤 編，《狂飆八〇》，台北：時報，頁 174。

【座談會】

〈新生代眼中的反對運動〉（1989.7.11「新生代眼中的反對運動」座談會整理稿），1989，蕭新煌 主席，吳介民、李建昌、郭正亮 出席，劉若韶 整理，《中國論壇》，第 335 期：7-19。

〈如何看待民間社會〉（1989.7.25「如何看待民間社會」座談會整理稿），1989，蕭新煌 主席，王振寰、卡維波、南方朔出席，王平 整理，《中國論壇》，第 336 期：7-22。

Althusser, Louis , 1990 , *For Marx* , London & New York & : Verso.

Eve Kosofsky Sedgwick (伊芙·賽菊蔻) 原著，1998，金宜藎、徐懿美合譯，何春蕤校訂，〈情感與酷兒操演 Affect and Queer Performativity〉，《性／別研究－酷兒：理論與政治》，頁90-108。

Laclau , Ernesto & Mouffe, Chantal , 1985 , *Hegemony & Socialist Strategy : Toward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 published by Verso.

Laclau , Ernesto & Mouffe, Chantal , 陳璋津 譯，1994，《文化霸權和社會主義的戰略》，台北：遠流。

Stuart Hall · 陳光興，唐維敏 編譯，1998，《文化研究：霍爾訪談錄》，台北：元尊。

Stuart Hall，黃麗玲 譯，陳光興 校，1999，〈「意識形態」的再發現－媒體研究中被壓抑者的重返〉，《文化、社會與媒體：批判性觀點》，Michael Gurevitch 等編，唐維敏等譯，台北：遠流。

Stuart Hall , Encoding/Decoding , in Stuart Hall et al. (eds.) , *Cultural Studies, 1972-79* , London : Uuwin Hyman Ltd , pp.128-138.



附錄一 《島嶼邊緣》大事紀

年	月日	歷史事件	《島嶼邊緣》大事紀
1986	09 10	民進黨組黨成功 《南方》雜誌創刊	
1987	05 07.15	「第一次民間社會論爭」 解嚴	解嚴後，王浩威開始在敦化南路自宅籌組「讀書會」，一方面閱讀西方思潮理論，另一方面串連人脈。
1988	01.01 01.13 02 06	開放報禁 蔣經國逝世，李登輝接任總統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創刊 《南方》雜誌停刊（1986.10 創刊）	報禁解除後，以讀書會成員為主，在自立早報（1988.01.21 發報）副刊主編顧秀賢的邀稿下，開設「戰爭機器專欄」。
1989	06.04 07 09	六四天安門事件 《到執政之路》一書出版 「第二次民間社會論爭」 《人間》雜誌停刊（1985.11 創刊）	
1990	03 03.16 05.20 06.01 06.04 06.14	 三月野百合學運 五月反軍人干政大遊行 郝柏村任行政院長	何方（甯應斌）在《當代》第 47 期撰文，以「戰爭機器」部分成員提出的「人民民主論」，正式介入「第三次民間社會論爭」。 唐山出版社出版「戰爭機器叢刊 1」：《歷史如何成為傷口？－「六四」的非官方說法》。此叢刊至《島嶼邊緣》停刊，共出版 12 本。 以戰爭機器成員為主，開始串連人脈、籌措資金，欲創辦新雜誌。
1991	03.31 05.01 05 10.13 10.29 12.31	廢除臨時條款，結束動員戡亂時期 獨台案 民進黨制定「台獨黨綱」 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改選	雜誌定名為「島嶼邊緣 ISLE MARGIN」。 《島嶼邊緣》創刊，第一期「葛蘭西一〇〇專題」
1992	01 03.07 04 05.02	時報出版《給我報報 1》（馮光遠·李巨源 編著）	《島嶼邊緣》第二期「科學·意識形態與女性」 「島邊」在台北發條橘子舉辦「島嶼邊緣當代思想座談會：科學、意識形態與女性」（傅大為主持） 《島嶼邊緣》第三期「拼貼德希達」 「島邊」在高雄醫學院和高雄串門書苑舉辦「台灣勞動權利及工運」、「從葛蘭西談台灣工運」兩場座談會。

<p>05.16 06 08 10</p>	<p>「外省人台獨協進會」成立</p>	<p>「島邊」在台北敦南誠品舉辦「解構德希達」座談。 《島嶼邊緣》第四期「廣告・閱聽人・商品」</p> <p>《島嶼邊緣》第五期「宛如山脈的背脊：原住民專題」 「島嶼邊緣雜誌社」出版《內報麥當奴・Cultural Studies》，收錄 1992.07 的「Trajectories 文化研究年會」的發表文章。</p>
<p>1993 01 04 07 10</p>	<p>智慧財產權三〇一條款</p>	<p>《島嶼邊緣》第六期「身體氣象專輯」 《島嶼邊緣》第七期「佛洛伊德的誘惑」 《島嶼邊緣》第八期「假台灣人專輯」 《島嶼邊緣》第九期「女人國・家（假）認同」</p>
<p>1994 01 06 09 12</p>	<p>《破周報》以「台灣立報一週末版」發刊 北高兩市及首長直選</p>	<p>《島嶼邊緣》第十期「酷兒 Queer」 《島嶼邊緣》第十一期「民眾音樂研究初探」 《島嶼邊緣》第十二期「保衛阿圖塞」</p>
<p>1995 03 09</p>	<p>《破周報》獨立發刊</p>	<p>《島嶼邊緣》第十三期「激進神學」 《島嶼邊緣》第十四期「色情國族」</p>
<p>1996 03</p>	<p>《當代》雜誌休刊（1986.05 創刊） 第一屆總統直選</p>	<p>《島嶼邊緣》正式宣布停刊</p>



附錄二 《島嶼邊緣》14輯（1991-1995）文稿一覽表

專輯發刊時間 及專題	執行編輯	文稿
<p>第一輯 1991.10.15 葛蘭西一〇〇專輯</p>	<p>蔡其達</p>	<p><葛蘭西一〇〇專輯> 編者的話 葛蘭西論「南方的問題」與知識分子／陳巨擘 論葛蘭西與市民社會的概念／蔣慧仙譯 從市民社會到無產階級國家－葛蘭西的國家理論／蔡其達 葛蘭西的霸權與意識形態論／張榮哲譯</p> <p><邊緣實驗> 人魚寶寶，深海居民／尹筱晴譯 <NEW FICTION> 人魚寶寶與世界新秩序／吳永毅，影印機合著 「方法學的補充」城市和草根／卡斯提爾原著・曾旭正譯</p> <p><邊緣書評> 邊緣觀點的破產聲明－ 《台灣的新反對運動》及後正文（post-text）文化政治／王文英</p> <p><本土理論> 歷史建構、邊陲策略與「中國化」： 對台灣「行為及社會科學中國化」提法的思想研究／傅大為</p> <p><性別邊緣> 認真對待女學生／成令方譯</p>
<p>第二輯 1992.01.15 科學・意識形態 與女性</p>	<p>傅大為</p>	<p><科學・意識形態與女性> 導言／傅大為 生命：經驗與科學－喬治・岡居朗：《正常與病理》英譯本序言／傅柯作・迷走譯 何謂科學的意識形態？／岡居朗（George Canguilhem）作・迷走譯 譯後記／迷走 生物學與人文科學的危機／拉庫赫（Dominique Lecourt）作・楊明敏譯 從巴舍拉到歷史唯物論／拉庫赫（Dominique Lecourt）作・楊明敏譯 譯後記／楊明敏 大聲要求教育／安菊思・瑞琪（Adrienne Rich）作・孫瑞穗譯・成令方校對 女性主義・科學與反啓蒙批評／哈定（Sandra Harding）作・王珍賢譯 學術？運動？台灣婦女研究生態環境的解析／成令方</p> <p><選舉邊緣> 一九九一二屆國代選舉，中區大學生選舉觀察團選舉觀察報告／選舉觀察團</p> <p><國際島嶼> 北極拼圖－參加「國際印第安條約會議」（IITC）第十三屆大會札記／舒詩偉</p> <p><理論島嶼> 市民社會的身體論／王墨林</p> <p><邊緣書評> 就在叛逃與回歸之間－《流離觀點》一書中透露的訊息／蔡其達</p> <p><法西斯就在你身邊> 法西斯心態的分析／吳其諺 未來派與法西斯主義－義大利的前衛與革命／（Piero Aragno）作・吳瑪俐譯 儀式的政治學／辜振豐 電視閱兵，法東斯／機器貓小叮噠</p>
<p>第三輯 1992.04.15 拼貼德希達</p>	<p>路況 （萬胥亭）</p>	<p><導言>：解構不是拆房子</p> <p><拼貼德希達> 解構的詮釋體系／路況 符號學與書寫文字學－德希達與克莉絲蒂娃（Kristeva）對話／于治中譯 超越安居欲望的建築－德希達與梅耶（Meyer）論建築與思想的對話／陳志梧譯 建築到哲學－後現代的共犯／羅斯（Gillian Rose）作・陳志梧譯 解構女人－德希達與女性主義理論／張小虹 德希達年表</p>

		<p><理論／衍異> 學運的精神分析／楊明敏 一個幽靈在商品的廢墟間—意識型態廣告誌異／方唐</p> <p><延異／詩牆> 肛交之必要／陳克華 詩兩首／黃毓秀</p> <p><邊緣檔案> 有關「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危機的十二條提綱／舒詩偉譯</p> <p><本吐話> 本土化與文化認同／黃非虹 片段氣泡／張南生 藝林丰采——次有關本土性的急救演習／陳梅毛 台灣歷史與主流社會—讀天下雜誌《發現台灣》特刊／楊照</p> <p><符號帝國> 沒有地址／羅蘭巴特作・曾旭正譯</p> <p><邊緣書評> 學院知識分子的另一種工作—淺談蔡源焯的《當代文化理論與實踐》／張宜泉</p> <p><腦筋左轉彎 2 / 新而獨立的宣言> 沛然莫能禦的獨立新浪潮／本刊獨家報導・吳姬慧 文件一：《機器戰警共和國 ROR 憲法宣言》 文件二：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觀—慎防公投運動落入統派手中 文件三：GATT 宣誓文 〈後新聞〉第二集 國會觀察之一：一百是太多？還是太少？ 國會觀察之二：養樂多救台灣</p> <p><給我報報> 假新聞・真廣告／馮遠・李巨源 統獨會議草草結束／紐約報導・夢正酣</p>
<p>第四輯 1992.06.01 廣告・閱聽人・商 品</p>	<p>馮建三</p>	<p><編輯前言></p> <p><廣告・閱聽人・商品> 傳播：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盲點／達拉斯・史麥塞作・馮建三譯 關於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盲點：答覆達拉斯・史麥塞／葛瑞罕・梅鐸作・馮建三譯 轉變中的閱聽眾研究範例／大衛・莫利作・曾旭正譯 廣告專書輯要</p> <p><延異／詩牆> 末世的愛慾／楊渡</p> <p><邊緣書評> 不由自主的小說家：論朱天心的四篇「政治小說」／呂正惠 評張新華《資訊學概論》與王崇德《情報科學原理》／賴鼎銘</p> <p><理論／衍異> 從「生產之鏡」到「遊戲之鏡」／路況</p> <p><本吐話> 強盜警察豬／豬哥興 後現代吞示錄：洛杉磯坑議事件所引爆的「大熔爐」神話／黃非虹 淡江—《夏潮》路線的民歌運動（上）張南生</p> <p><邊緣訪談> 施勒教授訪談錄／Lai Si Tsui 訪問・林文政譯 崩潰之後（1）：《新左評論》三十年／陳宜中訪問</p>
<p>第五輯 1992.10.15 宛如山脈的背脊： 原住民專輯</p>	<p>譚石 (王浩威)</p>	<p><島嶼記事> 國家在哪裡？人民是誰？——基客事件的初步觀察／吳永毅 十八標風雲——公共工程的政治經濟學／王振寰 無殼蝸牛對二次土改的主張？／無住屋者團結組織</p> <p><宛如山脈的背脊：原住民專題> 抗爭篇：</p>

	<p>原住民，怎能不生氣？／拓拔斯 對立與瓦解——歷史顯影下的台灣原住民「正民」呼聲／瓦歷斯·尤幹 重視少數民族的傳播權益——應合理分配傳播資源／尤希·達英 有關原住民母語問題之若干思考／孫大川 對話篇： 台灣原住民的政治經濟學涵義／裘亞飛 偏離群眾的菁英——試論「原住民」象徵與原住民菁英現象的關係／謝世忠 西方人類學的限制／顏匯增 另一種世界大戰——民族與國家間的戰爭／舒詩偉</p> <p><國際檔案> 泰國民主的前夜／人民民主連線資料提供 傳真文件／支援泰國人民民主運動委員會</p> <p><本吐話> M.I.T.(Metal in Taiwan)——兼談台灣搖滾論述的發展／尤大鑼 淡江—《夏潮》路線的民歌運動(下)／張南生</p> <p><違章學校> 認識你自己／台大人文報·男性廣場 有機知識份子們的對談記錄——油雞、姿勢、和糞仔／傅培梅</p> <p><當代思潮> 尼采·系譜學·歷史／Michel Foucault 作·李宗榮譯 社會主義的反思與前瞻(二)——社會主義的未來／Samir Amin 作·舒詩偉、蔡宜剛譯校</p> <p>訪談 崩潰之後(II)——《新左評論》三十年／陳宜中訪問</p> <p><邊緣評論> 《暗戀桃花源》的荒謬／吳其諺 黨國與猥褻——評李永平《海東青》(上卷)／楊棄 後現代，女人，《徵婚啟事》／黃毓秀</p> <p><島嶼相簿> 七號公園預定地／簡永彬</p>
<p>第六輯 1993.01.15 身體氣象專輯</p>	<p>王墨林 舒詩偉</p> <p><編輯報告></p> <p><島嶼記事> 邀約帖／美濃愛鄉協進會</p> <p><身體氣象> A. 一些身體的觀念與圖像： 墓穴、神殿、機器與自我—軀體的社會性建構／Anthony Synnot 作·舒詩偉譯 疾病的比較文化學／王墨林 B. 身體的具體呈現： 建築與身體——中國三合院的空間權力／第七小組工作站—李允斐 身體渾沌狀態的快感／張明章 少年的身體履歷表／王墨林 C. 女性身體 墮胎、身體政治與歷史的吊詭／傅大為 此性非一／Luce Irigaray 作·王志弘譯 身體禁忌的律條化／鄭瀉 變身的系譜／辜振豐 D. 身體新探 分身有術—人體操演的時空策略／王志弘 維也納行動藝術(上)／吳瑪俐</p> <p><「後正文」追蹤報導專輯> 前言：自從《島嶼邊緣》雜誌開始「後正文」實踐 你有沒有在游泳池裡放過屁？——從「後正文的理論與實踐」論「知識／權力」／媽媽吉利小叮嚀 後正文歷史文物出土(一)——校園腦筋左轉彎 後正文歷史文物出土(二)——泡茶通訊 徘徊在歧路上的《島嶼邊緣》——馬派，新左，還是後現代？／林威</p> <p><本吐話> 《虛無主義書簡》序：歷史終結的遊牧思考／路況 左右漆黑《愛在陰溝好悶時》——《黑盒子事錄》Notes on Video／吳苑菱</p>

		<p>土地測量／姚瑞中</p> <p><當代思潮> 資本主義與同性戀認同(上)／John D'Emilio 作・舒詩偉譯 尼采，系譜學，歷史(下)／Michel Foucault 作・李宗榮譯</p>
<p>第七輯</p> <p>1993.04.15</p> <p>佛洛伊德的誘惑</p>	<p>王浩威</p> <p>吳其諺</p> <p>(吳正桓)</p>	<p><編輯報告></p> <p><島嶼記事> 聲明：知識自由流通／敦誠 滅聲之石——二二八紀念碑的歷史寫作／陳志梧 二二八紀念碑的差異地學／爆房子工作室圖・文</p> <p><佛洛伊德的誘惑> 寄《心靈的激情》：弗洛伊德全集再出發／余伯泉 十九世紀關於歇斯底里現象的論爭／劉美麗 精神分析可被檢驗嗎？／楊明敏 精神分析與誘惑理論／楊明敏 為什麼在台灣談自體心理學？／文仲</p> <p><王菲林的時代——台灣八十年代的結束> 王菲林的時代／吳其諺 我所知關於菲林與電影的二三事／迷走 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憶王菲林和他走過的八〇年代台灣／汪立峽 飲恨與慰藉／陳映真 血跡斑剝的明路上，一片純真之聲／蔡文熙 給王菲林活著的朋友／吳永毅 從「第三劇場」到「行動劇場」——王菲林對劇場的反思／王墨林</p> <p><衍聚> 歌舞政治學／王墨林 《東方紅》的革命藝術／龐志陽、王墨林對談</p> <p><島嶼相簿> 桃源村造像／吳忠維攝影・文</p> <p><詩牆> 仍然在河的左岸／黎煥雄 吊橋——兼致九〇年代台北的一群安那其青年／鴻鴻</p> <p><違章學校> 大便報／大便工作室</p> <p><後正文接力書寫> 讓身體說話——《島嶼邊緣》成員的訪談記錄(上)／艾思侯訪談・皮寅仰記錄</p> <p><當代思潮> 資本主義與同性戀認同(下)／John D'Emilio 作・舒詩偉譯</p> <p><身體氣象> 維也納行動藝術(下)／吳瑪俐</p>
<p>第八輯</p> <p>1993.07</p> <p>假台灣人專輯</p>	<p>吳永毅</p> <p>何方</p> <p>(甯應斌)</p> <p>王墨林</p> <p>鄭村棋</p>	<p><編輯報告></p> <p><島嶼邊緣緊急質詢：韓國外交部爆炸性文件「自由時代」竄改歷史！> 《韓國學生運動》的「自由時代」譯本和原著之比較／臧汝興</p> <p><「假台灣人」專輯> 評「外省台灣」／賴義雄 霍布斯邦《一七八〇年以來的民族與民族主義》導言節譯／曾雁鳴譯 最少的自我(Minimal Selves)／Stuart Hall 作，黃非虹譯 分類：差異與區別／吳其諺 假台灣人：台灣的第五大族群／台灣人 大家作夥當台奸／吳永毅 影像模糊的台灣人造型：《台灣人論》的噯語背後／晏山農 <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何春蕤 <解構台灣>序：發現外省人／廖咸浩 我們都不是台灣人／假歪省人 家庭電影：一部八釐米電影短片的話外音／高重黎 「大中國／台灣鄉土」的虛與實(上)／機器戰警Ⅲ</p>

		<p>國族意構情節的「返祖性」(Atavism)及其認知構陷／丘亞飛 新台灣國民的生活公約／陳明雄 筆談／吳永毅、馮建三、成令方、朱天心、曾雁鳴、傅大為、郭文亮、趙剛 假台灣人專輯說明及書目／葉富國</p> <p><衍聚> 觀自在：有關，無關，和其他／江世芳 撕裂肢體的火熱毒刃：我們的「愛德華二世」／洪凌</p> <p><邊緣戰爭> 「後正文」策略有效嗎？／陳瑞麟 在香港主流論述間隙中游激的異類「民間抗爭」／繆思華 重寫皇家／白曉虹 就地邊緣化：評傅大為《知識、權力與女人》／何方</p>
<p>第九輯 1993.10 女人國・家認同</p>	<p>平非 (王蘋 & 丁乃非)</p>	<p><編輯報告></p> <p><女人國／家認同專題> 女人國／家認同宣言 出櫃(軌)之必要／平非 一： 《喜宴》・妖怪・認同論述／黃毓秀 認同與背離——談言情小說中的異國戀情／林芳玫 台灣女詩人眼中的「國家」／李元貞 女人和國家認同／顧燕翎 婦女也是國民嗎？——談婦女在「國民所得」中的位置／瞿宛文 人權性別化的探討——女人是不是人／成露茜 性／別／莫尼克・維蒂格作・米蟲譯 異性戀思維(法統)／莫尼克・維蒂格作・魏淑美譯 二： 刀斧指痕中的愛情傳說／紫衣 紀念最後一位「華姆」・莎黑克維薩——北美原住民的男扮女裝／李金梅 不要說不……／黃毓秀 變奏／米蒂亞 吳瑪俐裝置作品 三： 只能無題／范姜 妖言——情慾對話／陰娣姊妹 波波相連・莫之能禦／波波聯盟 馬路小天使路邊聯盟／阻街女 打掃時間到囉！／杜小痢</p> <p><讀者來函> 保險套公司投書抗議衛生局長陳寶輝</p> <p><島嶼記事> 一字之差的本土派和本土左派——《台胞》首映座談會的善意與敵意／吳永毅</p> <p><島嶼邊緣新聞> 張茂桂教授特別推薦《假台灣人》專輯／吳永毅</p> <p><編後延> 如果愛情是一齣齣上演的戲 愛福好自在報</p>
<p>第十輯 1994.01.15 酷兒 Queer</p>	<p>紅水鮮 (洪凌) 紀小尾 (紀大偉) 蛋糖饅 (但唐謨)</p>	<p><編輯報告></p> <p><島嶼記事> 舊(男)學運的死亡，新(女)學運的出發／陳光興</p> <p><邊緣酷兒佔領島嶼邊緣> 卡珊卓拉的口腔與高潮／洪凌 聖惹內——小偷與囚犯的午夜情挑／洪凌、方致、盧東魔 蜘蛛女之吻——乳絲自濕潤的肛門延伸爆長／但唐謨、紀大偉 黑夜裡不斷抽搐的基督山綱門／紀大偉 小小酷兒百科／紅水鮮、紀小尾、蛋糖饅</p> <p><島嶼相本> 黃書倩作品</p>

		<p><妖言> 序文：女性公共論壇的建立——介紹本期「妖言」及意義／何春豬 本土女性聲之必要／米非 島邊，倒鞭——評《女人國·假認同》／廖炳惠 性事一得／倪維亞 豪放女手記：我和老師在研究室做愛／程奇雲 尋找天使遺失的翅膀／陳雪</p> <p><（非）櫃男解碼系列> 新新男性／王秀雲、春天、溫志仁、吳匡時、沈綺、total</p> <p><畸片庫> 年度出軌電影／何春豬輯 例如《浮世戀曲》·(e)——一段猶豫的影·(評)／次影迷 羅蘭·巴特遺忘了的一枚無色透明的唇印——《解放我》／鄭立明</p> <p><本吐話> 「影響的焦慮」與「原創／模倣」的弔詭／路況</p> <p><邊緣戰爭> 保衛阿爾杜塞／于治中</p>
<p>第十一輯 1994.06.15 民眾音樂研究初探</p>	<p>張育章 張釗維</p>	<p><編輯報告></p> <p><民眾音樂研究初探> 另翼岸譜——民眾音樂研究初探／張育章、張釗維 1. 說明書 邁向民眾音樂美學／Simon Frith 作·張釗維譯 自主性是如何相對的——民眾音樂、社會形構與文化抗爭／Reedee Garofalo 作·張育章譯 2. 圖騰爭奪戰 從搖滾樣板戲到搖滾毛澤東／卡維波 我有權利嗎？——民歌政治策略中的正當性、原真性與社群／Steve Redhead、John Stree 作·張釗維譯 3. 巫師小傳 用一根拐杖「奔逃」出來的文化研究——專訪勞倫斯·格羅斯柏格／朱恩伶 譯前記／陳光興 「我寧可痛苦也不願麻木不仁」——搖滾：快感與權力（上）／Lawrence Grossberg 作·張育章譯</p> <p><族群> 意外之旅——竹頭角林家銅鑼圈蘇家祭祖會親記（上）／陳板</p> <p><酷兒啓示錄> 塔／紀大偉 「人都死了，你還要侮辱他們的清白！」／鯽小尾</p> <p>妖言／出櫃文學 妖言：1. 豪放女手記：我的保險套情結／程奇雲 2. 手指／水手女孩 3. 慕色生涯——一位慕色女子的自白／石頭 另類妖言——對<豪放女手記>的手記／竺小風</p> <p><戰爭機器> 「南進」：台灣「次」帝國的形構——解毒／獨「人間副刊」〔南向專輯〕／陳光興 一件抄襲案的揭發——我自己沒抵抗，所以別人也沒抵抗／田大川、趙煬、楊照</p> <p><島嶼記事> 為什麼我們的國號已改爲：中華民國在台灣 爲《解放後韓國學生運動史》正名——鄭重道歉，反對「裁賊」／吳繼興</p> <p>邊緣語錄／影印機辦母室輯</p>
<p>第十二輯 1994.09.30 保衛阿圖塞</p>	<p>王浩威</p>	<p><編輯報告></p> <p><假台灣人> 假台灣人之讀者投書：1. 給 XX 的一封信——我對〔假台灣人〕的一些私人想法／張南生 2. 台灣已被假台灣人控制！救台灣，應組合台灣黨！／海浪</p> <p><保衛阿圖塞> 結構主義與阿圖塞主義之崩解／Jorge Larraín 作·劉美麗、王恩南譯 重釋唯物辯證法——阿圖塞的方法論／韋積慶 安德烈·格林——一個痛苦人生的解析／卡特玲·克萊蒙訪問·鄭淑文譯 艾蓮娜其人／Maria-Antonietta Macciocchi 作·其蔚譯</p>

	<p>路易·阿圖塞年歷表／Yann Moulier Boutang 輯·鄭淑文譯</p> <p><原住民> 原音重現</p> <p><畸書房> 村上春樹：1. 村上與學生運動 2. 廣告大師村上春樹——評香港村上春樹論述 3. 後記／彭玉文</p> <p><戰爭機器> 一段可能湮沒的歷史(上)／李幼新</p> <p><流動攤販> 澳洲——西方終點站？／陳光興</p> <p><族群> 意外之旅——竹頭角林家銅鑼圈蘇家祭祖會親記(下)／陳板</p> <p><島嶼繪本> 王偉志作品</p> <p><妖言／出櫃文學> 妖言：1. (無題)／玫瑰 2. 豪放女手記：我喜歡在月經期做愛／程奇雲 3. 車／張媛 豪放女信箱——回應竺小風：對〈豪放女手記〉的手記／程奇雲 性事一得：紅燈時可以幹的事／Olga</p> <p><酷兒啓示錄> 叛徒們的碑碣(上)／賦格斯·康納利作·洪凌譯</p> <p><另翼岸譜> 「我寧可痛苦也不願麻木不仁」——搖滾：快感與權力(下)／勞倫斯·葛羅斯 柏格作·張育章譯 民眾音樂社會學——一份近期作品選註的書單(上)／Stephen B. Groce 張釗維譯</p>
<p>第十三輯 1995.03.21 激進神學</p>	<p>卡維波 (甯應斌)</p> <p><編輯報告></p> <p><島嶼邊緣留言></p> <p><激進神學> 前言/卡維波 上帝是個恐怖主義者——或者，為什麼有時候可以傷害無辜／樓亮 早期教會的「婦女解放」／小何 一個革命家之死／何春蕤 黑色彌賽亞／Albert B Cleage, Jr 作·何春蕤譯 從神學的革命到革命的神學／貞德 從世俗神學到解放神學：從現代到後現代神學／貞德 上帝 vs. 該撒／樓亮 南京的基督／樓亮 跟隨基督，就要扶助弱勢／馬赫俊</p> <p><國際檔案> 藝術與政治——反抗的美學／Luis Camnitzer 作·舒詩偉譯</p> <p><訪談> 與傅科談法蘭克福學河／黃非虹譯</p> <p><戰爭機器> 一段可能湮沒的歷史(下)／李幼新</p> <p><妖言／出櫃文學> 妖言：1. 七月十日／小四； 2. 我與我的處女情結／觀水無言的孔； 3. 「餵食母乳，身心健康」／小母親 <餵食母乳，身心健康>讀後／柯梧</p> <p><酷兒啓示錄> 叛徒們的碑碣(下)／賦格斯·康納利作·洪凌譯</p> <p><假台灣人> 「族群平等」與「左派進步」的照妖鏡——[假台灣人]專題序言／樓亮 邊緣份子首次統獨大表態——邊緣的統獨立場／假台灣人 假台灣人出櫃／葉富國 台獨與同性戀／邱潔芳</p>

		<p>報紙獨立建國宣言——工運及弱勢團體想像中的報紙理想國／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p> <p><另翼案譜> 民眾音樂社會學——一份近期作品選註的書單(下) / Stephen B. Groce 作・張釗維譯</p> <p><國王沒有新衣服> 1994 年最爛的電影、小說名單</p>
<p>第十四輯</p> <p>1995.09.30</p> <p>色情國族</p>	<p>新邪人類</p> <p>五人小組</p> <p>(甯應斌)</p>	<p><編輯報告></p> <p><島嶼相本> 島邊屁股大展 梁正居的照片作品 堆砌時光／林文珮</p> <p><色情國族> ■ 邪國族 國族主義與「去殖民」——評「陳昭瑛／台灣的本土化運動論戰」／陳光興 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新興民族」——從許信良的新書看台灣民族主義論述的轉變 / 趙剛 ■ 色情(邪)聯合國(族) 姓「性」名「別」, 叫做「邪」／斜左派 戀戀情深: 1. 家人戀／斜邊緣人; 2. 動物戀／貞德; 3. 嗅內褲——戀物日記／hm (龍); 4. 屎尿戀／樓亮; 5. 暴露戀／夏柳 妖言妖語／妖女乙 權力與能動性——<妖言妖語> 讀後／柯悟 誰來終結婚姻? / 悲筆 女人有外遇的權力／陶雁 電影與文學中的性／別邊緣——兼談人文與社會科學對性的新研究熱潮／卜西特 性解放的故事書／荻蒨 那一年他們說相聲／徐尚信著・邪現編 通姦／徐尚信著・邪現編</p> <p><酷兒啓示錄> 在荒原上製造同性戀聲音——閱讀《荒人手記》／紀大偉 粽浪彈: 身體像一個優秀的粽子——同性戀的端午節／紀大偉、洪凌</p> <p><妖言／出櫃文學> 寫入高潮／高慧蘭作・陶雁譯 女人的 A 檔案: 0. 編者前言 1. 兩百個 A 片女評論家的誕生／處女 A 2. A 片與 鈔票／陽葦 3. 我女朋友是 A 片明星／聖女小蕃茄 4. 我覺得噁心, 可是我會濕 / 單陽 5. 也關乎 A 片／永遠的處女 6. 我和我身體的關係／GG 7. 我的一千 零一夜／娥欣 女體性自主、情慾 DIY／張娟芬</p> <p><戰爭機器> 仇恨女性、歧視男同性戀、竊笑女同性戀的電影救世主奇譚／一個心理變態男 試寫一個心理變態女／李幼新</p> <p><第一大> 建築、哲學與德希達／Andrew Benjamin 作・陳慧珍、林洋譯</p> <p><國際檔案> 批判理論的新希望——吉候其人其著／彭玉文</p>

附錄三 <島嶼邊緣停看聽> / 晏山農(蔡其達稿)

《島嶼邊緣》(以下簡稱《島邊》)終於停刊了。台灣文化界有人深為惋惜，認為又少了一份充滿高度挑戰性的批判雜誌；也有人終於鬆了一口氣，慶幸「妖言惑眾」的東西已然不存，王子和公主的童話故事又可以繼續編造下去。為何會有這些不同的反映呢？讓我們細說從前吧！

一九九〇年台灣社會歷經波濤洶湧的二月政爭、三月學運以及五月反軍人干政之後，有識之士赫然發現新的政經保守體制已經蔚然成形，並開始進行反撲。

於是，有一群不滿學院陳規以及主流論述的知識菁英——包括大學教授、媒體工作人員、社運人士、精神醫師和女性主義者等，一方面深感當時有不少的媒體停擺(像《文星》、《新文化》、《南方》、《人間》等)，異議、邊緣可能馳騁的版圖開始縮編，另一方面，台灣政治力和社會力不斷激盪沸騰的同時，整個文化反思的能力似乎有萎縮不前的跡象。這群人遂決定另起爐灶、亟思重建文化界的梁山泊，第一個構想就是辦雜誌。

該年六月群賢(或群妖)首次在醫生作家王浩威家中聚會，眾人開始構思一份不一樣的新刊物，原先的主旨方針是以英國的 *New Left Review* 為依歸，卻因成員間的意見相當紛歧，所以在經過無數次冗長的討論後，兼具新左和激進邊緣色彩的刊物——《島嶼邊緣》才在九一年秋天問世。首期內容主打西方馬克思主義鼻祖之一的葛蘭西，直到今年三月決定停刊，總計出刊十四期，就一份異議、邊緣性的刊物而言，也算是壽終正寢。

《島邊》的構成員相當駁雜——包括新左派、後現代主義者、都市空間改革者、精神分析學派、女性主義、邊緣藝術工作者，所以，從創刊伊始不論對內或者對外，它都以「直接民主、多元丰貌」的姿態出現，不像先前出現的或左或右的各種文化刊物具有強烈的主導性格。不過，大體而言，《島邊》的投入者都有「超越狹隘的統獨國族論述，進行全面的激進民主鬥爭」的基本共識。

囿於傳統左右統獨論述的「衛道人士」，一方面對《島邊》的怪聲怪調恨的牙癢癢的，並忙不迭的奉送「新統派」(因為成員中有不少外省人)、「墮落的虛無主義者」之類的標籤給《島邊》。可是卻不得不小心處理《島邊》丟出來的思想炸彈，苦思如何拆解雷管，稍有不慎即可能炸得粉身碎骨。因此，《島邊》雖然已經打上休止符，但是它的效應仍在醞釀內爆中。那麼《島邊》到底丟出了什麼炸彈呢？

首先，《島邊》的雷管引信不在文字本身，而藏在相關的圖片、解說和廣告之類的後正文(post-text)裡頭。也就是說，《島邊》初期走的儘管還是引介西方左翼思潮的嚴正路線，卻隨時在長篇大文中穿插情欲色彩濃厚的圖片和充滿顛覆趣味的解說，真正發揮了「寓教于樂」的效果。它顛覆了食古不化、和台灣社會嚴重脫節的老左派，也糾正了自由派過於一本正經的蛋頭性格，並為左派提供了「另類」(alternative)選擇。

《島邊》發行了五、六期以後，一方面因為台美智慧財產權談判後帶來了翻譯的不便，另外也開始對本土的各類議題進行解構，於是第八期「假台灣人專輯」就直指國族論述(不論是大中國主義還是台灣建國史詩)的虛妄，並試圖以「假台灣人」(工人、學生、婦女、性少數、殘障者等)的逃逸路線作為左翼路線的回應，其後製作的「女人國」、「酷兒(QUEER)專輯」都是循此方針企畫。它震撼了整個台灣知識界，不論贊成與否，激起的漣漪迄今仍餘波蕩漾。

然而，在《島邊》製造出各類思想風暴的同時，它內部卻寧靜的可怕，多數成員愈來愈噤口，參與的次數愈來愈低。原因在於，直接民主的討論方式導致極度的無效率，使得眾人疲憊至極。再者，成員中不少人羽翼

已豐，已經沒有了創刊初期保有的高度熱情和全力投入的時間。更重要的是，共識已經慢慢的瓦解。

過度使用後正文的表現形態，成員中認為「玩物喪志」的大有人在；而對於「假台灣人」、「酷兒」之類走美國虛無主義左派的作法，不以為然的更多——因為它放棄了西歐更珍貴、更踏實的左翼路線參照模式。祇是這些歧異愈來愈少在內部會議中提出來，逐漸淡出就成為多數成員的共同選擇。也就是說，《島邊》營造出來的祇是外熱內冷的兩極效果。

原先，《島邊》內部包容不同形態的組合，就是想藉由辦雜誌和各式串聯，達成以人民民主為主軸的左翼新路線，最後結果卻祇剩少數兩三人在舞台上四處飛奔，內部多元卻不見了。因此，儘管財務狀況窘困是《島邊》停刊的要因，但真正的關鍵還是「人」。

如今，《島邊》的成員們雖又各自打遊擊去了，然而，回歸左翼理論再充電可能更為重要。沒多久再集體搞份不同於《島邊》的激進、邊緣刊物絕對是可能的。



【後記—天使不敢走的路·傻子一路衝過去】

現在的時間是人民民主聯邦 15 年（人民民主聯邦元年為 1991 年），論文口試結束後的某年某月某個星期三之夜，「台社」在紫藤蘆舉辦了一個論壇：「**第三勢力的想像與出路**」。與我的論文研究頗有干係，特北上。席間，大家對於「第三勢力」在詞彙、走向多所爭議，甚至搞工運的楊偉中感慨批判十年間運動團體的原地踏步及未來運動方向持續未明。而「人民民主」這個詞彙繼上個十年和一個星期前的罷扁論壇：「**台社對當前台灣政局的省思—政黨政治的危機與社會民主的未來**」，在這個夜晚又被提出，雖仍多所爭議。身為九〇年代初期台灣「人民民主論」的幕後推手—丘延亮，感性地延伸陳光興的用語：人民民主不是一種政黨、不是一種政治傾向，認為「人民民主是一種生活態度」。

我想「人民民主」此刻的重提，如同我此刻重提《島邊》。《島邊》或許不再復刊，或許被評為不合現今的社會情境，但重溯《島邊》並非藉以取暖自慰，《島邊》背後所代表的聲音是現今台灣社會被藍綠所掩埋的、所遺忘的。

只是「人民民主」和《島邊》當初過於酷異化的風格走向了另類邊緣；而另類菁英化的論述與「人民」接合的錯位，加上缺乏對相互發話立場的體解，致使九〇年代中期無以為繼。「左翼」如何不再只是一種位置的宣稱和教義的信仰固著，不再是一種排除，而是含納。沒有統獨潔癖、政治潔癖，反被群眾的力量所接合？席間我的發言，雖未被正視及獲得回應，但我口試時的陽萎頓時有了宣洩的出口！！



《島邊》的研究對我而言與其說是一種學術性的批判研究，不如說是我對自我成為「《島邊》迷」的研究。裡面或許沒有採取適度的批判距離，言詞不夠中肯客觀並衝動濫情，但若將其歸類為一種「迷文化」研究的話，我想那種主觀情感上的波動希望是可以被容許的，那種下意識的引用撰述，那種脫口而出的「島邊語言」是一種文化的表現，是一種迷的正常反應。

但是書寫的當中我又被迫必須不斷質問自己的是：為何我對《島邊》感到著迷？《島邊》抒發了我何種的情緒？我在《島邊》裡面看到了什麼？《島邊》真的解決我所面對的問題嗎？如何解決及為何不能解決？

我從來就不是一個運動者、也不是一個學術論述者、更不是歷史學家，我只是希望藉由對比《島邊》時期及《島邊》停刊十年後的社會，論述的轉進及運動方式的改變來了解我所處的這片土地上的究竟呈現的是何種生活樣貌？

但，無奈，《島邊》的年代是我的差異！！

《島邊》的閱讀與書寫過程中，我極力為自己塑造和試圖沉浸在一個八〇年代末九〇年代初期解嚴前後的時空感中，想像著街頭外是動輒得救卻又進退兩難的喧鬧。

我想像著「心中有警總」的戒慎恐懼，我想像著在黨外人士政見發表會場上的慷慨激昂，我想像著中正廟絕食罷課最後離場的含淚悲憤，我想像著夜宿忠孝東路街頭冰冷的柏油路，我想像著農民請願運動衝突時在我頭上紛飛的棍棒，我想像著小蜜蜂一樣穿梭街頭到處游擊噴漆……，好多

好多慾望成為的身體！

我冀望我可以擁有身處那些社會佈景裡青壯年的成熟身體感覺，好讓我可以妥貼的書寫出那樣的年代、那樣的環境、那樣的心理感受…。

但腦中不斷穿插、復返著的，竟是我刻意壓抑、排除掉的「我的記憶」！另外一種「身體感覺」！

「解嚴」一詞對我的身體感覺並無太大的意義，它不在我的感知當中產生任何的改變，彷彿生活本來就是如此。

有的盡是消費型態的改變：第一次吃「麥當勞」漢堡時的驚奇、滿足，藉由夾著漢堡排的兩片麵包便自認吃進了「原來這就是美國」，產生一種莫名對美國文化的憧憬。第一次踏進「7-eleven」便利商店時，整齊、乾淨、明亮的空間感，使我立即就嫌棄起巷子那頭腐舊昏暗的「柑仔店」。更切身相關的是台灣經濟結構的轉型，成衣商場及進口名牌服飾的大量傾銷取代了傳統的西裝店和裁縫店，家裡的裁縫店轉型為委託行，進口舶來精品並兼賣一些珠寶首飾供其顧客搭配。

1987年11月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電視總是播映著煽情卻又極其真實的熱淚畫面，大家總是抱頭痛哭或是跪在死去的人墳前，焚香並淒厲吶喊。許多外省伯伯來家串門子的第一句問候總變成了「要回去看看嗎？」、「什麼時候要過去看看？」外省老伯準備啟程的前些天，總是會到家裡添購眾多金戒指、金項鍊，「買回去給他們當見面禮！」口中喃喃自語地盤算著遠在大陸親戚的人數有多少…，伯伯們回來時往往一個金飾也不剩，有的連領帶及衣服都被扒了去…。爸媽總是問「回去之後那邊現在怎麼樣了？」、「要再過去嗎？」伯伯們臉上總是悵然所失的搖搖頭：「不回去了！」、「回那兒去？我的家在台灣啊！」之後久了，大家就再也不提了，彷彿是去了一趟大陸「旅遊觀光」而已。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外省族群這些老伯們心中的感傷及無根的失落。

而另一方面的生活景象卻是爸媽從早到晚忙著招呼的不是我們兄妹三人的衣食起居或課業(日後他們也一直覺得愧對我們的「童年」…)，而是匯率急遽爬昇、股票萬點後從號子走出的「爆發戶」，和房地產飆高之後炒地皮的「田喬仔」。每個人手上像是有花不完或不知道如何花用的錢，出手闊綽地定製華服或添購首飾。委託行裡的企鵝、雨傘、鱷魚、YSL 等的進口名牌服飾或金飾珠寶像是不用錢般的迅速出清；而家中累積的財富也在號子裡、房產裡、大家樂、六合彩裡迅速散盡。回歸原點。

我的記憶，只是歷史記憶的極小片段…原來我不能只是學運分子、副刊寫手、黨外人士、女性主義者、同性戀、原住民…，我還得是進出號子的菜籃族歐巴桑、飛車奔馳的飆車少年、大家樂的簽注組頭、炒地皮的房屋仲介、…我不能只是一個我，要有很多個我、無數個我才能夠或永不能夠全備那段歷史的臉孔。後來我才明瞭《島邊》不是九〇年代的歷史全貌，它只是其中一個樣貌，跟國民黨所塑造的「民主化、現代化」的歷史；和民進黨所塑造的「美麗島、本土化」的歷史一樣，只是視角不同所構築出來的歷史窗口。

台灣經濟泡沫化(也相伴隨著社會力的泡沫)後，爸媽縱有埋怨，卻也沒對社會失望，總說：「那時，時機好，錢好賺，所以那些錢是加(多)出來的，料起(沒了)就算了！攔賺得有啊(再賺就有了)！只是現在較難賺，就賺攔少ㄟ！…我沒有親身見證到的是上層階級或知識份子及邊緣

弱勢團體在當時社會情境下的脈動，我只親眼見證台灣社會中下階層(縱使不夠資格成為「邊緣」)的「活力」！在資本、社會高低起伏快速變動的大環境下，為生存、求生活的伸縮性！

前時期的台灣社會的確開放出許多空間供其揮灑，諸多社運和知識份子也在其中攻下不少疆土，但當社會條件緊縮時，社會運動的工作者似乎只感嘆有志難伸，卻難以有這樣的伸縮性。對外要求「純粹」的訴求往往向內轉化：運動內部的運作是否民主化、是否也有「中心／邊陲」的壓迫性、是否有成為另一個權威／邊緣中心的嫌疑...，而這樣的內向自省轉化並沒有更加凝聚或提昇改造社會的動力，反而像個兩面刃殺了外面的敵人也砍了自己，或者反向造成內部的過分噤聲。

運動中的熱血及純粹性格，一直是我所景仰的，但，不是全有就是全無的零合邏輯，似乎折刺了不少人沸騰的激情、還有年輕尚未成形便夭折的理想！

* * * * *

記得口試時被問及到「我的左翼位置」，或許我可以很虛無、取巧地說：「任何位置都可能是我的位置」，但我喉頭一哽，難以回答。什麼是「左翼」？什麼是「位置」？什麼又是「我」？研所四年似乎未能讓我回答這個問題！也許一輩子也回答不出來，甚至忘卻這個提問...

選擇為《島邊》書寫，並非是想去責難或是去挑撥當時的衝突矛盾，反而希望藉由自己的書寫，重新開啟每個發話位置對話的機會和相互的理解。重新檢視當初解合的因素，是為了逃離不斷重複的錯誤；如果漠視當初解合的原因，此刻論述的重提和尋求重新的接合，則顯得沒有意義！

原本希冀從個人的生命史串聯出相同世代的生活方式或世代之間的差異感，可以形成一個具有空間感的「島邊史」。但一方面自己書寫技巧的魯鈍難以呈現；另一方面諸位口試委員也均對這樣的書寫方式提出異議。劉紀蕙老師直接點明部分文章片段過於零碎、無意義並淹沒研究者自己的聲音；林文玲老師更相當貼切地點出本文對訪談稿的排置，不像「對話」，而是偏向「焦點團體式」的書寫；陳光興老師更認為像在「寫腳本」，因為說故事的人(也就是「我」)沒有出場；還有就是柯裕茶老師長久不斷直指我書寫的盲點：太易受「受訪者」及「研究對象話語」的影響，希望我可以將「島嶼邊緣」當作一本「電視周刊」來研究。.....其實說直接一點就是我成了太容易「上身」的「學術靈媒」，學不會「退駕」。對《島邊》的「去神聖化」成了首要的功課，並開始針對諸位口委的評論，對文章作某種程度的精簡、修改。

我開始到處撿拾碎片，深怕漏了一塊，就無法完整「島邊」。...腦中閃過的盡是一幅幅「倒邊份子」的臉孔，受訪的模樣，訪談間的互動...。經過訪談和閱讀，愈接近、愈進入...，內心就愈排拒、恐慌...，害怕去定義、去詮釋「何謂《倒邊》？」

訪談和書寫的過程中，我清楚地知道，我並非主導者，反倒像個被用以爭奪「倒邊」詮釋權的一只「棋」。有些人選擇多說，有些人選擇少說，有些人選擇不說。說了的，說了多少？怎麼說？沒說到的又是什麼？當中的意涵及利害折衝我難以進入並分析。而我又如何以有限的訪談去面對無限的未受訪者和閱眾觀點？成為口試後的思考。

停筆才體悟，《倒邊》這個潘朵拉的盒子，真是「傻子」才會開！！

但我仍在撿拾碎片！而你們還有什麼沒說的？

2006.07 彰化